

目 录

第四国际論民族解放运动

- 一、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決議(1948年5月)…… 3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殖民地革命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決議(1957年10月)……44
- 三、关于殖民地革命問題
——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3
- 四、殖民地革命
——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決議(1961年1月)
〔已譯載《托派第四国际資料》第一輯〕
- * * *
- 五、阿拉伯革命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全体
會議上的报告…… 84
- 六、薩迪：“阿拉伯社会主义”和納賽尔的民族运动…… 123
- 七、让·保尔·馬丁：非洲革命…… 136
- 八、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决定时刻
——巴布洛于1961年7月18日从阿姆斯特丹獄中写給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的信…… 154
- 九、第四国际国际書記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決議…… 170
- 十、巴布洛：安哥拉革命进入第二年…… 175

十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新阶段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决议	186
十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促进拉丁美洲群众争取解放和自决的斗争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呼吁书	191
十三、杰尔曼：殖民地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	200
十四、赫多·卢塞罗：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	221
十五、关于古巴革命的性质	
——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272
十六、保卫古巴革命	
——智利革命工人党决议(1961年6月)	281
十七、巴布洛：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	294
十八、列维奥·麦丹：一九六二年的拉丁美洲 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经济展望	309
十九、列维奥·麦丹：印度决定性的十年	338

一、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世界革命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1948年5月)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地革命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殖民地国家里爆发了一系列争取民族解放的激烈斗争。这些斗争表现了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帝国主义的危机，从而把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问题提到了突出的首要地位。到目前为止，在本世纪的历史斗争中，尽管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地区，尽管对这些地区广大人类群众进行的超额剥削是物质和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尤其是欧洲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实际基础，这些问题一直是处于次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各殖民地国家的斗争说明，在每一个落后国家里，政治觉悟的提高是如此迅速，其规模是如此巨大，使得在那里进行的斗争已经达到了同欧洲的阶级斗争相等的水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事变特别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里已经实际爆发的斗争，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使本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同时也是、而且主要是向着夺取政权的目标前进。这乃是当前时代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斗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要想谋求解放，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尽管是通过消极方式，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斗争史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即不论无产阶级人数多么少，争取民族解

放的斗争不由它来领导是不能清清楚楚到达真正的出路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但在把本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下解脱出来方面无能为力，而且事实上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国家继续置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不得不和他们最初阶段与之展开过斗争的同一个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以便平息并粗暴地制止工农革命斗争，甚至是把它镇压下去。

此外，远东的战后斗争，尤其是在爪哇和越南的斗争，还通过揭示世界革命的相互配合性来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有效性。在各个落后国家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跃进，这个跃进使得殖民地革命的步伐与宗主国国内革命斗争的步伐日趋一致，甚至在某些时刻还超过了它。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是俄国的工人夺得了政权，一些激烈的斗争使得一系列欧洲国家发生了动摇；另一方面是在非洲和亚洲紧接着大战的告终而采用罢工和示威游行等方式进行的斗争尚未达到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势有了惊人的变化，甚至是反了过来：一方面是在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这些运动由于其阶级组成而趋向分裂，同时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发生了阶级斗争，但这些斗争在尚未上升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以前，或者是在刚刚达到这个水平的时候，便在西欧为帝国主义所镇压，在东欧为斯大林主义所镇压；另一方面则是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迅速地以巨大的毅力上升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而且事实上，在一定时期，还真的把政权从法国和荷兰手里夺了过来，为民族主义力量所掌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实际斗争以及它们的暂时夺得了政权，有力地为了下列事实作了卓越的说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斗争是当前战争和革命时代的一个基本的重要部分；实际上，这些斗争本身就包含着为夺取政权而必需的力量

(正像不断革命論所闡明的那樣)。这些斗争的目的之所以沒有能够实现,其原因是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同远东斗争的全局(中国的内战,緬甸和印度的各项运动等等)联系起来看,上述事实不仅說明殖民地斗争的特定意义正在日益增长,而且說明这些斗争的国际意义在不断提高;对于帝国主义來說是如此,对于为爭取解放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來說也是如此。

下列各因素对于长期以来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不断成熟的危机給以較大的推动力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危机是經濟、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国内因素多年积累的結果。

甲. 帝国主义統治者,在遭到了慘痛的挫敗之后,威信大減。以往倍受鎮压和恫吓的各国人民已經懂得,他們的主子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他們的解放意志有了重大的发展。

乙. 战争的变化使得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間的关系大为松懈,在某些情况下則是全部断絕。新的占領者代替了传统的压迫者,在不同程度上打乱了旧秩序。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种例子。日本人在投降以前就为成立要求“独立”的民族政府創造了条件。

丙. 战争使得老牌帝国主义列强(英国,法国和荷兰)同它們的某些殖民地之間的經濟联系陷于松弛,尤其是妨碍了宗主国向殖民地提供装备。同时,这些列强却仍然对这些殖民地保持着經濟和軍事控制,在不同程度上封鎖了殖民地向其他列强购置装备的买卖和一般貿易。这就使得殖民地的經濟情况更加恶化,使得帝国主义給这些殖民地带来的慢性危机更加显得尖銳化。

丁. 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絕對削弱和相对削弱以及美帝国主义的飞黃騰达,使得殖民地的某些資產階級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在从属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条件下,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

間的矛盾中获得利益。

根据上述扼要事例可以看出，殖民地国家所經受的震蕩远非出自忆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就已是被压迫群众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觉醒的起点。但是，同今天的斗争规模相比，同今天无产阶级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老牌殖民主义帝国所經受的震蕩程度相比，当年的斗争规模，当年无产阶级的特种独立作用以及宗主国經受的震蕩就微乎其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便在少数几个国家里发生了革命运动，又过了几年，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才又发生了别的革命运动（1921年、1930年和1932年在印度，1926年在中国，1926年在摩洛哥等等……）。在当时，力量尚属微小的无产阶级是跟着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国民党）走的。英国、法国和荷兰几乎是纹丝不动地保住了原来的统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革命危机则波及到了远东，也波及到了印度尼西亚和近东的每一个国家，还波及到了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规模大小不一，特点也不相同）和每一个北非国家，就连非洲南部的民族也有了觉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他们占全人类的绝大多数——不再是像二十世纪初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政策消极对象的那些人民了；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标志是欧洲各民族的觉醒和他们宣告要独立，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标志将是亚洲及北非各古老民族提出民族的要求，将是非洲大陆各个辽阔的黑人国家的觉醒和民族觉悟。

随着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而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一个主

要特点是各个大殖民帝国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不能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这种发展把宗主国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同帝国主义大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大大地提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斗争的特种意义。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危机的深度，主要可以用下列事实来加以衡量：它们原先用来收买国内无产阶级一定阶层的那一大部分超额利润消失了，它们再也不能不运用大幅度降低宗主国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平衡。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伟大革命斗争来看，世界革命的国际配合性，从来也没有表现得这样明显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在一系列国家里（越南，印度尼西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目前正进入停止状态，而且正在后退。帝国主义能不能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当中重新建立它们的控制呢？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殖民地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等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排除了旧事物以任何形式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不得不另行策划新的殖民主义统治方式。但是，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当前状态，由于老牌帝国主义的削弱，由于美帝国主义不可能取代老牌帝国主义，或到处去支持这些老牌帝国主义，由于土著资产阶级的基础的薄弱性，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组织的不存在，所有这些情况使得殖民地国家里的各种矛盾比起宗主国里各种矛盾来要深刻得多得多。因此，即便是在宗主国内把工人运动镇压下去（这种镇压本身并不是能够迅速做到的），也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时期，不在各个殖民地里很长时期地延续下去，不能阻止帝

国主义統治，在一段长时期內，仍然具有深刻的的不稳定性。

另外，由于还有許多危机，殖民地国家一定会发生为爭取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一定会发生为建立工农政权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土著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各个殖民地国家是第四国际要去建立群众革命政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为了殖民地被剝削者的胜利，这种政党是必不可少的。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遭受了挫折，这是它們的运动陷于孤立的結果，这种孤立的由来是宗主国的援助不够，是因为斯大林分子的背叛行为，是因为各个革命党的薄弱，尤其是因为在两个远东最大的国家里，革命进程的发展不平衡。这两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

远东各个斗争发展上的不平衡，正在通过彼此間的配合来获得克服。另外，这些斗争的发展还受到了日本斗争发展的影响；在日本，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断騷动，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了失敗。

二、世界的重新划分和列强之間 在殖民地里的新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传统的国际力量对比。当初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占优势地位的英国，其力量发生了深刻的消亡，而美国則从中获得了利益，英国不得不另行制定一套新的帝国战略。美国在走向統治全球的道路，不能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予以特别地关怀。在这些国家里，老牌的統治者搖搖欲墜，而这些国家的战略地位、天然資源（石油、鈾矿等等）、广大市場以及投資場所等等許多方面更是引人注意。結果，美国在这些国家里占了越来越优势的地位。

美国把它的障地扩充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还有另外一种必要,那就是它想制止苏联扩大它的影响,并且在一旦同苏联发生冲突时,保证自己处于有决定意义的地位。

(一) 英国的后退

甲. 迄今为止,英国在远东的后退表现得最为明显。1939年时,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投资(一百亿美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是,由于战争关系,美国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顶替了英国,英国几乎放弃了它在中国的全部利益。它主要保留了香港这个十分重要的障地;但香港是孤立的。总之,英国打算在太平洋上占有的势力很小,太平洋变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美国大湖。

乙. 前前后后好几十年,近东和中东曾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些地区差不多是为英国所专有。当时,英国把控制远东和中东国家看做是同由它来操纵的远东帝国生死有关。发现了石油层以后,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更为增加了。

直到今天,英国在这一地带的障地依然是强大的,但它目前的趋势是,在美国的渗入面前作出让步。同时,英国的影响也正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伊拉克和约旦仍然是英帝国主义的中东支柱。反之,英国在进行了一场国际对抗之后,在伊朗的势力有了下降。苏联对伊朗施加压力的规模,促使美国加紧了干预;美国已经不再单单依靠英国来堵塞苏联的进路。从此以后,英国便把自己的势力压缩到了波斯湾沿岸的南方油田地区去。

英国目前在埃及的障地是完全靠不住的。埃及在大战期间取得了经济发展以后,这个国家的社会矛盾比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尖锐。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人民压力异常强大,英国将会被迫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和血腥镇压来保住这块障地。在这种

耗資巨大和富于冒险性的解决办法面前，英国已經不得不考虑在一个比較短的时间內从埃及全部撤退。

英国被迫从巴勒斯坦撤走了军队，这也是因为在战后的骚动面前，在反帝情緒的崛起面前，在帝国财源减少、不得不压缩开支面前等等，英国已經无能为力。

丙. 通过上述考查，可以看出，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殖民剝削在形式上有了改变，同时，英国的帝国战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英国不得不縮减軍事力量，因此它已經不再用派駐军队的办法来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英国已經被迫寻求同中东、近东殖民地国家签订協議的办法来在这些国家保持它的經濟利益和財政利益。它在印度和緬甸奉行了同样的政策。

从战略角度来看，英国事实上已經放弃了对地中海的控制，而只保留了几个有决定意义的基地；这些基地是馬尔他島，塞浦路斯，直布罗陀和利比亚港口（土布魯克和本加西）。总之，美国正在地中海上取代英国的地位。

丁. 根据国防部計劃，英国在战略方面和經濟方面已經撤往黑非洲。英帝国已經把它的防御中心設在肯尼亚的奈罗比附近。与此同时，英国已經計劃开发全部非洲資源。这些資源經過大力开发以后，一方面可以抵銷英帝国在其他地区蒙受的損失，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非洲集团实现由于它的战略地位而必不可少的經濟自給。英国已經向南非联邦作出了年达一亿英鎊的巨額投資。与此同时，許多英国企业也已經按照宗主国工业下放和巩固非洲帝国等統一规划，在南非設置了分公司。在英属东非，类似的开发工作也正在一个比較小的规模上进行。

(二) 美国的扩张

美国仗着经济和财政上的无比威力，它在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来往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对待美国，并不像对待老牌殖民主义列强那样深具戒心。

甲. 在远东

强大的日本垮台以后，美国成了太平洋地区不容置疑的主人。美国独自占领着日本，正在把日本变成它在远东的主要堡垒。美国恢复了日本工业某些部门的生产，特别是纺织工业的生产。日本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充分投入生产，引起了英国和中国的巨大不安。美国想使日本重新成为远东的工业中心。

占有中国的广大市场，是美帝国主义的首要目标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要把中国划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而是要实行个人有权采取主动的自由。由于经济上的压倒优势是在美国一边，美国也就能够独占整个中国市场。但是，自从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实现这项政策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内战，通货膨胀，贪污，盗窃等等，还有美苏之间在远东的对抗。苏联在远东占有着重要的战略阵地（旅顺，对于大连和铁路享有的权利等）。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夏季，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提供这种援助的理由是中国内战的再起，和苏军撤离满洲以后，中共军队进入了这一地区而形成的危险。

1946年1月，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将军为结束中国的内战作出了努力，他想用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其中占有一席地位的联合政府的办法，来促使蒋介石和共产党双方达成协议。美国这项企图自有它自己的用意，美国必须使中国停止分裂状态和地方性的内

战，因为这种分裂和內战会使中国无法进行严肃的經濟建設，会使华尔街渗入中国的計劃难以兌現。馬歇尔使命的失敗和蔣介石对于美国資本想要充分控制中国而作出的抗拒，使得美国从 1946 年 9 月起突然中止了軍事援助。但是美国对中国的事态是不能漠不关心的，它不能容忍苏联在这样一个幅原辽阔的国家里扩大影响。政府軍由于缺乏弹药而不能繼續利用美国武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华盛顿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又向它提供了大量的紧急援助。

美国在爬上了太平洋的許多島嶼之后，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統治。1946 年 7 月 4 日美国正式宣布給予菲律宾以独立，但是这个島国的被奴役地位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此外，美国对于美拉尼西亚和玻里尼西亚的用心，不能不引起它和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之間的磨擦。

乙. 对老牌帝国的渗入

美国在远东建立了霸权之后，必然要侵占老牌殖民主义帝国在地球这一地区占有的土地，而其中最值得染指的，当然是像法国和荷兰那样衰弱了的或者是遭受了破坏的帝国主义所占有的土地。美国为让这些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重建其統治而提供援助的結果，只是巩固了美国对于东南亚的抵押权。最近，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同荷兰进行談判时，美国就用强人接受它为具有无上权力的仲裁者的手法，为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創造了方便。在越南，美国的幕后干預对于談判发生的影响与日俱增，美国施加压力的主要目的是根除斯大林在越南的影响，并使战争早日結束。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美国已經把法国在太平洋上占有的土地(新喀里多尼亚島和法属大洋洲群島)广泛地置于自己的經濟控制之下。最后，美国追求的利益就連葡萄牙在远东占有的土地也不放过，特别是澳門，由于澳門在战略上显然占有重要地

位，美国人可能想在那里建立海軍基地。美国在英屬安的列斯群島上的影响也大为增强。英国对此感到了震惊，它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安的列斯联邦来抵制这个强大毗邻的威胁。

美国还向非洲渗入。它在南非的利益有增无已。它对德士瓦的工业进行了广泛的投資，并且在金矿方面取得了新的陣地。美国資本对于法属黑非洲的市場也感兴趣。

在法属西非，美国主要是通过私人投資和提供物資及資本的方式向摩洛哥进行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美国已經成了这个阿拉伯王子帝国的主要供应者。类似的傾向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有所表现，尽管不像在摩洛哥那样明显。

丙. 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美国对于地中海东部采取了比較直接的渗入方式。1947年5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以及杜魯門总統发表的演說，标志了美国对于这一地帶的政策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轉折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的专门用于軍事及战略的一亿美元貸款(修筑公路、鉄路及机場，各个港口的现代化及軍隊的摩托化)，把土耳其变成了美国用来进行反苏的前哨堡垒。

美国近来取得的对于伊拉克軍隊的軍事控制，为美国在这一地帶苏联边境綫上采取的安全措施作了补充。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由于法国的撤离和英国同这两个国家关系恶劣，美国大力发展了貿易往来，美国的商品淹沒了这两个国家的市場。

自从伊本·賽烏德当政之日起，美国便运用巧妙的政策在沙特阿拉伯成功地取得了对絕大部分領土的排他性的租让权。伊本·賽烏德毫无保留地把采地授予了美国的各大石油公司。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无不处处占上风。对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衰弱下来或是遭到破坏的一切其他列强来说，美国在经济上、财政上都占压倒优势，这为美国向地球上的其他新地点进行渗透来说，日益有利。但是，这种渗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国和南美，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英国挤了出去；但是，在印度和非洲，这种进程就慢得多了。

美国对于殖民地国家进行的干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对那些基础发生了动摇的各个帝国主义提供了援助，援助它们在受到直接威胁的地方去恢复秩序并重新建立它们的统治；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利用这种时机向这些地方进行了渗透，为在这些地方取代上述各帝国主义作出了准备。对于这些老牌的殖民主义列强来说，美国提供的这种援助是一种一刀双刃的做法。

另外，美国的财富，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软弱的资产阶级来说，有着一种无可否认的吸引力，并且具有破坏老牌帝国的趋势。美帝国主义可以向这些资产阶级提供一种经济上为他人附庸而表面上却政治独立的前景。这种所谓政治上独立的含义，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来说，首先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紧剥削土著群众的权利和留在美国政策轨道上的义务。

(三) 国际对抗地区

美国进行扩张这个新的事实，打乱了旧的列强对抗形势图。

在远东和中东，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对抗，主要是苏美之间的对抗。

甲. 在远东，苏联和美国特别是在中国和朝鲜互相抵触。苏联在从满洲撤兵以后，企图通过毛泽东的军队在那里一再发动进攻来继续把满洲置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朝鲜自从1905年起即为日本所统治。1943年，在开罗会议上，朝鲜获得了中国、美国 and 英

国正式承认其独立，以后又在 1945 年莫斯科会议上，获得了苏联正式承认其独立。然而，大战结束以后，上述事实并没有能够阻止新的胜利者在这个国家里展开了一场真正的竞赛，其结果是把朝鲜半岛，一半一半，截然分开，成了两个互相隔绝的地区。苏联占领了北部的工业区（煤，铁和发电），美国则占领了人烟最稠密的、主要是农业区的南部。就这样，朝鲜的经济生活遭到彻底的破坏。

近东和中东是另一个角逐场，竞争的目标是石油和对东地中海的控制权。最近这段时期，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获得了进展。美国在伊朗和土耳其取得了多大进展就等于苏联在该地区作出了多大退却。在瓜分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苏联所采取的态度，说明克里姆林宫希望在将来，利用由于英国的撤退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向近东进行渗入。

乙. 为了应付苏联的危险，美国和英国想尽一切办法来使彼此的政策一致；但是，尽管如此，这两个列强在有些地方，还是存在着严重的磨擦。

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日本，奉行着反对英国的政策，这种政策不能不让伦敦商业中心的老板们深深地感到不安。

总的说来，英国对于美国就英属自治领和殖民地施加的经济控制表现了不安，因为，大战期间，英帝国联邦若干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亚，安的列斯群岛，南非等）越来越为美国所控制。目前，英国正在试图不顾美国的要求，用维持并加强帝国特惠税制度，加强帝国的经济团结以及勒紧其在非洲的占领地（拒绝把西南非洲交付联合国托管，实行泛非计划等等）等办法，来抵制美国进行渗入的逆流。

三、帝国主义寻求新的統治方式

在新的形势之下，帝国主义不得不修改一下他們的传统的統治方式。他們要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地繼續統治被奴役的人民，已經不可能了。当群众的要求已經成了一股太大的力量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为了避免什么都丢掉，就越来越不得給予群众以名义上的独立。在各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公开的斗争，或是推迟这种斗争，帝国主义者竭力使用表面上的民主来掩盖自己的統治。这一类的企图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面設法到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里面去寻找更为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則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内部去鼓励或甚至是制造人为的分裂。

大战結束以后，帝国主义曾立刻试图在联合国范围内，給予这种新的殖民主义統治方式一种国际上的法律公式，也就是“托管制度”。但是，直到现在，这种公式缺乏任何内容，因为老牌的帝国主义者們一般是都拒絕把它們的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交付“托管”。另外，联合国非但没有对如何使这个哗众取宠的公式付诸实施表示过任何关切，非但没有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进行的干涉表示过反对，相反的，联合国在它的安全理事会上还表现了自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例如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干涉，就是这种情况。在印度尼西亚，联合国成了反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意願的美帝国主义意志的代言人。

在独立的要求已經无法迴避的国家里，帝国主义者越来越趋向于用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合作和达成更多的妥协等手段，来进行**間接的統治**。这种政治手段的趋势是，尽量掩盖这样一件事实，即宗主国在允許一些国家“独立”之后，对于这些国

家的經濟仍然保持着极端广泛的控制，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控制。对于这些国家的經濟，帝国主义通过其影响的简单比重来繼續实行其統治。

另外，帝国主义越来越趋向于采用制造分裂和人为的分立等办法，企图对正在进行反抗的殖民地保持自己的統治。在过去，殖民主义的贊助者往往提出来說，殖民主义在一系列国家里起了統一作用；而现在，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为了維持其統治，已經不得不把这种“統一”作用論收起来，而制造了一种新的分立主义（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勒斯坦等）。在各个殖民地里，这种进程的发展并不一致。它在远东及近东的某些国家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反之，在反帝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发展仅仅是在开始，同时，这一发展，虽說是在闊步前进，但同远东各国相比，仍然十分落后的中非和南非，老牌帝国主义的障地則有所加强。

老牌帝国主义在实行其新的統治方式时，并没有什么系統化。相反的，他們凭經驗行事，摸索着来，时而猝然改变做法，他們根据所遇到的压力大小和力量对比的不同，对此一国或彼一国而变化方法，关于这一点，人們只需考察一下不同帝国主义的各項政策，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 英国的政策

世界大战严重地动搖了古老的大不列颠帝国。在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英国在亚洲的障地就已經在經濟方面和社会方面遭到了日本有力的袭击。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发动的軍事进攻，只不过是它的經濟攻势的必然后果。英国军队于日本投降后，重新回到緬甸和馬來亚时，它所看到是經過战争和被占領之后，經濟上陷于瓦解，政治上被民族主义的希望掀起了巨大浪潮的一些国家。如果

說，在整个大战期間；如果說，在 1942 年 8 月起义被鎮压下去以后，开始了一个真正的軍事独裁时期，那么，反叛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而未能在群众中联合起来。1945 年 11 月，当英帝国主义对商德拉·博斯的印度国民軍老战士们提出控訴时，这些反叛力量便揭竿而起。游行示威和举行罢工的浪潮席卷了全国；随后，1946 年 2 月，印度皇家海軍进行了暴乱，他們的斗争得到了孟买工人們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像警报一样，在帝国主义的耳朵里响了起来。

英国当时是不能用加强軍事机器和鎮压机器的办法来解决問題的，因为它那經過大战而肯定衰弱了的經濟地位不許它这样做。于是它便用給予名义上独立的办法来謀求解决。这种独立戏剧性地表现为英国軍队的撤退，而留下来的則显然是仍旧完整无缺的英国进行統治的基础。这种手法在印度表现得最清楚。英国通过建立像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这样两个既无地理团結，又无經濟团結的人为的国家而一举两得：它一方面在表面上滿足了群众的民族主义的願望，并且把两个宗教性社会对于帝国主义的敌視一轉而为它們彼此間的斗争；另一方面，它使用让两个印度国家彼此为敌的办法，不可救药地削弱了这个国家，使它在經濟方面不可能获得任何的严肃发展，并且为自己准备了进行阴谋策划的广闊地盘。这样，英国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可以保住它对矿山、种植园、工厂以及銀行等的占有权。由此可见，印度独立的意义是帝国主义不再直接对这个国家进行統治，而是通过在那里的资产阶級和土著封建主来进行統治，同时，印度的分裂又为印度资产阶級和穆斯林资产阶級的服从英国，提供了保証。

緬甸的失去独立，只是比較近来的事(1816 年)；大战期間，緬甸的群众对于英国剝削者采取的敌对态度，是用拒絕站在同盟国的一边来参加战争而表达的。日本投降后，这种敌对态度又表现

为长时间的举行动乱，进行分立主义的示威游行和民族主义的骚动。在这个国家里，英国也不得不寻求一项解决办法；它在同反法西斯联盟进行的谈判中，找到了这种解决办法。反法西斯联盟原本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广泛组织，它包括的成员有共产党、社会党、仰光工会组织和农民协会。1946年由于其领袖奥格·桑进行了清党，反法西斯同盟变成了有产阶级的反动武器。缅甸的独立实际上是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压榨群众的责任托付给了缅甸的有产阶级。同时笼罩着全缅甸的内战的地方形势，波及到了资产阶级和半封建阶级各个阶级的内部不和，使得当权的人不得不向英国呼吁，要求给予支援。

在马来亚，英国允许了当地的资产阶级比较广泛地参加政治生活，但是对于那里的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却保持着牢固的统治。

非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远东各殖民地的发展，英帝国主义在那里保持着它的传统的统治方式。英国力图用资本大量出口的方法来在非洲进行扩张并加强自己的权力。大战以后，英国的投资方向主要是南非，其次是西非。就这样，英国帝国主义通过从中东和远东撤退，克服了发展上的不平衡，但是它这种克服不平衡的结果却产生了东方和非洲日益增长的相互配合，这种配合正在为可怕的非洲帝国挖掘坟墓。

(二) 法兰西联邦

在法国被占领期间，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不得不广泛地依靠非洲殖民地。正因为如此，戴高乐才向土著居民许下了诺言，答应改善他们的处境，好让他们为战争出力。这项诺言可见诸布拉柴维尔会议发表的声明。布拉柴维尔会议于1944年年初，提出

了战后将来殖民地組織的各大要点。法兰西联邦一語就是在該會議上以取代法兰西帝国的形式提出来的。會議建議成立一种由海外人民自由参加的、同法兰西共同成立的联合体。最令人注目的是有关取締强迫劳动，給予組織工会的权利以及成立一个非公民团，賦予土著居民以选举权并保証他們在宗主国国民議會里具有有限定名額的代表等各項决定。

实际上，这些决定的有效范围是有局限性的，它們一点也沒有改变殖民地的剝削制度。强迫劳动通过种种借口又加以恢复，工会权也不断被行政当局和移殖民加以破坏。至于說到选举权，向法国議會派遣几名議員，並沒有能够使殖民主义有所和緩。更有甚者，享有无上权力的行政当局和移殖民們，用尽了各种方法，如施加压力，进行恫吓和腐化收买等等，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选举殖民地群众的真正代表成为根本不可能。

在法兰西联邦的民主招牌下，事实上，鎮压变得更加空前的残酷，更加空前的难以容忍，1945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屠杀，还有在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和越南战争，就是一些例証。

根据新宪法产生的法兰西联邦議會完全是一种諷刺。表示願望是議會的唯一权力，它不是任何选举的产物，因为議員当中，有半数是按照行政当局的个人爱好的反映而派来的。

法兰西联邦的政策，在企图比过去更加广泛地利用土著资产階級来充当帝国主义的传送带这一点上，是和英国目前的政策如出一轍的。但是，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有一点不相同，那就是法国在經濟方面遭到的損失和削弱比英国尤甚，因此，法国在作出让步时，其活动余地比英国小。另外，法国所面临的殖民地资产階級，不論是在哪里，都沒有像印度的资产階級那样发达。法国的让步以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給予独立为最高限度，这种范围实际

上等于一把铁锁：外交和军队仍由法国掌握，财政以及整个经济仍须服从宗主国的利益，等等。在这种条件下谈独立，只不过是一种赌注和讽刺而已。

(三) 荷兰的政策

将近三百年来，荷兰资产阶级的财富是用对印度尼西亚人进行疯狂剥削得来的。处在最残酷的奴役制度之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早在1914年前就已经开始道出了他们对于独立的愿望。从1942年2月起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在投降以前，为成立以苏加诺博士为首的独立政府创造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摆在荷兰人面前的已经是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印度尼西亚独立了。在当时，对于荷兰人来说，那怕是有英国军队的援助，要想重新征服一个已经举国揭竿而起的、反对它们的统治的国家，已经根本不可能。然而，荷兰人也并不甘心眼看着这个荷兰的收入源泉跑掉。

1942年12月，威廉敏娜女王发表声明，代表荷兰政府宣布，大战结束以后，要成立一个联邦，在这个联邦内，宗主国和殖民地将享有平等地位。在荷兰政府同印度尼西亚民族政府进行的激烈谈判中，这种“平等”的含意就昭然若揭了。从其基本各点来看，荷兰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法国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政策并无二致；荷兰也想依靠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但是由于荷兰的衰弱，由于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剥削对荷兰来说生死攸关，荷兰在作出让步的道路上，无法再朝前进。实际上，荷兰拒绝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它力图把这个年青的国家置于双重障碍之下：第一，把印度尼西亚作为印度尼西亚联邦成员国之一。印度尼西亚联邦是在荷兰的最高照顾下成立的，包括加里曼丹共和国和东印度尼西亚（小巽他群

島,西里伯斯,馬魯古群島,新几內亞等)聯邦。第二,像法國在交趾支那所試行的那樣,成立一個荷印聯邦,荷蘭想用甘脆在全國不同地區製造分裂主義運動,以致力於分化印度尼西亞的資產階級。

1947年7月,荷蘭發動了新的軍事進攻,進攻的目的是要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予以最後扼殺。應該着重指出的是,荷蘭之所以能夠在印度尼西亞繼續保持其陣地,是因為英國於1945年8月進行了軍事干涉,是因為英美向荷蘭提供了軍事補充物資。美國在印度尼西亞的石油上,在印度尼西亞的橡膠和錳的貿易方面,享有利益。

四、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統治的新方式

所有上述的間接統治方式,其價值是相對的和暫時的。帝國賦予殖民地資產階級以比較重要的地位,只能是準備下了更加尖銳的階級鬥爭,使勞動階級更加直接地反對他們的土著剝削者。群眾必然會看透這樣一點:不推翻土著資產階級,不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就不可能從帝國主義統治下獲得徹底解放。

在過去,人數上力量薄弱的、同地主階級具有聯繫,有時還就是一回事的殖民地資產階級,只是懦怯地反過帝國主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擴大自己的利潤和剝削的基礎。當時,為了進行反帝鬥爭,殖民地資產階級需要獲得群眾的支持,但是同時他們卻又害怕群眾運動,主要是害怕土地革命,他們所一向關心的是怎樣才能同帝國主義達成妥協。

帝國主義企圖採用新的統治方式之後,殖民地資產階級在這種間接統治的方式裡面,佔據了比較重要的地位之後,就成了帝國主義的更加堅決的同盟軍,成了群眾的更加直接的壓迫者,在此同

时，他們就更不能起严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了。

至于在像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那样的、革命运动已經大规模展开了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表现是：他們不再在对帝国主义唯命是听和反对劳动群众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所仅有的一点反帝斗争几乎是全部一笔勾销了。有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仅仅是为了服从另一个更加强大的、能够保护他們反对群众运动的帝国主义时，才表示願意进行斗争。法国的有些殖民地，例如摩洛哥，看起来就是这种情况，美帝国主义对摩洛哥的渗入正在日益扩大。

遭受英国帝国主义統治的土著资产阶级本身有一种表面上向外发展的趋势。例如埃及就是如此。埃及对利比亚和英埃苏丹，主要是对后者，提出了严重的主张。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说，这种趋势并不说明土著资产阶级的力量或者是他們的独立在日益增长，而是说明土著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无法同帝国主义在主要市場上进行竞争，说明他們想到比較衰弱的国家里去寻找市場。这种趋势说明了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充当中介人的土著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同时，在一般情况下，也说明了土著资产阶级是在如何地服从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列强。土著资产阶级为了应付帝国主义列强和加强自己的陣地而进行的斗争，说明他們与日俱增地变成了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互竞争和对抗的牺牲品。

不同国家的不同资产阶级政党，表明了这个阶级的不同的性质。

在中国，国民党目前已經分裂为許多个相互对立的集团，迄今为止毫无結果的，拥护革新的示威游行，首先是些对最雄厚的中国资本家有利的改革国民党的企图。向美帝国主义投了降的国民党

日益失掉其群众基础，并且在农民紅軍的面前不断地遭到挫敗。同美帝国主义有着联系的国民党，针对一切中国群众，正在起着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作用。国民党資產階級的买办性从来也沒有像他們在帝国主义面前卑鄙地投降表现得这样露骨过。中国資產階級同美帝国主义之間存在的矛盾越来越从属于苏美双方在中国的对抗和中国国内的階級斗争。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分裂是在資產階級民族主义领导陣营内部表现出来的。1948年1月，沙里尔和他手下的人同社会党决裂，表现为日益倒向投降主义，而新政府则承担了将大片国土出让給帝国主义者的条約的責任。在穆罕默德·哈达的领导之下，穆斯林馬斯友美党，苏加諾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还有社会党和斯大林主义党，又重新糾合在一起。

在印度，帝国主义剝削的性质，並沒有因为它的統治方式由直接过渡到間接而产生质变。帝国主义通过其經濟在整个印度国内的单纯压力以及它对印度洋的控制而进行着統治。所有的貿易銀行以及絕大部分对外貿易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帝国主义占有着經濟方面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部門(矿山，种植园，黃麻，除去鉄路以外的运输，保险，还有一部分紡織工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印度資產階級分到的利潤，毫無疑問是有所增加的，特别是在紡織工业方面，但是，在經濟的其他領域方面，他們所分享的利潤仅占次要地位，而且即便是在印度資本已經打进去的那些部門里，要想最后改变英国資本的优势地位，印度資本多多少少是无能为力的；印度資本面临着被挤垮、被淘汰的危險，尽管它采取了一些中断英国資本进行投資的措施，而且在这一点上，通过对工人們的进一步加紧剝削，抵銷之后还綽綽有余。基本工业仍然是沒有获得发展。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資產階級是无能为力的。尽管

在作为工业大发展最基本前提的重工业方面(例如鉄和鋼)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但电气化还是没有发展起来。印度资产阶级要想起任何重要的独立作用,都要求国家的高度工业化,主要是发展基本工业,而这一点,在帝国主义統治之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印度,沒有高度的工业化便不可能談什么本国资产阶级的独立作用,而在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高度工业化是办不到的。因此,对于印度资产阶级来说,在购买工作母机方面,要同握有大量外汇的国家扩大其独立貿易是不可能的。

綜合上述各项因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尽管英国帝国主义撤走了它的占領軍,印度洋仍然是英国的湖泊,从这个湖泊出发,英国是可以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资产阶级身上的。

尽管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經在殖民地地位的阶梯上爬了起来,但它并没有从殖民地地位的阶梯跨到独立地位的阶梯上去。

泛印大会是印度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利用群众的战斗性取得了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些让步。泛印大会上台以来所进行的至为粗暴的镇压,已經說明了这一政党的阶级本性。

由真納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在印度国会的部长們采取了土地政策而又不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并且对大地主施加保护之后,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了群众基础。穆斯林联盟既糾合了若干封建分子(这些封建分子把穆斯林联盟看成是他們的特权的堡垒),又糾合了淹沒在印度资本家之間的新兴的穆斯林资产阶级,还有那些被迎合人心的拥护土地改革所吸引来的农民阶层。穆斯林联盟虽然是在巴基斯坦掌握了政权,但是这种离奇的大杂烩,早晚是必然要爆炸的。

在中东,1945年在英国唆使之下成立起来的阿拉伯联盟,一

方面糾合了利益上有分歧的各国首脑，另方面也糾合了一些相互对立的社会阶层，直接向帝国主义卖身投靠的老封建首領和寻求扩大其影响和市場的新兴資產階級。結果是阿拉伯联盟并不具备真正的一致性，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达成協議。沒落的封建主义和只能仍然是个早产儿的阿拉伯資產階級，誰也統一不了阿拉伯世界。

五、殖民地的农民和无产階級

資本主义給殖民地国家带来了資本主义經濟成分，这些資本主义經濟成分又在殖民地国家里引起了老的社会結構的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这种运动加速了。由于战争的原因，必須发展一系列殖民地国家(埃及，巴勒斯坦，滿洲，朝鮮，中国的某些地区，等等)的經濟資源。

尽管有了这些經濟上的发展，但是在各个殖民地国家里，从經濟的性质來說，占上风的依旧是农民。

我們把殖民地国家分为主要的两类：

甲．很久以来就已經有了一定的民族觉悟的国家，例如印度，中国，越南，滿洲，朝鮮，印度尼西亚，中东各国，埃及，北非等。这些国家的整个結構是相类似的，問題也是雷同的，虽然它們彼此之間存在着很大的差別。这些差別的由来主要是它們的經濟发展水平不一。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农民占全人口的絕大多数。这些农民过的是极端貧困和朝不保夕的日子，他們所有的是一些无法賴以为生的小块土地，而另一头則是一小撮大地主分占了絕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国家里，高利貸是不断地在农村人口中流行泛滥的禍害之

一。到处是饥饉或多或少地长期威胁。所有这些情况把农民置于了不折不扣的农奴地位，使得**土地革命**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动力。特别是在远东，由于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农村矛盾，土地問題成了更加尖銳的問題。由于这种原因，农村里的阶级关系具有着一种特别的爆发性。

乙. 民族意識正在开始觉醒的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

这些国家的特点是社会的分化比前一类国家要远为落后，和存在着旧的部落结构的残余(赤道非洲，比属刚果，葡属西非和东非，西非和东非的英国領地)。当地人口的广大群众在古代的条件下从事耕作，往往是在村庄的基础上从事集体劳动。他們的痛苦是殖民行政当局的滥用权力(对于耕作权的限制，强迫他們按照行政当局规定的市价出售产品，賦稅，强迫劳动等等)。

占有广大土地的主要是殖民地公司。资产阶级不过是在刚刚露头，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他們一开始就被各家大公司的竞争所压倒(不通过这些公司的居間就不許經營进口或出口)。騎在群众脖子上的一般都是些由行政当局委派和收买并被行政当局主要用来征收稅款的村长。

无产阶级人数极端有限，他們集中在少有的几家运输企业里(铁路，港口，邮局)。

在殖民地国家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些国家被压迫群众的經驗，都証实了革命的不断性，这些經驗的代价，往往是很大的。农民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和民族独立紧相关联的問題而进行的叛乱和起义，迄今为止，由于沒有同无产阶级結成同盟，沒有能够成功。正如 1938 年第四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关于“远东的阶级斗争和战争”的決議所指出的：“同一切城乡被压迫群众建立同盟，把自己提高到統治阶级的地位，从而担当起促使民族問題早日获得解

决，并为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的双重任务的，是无产阶级。”

土地革命，从性质上说，是不断革命。它包括一系列的措施和经济性、社会性改造，而这些措施和改造只能是社会的社会主义重建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灾难性的没落时期，在农村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力量对比的范围内，这些变化是无法想像的。土地革命包括对大地主进行剥夺；把土地收归国有；包括在平等的基础上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且，作为开始，宣告一切抵押权及其他债务为无效；包括把收归国有时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土地改成国营农场，在另一些土地上建立集体形式；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工业化；包括小规模种植相称地朝着国营种植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采取用低廉价格供应肥料和装备的办法，彻底地帮助贫苦农民；包括填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以及发展城市工人同小农户之间现有的关系。

由此可见，土地革命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重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此就必须在一个工农政府里实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一般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武装的政府来实现土地革命的复杂任务，而实现这项任务是该政府总的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不仅是农民为了进行彻底的反对封建、半封建和反对资本主义压迫所必需；无产阶级不仅是在农村里发动阶级斗争时能够把分裂的、动摇的、犹豫不定的和受制于人的农民引上土地革命的道路的唯一阶级，而且这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联盟必须在工农政府的形式下继续下去。由**工人领导阶级掌握政权**是继续进行和实现土地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动荡，加速了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

加速了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也加速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觉悟的提高。

如果说，在殖民地里，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和缺乏基本工业，对于无产阶级不利，那么，反过来，由于他们不久以前原来就是农民，由于他们同农村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同农民中最贫苦阶层结成同盟却极其容易。

在远东的许多殖民地国家里，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就存在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曾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并且通过工人群众，深入到某些农民阶层中去。

但是，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运动的巨大发展。这种工人运动的组成对于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教育因素，并且有利于提高斗争的水平。在远东，日本统治崩溃的结果是在日本本国内和朝鲜组成了强大的工会运动。这些运动表现了伟大的要求精神和伟大的战斗精神。1946年3月，在朝鲜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总罢工；在日本，运动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无产阶级也在各大工业中心恢复了斗争。在印度，大战结束以后，工会斗争在各大工业中心，特别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也有了巨大发展。印度托洛茨基主义者对群众的影响取得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工会及合理要求斗争对群众的影响取得的发展，是一个特点。

在近东和中东的反动的半殖民地国家里，工人们在强使这些国家承认他们的工会权和组织中央工会权方面，遇到了最重大的困难。在伊拉克，1941年到1944年间取得巨大发展的工会运动，遭到了政府的广泛镇压。埃及的工会也有了巨大发展，在这个国家里，自从1945年起，罢工浪潮就不断发生，参加的人数达到好几万（舒勃拉·阿尔·卡依马纱厂），埃及政府对此进行了最残暴的

镇压。

只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工会运动取得了合法的稳步发展。

在北非，工会运动是以法国总工会一个支部的形式进行的。在突尼斯，原为法国总工会一个支部的工会组织，1946年10月决定自行组织独立的中央工会以便直接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在摩洛哥，摩洛哥人还没有取得组织工会的权利，法律规定凡属摩洛哥人参加工会者处以徒刑，这项法律虽然一般说来并未执行，但仍然有效。尽管有这些困难，摩洛哥的工会还是有了发展，并且最近还领导了重要的罢工。

法属黑非洲1945年才获得工会权。工会运动立即有了广泛的发展，直到当时还完全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例如喀麦隆，广大阶层的政治觉悟立即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飞跃。1945年9月作出了在土著居民中成立工会组织的决定。这些组织主要是在冶金业，运输业、建筑业和职员中取得了发展。

在以有色人种为主要问题的南非，非洲人的工会虽说不是完全违法，但它遭受着残暴的镇压；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发展（1947年会员人数达二十五万）。1946年8月，十二万五千名矿工举行了罢工；当局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尽管种种的合法威胁能够使工会运动变成完全非法，它还仍旧在继续进行。

最后，1947年4月，在世界工会联合会主持之下，泛非工会会议在达喀尔举行，与会者五十人，他们来自二十一个工会组织，代表着八十万工会会员。法属非洲殖民地工会不受法国总工会的控制而独立，是它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了这种必不可少的独立，还必须配合一个在中央工会组织内部，根据工会运动发展本身的条件而制定的各工会的进一步集中。

六、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 如何对待殖民地問題

(一) 殖民地里的斯大林主义者

斯大林主义者是从 1925 年开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奉行阶级合作政策，并且制定了一套理論上的辯解的（中国的四大阶级同盟）；例如，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們理想化了土著资产阶级的作用。斯大林主义者在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問題上，最令人作呕的堕落表现是在战争时期；在战争时期，各国共产党为了充分让帝国主义感到滿意，自动地宣布了承諾殖民主义。就是为了这个緣故，印度的斯大林主义者曾經宣称反对 1942 年的起义，并且同英国帝国主义站在一边，贊成打殊死战。也是为了这个緣故，阿尔及利亚的斯大林主义者于 1945 年贊同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屠杀罪行，并且譴責了阿尔及利亚群众的游行示威，把它說成是法西斯行径。也是为了这个緣故，越南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經并入越盟）违反了本国工农群众的意志，主张越南加入法兰西联邦。

实际上，不論是在殖民地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归根結蒂，是由莫斯科的官僚集团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强加給他們的。在中国，斯大林主义者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针对蒋介石而进行的国内斗争，服从于苏联官僚集团同帝国主义的战争同盟。同样，越南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径也是为了符合苏联在中国南部占领重要战略陣地的外交活动的需要。中东国家和埃及的各个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政策，也是由于苏联同美国及英国作对而强加給他們的。

在同苏联的利益很少有直接关系的非洲各国，土著斯大林主

义者服从宗主国斯大林主义者的需要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服从被剝削者群众的利益的程度。

斯大林主义者的亲殖民主义政策对这些政党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苏美关系陷于紧张之后，他們不得不作出同他們在欧洲不得不作出的轉变或多或少相吻合的轉变。就是这样，阿尔及利亚的斯大林主义者用了比对待帝国主义还要强的斗争性，来寻求同民族主义組織（宣言之友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重归于好，但却拒絕表示贊成同宗主国决裂，并且繼續充当法兰西联邦的捍卫者。

进一步走向农民是各殖民地斯大林主义者政策的傾向之一，但并不是走向农民中最貧苦的阶层，而是走向他們的某些中間阶层。中国的苏維埃地区便是最富有特点的例子。中国“苏区”在一开始时是农民继 1926—1927 年革命被粉碎后举行的起义。起义的結果是有些队伍組織了起来，并在中国北部若干地区或多或少地站住了脚。在这些“苏区”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毛澤东）奉行的政策是要把一些富裕农民組織起来。由斯大林主义者們組織起来的越盟的土地綱領，其目的是从革命一开始就要保持住地主對他們的支持；越盟的领导者禁止分土地，不同意废除一切債权和抵押权，不同意取締高利貸。

殖民地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主张阶段革命論，主张在談論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問題以前，必須先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理論。

（二） 宗主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和殖民地

在宗主国里，各斯大林主义政党关于殖民地問題的政策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政策是一回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宗主国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为一种殖民地政策辯护，而

这种政策，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的和反动的殖民地政策相比，并无二致。由于有了“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可以和平共处”这样两条理论，宗主国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是在同帝国主义实行阶级合作的范围内来工作。因此，在关于殖民地的问题上，这些政党都是使它们的政策，一方面充分和绝对地服从、符合并配合克里姆林宫对于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采取的政策，另一方面，它们也使自己的政策充分和绝对地服从、符合并配合它们自己同这个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产生的关系。就这样，从1939年到1941年，宗主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們曾經不时地重新掀起他們那面被玷污了的、为争取殖民地的独立而斗争的旗帜；他們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促进殖民地的解放，而是为了使帝国主义难堪，并且为重新同它言归于好和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同克里姆林宫之間的勾結营私創造条件。他們把他們的宣传工作严格地限制在他們的阶级合作的基本政策上。从1941年到1945年，宗主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把独立的口号完完全全全丢在脑后，他們化了很大的力气，想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捆绑起来，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到了1945年以后的年代里，当斯大林主义者在一系列欧洲国家里进入了资产阶级的內閣之后，他們对待殖民地、甚至是对待他們在某些殖民地（越南）兄弟党的那种叛徒态度，就十分表面化了。法国共产党的部长和議員們帮助镇压了阿尔及利亚的起义，投票贊成了对越南的独立斗争进行可耻讨伐的战争拨款，宣布了贊成“法兰西联邦”，参加了对法属黑非洲的管理和殖民統治。意大利共产党的議員們曾經高呼，但他們的高呼不是为了要求給予意大利已然丧失的非洲帝国以独立，而是要求部分地恢复意属非洲帝国。荷兰的斯大林主义者在給予印度尼西亚以援助方面，連个小姆指也沒有动过。相反地，他們倒企图把印度尼西亚置于“荷

兰联邦”范围以内而加以扼杀。他们谴责了坦·马喀喀的英勇斗争；他们责备了不肯妥协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投票赞成灵嘎加第条约，并且主持了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投降派同荷兰政府的合作。以上就是宗主国斯大林主义者不同程度的可耻作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们拒绝给予摩洛哥独立；阿比西尼亚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时，他们展开了阴险的“制裁”运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宗主国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又在殖民地问题上作出了种种空前的背叛。他们的整个殖民地政策表明，他们在自己国内的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克里姆林宫的阶级合作的基础上，起着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作用。

（三） 1947 年的向“左”转和殖民地

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标志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向“左”转的开端。1947年的转变为斯大林主义政党在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里的政治背叛行为，打开了一个新阶段。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斯大林主义者在其领导和指挥的斗争中，作出了一再的背叛，如今的向“左”转，必不可免地要暴露其局限性，暴露其在中国和越南完成土地革命方面的无能；暴露其制止作用（在爪哇接受同荷兰的妥协，在越南接受同法国人的妥协）和公开的反革命性（暗杀托洛茨基主义者及积极分子，策划阴谋，拘捕监禁，对群众实行武装干涉等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实现首要任务，即土地革命，解决民族问题，为争取彻底的民主而斗争以及推翻帝国主义等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必然会像过去一样，充分地表现为无能为力。

但是，特别是在殖民地，共产党有一种双重的和互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是斯大林主义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基层工人和群众。基层群众不止一次地同“阶级同盟”及“阶段革命论”

的思想发生了冲突。在未来的革命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相竞赛的时期里，斯大林主义政党将不得不一方面紧紧抓住它们的基层群众不放，把他們引上斗争，另一方面則又小心翼翼地限制这些斗争，使之符合美国和苏联政府的新协定和新交易。在殖民地里的革命危机中，领导着斗争的斯大林主义者必然要同群众的革命热情发生冲突，尽管在某些时刻这种革命热情是由斯大林主义者自己发动起来的。这种基于群众的要求而高涨的革命热情，将会在不同的共产党基层里表现出来。倘若缺乏一个第四国际的党，共产党里的这些基层战士将会被斯大林主义机器加以肉体上的消灭。或者是由于孤立，而惶惑迷惘及士气沮丧。在这种危机中，一个革命党的出面，不但可以把几百万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失望中拯救出来，而且可以把他們集合在一个真正的革命党里。第四国际参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千百万勇敢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反帝斗争，并对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及思想加以无情地揭露和打击，让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逐步地深入了解第四国际的纲领，第四国际就一定能够在斯大林主义具有力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障碍，找到通向群众及群众的行动的党的桥梁。在殖民地的斗争时期里，毫无疑问还会发生其他的，争取共产党基层群众积极分子的机会。第四国际在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党，只要在反斯大林主义时，把强硬的、坚韧不拔的和无情的斗争，同最灵活的策略结合运用，以便接近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它們就一定会战胜斯大林主义，一定会在殖民地里，领导着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及其他一切被压迫者，走上实现不断革命各项任务的道路。

(四) 社会民主党

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够在殖民地里扎根。虽然說，像印度社会党这样一个組織，基本上是在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行事，但是它当初并非是作为宗主国社会党的一个側翼出现，而是在民族解放的基础上，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出现的。

虽然如此，对于殖民地的被压迫者来说，社会民主党在宗主国里的作用，仍然具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在殖民地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不论是英国工党还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等等社会党，一直是以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而出现并工作的。不论是在上述情况下，或者是在总的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殖民地政策毫无二致。然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背叛系以阶级合作为基础，这种阶级合作系来自它们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其基础也是阶级合作，但这种阶级合作系来自它们同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物质联系；这种工人贵族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進行超额剥削的产物。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个因素赋予了社会民主党的殖民地政策以較大的連續性，平均性及稳定性，显示了社会民主党同斯大林主义党的区别。法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个典型的例子。“解放”以来，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向法国帝国主义提供了它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直到 1947 年的殖民部，总督……等等），这些领导干部主持了针对殖民地各国人民的一些血腥镇压（在阿尔及利亚特克西耶、沙台諾和那厄日嫩的大屠杀，在馬达加斯加尔葛培特的大屠杀，在突尼斯蒙斯的大屠杀）。

英国工党是个古典的例子。它一方面是从工人贵族中诞生的，并由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用从殖民地搜刮来的超额利潤加以豢养的政党，另一方面则是在英帝国处于最不穩定和最被削弱的时刻成

了最强大的政党。归根結蒂，英帝国主义的四分五裂以及它在远东的后撤，激化了英国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把这个政党捧上了台，为的是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身为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历史性产儿的英国工党，必然要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里去力图恢复帝国主义统治，因此它完全不可能从殖民主义剥削的利益中，解放英国工人阶级。这种解放是使英国无产阶级摆脱靠工资度日的处境的先决条件。

英国工党已经向殖民地群众证明了这样一点：英国工党继续奉行英国的统治政策。对于宗主国内的劳动人民来说，英国工党则将日益证明这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实：英国无产阶级针对殖民地奴役主义而进行反叛，而且实际上是全体西欧享有优先权的无产阶级针对殖民地奴役主义而进行反叛，以及他们针对在殖民地上分享任何利润和任何份额而作出拒绝，是他们本身获得阶级解放的一个根本条件。

此外，一般社会民主党所提供的教训，特别是英国工党所提供的教训说明：宗主国工人阶级，不但必须同帝国主义决裂，推翻自己的资本家主人，并把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看作是一个帝国主义阶级；而且，在和帝国主义决裂的同时，宗主国工人阶级还必须同殖民地无产阶级及被压迫者联结起来。不但必须坚决粉碎帝国主义在宗主国与殖民地间设置的帝国主义的奴役性纽带，而且必须把这种纽带代之以宗主国劳动人民和殖民地劳动人民互相团结、互相配合的纽带。历史的发展正有利于这一进程。宗主国无产阶级的觉悟越高，他们就越能迅速地解放自己。从总的方面来说，这项任务所采取的形式将是：在宗主国内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以便同殖民地劳动群众共同推翻帝国主义。以上是在殖民地问题上，半个世纪以来从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的主要经验教训。

七、第四国际和殖民地

第四国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的綱領，是根据对于各项发展规律相互配合及不平衡性的理解，以及不断革命論制定出来的：

1. 在各个宗主国里，革命党的任务是对一切殖民地的反帝斗争給以无条件的支持；是进行具体的斗争，并用一切办法援助殖民地群众摆脱帝国主义奴役、获得彻底独立；是在“他們本国”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并把这种斗争看做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好的传统范围内，对一切殖民地的运动、斗争和革命，提供具体援助的最好手段。

当一个帝国主义的军队占领了一个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的时候，該帝国主义宗主国里的革命党就要同殖民地的第四国际支部紧密合作，为撤退帝国主义军队而斗争。与此同时，宗主国的革命党要同該殖民地的第四国际支部合作，进行革命宣传，导致宗主国士兵站到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方面来，导致他們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战斗群众进行亲善。

当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对一个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发动了战争时，有关宗主国的第四国际支部必須为該帝国主义国家遭受军事上的失败而努力。

2.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里的革命党来说，其任务是为剥夺并推翻帝国主义，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自决而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在农民占压倒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远东，中东，近东，北非），土地革命起着推动力的作用，而在南非，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力因素，则是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有色人种以及争取平等和民主权利的运动。第四国际各

党,根据各国条件,采取过渡綱領,并且在具体实行各项最先进的过渡口号时,重視各种斗争的成熟性。

第四国际各党为維護殖民地半殖民地年青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主要是要求制定劳工立法(劳动时数,工人代表,社会保险……等等)。

在某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例如中国,制度上的一场严重灾难,可能造成这样一种革命形势,即提出进行武装革命的问题。第四国际正在用号召工人、农民和士兵組織起来成立委员会,号召把这些委员会武装起来,并且在武装起来的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工农政府的办法,为这种发展而动员无产阶级,作出准备。

在中国,第四国际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即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統治;反对国民党买办资产阶级会同地主阶级、仰仗着帝国主义的支持来反对“赤色”中国的以及国民党中国本身的工人和农民。第四国际于参加并支持一切反对蒋介石及其帝国主义支柱的同时,还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及恐怖的斗争;它号召建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以便实现土地革命,获得民族解放;它为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

在中国的革命党“支持为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农民軍,并坚决反对想到农村里去恢复旧秩序的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在中国的革命党宣布,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党进行着反动的领导,这个党的寥胜于无的土地革命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农民們要維護这一点可怜的果实当然是正确的。因此,在“解放”区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将会毫不迟疑地同农民站在一边,抵抗蒋介石的进攻,并且,在这同时,在进行这种抵抗的过程中,揭发斯大林主义党的一切妥协及背叛行为,反对它的反动政策。在蒋介石軍队的后方,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口号,并且支持一切反对战争和争

取和平的群众运动(1948年2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決議)。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为把斯大林主义者羞羞答答进行的一切改革貫徹始終,直到彻底实现而斗争,并且强调,在无产階級和农民之間缺乏牢固同盟的情况之下,实行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他們为紅軍的民主化,为把“解放”区里的政权交給由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工农委员会而斗争。

在越南,第四国际贊成为反对法国帝国主义这个头号敌人而进行的斗争。在参加并支持一切反对法国統治的真正斗争的同时,第四国际还譴責企图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保大的任何反革命阴谋詭計及其民族主义的王国。第四国际經常地揭发由斯大林主义者們领导的資产階級及越盟的妥协政策及其微弱的买办性;第四国际拒絕对于法兰西联邦作出任何承諾;它为反对任何机会主义,为反对任何腐朽的妥协而斗争;它为爭取土地革命而斗争,为同法国断絕一切联系而斗争,为实现越南的統一及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

在印度尼西亚,第四国际把荷兰帝国主义看作首要敌人,反对一切土著資产階級政党同帝国主义主子达成的任何反动交易,并用为爭取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斗争来系統地反对“荷兰联邦”。

在印度,第四国际把推翻英帝国主义(包括征用一切外国企业)及其在印度資产階級中的合作分子作为首要任务。它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土著資产階級已經不再起进步作用。它为爭取无产階級在其反对土著資产階級及其帝国主义头子的社会斗争中掌握领导权而努力。它号召进行土地革命,并且从同农民訂立同盟的无产階級身上,看到了唯一能够胜任解决土地問題的階級。农民不能起独立的和领导的作用。第四国际印度支部主张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錫兰实现最彻底的民主,反对

任何伪装的制宪议会。它主张彻底的独立，谴责任何诸如自治领地位的帝国统治形式。它为印度取得以自决权及脱离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而斗争。它谴责将印度和巴基斯坦加以武断地分裂，主张成立各民族享有最充分的自决权的印度社会主义联邦。

在中东、近东以及北非的**阿拉伯国家**里，第四国际各支部及小组主张，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统一起来，成立自由阿拉伯共和国联邦。这些支部为根除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及法帝国主义——，为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干预，为反对充当帝国主义者同谋的地主阶级，为反对他们的工具：阿拉伯联盟，为争取成立制宪议会并实现最广泛的民主而斗争。

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第四国际在犹太人问题上，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式的”解决办法，认为这是空想的、反动的；第四国际宣称：彻底废弃犹太复国主义是把犹太工人的斗争同阿拉伯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社会斗争和民族斗争合而为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第四国际宣称：要求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迁移出境，这是极端反动的，就像号召压迫者移往一般殖民地国家同样地反动。第四国际的主张是：移民问题和犹太人及阿拉伯人间的关系问题，只有在把帝国主义赶走之后，才能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犹太人在其中作为少数民族、享有充分权利的制宪议会来作出适当的决定。

在**非洲大陆**上，革命党为自由的非洲而斗争。它为一切的人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它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反对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各种各样的种族障碍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它为把迅速壮大起来的、年轻的和强大的无产阶级，用工会形式组织起来，并为这个阶级争取领导权而斗争，因为这个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各个部落的劳动者以及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非洲群众走向民族解放和自由，从而实现由于他们的民

族意識有了广泛地覺醒，向全世界宣布了的伟大斗争的階級。革命党为推翻并彻底驅除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帝国主义而斗争。它为非洲一切国家全体劳动者的独立和自决而斗争。

* * *

没有一个以馬克思主义理論和布尔什維主义組織方法为基础的党，殖民地革命的复杂任务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殖民地里的、建立在上述两项基础之上的唯一的政党，是第四国际各支部。这些政党掌握了理論的、政策的以及組織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方法，但它們經常地面临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階級群众党的任务。殖民地斗争史已經多次通过反面的例子証明，为了领导这些斗争，一直到胜利地完成这些斗争的任务，必須要有一个革命党。在殖民地里建設第四国际群众党，不能像建設宗主国支部的一种延长物那样来进行，而是要在当地問題的条件、特点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来进行；第四国际群众要融会貫通这些問題，并使第四国际的世界綱領适用于这些問題。革命党的方向不是居民当中因其所享有的特权和其在政治、社会的联系方面，同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联結在一起的那些阶层。相反的，这些政党的方向是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方面和民族方面，最受剝削、最受压迫的那些人。革命党的基础首先是大城市的无产階級，是发展城市无产階級同农业劳动者的联盟，发展城市无产階級和农业劳动者同貧苦农民，以及一般被压迫者的联盟。党从事于把这些国家的全体劳动者、全体被压迫者进行的斗争导向胜利的工作。第四国际的党以此为方向，并且特別把自己的工作拿到业已在工会中組織起来的劳动者中去进行；这些工会的最好的成員應該成为第四国际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坚定的干部。凡是工会运动有了发展的地方，第四国际各支部就为争取对

于組織起来的劳动者的领导权而努力；第四国际各支部从事尚未組織起来的劳动者的組織工作；这乃是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党避免抱有小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幻想的唯一保證。凡是劳动者由于一些种族上的理由，由于一些特权阶层的理由，或是由于一些宗教上的理由而产生了分裂的地方，第四国际各支部就該一般是在无产階級历史命运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只能是失去他們的鎖鏈的那一部分无产階級的基础上，进行反对种族主义、反对特权阶层成见的斗争。

* * *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設第一批真正的工人政党的任务，落在了第四国际的身上。第四国际的使命是让这些国家的无产階級不再遭受欧洲各国无产階級遭受过的痛苦的失敗。第四国际是把殖民地年青的无产階級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真正地联合在它领导之下的第一个国际。时至今日，它的思想已經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越过铁幕，透过丛林，跨过海洋，从黑非洲到日本，从朝鮮到埃及。第四国际将在这些工人階級遭受过失敗的处女地上作出准备，使之发生到目前为止，史无前例的大转变。

通过无产階級领导之下的革命的繼續前进，世界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定会达到先进国家那样的工业及文化水平。通过在美国、欧洲、亚洲及非洲互相配合的进一步的革命斗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奴役，一定会被摒弃，成为过去，并且一定会在一切现代的和落后的大陆上，让位于社会主义建設。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殖民地革命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決議
(1957年10月)

1. 自从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出卖了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上主要的原动力是殖民地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的运动牵涉到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正在曾經被殖民地化的每一个大陆上展开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胜利的十月革命促使变成殖民地的各国的人民、特别是亚洲的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觉醒过来。共产国际第一次把殖民地宗主国的工人运动的注意力引向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起义，把它們看作爭取世界革命的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有系統地表述了共产党在殖民地群众运动中的战略和策略的原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的十二年中，殖民地革命的范围扩大了，并且繼續蔓延到在过去几百年間淪为殖民地的一切区域（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

殖民地革命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中国、接着又在北朝鮮和北越取得了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对社会力量彼此关系上的变化起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这些永不停止发展的革命运动不仅証实力量关系上的这种变化；在許多場合下，它們甚至已經把这种对比推进到一个更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更有利于群众和世界革命的方向。群众所遭受的失敗

不过是局部的和有限度的。

虽然世界帝国主义现今在技术和物质上占据优势，殖民地革命却已经使它处于这样一个局面：除了在有限地区企图阻挠或镇压革命而外，只有希望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反对工人国家的联盟和殖民地革命，重新在全世界建立它的已经丧失的均势。

殖民地革命已使全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最落后的群众发动起来，以便使他们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走完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进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已为以后的世界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这个汹涌澎湃的浪潮所提出的关于绝大多数人类的经济和文化问题却只有随着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的到来才会获得解决。

殖民地革命已经引起了以群众为一方、以官僚分子为另一方——不论他们是克里姆林宫主要的官僚集团及其仆从还是那些改良主义的官僚阶层——的力量关系上的变化。它因此大大地加剧了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世界传统的工人领导集团的危机。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殖民地革命已经明显地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这是六亿中国人民的力量在现代史上提供的证明），并且已经把这一理论的若干部分注入了由斯大林主义教养出来的共产党人的头脑之中。它已经丰富了这个理论本身，因而也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2. 殖民地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主要部分

a) 由于它自己的发展

从1911至1949年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通过它所遭受的几次惨重失败和它的最后胜利证明了：如果现有的世界结构不变，

本国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全部基本任务（經濟和政治上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統一、土地改革），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使生产力像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的革命中那样經歷长期发展过程的穩固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些国家可能变成独立的帝国主义国家。

我們下文还会談到，主要由于苏联政府和它控制的那些党的领导机构所起的作用不同，殖民地革命的发展速度并不一样，但尽管如此，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是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証它取得胜利。

为了証实这一点，不妨看一看中国和印度的十分明显的对比：在中国，革命是受工人阶级领导机构的指导的（虽然它是极端經驗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在印度，占統治地位的本国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的財政支持以及苏联政府的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这种对比导致下列結論：

印度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它已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沒有完成国家的統一（巴基斯坦）；也沒有实行土地改革。

印度的资产阶级政权沒有形成真正的稳定局面；它所以能够維持下去，主要是由于国大党在以前历次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传统和威信，以及由于尼赫魯个人的品格。

印度的群众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回答群众的这种感情，印度政府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計劃，以便証明印度有可能不用革命的方法来发展經濟。可是印度的經濟情况已經大大地恶化了（通貨膨胀、缺乏外汇），而第二个五年計劃則已陷入一个需要筹措一笔巨款（根据財政部长的估計，約为二十亿美元）才能加以克服的危机。因此，虽然印度和遭受美国抵制的中国不同，同全世界都保持正常的关系，它在

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這一框框內的經濟能力却已經表明是十分有限的。

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實行土地改革，印度才會能夠打開口路，使它的生產力發展到中國那樣的水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獲得政治獨立的一切國家中，這種政治性質的變化很快就驅散了關於在一切社會階層中間保持“全國團結一致”的幻想，群眾迅速而有力地提出了——與本國資產階級的目标相反——他們自己的要求，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不實現這些要求的話，民族獨立不過是一個空架子罷了。

在每一次殖民地革命中，都曾出現過納賽爾根據經驗稱之為“兩種革命”同時發展的局面，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那就是殖民地革命的不斷發展的性質。

殖民地各國人民所要求的，不僅是享有同西方國家形式上平等的權利。和政治平等相聯系，並且為了使這種平等不致完全成爲一個沒有內容的空洞形式——他們迫切要求平等的生活條件。所以在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工業化的思想對居民的一切階層都發生異常深刻的影響。由於這一事實，以及甚至在一個殖民地結構內部也正在開始實現工業化，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地位日益加強，並且，如果不是斯大林分子和改良主義者力圖把無產階級綁在本國資產階級的尾巴上，無產階級本來是更容易地努力爭取並贏得鬥爭的領導地位的。

不斷革命的第二條規律（革命的改造以及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後各方面的躍進）在中國得到証實，正如從前在蘇聯得到証實一樣。

在這方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戰勝帝國主義之後的經濟發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們從先進工業國家的革命勝利

所能获得的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巨大任务是把二十亿左右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较短时期内提高到大約几百万人的现有水平，这是真正开始建設社会主义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些国家必須主要依靠它們自己的力量或在苏联的必然是有限的援助下解决这些問題——中国仍然是一个例子——它們就只能以劳动群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甚至在真正革命领导下也要冒官僚主义畸形发展的危险，才会慢慢地做到这一点。

b) 由于它对殖民地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在欧洲群众的革命斗争受到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分子领导的遏制，以及 1944—1945 年的革命高涨一方面由于美国支持各个资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由于可以說是被指定来支持克里姆林宮外交目标的各国共产党的无能而能够加以阻止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却因为它必須努力对付殖民地革命而没有能够在本国重新确立任何持久的經濟或政治的稳定局面。

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不仅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濟，它还有效地使資本的輸出不能繼續扩大，从而造成某些国家(美国、瑞士、比利时，以及部分地在英国和德国)資本过剩和世界某些地区即使是殖民地类型的工业化过程始終停滯不前——从而加剧了殖民地国家的危机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

十九世紀两大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显然受到殖民地革命的影响最深。

英国资本主义尽管在其旧帝国的一些地区实行了比較灵活的政策，但从战略的和經濟的角度来看，却接連不断地丧失了它的陣地。在中东，它面临着一个对它的工商业以及对它作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生存本身來說是生死攸关的問題。

从 1956 年以来，法国帝国主义每天都同这一个或另一个殖民

地民族作战。它在远东垮了台，正在北非进行背城借一的战斗，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造成它的非洲帝国的崩溃。殖民地战争给与它的财政预算以十分沉重的负担。被动员去作战的有几十万人。它的军队的士气受了很大影响。法国资本主义只是由于美国的援助以及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集团的灾难性的、罪恶的政策才能苟延残喘。

至于说到美国帝国主义，虽然它仍旧享受着欧洲早就丧失的社会均势的利益，它的整个经济结构却由于它在殖民地革命影响下没有真正扩展的希望而遭到损害。它无法像英国在十九世纪那样为它的生产力找到适当的出路。虽然它的生产力是不可忽视的，它却必须面对一个越来越缩小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且只有牺牲它的“盟国”才能获得非常有限的扩展机会。不仅如此，甚至在美国，政治和社会范围内不稳定状态的最初根源也来自深受殖民地各国人民胜利的解放运动影响的黑人运动。

总之，无论根据它自身发展的逻辑来说，还是根据它对殖民地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的影响来说，殖民地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部分，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今天，它一向是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

3. 殖民地革命的现有的领导

殖民地革命在各国不同的领导下以不同的节奏发展着。

在中国，在一部分的朝鲜和越南，革命是在起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在锡兰，它正在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下发展着。

在玻利维亚，它的可能性和成功主要取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有效地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那里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工人阶级组

織，它在目前还是受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領導的。

产生这一形势的原因与其說是在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客观条件(无产階級的軟弱或不够成熟，农民和本国中等階級的占很大比重)，还毋宁說是在于殖民地宗主国工人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領導集团的政策，以及克里姆林宮的政策。这些領導集团鼓吹殖民地工人、农民和貧苦小資產階級群众在本国資產階級領導下根据它的綱領同它結成联盟。最后，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已使殖民地宗主国的工人陷于癱瘓，而不是要求他們表现出同殖民地各国人民團結一致的精神。在这些情况下，殖民地各国人民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适应他們的需要，而倾向于接受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領袖所揭櫫的意識形态（公正裁判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等）。

4. 殖民地国家和国际形势

在战后年代里，已經贏得政治独立的具有殖民地結構的亚非国家在大西洋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和工人国家同盟之間建立了万隆集团，这个集团正在企图利用东西方之間的不穩定的平衡和它們的根本对立来获得經濟和政治上的最大利益。

拉丁美洲国家在組成一个集团方面远沒有那样成功。它們毫不猶豫地为它們自己的利益利用帝国主义之間在它們大陸上的經濟竞争。它們偶然也对万隆集团反对帝国主义目的的資產階級政府表示同情；但是它們十分明显地集合在美国帝国主义的背后来反对苏联，因为它們正是由于害怕拉丁美洲的群众日益对苏联和中国表示同情而在美洲国家組織中通过一系列經濟、政治和軍事协定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束縛的。

a) 帝国主义者的政策

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根据地区和时间而有所不同。

英国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就给与印度、锡兰和缅甸以正式的政治独立,而在其他各地,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力图保卫它自己的阵地(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法国在越南、英国在马来亚)。美国固然假装给与菲律宾以正式的独立,却已经在那里巩固了一个完全受它控制的政权。

在远东,法国人和荷兰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主要阵地。英国对马来亚只维持着朝不保夕的统治权力。

在经济上,正就是美国在企图代替那些已经丧失其阵地的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帝国主义同旧的帝国主义相比具有压倒一切的势力,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占据领导地位,因此它曾支持一种“温和”与“和解”的政策,以便使当地的资产阶级共同对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然而根据拉丁美洲的情况来看(危地马拉、阿根廷……),凡是美国帝国主义担心它的切身利益受到当地资产阶级可能无力加以控制的群众运动的影响的地方,或者当资产阶级的一些派系有脱离它的轨道的危险时,它就完全准备组织军事干涉。它在朝鲜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中清楚地表明了,它将毫不迟疑地在全世界的任何地点进行这样的干涉。

最近几年,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眼看着他们非洲的最后据点遭到威胁,已经对非洲大陆采取了互有差别政策;他们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给与当地比较发达的资产阶级以独立地位(在摩洛哥、突尼斯、多哥和黄金海岸),但在具有战略意义(肯尼亚)或群众运动不易加以控制(阿尔及利亚)的国家,他们就一味采用可怕的镇压手段。

非洲虽然是一个地理实体,在人种上却未达到充分的统一而使它的一切国家都能跳过建立不同的国家这一阶段。从卡萨布兰卡到苏伊士为止的大陆的整个北部正在达到这个阶段,埃及并且

无疑地还有利比亚将在中东国家的阿拉伯联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薩哈拉以南的那部分非洲却在帝国主义征服时期被割裂成若干并不符合任何历史统一的实体，并且帝国主义者正在给与这些“国家”以缺乏实际内容的独立或自主，或使非洲巴尔干化（法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德费尔組織法），借以竭力維持他們的統治权力。如果不低估那些已經消失的古代黑人王国（加納、宋哈、刚果、卡非尔兰等等）的遗迹的解放运动的宣传意义，如果不放过哪怕在今天人为的疆界范围内达到政治独立的一切机会，革命的先鋒队就一定会毅然地致力于建立非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使北非各国可以按照它們自己的志願随意同阿拉伯国家联邦、社会主义非洲或社会主义欧洲联合起来。

中东国家已經亲眼看到英帝国主义实际上从这个地区排除出去，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是长期在那里享有几乎絕对的統治权的（除法帝国主义在那里占优势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而外）。1956年10月它勾結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在苏伊士的最后一次袭击，迫使它把作为帝国主义卫士的地位让給了美国。从那时以来，美国已經显示出了它给与世界这一部分的极端重要性（“艾森豪威尔主义”），因为这个地区现在是国际关系方面最有爆炸性的地区之一。

b) 苏联和中国的政策

莫斯科和北京与帝国主义者相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沒有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所以它們对于万隆集团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始終保持着最友好的态度。它們支持这些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者的目的，但同时它們援助这些政府，从而助长了它們的声势，使它們便于反对同样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印度、印度尼西亚、中东……）。

既然苏联由于它的工业的可能性以及在“冷战”期间所生产的大宗武器，现在能够对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计划和它们的武器需要提供较多的经济援助，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可能格外有所增长；苏联的工业设备和武器现在正被比较现代化的装备所代替并被用来进行交换，以保证这些国家日益扩大苏联越来越需要的原料和农产品的出口。

由于这一点，万隆集团已经抱定一种“中立主义的”态度，但其特点则为对苏联比对资本主义国家较有好感。

工人国家和万隆集团国家之间的谅解，从它们领导人员的具体利益的角度来看是脆弱的；当面临着群众运动的威胁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员就会转而接近美国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殖民地和工人国家的群众的利益却倾向于巩固这种联合。

万隆会议各国的领导彼此也有不同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倾轧）。基本上，这些国家的领袖不是资产阶级的便是封建-资本主义的头子，他们渴望维持使他们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倾向于那些代表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的苏联领袖，因为后者既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又支持他们反对本国群众的要求。

可是，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忽视在这些国家和工人国家中处于上升的革命状态的群众。而且，像我们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殖民地国家的群众的愿望是同工人国家的群众的愿望相一致的：摧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幸福和自由的世界。

5. 拿破仑主义的政府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不稳定的国际平衡——其特征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急剧衰落和帝国主义地位的削弱，另

一方面表现为使群众运动步調放慢的苏联經濟和克里姆林宮的十分显著的机会主义的扩展——已經使拿破仑主义类型的政府在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执掌政权（納賽尔、苏加諾和过去的庇隆……）。

领导这些政府的人們有时似乎获得全国的支持，或者至少是获得他們本国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他們也以拿破仑主义的方式充当社会不同阶层間的調停人。可是，仔細研究一下他們的綱領，就肯定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們是表达民族資产階級的基本利益的。民族資产階級正在打击同帝国主义相勾結的地主和买办資产階級，力图为自己贏得一个比較重要的地位，在农民中間发展一个較大的国内市場，并且最后把这一市場扩展到邻近的国家。

这些人拥有一种与民族資产階級的實力完全不相称的权力。

他們的力量基本上是从他們有可能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起一种拿破仑主义者的作用这一点产生出来的。在国际方面，他們能够利用东西方之間的对立；在国内方面，他們能够利用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地主和买办的旺盛斗志。

然而，庇隆的例子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政府的局限性。他們也不能对帝国主义和其他有产階級发动不折不扣的斗争，这既因为他們受到后者的牵制，又因为他們在对待他們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其斗志的群众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弱点。他們在經濟困难时期終于不得不背弃群众，收回群众在斗争初期所贏得的一些让步。当他們不再得到群众的支持时，帝国主义和其他有产阶层就会毫不犹豫地实行进攻。这基本上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推測的，即这些政府不可能武装群众和攻击資本主义所有制，从而奋不顾身地跳出資本主义的框框。

在搖摆于群众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間的民族資产階級的政治态

度上特別显著的这种犹豫不决，也成为它不仅在于土地改革这种結構問題上、而且尤其是对工业化問題的經濟政策的特征。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巴西)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只发生在受外国資本刺激的領域。世界上任何一处的民族資產階級依靠自己的資力实行的工业化，都沒有取得重大成就。

而且，尽管殖民地国家实行較大规模的工业化，它們的发展速度还不如殖民地宗主国。实际的結果是它們在世界上的相对境遇远沒有得到改善：例如，在 1954 年以来所存在的資本主义經濟的順遂时期，这种局面只是影响了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而殖民地国家(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則仍处于严重的經濟困难中。資本主义世界正在建立一个新的交換組織，削減它們的一部分产品的出口。

总之，由于国际紧张局势、东西方冲突以及克里姆林宮之背叛威胁现状的群众运动，这些拿破仑主义类型的政府已經拥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实际可能性基本上是十分有限的)。

6. 殖民地革命的农民及其与无产階級的关系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除推翻帝国主义的問题而外，由于农民群众十分貧困和他們在那些国家人数占很大比重，土地問題是最有爆炸性的一个問题。

那些国家的农民的社会結構在国与国之間以及在任何特定的国家內部差別很大。可是，無論存在着具有半封建結構的大地主，还是存在着农民甚至无法賴以糊口的小块土地，任何地方都沒有“农民党”。农民为了保卫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追随城市的政治組織(不論是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还是无产階級的)。

哪里有种植园，哪里就有具备任何无产階級的基本特征的农

业无产阶级，并且它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总之，胜利的殖民地革命意味着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的起义。在中国，胜利是未经工人阶级的干预，单凭一个工人党领导的农民军的战斗而获得的。但这是一个由下列异乎寻常的局势造成的特殊事例：资产阶级政权的极端腐朽、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在人数上的大相悬殊、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农民战争的旧的传统、美国的政策主要侧重于欧洲这一事实、以前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削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中国红军卤获的日本人的武器……。

为了保证殖民地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政党的任务是把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在游击战争中获得它的一个最高的表现，而用以对付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游击战争则证明为斗争的有力手段，在政治组织上也是一个同样有力的因素。

这种类型的游击队只有当它们是由具有高度革命精神的战士所组成并与乡间的群众联系时，才能生存、发展和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它们势将成为制定和实施一种符合于群众利益的政策的一支出色的先锋队。

除了它的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游击战也证明是一种“经济的”战争形式，因为它只需要有限的干部、人数不多的部队和少量的物质装备，但是这就可以瘫痪大批的敌军并使他们士气消沉。

7. 殖民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

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微弱，却从它开始存在起就在殖民地革命中担任主要的任务，在反帝斗争中成为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特别是它刚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农民的发言人。它本来能够从它属于国际无产阶级这个基本上不为地方或国家利益分割的唯一社会阶级这一事实汲取巨大的力量。可是，正因为殖民地

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得到来自殖民地宗主国无产阶级的必要的国际团结，它在争取殖民地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已经遭到削弱。

虽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具有在政治上各不相同的特征，并且有时是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下，或者更常见的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它在每一个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则是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形成。

这一事实首先是由于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增长，同时也由于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客观上必须有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当地的工业资产阶级曾经援助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借以有节制地利用工人的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或反对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一部分有产者。

既然殖民地革命还多半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那就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工会领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然而，领袖们的这种政治关系并不能改变工会本身是工人组织和阶级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这一事实。甚至这些工会的领袖也无法在工会内部专门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或多或少感到工人群众的压力。屡见不鲜的情况是：这些工会领袖被迫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采取左派的立场。

既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如此，政治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同工会斗争结合起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缺少为群众本身所承认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工会就会越出工会运动的框框，随着形势的要求起一种政党的作用，甚至在严重的危机时刻起一种组织工人力量的作用。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在许多场合下通过工会组织揭开它的阶级经验的第一页，这个事实将在这些国家的工人阶

級的政治发展中产生重大的后果。在这些情况下，工会将无疑地被要求在建立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方面起一种重要的作用。

8. 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党

社会党或具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党在某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存在的。从阶级性质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把这些政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政党等量齐观。殖民地宗主国的社会党在其政策上是改良主义的，但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就英国和德国这样重要的国家而言，它们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相反地，即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党从事一种战斗的革命政治活动，它们也常常不是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们的命运是无可怀疑的：它们将在帝国主义的行动和劳动群众的行动之间分裂开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在某些国家里，因为这些政党最初是从每一个社会阶层、特别是斗志最旺盛的阶层集结成员的，它们必须被认为是组织马克思主义干部的合适的工作基地。

9. 斯大林主义和殖民地国家

所有由斯大林主义领导的党一向把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和苏联外交的目的置于群众、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群众的利益之上。

对于殖民地宗主国的党来说，这种从属关系已经在法国产生了最丢脸的后果，在那里，法国共产党想要迫使资产阶级同克里姆林宫达成协议（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政策），争取在越南战争时期和现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对美国的政策保持“民族独立”，因而至多只是采取了微弱的议会反对派的政策；实际上，它已经让帝国主义者为所欲为，并借口使社会党人参加统一战线，投票赞成政府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拥有非常权力。由于实行这种政策，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面前已经声名狼藉，并使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处于困难境地。

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也曾奉行克里姆林宫所指使的政策，而叛卖革命运动的最著名的例子是 1942 年印度的例子。目前，他们制定政策的主要动机是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以后者的纲领为依据。

各国共产党的危机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一直在发展着，这个危机由于殖民地革命在现今革命斗争中所占的地位，已经在有些国家掀起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对殖民地问题的政策或它们对那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普遍争论。

殖民地国家的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挑选了苏共二十大的十足右派的方针：和平共处、新路线……，以便加强它们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并以后者的纲领为依据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的代价则是牺牲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群众的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将遭逢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并从中产生它们是否能继续存在的问题。

10. 殖民地宗主国的社会党和殖民地革命

一般说来，只要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运动并不威胁其宗主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殖民地宗主国的社会党是对殖民地各国的人民表示同情的。反之，它们就会暴露出它们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容它们的那样。

现今最突出的和最卑鄙的例子是法国社会党的例子。正就是该党的总书记接受了资产阶级所委托的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任务；也正就是他在准备和实行对埃及的战争时是表现得最热心的。只是当英国声明它放弃战斗时他才表示让步。

至于說到英国工党，它对殖民地问题的态度反映了它所經歷的接近一种右派色彩更浓的中間主义的演变。它正在领导一个議會反对派，来反对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种种表现。

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的中間主义同斯大林主义携手合作，鼓励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追随他們本国的資产階級。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人把他們自己在殖民地宗主国实行的政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

11. 第四国际和殖民地革命。

第四国际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不问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暫时的领导成分如何，无条件地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一切反帝斗争。

参加这些斗争，是以政治上保持完全独立的精神进行的。在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这些运动的过程中，第四国际为下列目标而奋斗：

——第四国际争取建立不受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和斯大林主义政治組織影响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第四国际努力奋斗，务使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和工人階級的群众組織(特别是工会)采取一种不受民族資产階級影响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

——第四国际努力奋斗，务使这些殖民地革命以促成工人階級执掌政权和建立工农政府为目的。

抱着这些目的和希望，第四国际在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努力創建的支部仔細拟訂适合现阶段群众运动的情况的策略。

在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資产階級正在同殖民地运动相对抗的地方，第四国际各支部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革命，并負有迫切的斗争任务来保証殖民地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在殖民地各国人民的

斗争中给与援助。殖民地宗主国的第四国际支部必须在工人队伍中特别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政策，因为他们即使谴责殖民主义，也只是以那受到旧殖民主义威胁的伪民族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以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名义进行的。这种意识形态决不能鼓励殖民地宗主国的群众去支持殖民地革命，它具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只会寻求怀有“善意”等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并使工人运动丧失战斗能力。

12. 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地位

在 1917—1923 年的革命浪潮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反抗同改良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苏联官僚阶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胜利的影响相结合，开始于俄国的世界革命运动的进程在西方遭到堵塞。

世界革命运动的严重失败以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顶点，经过几次严重失败以后，世界革命运动由于中国的殖民地革命的胜利而开始在东方打开出路。东欧所产生的社会剧变，除南斯拉夫以外，主要是由苏联军队的军事和警察干涉造成的，因此，对于仍旧遭到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遏制的西欧群众来说，那种剧变并没有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起一种刺激的作用。

东方的突破改变了力量对比：它对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促使工人国家开始革命高涨，但它并没有从本身产生出——虽然可以看出它所必须立即解决的一些问题的政治水平和中国领导方面本身的水平——必要的成分来有效地解决世界革命领导的问题。

在工人国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开始的革命高涨，特别是目前在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政治革命，已经提出了整个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一些十分明确的问题，其中包括第四国际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它也把欧洲革命这一走向世界革命的决定性步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殖民地革命势必成为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胜利的中間环节。

三、关于殖民地革命問題

——皮埃尔·弗朗克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殖民地革命、即殖民地各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羈絆的运动，是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几年中世界上引人注目的现实。只是到了今天，除了始終不断地进行的殖民地革命而外，才出现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仍旧处于官僚政治束縛下的工人国家中发动的政治革命。

十多年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动摇的活动。它們已經贏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在过去沦为殖民地的一切大陆上，革命的浪潮还在繼續高涨。

殖民地革命已使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彻底地重新估价他們以前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看法。事实上，从第一次革命胜利、即从1917年10月起，到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为止，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即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以及随后的第四国际，都是以下列另一种看法作为他們的方針的根据的：在苏联发动的革命将自行扩展并在西方取得胜利。

我們当时自然沒有低估东方的革命运动。我們能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看出东方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話句，但这些胜利不过是偶然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时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主要針对西方、針对欧洲。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

的失敗並沒有使我們放棄改革共产國際的鬥爭，因為工人運動的重心還在歐洲。我們所接受的教育是要對那作為歐洲革命中心和世界革命中心的德國革命抱有希望。德國工人運動是世界工人運動的中心，等到它失敗以後我們才脫離在第三國際內部爭取改革的鬥爭，進而為第四國際努力奮鬥。甚至在法西斯主義的年代以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們集中注意的還基本上是歐洲的革命浪潮。

可是，形勢已經按照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發展：在蘇聯贏得其第一次勝利的世界革命，沒有等到它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那些國家取得勝利，便首先在我們今天所說的不發達國家中打開了出路。這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在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曾經大肆利用的一樁事件。可是馬克思主義已經深入其他許多人的心中，並不因此有絲毫損失。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是使我們能夠正確地分析、理解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近幾年的極端複雜的形勢中不致迷失方向的唯一工具。繼第一次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來的資本主義的基本危機，已經大大地削弱了資本主義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資本主義遭到一個十分嚴重的革命危機，因而它不得不作出認真的選擇。由於它無法在所有的戰綫上用同等的力量扼守陣地，它有意把它的力量集中在歐洲的殖民地宗主國，而把一小部分的力量留在亞洲。它必須不惜以任何代價保住歐洲的堡壘。主要由於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領導集團的背叛，資本主義終於能夠在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建立某種均勢——雖然是不穩定的，但總還是一種均勢。

另一方面，在亞洲，資本主義只保持有限的勢力，當地的資產階級也很軟弱，殖民地革命在其挺進過程中便在中國取得了一次十分顯著的勝利。與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無關，中國農民群眾起義

的声势非常浩大，它终于在斗争中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动前进。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了。

当帝国主义了解到它已经在亚洲丧失了十分重要的阵地时，它在欧洲也几乎没有能够恢复某种均势、某种稳定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时候，它干涉了朝鲜战争，企图阻挡远东革命的发展。

这样我们便处于一种在战前我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的局势。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的衰落、欧洲革命的迟迟不能实现以及殖民地革命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展现世界革命发展的一个新的前景、一个具体得多的前景的图画。现在，我们亲眼看到殖民地革命的继续和工人国家内政治革命的最初一些步骤。最可能的前景是：这两项发展正在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而美国的革命将成为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后环节。

我们并不是为了要画一幅历史壁画而提出这种图画和这种前景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指导和领导整个世界革命为己任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对我们来说，这种任务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较近的未来中的一个具体前景。知道在哪里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决定世界革命在这个或那个地区的目标，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回想一下我们所作的这种重新估价，以便有批判地审查过去的观念、概念和著作，从而能够按照我们当时的看法来加以判断，并了解某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以及它们错误到如何程度，那也是有用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和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所写作的和发表的一切东西，都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看法来设想和动笔的。如果只举出这个或那个观念、这个或那个语句，我们就无法进行认真的有批判的审查；我们必须全面地对照在这局势以前所抱有的看法来观察那些文章和言论。

例如，有些同志曾經很想知道，固然不斷革命論大體上已經很好地得到了証實，它是否曾暴露出某些缺點，我們是否還需要使它更靈活一些，以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犯過錯誤。比如說，這樣一個事實是很重要的，即：中國的無產階級並沒有以領導革命的身分直接參加進去，無產階級的領導只是間接地通過更加盡力防止中國無產階級的活動的工人黨的領導才得到保證。有些同志發表另一種意見，認為在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有着在資產階級領導下完成的不容忽視的一定程度的工業化。有些同志發表另一種意見，認為雖然帝國主義殖民地宗主國已經喪失了一定數量的殖民地，這對資本主義制度卻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因為我們近幾年來親眼看到了異乎尋常的經濟“繁榮”。最後，印度的例子在同志們中間引起了許多疑問。印度在本國資產階級領導下獲得了並不單純是形式上的獨立，並且它正在全世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我們在戰前曾經堅決認為印度的資產階級不會有能力引導印度走上獨立的道路；我們可以引述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一些獨特的語句。因此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過去是不是低估了當地資產階級的潛在力量？

我們必須重新看一看所有這些意見，逐一地加以審查，但是——像我剛才說過的——我們不能孤立地作這樣的審查。我們必須聯系到我們以前的看法、聯系到當時存在的條件來處理這些事情。例如，就中國來說，在 1925—1927 年期間的形勢和 1946—1947 年及以後的形勢之間，毫無共同之處。我已經提到帝國主義從遠東撤退一大部分力量的情況。而且，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的幾年里削弱很多。中國的紅軍又得到了大量的裝備。我們當時所看到的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情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其政策的因素在全部的圖景里只起了很不重要的作用，當然更不必說

从人数的角度来看，中国无产阶级在整个革命时期始终不变的全部人口中是多么软弱了。正是由于这些异常的情况，我們才說中国的例子是完全特殊的，并且认为它不允許我們縮小无产阶级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中起主要作用这一基本的观念。

至于經濟問題、即工业化的发展和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間的經濟关系問題，我宁願让它由有关政治和經濟展望的报告来加以討論，因为这样可以闡述得更广泛些。在这个报告中，你們将找到关于特殊的情况以及一定数量的殖民地的丧失何以沒有給帝国主义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原因等等的解释。可是我相信，从帝国主义者在中东的抗拒所作的努力和所采用的暴力来看，他們显然懂得斗争的重要性，并且他們正在一个對他們生死攸关的形势下进行战斗。这对他們米說比他們已經喪失的东西要重要得多。

现在讓我們來談一談肯定是最为重要的印度的例子。毫無疑問，我們在 1948 年低估了印度在那时所获得的独立的程度。當我們重新閱讀我們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那个时期的殖民地运动的文件时，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了。

我們所犯的这个錯誤的根源是什么呢？我再重說一遍，我們当时确实是主要根据欧洲革命的比較迅速的胜利来决定我們的方針的，因为它如果获得胜利，就会对印度无产阶级的发展間接地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印度的无产阶级以后就会有很大进展，而印度的資產阶级也就不会有它事实上已經有过的那么多的回旋余地。

在这方面，簡略地重溫一下某些理論問題并不是一个坏的想法，因为我并不认为民族独立問題是不断革命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當我們追溯它的根源，那就是，當我們考查托洛茨基

据以阐释其“不断革命”論的外界状况，并重新閱讀他論述这个問題的主要著作，即他的《不断革命》一书时，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清楚了。

托洛茨基是就沙皇俄国来系統地闡明他的不断革命論的，那时沙皇俄国不但不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相反地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所提出的問題不是獨立的問題，而是下列的問題。俄国是一个經濟上不发达的国家，它那时还没有解决民主的任务，首先是土地革命。托洛茨基在1905年和他在1928年写的論述不断革命的书里所提出的，正就是土地革命的任务。托洛茨基就沙皇俄国来闡明的、以后在談到其他經濟上落后的国家时又提起的基本思想如下。他說，这些国家的资产階級不能起到完成了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革命的近代資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階級所起的作用。它不能坚决地担負起领导全国的责任，以便彻底地和全部地完成其前輩所完成的任务。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同帝国主义和地主有着千絲万縷的关系，而且它也过分軟弱，同时它看见自己的面前正在出现作为世界无产階級組成部分的本国无产階級的威胁。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說过资产階級根本不会进行任何斗争，而只是說：它不会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它不会像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欧洲国家的资产階級那样能够建立一个穩固的资产階級政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階級虽然从人数上說还很薄弱，却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解决民主的任务。无产階級在夺取政权以后，当然不能以解决單純的民主任务为限，而是会着手以社会主义建設社会的工作。这三言两語可以使我們想起不断革命論的本质和基础。托洛茨基論述这个問題的那本著作的主要一章就冠以这样的标题：“不断革命是国家在无产階級领导下的改造。”

不断革命并不意味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对帝国主义进行一定的斗争，殖民地社会在本国资产阶级统治下不能有任何发展。它基本上意味着：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全部完成民主任务；和它前几个世纪的先驱不同，它不能建立一个使资本主义在整个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局面的政权。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印度的形势，考查印度从宣布独立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印度的独立已经成为不容怀疑的事实。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发展不是由于印度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力量，而是由于主要在国际范围内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凑合。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曾经有利于印度资产阶级的情况。它曾从东西两方得到支持和援助。我现在暂时不来讨论这种援助的重要性。虽然有这些情况，印度的资产阶级却没有解决民主的任务；尼赫鲁的政权、国大党的政权正在接近一个新的阶段，而根据一切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的意见，这个阶段充满着危险，并将对印度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起决定性的影响。

必须首先指出，印度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解决全国团结一致的问题。相反地，它是以巨大的分割——其本身由分开的部分构成的巴基斯坦的建立——为代价才获得它的独立的；并且完全可以肯定，印度的某种形式的统一问题将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至于土地问题，我们不能说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也不能说它已认真地把这个问题抓在手里。在过去的时期，尼赫鲁主要是一方面利用了国际局势，另一方面在印度社会中扮演了拿破仑主义者的角色，特别是利用了事实上主要在国大党领导下进行的过去的斗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威信。

在经济方面，新政权、即国大党政权没有给群众带来十分可观的改善，也很少向他们提供什么远景。有些比较是能够用统计数

字作出的，有些是无法用統計数字作出的；但群众却不看图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作出比較。特别是，印度的群众像亚洲其他一些群众一样，拿中国的发展来作比較。正是由于这种比較的条件，尼赫魯才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計劃，其目的在于給群众打气，給他們提供另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印度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使他們不必遭受中国人民所經歷的种种痛苦的廉价解决办法。

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計劃是設想得很大胆的；但是他們一經开始实行，他們就发现自己面前的經濟和財政情况包含着一些大大地危害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实现的十分严重的危險。印度缺少外汇。它也因通貨膨胀而受到打击；并且在今天看来，如果印度不接受巨額貸款，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一切打算都会大受影响。所以我們看到印度政府今天向左右两方或毋宁說是向东方和西方乞求数目十分巨大的貸款。尼赫魯开始以非常溫和的态度对待美国，想要获得极端重要的貸款。

印度的这种局势在許多資產階級或社会民主党的旁观者中間引起十分严重的忧虑。讓我們只引証两个人：美国新聞記者、見多識广的国际問題专家华尔特·李普曼和工党的主要經濟学家巴洛夫。他們宣称，如果沒有資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大量干預，如果沒有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援助，那就不可能維持印度政权的穩定，并且他們补充說，那时就会发生印度走上中国所遵循的道路的危險。李普曼甚至进一步說，同印度方面开始出现的一切情况相比，叙利亞事件只是一件小事罢了。

我相信，由于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經驗，我們誰也不会抱任何幻想，认为資本主义有可能断然地干預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以保証它的政权的穩定。我这样讲并不是說資產階級的印度根本不会接

受任何援助；我也不是說事物的动向直接趋向于无产階級革命的发展，而是相信我們必須了解：排在日程上的不是資產階級的穩定而是它的危机。

我們可以从印度的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从独立到现在这几年来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印度資產階級真实力量的表现，而是由于它能出乎我們的意料长期地在國內和国际方面起一种拿破仑主义的作用。不曾有过稳定的局面；最后的日子比我們設想的来得迟，但它正在日益逼近。国家的改造在資產階級领导下以前沒有实现，现今也并不在求得实现。有过一些改造，但沒有一項是根本的；死亡綫正在逼近，国家改造的問題提出了无产階級领导的問題。

印度的例子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一般地解释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資產階級在过去几年内可能已經遭遇的事情。在每一个具体場合下，都存在着已經起了作用的特殊因素。它們对印度和埃及來說是不同的。但本国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由于自己的力量而起过重要的作用。它沒有使国家保持稳定。它的任务同它自己的由于所处的环境而拥有的力量是不相称的。我們不妨再回想一下那个环境：资本主义的大量削弱、工人国家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階級革命在工人階級领导下的长期不能实现。革命发展的速度已經有了改变并且慢下来了，但我們正在毫無疑問地接近或者可以說是已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印度，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清楚，并且，順便說一句，这将是我們关于本屆代表大会組織部分的任务方面所必須考查的問題。

在远东，还发生了印度尼西亚的問題。也有异常重要的运动正在进行：最近几个月里我們已經看到十分重要的选举結果，这是一种异常强大的革命动力的朕兆。我想一位有資格的同志将在討

論的過程中詳細地談及這個問題，所以我就不在這個報告里多加論述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在遠東範圍內、特別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看到出現一個新的革命高漲，那麼另一方面，在從卡薩布蘭卡到巴格達的阿拉伯世界裡，殖民地革命已經達到高潮。

全世界都知道，從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角度來看，那些正在進行這種革命的地區是極端重要的。這是亞洲、歐洲和非洲這三個大陸的會合點。歐洲和遠東之間的最短的路程須通過這裡。它從高加索油田的邊界直到同美洲大陸十分接近的那一部分海岸。中東的石油資源是非常著名的；最近宣布在鄰近北非的薩哈拉又發現了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因此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國際間對這些地區的角逐會如此劇烈。我們面臨着一個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危險的局面。從蘇伊士運河事件到現在的一年期間內，我們已經看到一些事件和一些危機，最初是約旦，現在是敘利亞；我們肯定還會經歷其他一些事件和危機。借用福斯特·杜勒斯的話來說，我們正俯身在“深淵邊上”。

現在讓我們來談一談阿拉伯國家革命的本身力量的問題。這些國家可以分成兩個各有其比較顯著的一致性的集團：一方面是中東，另一方面是北非。

在中東，起主導作用的是埃及，並且，由於它是這整個地區以及所有阿拉伯國家中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它肯定還會起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個主導作用現在是由納賽爾的資產階級領導的。納賽爾曾經以他自己的方式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語句很好地描述了當時正在發展的局勢和他自己的想法。我們在我們的出版物中幾次引証過納賽爾寫的《革命的哲學》一書里的幾段文字，在這本書里，他解釋埃及的軍官團怎樣進行干預以排除腐化墮落的派

系，把他們的國家變成一個在經濟上相當發達的現代國家。接着他又說明他自己的意見：在把國王法魯克趕下台去的軍事政變之後，他所看到的不是支持那些發動這次政變的人們的全國團結一致，而是紛紛露頭的私人的願望和利益。因此他得出結論：在他的國家中，正在同時合併發生兩種革命。一方面是其目的在於使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羈絆的革命，另一方面是群眾希望賴以獲得較大幸福和實現一個嶄新局勢的社會革命。

納賽爾用他自己的話——非馬克思主義的措辭——重新發現了我們關於不斷革命論、關於不發達國家的革命的二重性所發表的言論。當然，納賽爾也描述了他的想法、他的希望和他的綱領，這些都是一個喜歡把各種事情辦得有條不紊的軍人的見解。那兩種革命不應當同時發生。首先應當實現擺脫帝國主義羈絆的政治革命。在完成這一革命以後，就可以由最高領導來決定怎樣逐步地改善國內的狀況。很難更清楚地解釋現今埃及革命的資產階級領導方面的想法；他們的想法已經說得很明白了。當然，它也會朝向一個和最高領導可能採取的決定截然不同的道路發展。

米夏同志肯定會就這個埃及和中東問題發表講演。他已經為代表大會的預備性討論作出了一項重要的貢獻，尤其重要的是它已經為我們在中東的運動擬定了一個大綱。我想在這裡只提到兩點。米夏同志在他的幾篇文章里十分正確地指出了納賽爾和庇隆對工人運動抱有不同的態度。這種差別是很重要的並且是很大的；但是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條件不同，由於阿根廷的工人運動同埃及的不一樣，它有着不可忽視的長期的組織傳統。也許正是這種鬥爭的力量、這種形勢發展的力量將迫使納賽爾在將來更多地考慮到勞動群眾。在塞得港事件期間，因為工人運動的發展在埃及還很薄弱，納賽爾很大膽地武裝了群眾。我們可以肯定：隨着形

势的发展,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他的勇气将远不如从前;他对埃及劳动群众的态度将复杂和有变化得多。

我想引起你们注意的另一点,是一个特别存在于叙利亚和约旦并在伊拉克从事非法活动的组织。我指的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乍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政党好像是民族革命运动类型的政党的一个阿拉伯变种。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个组织。这里肯定是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很好地求得发展的一个政治中心。

现在我们谈到北非。我只打算提出几点基本的看法。我们当然会有几篇阐明这些问题的发言。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殖民地革命斗争中的最前哨。它要求我们对于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不但给以政治上的支持,而且要尽可能给以物质上的援助。

好多年来,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向是力求分裂构成北非的三个国家,即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它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希望寸步不让地保持它对整个北非的支配权。后来它对突尼斯作了一点让步,这就是所谓“内部的自治权”。接着它又必须给与摩洛哥以所谓“互相依存中的独立”;它不得不送回以前被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苏丹。

既然答应让摩洛哥独立,它就必须随即让突尼斯享有独立地位。

在这些情况下,法国帝国主义认为它比以前更能保持它在阿尔及利亚这一北非要冲的权力了。如果没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都是颇成问题的。

帝国主义的一切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因为不久以后阿尔及利亚就在1954年11月发动了起义。法国帝国主义现在正竭力想扑灭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它在那里驻有五十万正规军,用来对付大约八百万的居民。它每天要花费二十亿法郎。法国帝国主义实际

上再也找不到任何願意扮演保大的角色和充当帝国主义奴仆的本地人了。目前，法国議會正在討論一項“組織法”來確定阿尔及利亚的新的地位。它正在被所有法国的政党所討論。它正在被提交給世界各国的政府。它不能被提交給阿尔及利亚人，因為他們中間誰也不会把它接受下来。可是为什么法国帝国主义这样頑固，为什么它还繼續推行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政策呢？由于社会結構的关系，阿尔及利亚並沒有法国資产階級按其自己的說法称之为“有效的对应发言人”那号人物。他們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是很难做成一种同他們能在其他殖民地完成的交易相类似的政治交易。法国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在阿尔及利亚的統治，已使当地的地主实际上完全消灭。当地的有产者是存在的，但他們的人数不多，很难說他們形成一个按組織意义来理解的本国資产階級。有产者阶层是非常有限的。阿尔及利亚也有小資产階級，但它极端貧困。它只能是非常貧困，如果你了解到那里广大的人民不是无产者，即不是正式的无产階級；它是一种次无产階級，一种在世界上罕见的生活异常困苦的下层群众。从社会的角度來說，只有“貧民”这个詞儿才能恰当地形容这一类人。連法国的統計数字、官方的統計数字也承认，阿尔及利亚絕大多数人民的总收入低于住在法国的四十万阿尔及利亚工人寄回的儲蓄，虽然这些工人所做的工作最苦而所得的工資最低。据官方宣布，一个阿尔及利亚家庭每年的收入是两万法郎，大約折合四十二美元或十五英鎊。这就足以解释为何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以及为何帝国主义很难找到一个由有产者組成的能够領導該国的适当的社会阶层了。

不消說，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革命也对邻国、即突尼斯和摩洛哥起一种爆炸性的作用。

所以，除法国帝国主义而外，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本国资产阶级也对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事件非常敏感，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平衡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在上一个月或最近六个星期的期间中，我们看到突尼斯资产阶级的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布尔吉巴消除君主制度，也看到摩洛哥的苏丹采取措施来对付某些曾经公开地同法国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地主。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这种措施是预防性的措施，是对这些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并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所唤起、鼓励和加强的动乱的一些让步。布尔吉巴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最精明的代表人物，他想找出一个能使资产阶级政权在阿尔及利亚确立起来的方案。他已经在某种形式下提出建立一个确为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北非联邦的想法。但他尤其希望能够利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资产阶级去支援不管何种的阿尔及利亚资产阶级。

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指出，当地的工会运动现在已经摆脱了法国工联的保护。必须指出，在以前整个时期，法国帝国主义都不使土著领导工会，不使他们有自己的工会运动；只要工会从属于一个由巴黎领导的法国工会联合会，法国帝国主义就宁可让它们甚至处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之下并依靠这种领导。摩洛哥的情况也是一样。

至于说到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今天真正领导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族解放阵线在整个时期最初把重点放在军事问题上、即专门从军事观点出发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上。然后它才注意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具体地表现在去年它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在《工人真理报》上曾大段地摘录过纲领的原文。在最重要的论点中间，除了它给予无产阶级的十分重大的任务而外，据我们看来最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建立一个组织、一个以人民类型的

委员会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当然，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的形势非常复杂，我们必须以完全相对的方式来考察这一点。

法国工人阶级领导部门的罪恶态度，肯定是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治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它们实际上已经各以它们自己的政策尽可能破坏法国无产阶级的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行动。我们大家知道，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偶尔说过一些好话。但那是言不由衷的，并且我们很容易理解，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去年，当吉·摩勒政府把千百万工人召回军队并把他们派到阿尔及利亚去时，法国全境发生了示威游行。集合在火车站的青年自发地不愿动身。共产党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组织和扩大这些斗争，相反地，只要哪里出现暴力事件，它就谴责那些事件是煽动分子挑起来的。

从1957年春以来，我们看到劳动群众对政治十分冷淡；而那些在言论和行动上有所表现的人，则是混水摸鱼的少数法西斯反动分子。

在法国，有小资产阶级左派人物领导的若干小资产阶级运动，他们当然并不抱有帝国主义的态度，而是赞成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或赞成同它谈判的；可是，如果我们探索到他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不妨说，他们的真实态度是拥护一个牢固的法兰西共和国并以干涉政治的方式献计献策的人们的态度。不用说，当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的报刊上对这些分子下逐客令并劝他们先打扫自己门前的台阶时，他们是做得对的。

在这样地为阿尔及利亚人创造的环境里，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特别受到危害。有许多欧洲的工人、甚至欧洲的共产党人在长时期内不了解吉·摩勒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殖民地国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自然很

低，要他們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吉·摩勒、多列士之流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困难問題。

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前途來說，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有几十万这样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們以工人的資格参加法国的工业生活和工人运动，他們参加斗争并給工人运动提供了許多像工厂代表和工会斗士这样的干部，他們在阿尔及利亚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

我现在想略为談一談所有的革命战士必然都十分注意的而他們在法国境外不大了解其底細的一个問題。这就是两个組織，即民族解放陣綫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之間的傾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答复拉姆貝尔集团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是阿尔及利亚革命中的布尔什維克党这一說法。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不是一个布尔什維克党。它甚至不是一个工人党。像民族解放陣綫一样，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組織；其社会成分自然是与阿尔及利亚居民的成分联系着的。这些組織的基本队伍是工人和极穷苦的农民。

从綱領的角度来看，不可能看出所发表的两份原文之間有什么巨大的差別。它們双方都要求独立、一部阿尔及利亚的宪法和土地改革。我們是慣常用显微镜来研究綱領的，如果我們看不出有什么基本的差別，那么阿尔及利亚的群众之所以大规模地傾向民族解放陣綫而不傾向民族运动党，就不是为了綱領的緣故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最初起，民族解放陣綫就在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中有較大的影响。起初，民族运动党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侨民中間拥有一个很大的多数。依靠我們可以利用的一切驗証的資料（对号召罢工的响应、工厂中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地位，等等），我們即使不能确切地衡量它們的傾向究竟

如何——因为这些事情是无法衡量的——也至少能够作出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发生错误的。今天，在1956年有了变化的阿尔及利亚侨民的大多数拥护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运动党只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还保住它的阵地。

在阿尔及利亚的群众看来，正在领导斗争的是民族解放阵线，所以他们在两党之间作了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在武装斗争几个月之后了解到了发动斗争的一些情况。而开始战斗的正就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居住在法国的侨民中间的一个主要的组织；在多年期间曾不断地留心观察这个组织的极少数法国斗士知道它的内部正在产生危机。1947年开始，我们知道了一连串的事件。那些事件看来是个别的而不是大规模的和全世界的，但它们是一些重要的政治症候。这个危机在1952—1954年的期间呈现出严重的性质，那时突尼斯和摩洛哥正在进行斗争，并且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正在通过这个斗争来夺取一些利益，但是在这个时期，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是无能的和无力的，它毫无作为。这就在上层中间引起了危机，它们开始分裂了。它也促使在这组织中为数颇多的对上层的危机感到厌恶的一批中级干部，即该党的非正规军事组织的干部违反上层的意志而主动采取行动，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在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分裂以后，上层中间有一派被彻底清除了。另一派、即梅萨利·哈吉的一派在几个月的期间对起义抱观望态度，在起义发动后六个月光景才宣布赞成武装斗争。所以，在阿尔及利亚，梅萨利一派，即民族运动党没有能够在武装斗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的，正就是由起义的组织者建立的民族解放阵线。我们认为这一点可以充分地解释为什么群众在两党之间作了

那样的选择。

我们的态度，特别是法国支部的态度一直受到想要尽力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这一愿望的鼓舞。如果认为社会和政治的明显差别已经在革命运动中确立起来，那是达不到上述的目的的。我们认为正是革命的发展和它的进步才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和壮大。

必须再提一下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最近的发展。由于日益成为少数党，民族运动党——我们认为这纯粹是策略上的考虑——已经采取了灾难性的立场。它不是希望听到美国人的好评吗？无论如何，它已经对联合国、美国国务院和阿登纳政府发表了声明，这些声明表现出了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在今年2月对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所说的“亲西方主义”。最后，它已经在法国组织了阿尔及利亚人的工会，而不是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参加他们工厂中的伙伴所组织的工会。

当然，我们并不模仿拉姆贝尔集团的立场，仅仅把一个组织代替另一个组织。我们并不把自己和民族解放阵线等同起来，因为它可能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支持实际上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及它现今的实际上的领导。这决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革命的一些组织和领导作出我们自己的政治估价。

我已经着重说明了几个问题；阿尔及利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可以谈一谈。但是我要再度提醒你们，这是今天殖民地革命的最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它只得到其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或最近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却每天被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所叛卖，那些组织曾经竭尽全力把那直接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有关的法国无产阶级引入歧途。我们的职责就是随时随地干预工人阶级的运动以结束这种可耻的局

面。我們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特征是以尽可能活跃的行动来引起工人运动的注意，鼓励它行动起来，走向正在同阶级敌人作殊死斗争的革命的地区。在阿尔及利亚的具体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忠实于我们的传统。

* * *

北非和中东使我们了解到非洲大陆的大部分主要情况。帝国主义者在那里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各国人民的解放愿望。这些国家的人民从一个较低的水平着手，我们往往看到部落结构的解体，并且由于这一点，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比較突然的和复杂的。

澤尔曼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的预备性讨论期间已经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概括的考察。可是我们显然不能停留在那一点。我们必须仔细地考查现有的各种运动、群众运动，以及在这些国家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会运动也开始在那里广泛展开，并且在有些非洲国家中我们已经看到普遍的罢工斗争。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存在着一个从思想上深入探索非洲革命问题的基本答案的倾向。现在已经形成了少数可贵的马克思主义干部，这可能对那些国家的革命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个报告中，我不打算阐述我们的党在拉丁美洲和锡兰的情形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将远比我讲得更详尽。我决定只对两方面的情况略为作一点说明。

在拉丁美洲，美国所指使的第一次暴力行动，即对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的干涉，发生在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的期间。从那时起，出现了反对庇隆的行动。现在玻利维亚的局势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爆发。但所有这些事件也表明了，特别是在阿根廷的事例中，

帝国主义和它在那些国家的代理人是无法使任何政权保持哪怕是极短暂的稳定局面的。如果帝国主义终于使庇隆复辟以阻止阿根廷的社会分裂，上面的这句话也同样可以适用。

至于说到锡兰，我们想对大会强调指出我们的支部对语言问题上的地方自治主义潮流所作的英勇抗击。这个态度加强了党的力量，我们相信它不久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收获。

现在还有待我们来看一看怎样才能把关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讨论作一总结。国际执行委员会曾把这一项目列入议程，并在会议上拟定：一篇总的序论——由国际书记处准备——关于世界不同地区革命的一些专论——由那些有可靠根据比较直接地同这些问题有关的支部的同志们执笔。不幸地，由于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工作的繁重，后面的这些文件落空了。只有少数几篇供讨论的文章可以由一些同志写出来。

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确定其名称的殖民地委员会在这讨论开始前举行过会议。它研究了可以进行的事项，并在最后把这提供给你们。一方面，这里的讨论应当根据这个报告和那篇总的序论进行，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们必须有一篇经过修改补充的序论。可是这篇序论按其性质来说总还只会是非常笼统的。委员会建议趁此有许多有资格的同志出席会议的机会，写出几篇关于某些对殖民地革命关系十分重大的国家的形势的论文来。这些论文应当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当月的月底写好。有了这些论文，国际书记处就可以写出一个综合殖民地革命现状的文件，提交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下次会议，由它明确地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加以通过。我们认为这是最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 * *

对我们来说，成问题的不仅是一个文件。我们在座的人大家

都理解到殖民地革命对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意义。在一切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国家人民的一切运动中,都有一种探索、一种热烈的愿望,想要了解形势并找出他们解放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草拟的这个文件必须不但是供我们阅读的、指导我们自己作为第四国际的活动的文件;它必须成为殖民地各国人民中间广大斗士的工具,成为他们战斗的武器。帮助这些人进行斗争,我们就会加速我们运动的进展。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胜利,也就是第四国际的胜利。

五、阿拉伯革命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我不打算对阿拉伯革命作真正全面而詳尽的考察，倒是想就这个问题介紹一些入門的知識，而且主要是想对中东的阿拉伯革命和阿尔及利亚革命作一次初步的探討。

阿拉伯革命是战后时期的殖民地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时常成为殖民地革命的主要方面。这个革命包括了非洲和中东的所有信仰伊斯兰教、保持伊斯兰文明和使用阿拉伯語言的国家，特别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阿拉伯半島各国，叙利亚，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把伊朗包括进去，虽然它使用着伊斯兰教以前的語言。这场革命总共把六千万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人民，席卷在內，占全世界穆斯林居民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这场革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单位問題。这个民族的各成分，虽然从純种族观点来看各有不同的背景^①，但是，他們都意識到他們首先是阿拉伯人，首先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阿拉伯的，或者不如說是“阿拉伯化的”，民族共同

^① 按照现代的科学定义，严格來說，即使在阿拉伯半島，也沒有一个阿拉伯种族；相反地，倒存在着三种主要种族类型的混合现象，按照伯特勒姆·托馬斯的分法，这三种主要种族类型是：閃族型，地中海型，阿美尼亚型。在伊拉克，基本居民是“奈伯特人”，即“迦勒底人”，在叙利亚-黎巴嫩，基本居民是“亚拉美人”，即“叙利亚人”。从人种学上說，埃及居民是科卜特人。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馬格勒布的居民是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本身并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种族复合体”。

体在地理上却分布很广，从大西洋一直到波斯湾和里海；而且在这个共同体当中还有许多星罗棋布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亚述人，犹太人，希腊人，突厥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柏柏尔人以及属于许多不同的非洲种族的阿拉伯化的黑人等等。

从宗教观点来看，教派和信仰也是多种多样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十叶派，阿拉维派，德鲁斯派，易司马仪派等等。**基督教**：正教，天主教，新教，雅各派，贵钩利派，马龙派，景教等等。这种宗教信仰错综复杂的现象，举例来说，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特别显著。

除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馬格勒布没有陷入伊斯兰教教义学的爭吵中以外，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教派（穆罕默德预言会有七十二派之多）它们在严格遵守《古兰经》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圣训的重要性，却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对于先知和他的继承者的使命感，解释就更多了。

因此，在一个确确实实的**阿拉伯或阿拉伯化的民族**基础上，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人种和文化结构。结果，这些国家在过去就全都陷入极其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大多数这些国家都曾经連續不断地遭到埃及人，腓尼基人，波斯人，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占领，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又遭到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占领。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到晚近才稍稍侵入这些国家，世世代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种结构虽然被颠覆了，在某些地方甚至被抛弃了，可是并没有完全绝迹，直到现在还同阿拉伯各国的复兴交织在一起。

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虽然有这样一些因素，我们仍然可以说存在着一个**阿拉伯民族**。我们的基本论据是，在这些国家的絕大多数居民当中存在着一种由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历史而形成的

共同的民族意識，而他們的历史的特点則是，有共同的語言，有共同的地理位置和共同的社会和文化体系。

要說明这个論据有多么充分的根据，最好对这个問題作一次簡要的历史考察。

阿拉伯民族意識的历史形成

阿拉伯民族意識早在十九世紀就出現了，这就是說早在欧洲现代資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出現了，時間就在西方的封建帝国和奧斯曼东方的封建帝国衰落以后。

在上世紀末尾喚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正是奧斯曼帝国的灭亡和当时的資本主义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目的和活動。

在那个时期的阿拉伯商业和文化中心——貝魯特，阿勒頗，大馬士革，巴格达，亚历山大港，开罗以及君士坦丁堡和波斯各城市，有时还有喀布尔，甚至德里——，受到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識界的先驅們，都希望西方能够幫助阿拉伯人摆脱土耳其的专制統治和压迫。

但是，西方的态度很快就使人們感到失望，这些先驅們的自由主义也就变成了更坚决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像薩拉弗运动（向古人求援）的主要倡导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薩拉弗运动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个改革运动，又是穆斯林和阿拉伯願望的搖籃。

“青年土耳其”改革运动一度結束了明确的阿拉伯意識的覺醒，把它吸收到要求給土耳其帝国内一切被压迫民族以独立的更广泛的“奧斯曼自由主义”的框框里去。

但是，到了 1910 年，“奥斯曼主义”和“奥斯曼阿拉伯大家庭”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土耳其资产阶级当时正在上升期，它的“青年土耳其”运动思想家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打破奥斯曼帝国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从那时起，阿拉伯人就力求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起初是在文化方面，后来是在政治方面，但是，始终都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叙利亚-黎巴嫩知识分子的倡导之下。当时建立的组织有下面几个：文学社(al Muntada al-Arabi)，1909 年创立于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讨论中心。它的若干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土耳其人以卖国贼的罪名绞死。这几个人就是黎巴嫩的穆斯林哈里，巴勒贝克的穆斯林海达尔和霍姆斯的基督教徒萨鲁姆·卡赫坦社(传奇式的种族祖先卡赫坦的后裔)，这是一个多多少少隶属于文学社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希望建立一个奥匈帝国式的双重土耳其-阿拉伯帝国。“法特”(青年阿拉伯社)，1913—1914 年创立于巴黎，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设有分社。“分权党”，1912 年由一些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创立于开罗，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设有委员会，以阿拉伯愿望的代言人的身分出现。青年阿尔及利亚党，也创立于 1912 年。

1914 年的大战前夕，阿拉伯民族运动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已经变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大战加速了这一演变，因为英国人认识到，为了对付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他们必须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1915 年春天，《法塔特》(Al-Fatat)和《阿赫德》(Al-Abd)的成员(前者是从叙利亚境内各国的封建中坚人物和知识界中坚人物中产生的，后者主要代表土耳其军队中的美索不达米亚籍军官)起草了“大马士革议定书”，规定给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各阿拉伯国家以独立。这两个团体的成员由于受到土耳其帕夏凯末儿的残暴镇压，很快就损失殆尽。

但是，这一镇压也激起了民族主义的热潮，并且促使阿拉伯半岛的主要首领下决心行动起来。例如，1916年5月6日，麦加的“艾密尔”，侯赛因的儿子，后来的哈希米王朝的奠基者艾密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得悉阿拉伯爱国者被处死的事件以后，就号召发动武装起义来反抗土耳其人，他的口号是：“阿拉伯人呀，死亡已经变成了快乐的事情。”也就是这位费萨尔轻易地相信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提出的慷慨诺言，以下列词句向和会提出“阿拉伯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我的父亲应英国和法国的请求，领导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作为我父亲的代表，我到这里来向你们请求：国际联盟应该承认从亚历山大-迪阿布阿克尔—绕到南方印度洋的说阿拉伯话的亚洲人民是享有主权的独立人民[……]我是根据威尔逊总统阐述的原则提出这一请求的。我相信，大国将重视说阿拉伯话的人民的肉体 and 灵魂，胜于重视它们自己的物质利益。[1919年1月29日]

但是，像当初可以料到的那样，后一物质利益毕竟占了上风。按照1916年5月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东被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而且还成立了臭名远扬的“委任统治”制度。

对阿拉伯人来说，1920年是灾难之年。当代的一位反动的作家写道^①：

对所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说，国际联盟在圣雷莫的决定似乎是一件可鄙的罪恶。在他们看来，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国的建立是一件违反一切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荒唐事情。

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就这样“像靠了一张益智图一样”被创立起来了。这是殖民主义者的“巴尔干化”阴谋的最好例证。

^① R. 富隆：《近东》，巴黎巴约出版社。

在这一挫折的打击之下，阿拉伯人的革命热情在各地都消沉下去，但是，在别的地方，民族觉醒又以更大力量爆发出来，例如二十年代在埃及和伊拉克就是这样，后来，在摩洛哥也是这样。^①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逐步发展和伊朗在巴列维王朝奠基者礼萨领导下的逐步发展也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华夫脱党（独立党）创立起来，并且在反对 1922 年英国人扶植的埃及国王的斗争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英国人扶植这位国王是想要维持他们对埃及的事实上的指导权。同样的斗争也在伊拉克展开了。在那里，英国人执意要保持一套人为的行政机构，以便遏制为争取国家的真正独立而奋斗的力量。

他们把大部分政权都交给逊尼派（这个逊尼派构成一个封建和商业贵族阶级），答应给库尔德人和亚述人以自治，并且把某些地区划给什叶派的首领。至于用来掩盖这一政权的本质的议会制度的性质，“英国人”努里·赛义德在下面一段话里有极其机智的说明：

在选举中，候选人预先就安排好了，其中包括所有的前首相，所有两度任职的大臣，还有议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退休的高级官员，各地方的首长，部族的酋长等等。他们占去议院成员总数的近百分之六十；其余的议员大部分还要仰仗政府的鼻息过活。

1921 年的反帝暴动那样的激烈斗争和危及伊拉克国家统一的内部变乱就是这一虚伪的制度造成的。

两次大战之间，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反对“委任统治”的斗争也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且使得形式上独立的时刻更加

^① 二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也有一个由艾密尔·哈立德领导的运动，提出了各种要求；1923 年，在巴黎创立了北非之星社。

接近了。

巴勒斯坦是整个“肥沃新月地区”的最富于阿拉伯特色的国家。因此，巴勒斯坦的情况值得特别注意。1918年的巴尔弗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承认犹太人有权利在委任统治制度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乡土”。由于犹太居民在数量上有所增长——1929年达到十九万人——一个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就应运而生。阿拉伯人从那时起就竭力反对这个运动。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运动更严重地妨碍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危及他们自己的经济独立，并且是一种要犹太人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来扩大领土的政策。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就是在那时候，阿拉伯人本来也会同意把犹太人当做巴勒斯坦国家的公民而同他们进行谈判，准许他们占有土地，尊重他们在文化上的自治，甚至或许还会同意他们实行地方自治。总之，阿拉伯人本来会同意他们取得一种**少数民族的地位**；他们只不过是不同意让犹太人继续移入和购买更多土地罢了。这两种活动当时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社所拼命进行的活动。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犹太运动（这个运动由于环境的原故很快就变成了反英运动）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而且逐渐壮大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到了最高潮。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既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因而也就大大推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三十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再一次更有力地光芒四射的中心。一家接受沙基布·阿斯兰和阿布杜·赖哈曼·阿萨姆的精神指导的巴勒斯坦报纸《阿拉伯人报》，在1932年发表了这样一条教义问答。

阿拉伯人理应占有地中海周围的一半地区。他们一边俯瞰着大西洋，一边俯瞰着印度洋。到处都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同一的文化。因此，

阿拉伯統一既是一个現存的现实，也是一个历史现实。

为了加强文化上的統一，当时就制訂了計劃，准备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阿拉伯大学，并創立一所阿拉伯科学院。后者于1933年下半年在埃及創立起来。

1931年，阿拉伯大会在耶路撒冷举行會議。1932年秋天，阿拉伯大会的執行委员会就着手筹措一次新的大会，来研究在阿拉伯各国撤銷海关机构和統一貨幣制度和邮政的問題。

在1930年到1933年期間（伊拉克的費薩尔国王在这个时期身故），还进行了各种其他的努力，来实现阿拉伯的統一，但是，这一切活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及其土著代理人的破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各国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了，但是还远沒有消灭。不过，在巴勒斯坦，从1936年起，就在进行一場名不副实的反英战争，法国人在叙利亞維持他們的統治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东国家走向形式上的政治独立的过程达到最高潮。中东各国从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中，从英法势力的衰微中，从两国的矛盾中，得到了好处。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1941年5月伊拉克掀起反对英国人的革命；1943年11月，法国人退出黎巴嫩和叙利亞；1944年9月的亚历山大港會議为阿拉伯联盟（埃及，伊拉克，叙利亞，黎巴嫩，外約旦，沙特阿拉伯，也門）奠定了基础。不过，在联盟的誕生中，伦敦的别有用心的贊助及沙特王室和哈什米王室的矛盾也起了作用。

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阿拉伯統一的願望才退避三舍，为的是“尊重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因为这些阿拉伯国家仅仅“想肯定和巩固这些联系”（联盟宪章語）。

从 1945 年起，近东的阿拉伯国家就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并且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①

另一方面，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还需要等待独立时刻的到来。利比亚在 1952 年取得独立，接着，在 1956 年，苏丹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又先后取得独立。在非洲，只有阿尔及利亚和隶属于法国的撒哈拉地区以及西属撒哈拉还没有解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阿拉伯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要从帝国主义的手中取得真正的独立，它把阿拉伯革命的扩大所带来的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来了。

阿拉伯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阿拉伯社会是由地中海周围一大半贫瘠的国家组成的。它的农业居民，不管是定居的，游牧的，还是中间性的，都束缚在沿海的土地上，或者束缚在大河沿岸、高山、绿洲的土地上，或者束缚在大片内地沙漠中星罗棋布的畜牧“草原”上；在那里，土地所有制一般是由伊斯兰教的法律或土耳其的封建制度决定的，城市里则居住着一个依靠贸易利润和租金过着寄生生活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长期以来就分成几个不相往来的部分，与外界隔绝，闭关自守，而且不论是在中东或马格勒布，都保留着家族和部族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保存着奴隶制度的痕迹，有时还十分清晰；除了在小岛上和各国边沿地带以外，这个社会还没有为帝国主义的侵入所颠覆。

大体上来说，我们通常关于阿拉伯各国的概念就是这样，而且这一概念基本上是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在这一概括的概念中，具体的各别结构就不能不模糊起来，正在进行中的演变

^① 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海盜海岸，巴林和科威特除外。这些地方仍然是受英国控制或保护的属地。

的基本輪廓也不能不模糊起来。因此,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一) 土地問題

在阿拉伯各国,工业化已經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上次大战期間。但是,总的来說,尽管在工业化方面无疑地有了进步,阿拉伯各国的特点仍然是农业經濟占压倒优势。在中东,这种农业經濟大体上受着封建关系的支配,在馬格勒布各国的殖民者經營的大庄园里,这种农业經濟受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

保持国内的现状,对城市的寄生性的高利貸性的资产階級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正是这种现状使得他們能够占有土地,然后把土地重分分租出去以求得利潤。也正是这种现状使得他們仿佛在管理着农民的財務。这些农民經常缺乏金錢,負債累累。只有一小批名副其实的工业资产階級核心在形成中——不过,尽管有着一切不利条件,他們仍然发展得很快。他們的利益就在于遏制封建分子和高利貸资产階級的权力,实行某些改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創造他們自己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国内市场。

在战后时期,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真正领导阿拉伯革命的正是这些工业资产階級核心以及在思想上同工业资产階級有联系的知識分子,甚至軍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情况特殊,我們以后还要加以研究。)

現在我們用一些基本数据来更清楚地說明阿拉伯各国农村地区目前的經濟和社会結構。

适于耕种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5%—45%。已經开垦出的土地所占的比重就更少了,占 2%—33%,不过,一般来說,不足 10%。基本問題是水利和灌溉。这一問題对土地の利用有极大关系。在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外約旦,伊拉克和伊朗六个国家

里，得到灌溉的土地在耕地面积中不到八分之一。在伊拉克，可以灌溉的土地有一万九千一百平方英里，得到灌溉的只有二千六百二十平方英里。在叙利亚，八百七十五万英亩中只有一百二十五万英亩得到灌溉。

由于耕地面积有限，由于灌溉困难，由于农业人口在不断增加的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所得的可资利用的土地就降低到可以和印度相比的水平，即每人 1.48 英亩。

耕地面积的极低的比重和非常低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碍造成的，而是陈旧的社会关系造成的。

伊斯兰教禁止**按固定地租出租土地**；伊斯兰教规定由出租者和耕种者共分作物，并且准许租额达到极高的水平。此外，《古兰经》规定的继承法也促使人们把土地分到极小的限度，每个男孩继承两份，每个女孩继承一份。

而且，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地归国家管理的原则长期以来也给土地带来沉重负担。它首先准许建立附有地租的“封地”。这就促进了受封“领主”的不在主义，造成了耕作不良和停滞现象，结果就使得租佃制度极其多样化。

穆斯林土地耕者（伙种农或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不论在摩洛哥或中东，一般是由风俗习惯，传统及家族或部族的首领决定的。这些家族或部族首领负责确定地租，定期地在家族或部族的土地集体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

这就使耕种者对他自己的权利和他那份土地的前途，感到惴惴不安。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反映在土地日常耕作不良上面。

如果把问题简单化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在中东，除了同欧洲各国的自耕户相当的“穆尔克”（mulk）土地以外，占优势的是**封地和租地**。国家的财产（或者不如说是国君的财产）“米里”（miri）

土地本來是為酬勞領主的勞績而以“穆爾克”的方式，或大體上長期租借的方式，分給封建領主的，在兩種情況下，又由領主分給農民。“馬特魯基”(matruki)是公用的土地，“華克夫”是永遠管業，即捐贈給宗教或慈善組織的土地。

“米里”制度是伊拉克所特有的，“馬特魯基”制度是伊朗所特有的；而在一個很長時期內，“華克夫”土地占了埃及耕地的十分之一。

在馬格勒布，建立在最好的土地上的大農業莊園，一般都在資本主義殖民者和少數土著大地主手中。這些大莊園都是利用大量而廉價的土著勞動力，即無地的農民，按照現代化的方法耕種的。至於土著居民的土地，則劃分為“穆爾克”土地，即不可分割的家族土地——這是山區的特色（男系家族的每一戶都有權利按照面積的比例取得收穫物）。這種土地由家族的成員耕種，在土地屬於撒哈拉綠洲的半游牧民所有的情况下，在農民公社集體公有土地的情况下，在牧民部族的情况下，在公有“哈波斯”土地（相當於埃及的“華克夫”）的情况下，則由伙種農耕種，按五對一的比例對分收穫物（哈麥斯制度）。“哈波斯”土地今天在突尼斯仍然特別盛行。

總的來說，在每一個地方，地主，部族的“貴族”或公社的“貴族”，以及他們在城市中的商業和高利貸資產階級盟友，都占有優越的社會地位；經濟權力，金融權力和民政權力都集中在他們手中；另一方面則是小農戶，特別是一切朝不保夕的小農戶。這些農戶正由於朝不保夕，也就認為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從長遠的觀點來進行經營。

住在城市的土地占有者常常要求用現金償付地租。為了生存下去，農民幾乎不得不經常地舉債——現金墊款或實物賒欠——，辦法不一而足，但是都讓“商人”或放債的資本主義所有者取得了

100%或更多的利息。这些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成了他們的农民“顧客”的管家，替他們納稅，在他們有非常的家庭开支时給予照顧等等。

只有山地的农民，像阿尔及利亚或摩洛哥的农民（在那里，土地是家族和公社的不可分割的财产，因而还很有相互帮助的精神）不受阿拉伯农民状况的这一法則的支配。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地区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土地則貧瘠而有限，而且已經划分得很細，住滿了人，发生了人口过剩的现象。因此，那里的居民已經在空前的规模上外移。

在埃及，1952年实行农业改革以前，耕地分为下列几类：私有土地約五百六十万費丹^①，“华克夫”土地五十九万二千費丹，国家土地或公用土地二百五十万費丹。每戶不足五費丹的小块土地占总数的37%；但是，这些小戶的数目在土地所有者总数中却占了94%。5—10費丹的中等戶土地在私有土地中占31.6%，中等戶数目在土地所有者总数中占5.3%。50費丹以上的大庄园則为不足0.5%的土地所有者所掌握，土地面积在私有土地中占31%（华克夫土地还不計算在內）。

据人們估計，依靠不足两費丹土地維持生活是不可能的。可是，在1952年以前，拥有不足两費丹土地的农户却有两百五十多万户，而且从人口增加的情况来看，这一面积还有减少下去的趋势。交給地主的那份作物平均竟占总收入的80%。

在黎巴嫩，面积在1.2到12英亩的小块土地最多，但是，不几年以前，2%的土地所有人还拥有40%的土地。

在叙利亚，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以前，面积在250英亩以上的大

① 一費丹合四百七十八平方碼。

庄园的土地在全部可耕地中占 15% 以上，而小农户的小块土地的面积却在 25 英亩以下，悬殊现象或许比在埃及更加严重。在叙利亚北部，大土地所有者占有 80%—90% 的土地；在大马士革地区，占有 60%—75% 的土地。^①

在伊拉克，“土地是最封建化的了，制度很不分明，最突出的特色是大庄园的出现。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城市地区以外的全部土地都是‘米里’土地。”^②封建主和“贵族”又用各种方式夺取了这种土地。

在最近的土地改革以前，可耕地总数有三千万英亩，一千个左右的地主就占有了二千万英亩土地。某些“贵族”拥有的庄园面积达到十万英亩，由名副其实的农奴替他们耕种。农奴们常常只得到收获物的 30%。^③

在约旦，以不足二十五英亩的小块土地居多。大概有 30% 到 40% 的村民没有土地。集中在几百个地主手中的大庄园网仍在增长中。

在伊朗，85% 的土地耕作者并非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些土地属于国家，或者属于一些数目有限的大土地所有者。

在馬格勒布，情况如下：

在突尼斯，在大約二千二百万英亩“肥饒”土地中，实际耕种的約有九百三十万英亩，殖民者在不久以前还拥有一百九十万英亩

① 这些土地是按照对分收获物的方式耕种的。“租给佃农的土地在 17.5 到 150 英亩之间，实行干燥地耕作法，完全仰仗土壤的质量和气候的干燥，因此他们自己留下的一份收获物也同样有所不同，大致在一半到五分之四之间。合同期限按年计算，或者按作物轮种期计算，不能保证佃户的生活。佃户除了负责的时候，并不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比罗和让·布雷希：《地中海和中东》，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② 同上。

③ 1933 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不让伙种农离开土地，直到他清偿债务为止。

最好的土地。其余的土地由少数大土著“哈博斯”土地所有者和大量小土著所有者占有。

在**阿尔及利亚**，在将近三千万英亩可耕地中，实际耕种的有一千万英亩。两万五千名欧洲殖民者拥有或者租借了七百万英亩以上最好的土地。在1950年，欧洲殖民者拥有的土地在已开垦的土地中占38%。另一方面，据估计，穆斯林拥有的农村土地分成了约六十万块，其中70%不足以维持生活（在二十五英亩以下）。

因此，差不多有七十万户的农业居民没有土地（三百到四百万人）。

在**摩洛哥**，在三千七百万到五千万英亩可耕地（和一千万英亩森林）中，1953年实际耕种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万英亩（约有一千万英亩种了谷物）。六千名欧洲殖民者拥有二百五十万英亩的可耕地（面积在七百五十英亩以上的农庄有九百个），其中实际耕种的有一百五十万英亩。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常常为摩洛哥农民的单位面积产量的三倍。

几千名摩洛哥大封建主占有摩洛哥耕地的四分之一，即四百五十万英亩。一百三十万摩洛哥人耕种将近一千万英亩土地。在1954年，据估计，有五十万户没有土地。^① 摩洛哥人耕种的土地有四分之一是集体土地。

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马格勒布，除了大批贫困不堪的农民和游牧民以外^②，还有大量的农村无产阶级。这是过剩的人口。他们

^① 在四十五年中，有一百万农民为悲惨的境况所逼，涌往城市，形成了“比奈维尔”（贫民区）的半无产阶级。

^② 游牧民大都为牧民。他们虽然肯定地和不可避免地在减少，但是在阿拉伯人口总数中仍然占很大比重，或许占10%左右。在叙利亚有三十万人，在沙特阿拉伯的六百万居民中占大多数，在伊朗有两百万，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占居民的半数以上（那里

无法找到真正的生产性的工作。

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在世界上是最悲惨不过的了：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有时甚至是全家的收入，如像在埃及——不足二十五美元；完全不識字；由于营养不良或工作和气候条件，还染上各种疾病（肺結核，虐疾，沙眼——連一位伊本·沙特也难逃此灾——血吸虫病，鈎虫病等等）。所有这些病都損害了他們已經很弱的身体。

而且，在趋势是朝着集中的和现代化的大庄园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由于卫生状况的改进，由于游牧民的定居化和土地产量的提高（土地并没有成比例地扩大），过剩的农民人口增加了。这些人由于沒有受雇从事經濟事业，因此，对土地的耕种也不能发挥經濟效用。

因此，这就清楚地說明，和摆脱帝国主义、爭取真正独立的民族斗争一样，这些国家的土地問題也具有头等重要性。而且，只有在一个給农民以充分土地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全盘革命政策的范围内，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圓滿地解决这个問題。要想通过各种水力工程开垦新的土地，要想消灭疾病和文盲，要想提高土地的生产力，要想在农业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以支持阿拉伯各国不可

約有一百七十万居民)。

游牧民轉入定居生活的过程现在正在中东和馬格勒布进行中。这是建立了各个独立国家，把沙漠分割开来，切断了游牧地区的通路的結果，也是輸入資本主义时代的貿易和自动化运输设备的結果。資本主义时代的貿易和自动化运输设备的輸入使得沙漠的流浪生活变得既困难又不时兴了。

“定居化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的經濟和社会状况的变化。部族酋长正在通过各种方法变成大地主：可耕地的专断分配，水源的出售和信贷。”其他人則变成普通的农民，或者甚至丧失他們的牲畜，迁往綠洲，扩大了“哈麦斯”农民的队伍，或者涌往城市或油田——如阿拉伯半島的油田或现在撒哈拉的油田——，变成了无产阶級。

缺少的平行的工业化事业，也不是单靠土地改革所能奏效，还需要有一个全盘的国家政策。

阿拉伯各国的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给实际耕种的人以土地，这也就是说给小农，伙种农和农业工人以土地；消除一切使小块土地的耕作者对前途惶恐不安的制度，无偿地剥夺一切土著的和外来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以及“华克夫”土地和“哈博斯”土地，在可能和必要的地方通过水力和其他工程，扩大现有的土地。

至于这种土地改革所采取的形式，必须考虑到阿拉伯家族和部族社会仍然拥有的公社习惯（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的侵入，这种社会已经在衰落中）以及公社基础上的灌溉耕作方法的需要。

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可以实行一种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这种改革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公社的或部族的集体（这些集体以后还要并入更大的集体中），并且把土著封建主和殖民者的最好的大农业庄园变成国营的事业，由在这些农庄上工作的农业工人或伙种农集体加以管理。

事实上，阿拉伯伙种农或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低下（或许使用“可怕”一词要更好些），以致任何显著的经济改善——举例来说，其中包括工资的提高——都可以鼓励这些群众在他们成为管理人的集体农庄上提高生产力。

自然，各国的具体情况是互不相同的，有时甚至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也是互不相同的。

（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工业化

不久以前，阿拉伯资产阶级还基本上是由商人和高利贷者组成的。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利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落入他们手中。这些阶层把土地产品加以消费，重新分配，或者输出国外，把

他們的所得用黃金儲存起來，或者投入地產中或大莊園中，這些大莊園又按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分租給伙種農，或由農業工人耕種。^①

這些階層還對農民進行高利貸剝削，利用“複雜的債務制度，商業關係制度，或者把農民當做主顧”，使農民依附於他們。在貿易（紡織品，谷物）或運輸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商人也是馬格勒布各城市的阿拉伯資產階級基本構成的一個特色。

阿拉伯資產階級的這一構成至今仍占有優勢。他們基本上是寄生性的。

但是，由於帝國主義侵入阿拉伯各國家引起了經濟的變化，由於新油田的開辟以及由於緩慢但不間斷的工業化過程，除了這些階層以外，已經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工業資產階級核心興起了，因此，這就是說有一個現代無產階級興起了。

在中東，除了蘇伊士運河一類的貿易基地和事業以外，對中東各國的經濟和社會變化影響最大的是油田。今天，在中東一共有六百個油井，其供應量占西方世界生產總量的四分之一，而這個地區的石油蘊藏量據估計則占“大西洋”蘊藏量總數的三分之二。^②中東的總產量每年價值在十億美元以上。生產石油的阿拉伯各國的預算即令不是全部依靠從石油中取得的收入，大部分也是依靠這種收入。但是，現在，這筆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用於國民經濟。

① “在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甚至在黎巴嫩，除了在高山中以外，有很大一部分大莊園在資產階級家庭的手中。他們在實行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農業公社中，購買了‘穆爾克’土地，在對分的原則下取得‘米里’土地的收益權（這些土地在伊拉克由於可以利用水利，所以很有價值）。他們要么是擴大灌溉工程，購買工具，種植工業作物以便進行投機，要么是把这些土地交給管理人，分租給佃農去耕種[……]。”（P. 比羅和讓·布雷希：《地中海和中東》）

② 據估計，這一蘊藏量為一百六十一億噸。單單沙特阿拉伯一國的石油蘊藏量就超過了美國（這是由於海底蘊藏量特別豐富的緣故）。

尽管如此,开采石油的技术需要和这种开采的利润,仍然——举例来说——使阿拉伯半岛这样一个地方与“波斯”接壤的整个边沿地区的传统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那里,不久以前,还盛行奴隶制度,现在却发生这样的现象:非游牧化,无产阶级化,道路建设,都市化。

此外,中东各国还在不同的程度上出现了现代化的工业,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这样:各种开采工业(石油开采业除外,因为石油开采业完全在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或各种加工工业。

纺织工业是最最主要的工业,特别是在埃及(埃及的纺织业除了对棉花进行加工外,还对亚麻,人造丝和天然丝进行加工,设有非常庞大的工厂,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场)。其次是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伊拉克,纺织工业还处在初期阶段,只对棉花和人造丝进行加工。

其次是食品工业,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这些工业全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主要集中在埃及,但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也有少数企业。一般来说,这些工业,包括纺织工业,尽管在不断发展,现在甚至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因此,如果有剩余可供出口的话,那是非常特殊的现象。

不过,这些工业的发展就其社会影响而论,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加强了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

现代无产阶级现在在数量上还很薄弱,但是,他们常常是集中的,而且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他们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增长:在伊朗,在波斯湾各被保护国,在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和在撒哈拉,有一支约二十万人的石油工人先锋队;在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有纺织业和建筑业工人;在从亚历山大港

到拉塔基亚的各港口中，有运输工人，码头工人。

现在，单单在埃及——阿拉伯各国中最最工业化的国家——就有一百三十万工人，不过他们大部分(90%)是不熟练的工人，分散在几千个小工场中；雇用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只有六十五个。

在馬格勒布，以出口为目的的殖民地农业在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然而，

在城市里已经建立起加工工业，最初的目的是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特别是欧洲人的需要：有面粉厂，随处可见的滋养品工厂，现代油类加工厂，还有少数罐头工厂。但是，至少在1945年以前，它们的产品几乎完全不供出口。土壤和下层土壤的大多数其他产品也很少加工。①

但是，在上次大战以前，任何北非国家

除炼铁厂和修理厂以外，[都没有]金属工业。也没有纺织工业，虽然棉纺织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品之一。只有少数工场对羊毛进行加工，在摩洛哥尤其是如此。整个来说，化学工业只限于生产硫酸和过磷酸盐，这两种产品几乎只有欧洲移民使用。建筑工业不能满足这些正在从事建设的国家的需要。例如，阿尔及利亚所用的水泥有三分之二是进口的，石灰有一半是进口的，甚至砖瓦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的。②

自上次大战以来，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战期间，工业化似乎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从1943年起，有三个北非国家同宗主国断绝联系，在那里，最必需的制造品很快就发生匮乏。因此，不能不匆匆地建立整整一系列新工业：食品工业，冶金工业，家庭用品工业，化学工业和玻璃工业，建筑工业等等。

其中有些工业，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无法应付宗主国的设备更好的工业的竞争，马上就垮台了。但是，在法国资本或国际资本

① 见上引的《地中海和中东》。

② 同上。

进行新投资的情况下，工业化的动力保持下来。他们所以要进行新投资则是因为马格勒布各国在战略上很重要，利于建立大规模企业和支出大量开支。工业从这些公私投资中得到很大好处。

除了投在食品和纺织企业中的一些当地资本以外，

宗主国法国的大公司也建立了分支机构，如穆松桥梁公司，液体空气化学托辣斯，索尔韦公司，佩希奈托辣斯，圣戈班化学公司，拉法格公司，尼德威勒公司，布萨克公司，阿米欧公司等，以及一些英美联合企业（热里加的北非铅公司及突尼斯的港湾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①。

这样，各种工厂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了：冶金厂，纺织厂，化学厂等等。其中有些工厂（食品工业）建立在产地，但是，大多数工厂都建立在港口附近，结果，庞大的工业区也就兴起了（著名的“比东维尔斯”也在其中）。

不论是在中东或马格勒布，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过程都还没有使这些不发达国家的以农业和贸易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任何质的变化。

从技术上来讲，工业的大规模发展由于没有重工业而受到阻碍。如果有重工业的话，就可以有效率地生产廉价机器来装备轻工业，从而降低国内工业产品的高额成本。现在，却不得不用同样高额的关税来保护这些国内工业，以便使它们能够存在下去。

从经济上来讲，农村地区的封建结构和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的高利贷作用也有碍于开辟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推进工业的发展。

从资金上来讲，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原始资本累积所必需的充分财力，而受到阻碍。本国资本都宁愿投入商业和贷款业务中，为的是迅速取得大量利润，外国资本只愿小心翼翼地投资，也希望迅速取得利润。掌握在封建-资本家或帝国主义手中的国家又

^① 见上引的《地中海和中东》。

反来促进了这种投机活动，并且消耗了本来可以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财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有一种人所熟知的现象：官僚集团不但颞頥无能，过着寄生生活，而且过分臃肿。^①

此外，由于它们是不发达国家，居民的劳动潜力所提供的巨大生产力量大部分也还没有用在生产事业上：在埃及，一千八百万农民中有三分之二没有受雇从事生产事业，在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每九个人就有七个人没有从事生产事业等等。

因此，在这些经济仍然受着帝国主义控制(很少有例外)的国家里，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和条件就成为妨碍这些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并且使得它们毫无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赶上工业国家。

不过，自然条件对阿拉伯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却绝不是不利的。

虽然一般来说，这些国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于解决水力电或燃煤热力电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这些国家除了明天的**太阳能**以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可资利用。这种资源如果汇合在一个**泛阿拉伯联营机构**内，可以充分满足它们的工业化的全部需要。

矿产资源虽然没有切实的勘查，很少为人所知，但看来是很充分的：

在中东，叙利亚的叶尔茂克山谷中有**含氮的石灰石**，在整个叙利亚沙漠中，在死海里^②，在红海沿岸等地，有大量**盐类**蕴藏；在

①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都陷入贫困的境地，做官(和做点卑鄙的交易)是逃避这种贫困境遇的手段。1951年，在埃及，有五十五万官吏，其中二十万人没有具体的工作。

② 有四百亿吨矿盐，还有取用不尽的钾碱蕴藏。

埃及的阿斯旺东面和黎巴嫩有**鉄矿苗**；在也門有**煤**，**銅**和**鉛**；在沙特阿拉伯的馬哈德·德哈卜有**黃金**；在埃及和利比亚沙漠中有**磷酸盐**等等。

在北非：在突尼斯，特别是在摩洛哥有**磷酸盐**，摩洛哥的产量几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有**鉄矿苗**，如波尼（欧恩薩的中心）的鉄矿苗，现在正在計劃开采这些鉄矿苗，預計的鉄产量达到每年四十到五十万吨；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有**鉛**和**鋅**矿藏；在摩洛哥有**錳**、**鈷**和其他**稀有矿藏**；在撒哈拉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矿藏**；在加腊·杰比列特和古罗堡有**石油**，**天然气**，**科隆-貝沙尔煤田**，**鉄矿**，在阿基韦特有**銅矿**，在霍格尔有**各种矿藏**等等。

除了中东和北非的这些矿产資源以外，还要加上农业和畜牧业出产的原料：棉花，甘蔗和甜菜，各种油类，羊毛等等。

至于阿拉伯国家工业化的**資金**条件，由于有石油資源，再加上这些国家的现在閑置未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方面的需要也可以充分滿足。从理論上来說，从石油生产中取得的巨額利潤^①应当足以提供充分資金，来滿足一个联合阿拉伯联邦共和国工业化的需要。但是，现在，这些利潤大部分都落入外国帝国主义公司和当政的寡头集团（政府，国王，酋长）之手。^②

科威特酋长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国庫的惊人收入是大家都知道的：每年分別竟达五亿美元和三亿美元之多！科威特酋长把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他的家庭（七十人），还有三分之一“由这位酋长在伦

① 这一石油产量在 1954 年达到一亿五千万吨，占世界产量（苏联不計在內）的 20% 以上。此外，据估計，世界消费量今后十年中将提高一倍，那时，中东石油将必須至少滿足世界消费量的一半，这也就是说，須要把中东的产量提高到八亿吨。

② 目前，中东出产的每吨石油都給有关的政府带来平均相等于 5.50 美元的一份利潤。

敦設立的一个投資委員會”，即著名的科威特投資委員會投入“头等的国际股票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所謂“公共福利”方面。

至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有五千万美元用来供养王室的三百名成員和維持二十四個“一千零一夜”宮（而在1952年到1954年之間，只有一千三百万美元用于农业，在1955年只有一千万美元用于社会福利工作和八千万美元用于軍隊）。

另一方面，在伊拉克，70%的石油收入都由一个“发展局”用来改进国民經濟，特别是农业，主要是靠了修建水利工程，以便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水进行灌溉。

帝国主义对石油的控制也妨碍了国内的消費，一方面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要在当地对任何数量的原油进行加工都有种种困难，但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根据美国石油价格来計算石油价格，使石油价格大大超过了中东的生产价格。

总之，要想使非常庞大的阿拉伯石油資源对这些国家的国民經濟的迅速发展作出有力的贡献，一个根本条件就是要无偿地剝夺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主义分子。

在这些国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資源，它本身至少能部分地解决迅速大规模开始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資本累积这一困难問題；这一資源就在于把千百万现在部分失业或完全失业的男女劳动力动員起来投入生产。在一个由国家加以控制和計劃的經濟的範圍內，把这支力量投入灌溉工程，造林事业和各种民用建設以及地方工业中，就可非常迅速地提供巨大的生产力，首先是大大增加农业生产。怎样有效地动員这支力量，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問題。

怎样评价目前资产阶级 对阿拉伯革命的领导

在判断战后时期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对阿拉伯革命的领导所起的作用时，必须把这些材料考虑在内，才能对这种领导作出试验性的评价和估计它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新阶段中，中东和阿拉伯革命的突出事件是：摩萨台在伊朗的试验；1952年埃及的政治革命和纳赛尔主义的登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解放；1954年11月的阿尔及利亚革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1958年黎巴嫩和伊拉克的革命。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都树立了自己的权威，领导了民族反帝斗争。在有些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党和人物——他们自己就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出身，或者在思想上明确地依附于资产阶级——所起的政治领导作用是极其明显的：伊朗的摩萨台；摩洛哥的独立党；突尼斯的新宪政党和布尔吉巴；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像在埃及和伊拉克，革命的领导责任由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军官集团担负起来。他们的社会本质和立场应该更容易理解。一般来说，**纳赛尔主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我看来，事变已经完全证明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我们时代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作用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事变已经证实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这又反过来证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有必要建立一个团结一切阶级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

但是，事变也同样证明了本国资产阶级在一切基本领域中的局限性：摆脱帝国主义，实现真正的独立；民族统一；土地改革；工业化；妇女解放。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本国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核心，在经济上都是薄弱的，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分子和本国其他剥削阶层（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都有太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还不肯坚决地依靠农民和工人群众。由于这个原因，事变已经证明，这个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和完成上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①

摩萨台在伊朗石油国有化方面的失败；摩洛哥的独立党政权和突尼斯的新宪政党政权的记录；今天伊拉克革命的初步记录——这一切经验都清楚地说明了一个归根结蒂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的局限性。（目前的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情况，我们将另外论述）

由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在实际上给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千载难逢的可能性和机会，由于东西方的对立，由于有了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获得外交、军事、财政、商业和技术援助的全新的可能性，这种局限性就更加暴露出来了。^②

① 这就是同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有关的任务。过去在欧洲国家，由于实现这一革命，才推翻了封建主义，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

② 埃及：在1953年到1957年之间，埃及和苏联的贸易额增加到十一倍多。有整整一系列货物，苏联现在都是埃及的主要供应者。例如，1957年，在埃及的进口中，苏联货占：小麦，43%；油类，37%；锯好的木材，37%；木板，50%；拖拉机，27%。此外，苏联现在还购买了埃及的30%以上的棉花和大米。

叙利亚：在1957年，叙利亚从苏联进口的货物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

机器和设备……………47%

石油产品……………24%

钢铁……………13%

锯好的木材……………9%

苏联从叙利亚进口的货物主要是棉花（70%以上）。

由于这些新情况，民族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把它不依赖于帝国主义的相对独立性推进到比过去更远的地步，同时还有可能胜利地抵抗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6年英法侵入苏伊士运河时，情况就是这样，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使它无法利用这种千载难逢的局势，来根本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造成的经济后果，即妨碍扩大国内市场和迅速大规模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在阿拉伯各国，包括在埃及，帝国主义的经济障地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完全消灭——远没有消灭。

在群众的压力下和迫切的政治和经济需要的压力下，的确他们确实采取过某些剥夺措施和国有化措施——如苏伊士运河和埃及其他企业的国有化——但是，帝国主义者也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补偿。这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负担，在完全相应的程度上减少了本来可以用于工业化的可能的资源。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工业化具有决定意义的石油问题可以说明，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一般来说是软弱无力的。两者之间的新的力量对比也许可以促使资产阶级去同石油公司谈判合同，而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事实上，这一过程现在已经开始了。^①

但是，如果没有阿拉伯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个远远超

不论在叙利亚和埃及，销售苏联货物所得的款项都全部用于购买这些国家的农产品。

苏联给予阿联的信贷到现在为止，合计已达四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约有二亿美元用于兴建阿斯旺水坝）。

① 所采取的方式是成立“合营”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用日本和意大利资本建立了这种公司。利润是按照比传统的对半平分办法更有利的方式对分的，而且不但有权对分由生产中得来的利润，而且有权对分由石油的加工、运输和销售中得来的利润。沙特阿拉伯最近正是希望按照这些条件来同印地安纳美孚油公司订立一个合同。

出資產階級範圍的領導，就不可能進入對這些公司不加賠償的國有化階段，而這却是保證在阿拉伯國家大規模開始工業化所必需的原始累積的根本先決條件。

阿拉伯民族統一的事業在目前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領導阿拉伯革命的情況下，也同樣受到損害。阿拉伯統一是一個太進步的任務，決不能說，實現這一任務的政權具有什麼性質，它也就具有什麼性質。

阿拉伯民族統一將成為阿拉伯革命在經濟方面，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欣欣向榮的最適合的基礎。從這一觀點來看，實現這一過程的政治形式就不如內容本身重要。舉例來說，如果阿拉伯統一可以在一個由納賽爾管理的單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範圍內實現，那麼，不管這個國家多麼不民主，人們都不能夠反對這種統一。人們只能滿足於繼續在這樣一個國家內部為爭取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但是，在實踐中，由納賽爾主義在一個中央集權的泛阿拉伯國家的形式下，或甚至在一個阿拉伯共和國邦聯的形式下實現阿拉伯民族統一，是辦不到的。阿拉伯國家的一切聯合形式，作為走向在一個單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或一個有效的聯邦共和國^①內實現統一的過渡形式，都必須看做是進步的，如果有實現的可能，都必須加以支持。

目前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內，在埃及和敘利亞之間發生了糾紛；阿聯和伊拉克雙方在把統一擴大到伊拉克的問題上，都採取保留態度；布尔吉巴對阿聯採取了敵對態度；甚至在馬格勒布內部也發生不和。有許多重要跡象都說明，任何阿拉伯資產階級——即

^① 例如，由馬格勒布聯合共和國和中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來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

令是其中相对來說最有力的資產階級——不仅从組織上來說，而且从結構上來說，都沒有能力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同化和統一的因素。

阿拉伯封建-資本主义統治階級的各不同的部分从經濟和社会結構观点来看，是太庞杂了，同帝国主义的各式各样的联系也太密切了，也太富于地方主义观念了，因此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运动，在一个单一的民族体制內，團結在一个单一的軸心周围。只有一个拥有巨大經濟力量的强有力的政权才能够打破地方主义的离心傾向，实现統一。这种統一**是阿拉伯群众的最大的共同革命願望。**^①

納賽尔主义并没有这种气魄。納賽尔主义是一个突出的**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它利用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群众运动的声势以及东西方的矛盾，使**民族工业資產階級**这一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仍然很有限，但正在不断地加强中）最后得到好处。这一資產階級具有**突出的資本主义的本色**，目前沒有充分力量通过一个議會民主党和議會民主政府来进行統治。为了实行統治，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便既能应付帝国主义，又能应付經濟上落后的本国封建-資產階級阶层，同时，又不致在左方为群众的独立革命运动所包围。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軍官大多是城乡中等資產階級的产物。他們都是**在社会理想方面朦朧地希望国家“现代化”，“赶上西**

① 阿拉伯民族統一还必須給某些国家里存在的不同的人种集团，如伊拉克的庫尔德人，以真正的自治，甚至自决权。此外，在中东，它还必須解决以色列国家和阿拉伯难民問題。这些难民总共有八十万，至今仍住在营地中，一般是帳篷里，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沒有工作。解决他們的痛苦的和爆炸性的問題的唯一公正办法，是把他們重新安置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并把目前的以色列国家当做一个少数民族吸收在內，让它在一個中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享有自治权和充分的文化自由。

方”等等的中型大土地所有者，企业家或职员子女。他们建立的军事政权，对资产阶级的这一阶层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工具。

从根本上来说，纳赛尔式的波拿巴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一部分国家行政机构由于职权的缘故，富裕起来，变成了资本家，即资金占有者；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国家的行动整个来说，力求促进原始资本主义累积，并且正在协助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打破了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全权权力给这一发展带来的种种限制。

纳赛尔主义的泛阿拉伯政策是力求至少部分地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的障碍，以开辟更为广大的泛阿拉伯市场，并力求在这种基础上吸引阿拉伯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这个政策就其经济本质而论，也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

* * *

我们已经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局限性，也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统一和工业化的斗争的局限性。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分子的斗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清楚地反映在民族资产阶级战后推行土地改革时所表现出的极端怯懦的态度上。

^① 纳赛尔主义根据经验发现，它的使命就在于作为一个政权来促进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从1952年以来，埃及就在加紧推行工业化，虽然实际结果仍然很有限（在1956年只有两亿埃及镑工业资本）。

纳赛尔主义国家的政策愈来愈致力于推行工业化：在国家的大力参加下成立了一些联营企业；还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来加速工业的发展；在1956年成立了“计划委员会”；现在又拟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定于1959年开始实行。

这个计划的资金达到二亿五千六百万英镑——为数毕竟不大。其中三千六百万由苏联提供，四千四百万由西德提供，8百万由东德提供，一千万由日本提供。

然而，动员当地资本（其中包括在土地改革中以土地赎金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资金）投入工业的努力，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不成功的。

在埃及,到现在为止,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受到土地改革的实惠的还不到10%左右,“被剥夺”的所有人还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补偿。^①

土地改革现在正在扩大到叙利亚,在那里,封建主的私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灌溉土地二百英亩,有子女者增加一百英亩,外加非灌溉土地七百五十亩。其余的土地由国家接收,按相当于每年平均地租十倍的地价付给所有人以补偿(每年平均地租通常为欧洲同一土地面积的四倍,例如在埃及就是这样)。

至于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那将由二十英亩的小块灌溉土地或七十五英亩的小块非灌溉土地构成,地价在四十年内偿清,利率为1.5%。土地改革预定在五年内完成。到五年期间的末尾,在叙利亚的三百多万无地农民当中,受到土地改革实惠的将只有极小的一部分。

至于伊拉克的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促使土地改革扩大到叙利亚的就是伊拉克的土地改革),那是更加温和了。据一位为这

^① 1952年的法律规定,私有耕地不得超过二百费丹,如有子女,头两人每人可额外增加五十费丹,总共不得超过三百费丹(三百费丹合三百三十一英亩)。未经开垦的土地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以内。因此,有六十六万六千费丹未经耕种的土地还可开垦,此外还有属于皇室的十八万费丹的土地。在1956年7月,有六万五千户的五十万人从没收的二十六万费丹土地中分得了土地。在一千八百多万农民中,受到整个土地改革之惠的总共将有一百五十万人。付给前所有人的补偿金相当于地租价值的十倍,外加设备、机器和树木的代价。这笔补偿金是用利率为3%的国库债券支付的,三十年后偿清。在1956年7月,在这些债券中,有五十亿法郎的债券及利息已经偿清。

售给农民的土地的地价在三十年内偿清,价格相当于税额的三十倍,外加3%的利息及15%的开垦费,每年收获时一并偿还。在理论上,农民所分的小块土地不能再分割下去,甚至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继续分割。

农民所有人在一个集体体制——强制性的合作社——内耕种土地,按面积比例均分收获物。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的特色是用权威主义的方式降低了过去的高额地租,从土地改革前的每费丹四十到五十埃及镑,降低到十八到二十一埃及镑。

种土地改革辯护的阿拉伯人自相矛盾地論断說，那是“因为伊拉克拥有的可耕地相当于叙利亞可耕地的三倍多！”(參看旅英阿拉伯学生联合国出版的《阿拉伯評論》1958年10月号)

伊拉克的土地改革也預定在五年內完成。它規定，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应降低为灌溉土地六百一十八英亩和非灌溉土地一千二百三十英亩。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以前的大地主階級都将由一个富农阶层来接替。他們由于沒有财务上的困难(单单有了国家的补偿金就夠了)，将可以毫无困难地以各种方式在經濟上支配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人的小农。因为这些小农絲毫得不到国家的适当的物质和技术援助，而且气候又非常恶劣。

* * *

至于馬格勒布的解放了的國家——突尼斯和摩洛哥，除了有償地剝奪少数殖民者庄园的有限措施以外，它們还没有认真地着手实行土地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阿拉伯各國，关键性的問題，即土地問題，基本上依然原封未动；希望阿拉伯革命目前的領導者来根本解决这个問題，那是幻想。

至于妇女解放問題，由于伊斯兰教的规定和封建传统，阿拉伯各國妇女的境况要算是世界上最不合时代潮流和最痛苦的了。这一任务的解决也是同这些国家的根本的經濟和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在目前的封建-資本主义制度下根本办不到。^①

① 在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现在在阿尔及利亚，妇女都参加了阿拉伯革命，但是，这只是部分地緩和了而不能打破仍然压在她们身上的中世紀的枷鎖。

只有高山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或游牧部族的穆斯林妇女还在各方面保持着某种自由，有时还保存着古代母系制度的繼承权(卡比利亚的妇女，尤其是奥雷斯山中保有乔維亞·柏柏尔文化的妇女，沙漠中的土瓦勒格妇女等等)。

为阿拉伯的新的、革命性的 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奋斗

为了完成和彻底实现阿拉伯革命的真正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为了实行阿拉伯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必要促成**一个能够代表阿拉伯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的新的革命领导的兴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促成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兴起。**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历史的时间表相比，这一任务是大大地落后了，而且，在阿拉伯各国，正像在别处一样，这个任务已经由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外交政策不断改变而大大复杂化。共产党在阿拉伯各国，也像在别处一样，都是顺从的工具。通过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政策，它们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能够推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独立组织和行动的独立阶级政党的建立。**

当然，这样一种必要的阶级政策并不意味着要丝毫缩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的有效斗争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这种联盟也是同等必要的。但是，这种联盟必须采取这样的形式：**在独立的阶级组织中间建立统一战线，以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为明确的目标而奋斗，战线的每一参加者都能充分保存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充分保持批评组织上的盟友的充分权利。**这是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作用，这一政策也就要求在意識形态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展开无情的批评，并且对它进行同等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解决真正的社会主义任务。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不是采取这种路线，而是在克里姆林宫的

逼迫下，时而支持宗主国资产阶级的立场，时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从而既出卖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又出卖了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

每当克里姆林宫孤注一掷地同宗主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或者要中立宗主国资产阶级的时候，它就为了这个目标而无耻地牺牲了隶属于这一宗主国的那些国家的反帝斗争的利益和社会革命的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同英国和法国保持同盟关系，克里姆林宫逼迫阿拉伯各国共产党放松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甚至不折不扣地破坏这一斗争，只是为了避免妨碍它的帝国主义盟友。战后，在另一个阶段，当民族独立运动冲破重重障碍变得势不可挡的时候，为了在自己反对大西洋列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好感，克里姆林宫又逼迫各处共产党完全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放松在这些国家争取社会解放的独立的阶级斗争，甚至公然破坏这一斗争。

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在大战期间是怎样破坏反帝斗争，是怎样为了克里姆林宫和英法美的同盟的利益而牺牲反帝斗争的吗？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共产党由于“充分了解到”据说在这些国家和法国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是怎样在事实上长期破坏这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致做了民族主义领导的尾巴，让他们在这种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的吗？难道还有必要追述一下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在埃及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巨大的武器协定之后，从1955年起是怎样几乎无条件地支持纳赛尔，甚至不惜取消自己并且在这些国家公然破坏任何阶级政策的吗？

的确，由于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的共产党再一次一百八十度地改变态度，他们对纳赛尔主义的无条件支持似乎又部分地撤消

了。现在，他們正在批評納賽尔，采取了反对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扩大到伊拉克的态度，并且歌頌起每个阿拉伯国家——现在首先是伊拉克——的独立自主来。

不管初看起来多么令人不解，这一政策的主要罪人自然又是克里姆林宮。克里姆林宮大概认为，再进一步加强納賽尔是危险的，因为它担心納賽尔很快不要克里姆林宮的支持也能活下去，而且会投到西方去。这种曲曲折折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政策是由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的不断变化的目标决定的，并不是在充分了解到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以后决定的。而且，克里姆林宮是通过各国共产党内少数重要人物来贯彻这一政策的，因为各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甚至还有他們的干部，并不知道他們的党只是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棋盘上的小卒子。如果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他們很可能把这些党中的某些党推到克里姆林宮规定的行动界限以外——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已經不顾法国共产党的路綫勉强参加了民族解放陣綫领导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伊拉克共产党明天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

不过，总的来說，除了伊拉克的共产党，现在还有叙利亚的共产党以外，这些党目前大部分都已經威信扫地，在广大阿拉伯群众当中陷于孤立。这就提出了在阿拉伯各国建立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领导的问题。这种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领导可能不是基本上在共产党内进行工作，而是用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的其他方式进行工作。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目前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根据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完整綱領，即第四国际的綱領，把一个阿拉伯干部的核心团结在一起，这些干部同时又处在各該国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当

中，并且开始制訂一个把本国特点考虑在內的**綱領**，一个**过渡性的綱領**。这个具体的过渡綱領必須把反帝的、民族民主要求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口号結合起来，从而在每一个国家指出从现状走向在阿拉伯体制內实现根本的社会主义解决的具体明确的道路。在制訂这样一个綱領的同时，还必须闡明和宣传需要有怎样一个**过渡性的党**来为这个綱領奋斗。

爭取社会主义解决的斗争同爭取成立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样一个党是爭取社会主义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工具。但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建立在每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过渡性的道路进行。

这样，像摩洛哥或突尼斯等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得出結論，认为在建立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时，应该走在**工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劳工党的道路**^①，因为**工会运动很强大，而且过去已經有自发地政治化的趋势**（突尼斯），目前还有这种趋势（摩洛哥）。而且，这条道路还可能証明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工会运动在整个一类国家中也需要起这样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的开路先鋒的作用。

这样一个党必須制訂一个尽可能进步的一般綱領，特別是一个**过渡性的行动綱領**，具体地回答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独立，阿拉伯統一，土地改革，經濟和工业发展和妇女解放等未解决的問題。

就比較特殊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而言，很明显，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明天的一个**群众性的劳工党**的基本力量将从目前民族解放陣綫內部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中涌现出来。民族解放陣綫在开始时是一个反帝的民族統一战綫。由于革命的深

① 就其意識形态和綱領來說，是工人的、无产阶级的党，通称工农党。

入，經驗，甚至困難，這個陣綫正在不斷地分化中。它的基本基本上是下層階級，它的組成成分包括大殖民莊園的農業工人，山區和綠洲的貧苦農民，“哈麥斯”農民^①，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阿爾及利亞各城市中和法籍無產階級移民當中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工人。領導這個陣綫的是從這些環境中湧現出來的人物，加上知識分子和中等資產階級階層的少數稀有的代表。

下層階級分子的人數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尤其是資產階級分子的人數在這裡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懸殊，使前者在數量上和社会地位上都占有優勢，這就使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比突尼斯的革命，甚至比摩洛哥的革命，都更加深刻得多，都更加難以“資產階級化”，“布爾吉巴化”。

然而，我們對另一事實也決不能低估：由於缺乏明確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就連最好心的和最親下層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都難免落入歸根結蒂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政策軌道中。

這個危險始終在等待着民族解放陣綫的領導機構：我所指的當然不是公開親資產階級的分子（即令他們本身並不是資產階級分子），像費爾哈特·阿巴斯那樣的人，而是指民族解放陣綫的左派分子和農民出身的軍事領袖。情況所以是這樣，還因為阿爾及利亞革命現在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戴高樂政權及其“關於經濟問題和社会問題的建議”，它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曖昧態度，以及它加緊進行的鎮壓；一心一意希望同帝國主義共同開發撒哈拉富源的突尼斯和摩洛哥資產階級所施加的壓力；法國工人運動的屈膝；必須說還有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政治綱領和一般領導的無力。

問題並不是要懷疑民族解放陣綫所取得的巨大積極成就。民

① 按一對五對分收穫物的伙種農。

族解放陣綫是革命的发起者，而且到现在为止还組織了頑强的惊天动地的抵抗运动，来反抗一个老羞成怒的野蛮帝国主义的异常强大的战争努力。相反地，問題在于要了解：革命在新条件下的深入要求它的社会綱領更加明确，要求民族解放陣綫的结构和管理更加民主，这样才能使革命的下层阶级基础可以同它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觉得他們长期以来为它战斗，为它作出巨大牺牲是完全值得的，也是有前途的。

* * *

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在真正的群众运动当中建立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核心时，还必须同时在各國核心之間建立泛阿拉伯联系，以便在事实上形成阿拉伯明天的群众性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創始核心。第四国际願意并且下定坚定的决心，要在各个方面大力协助这一任务的完成。它的战士们絲毫也不想用官僚主义的方式强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他們正在同一切的确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阿拉伯同志，以及一切并不完全同意第四国际的全部立場但却独立地轉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阿拉伯同志，进行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以便帮助他們在每个国家和在泛阿拉伯的水平上組織起来，制訂泛阿拉伯和各國的綱領，并出版一份泛阿拉伯的革命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刊物。

这是一个伟大而迫切的任务。阿拉伯革命的前途即系于此。从阿拉伯革命的浪潮里已經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們正在寻找它的社会主义前途，它的唯一的前途，但是大体上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

在埃及的穆斯塔法·哈米斯^①那样一位无产者或阿尔及利亚

^① 他是亚历山大港近郊巨大的道瓦尔村紡織厂工会工人的領袖。这些工人于1952年8月12日聚集在經理部办公室門前，“以穆罕默德·納吉布和革命的名义”，

革命的最早的一位光荣圣战者拉尔比·本·姆希迪^①的队伍里，阿拉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知道怎样把农民和无产者遭受那么多牺牲的革命引导到它的胜利的目标：**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

1958年11月

要求提高工资和开除公司秘书处的一位人员和劳工局的首脑。军事法庭把穆斯塔法·哈米斯判处死刑并加以处决。他一直拒绝谴责“那些教唆他的人”，临刑之前还高呼“革命万岁”的口号，并低语说：“我永远不死”。

① 本·姆希迪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一开始就是一位英雄的战士。在受过几周酷刑之后，他还有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大队刽子手啐唾，以表示自己的轻蔑，而且还有勇气在施刑人面前高喊：“我们一定要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为我们相信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必将实现，你们的酷刑摧毁不了我们的信念。”

六、“阿拉伯社会主义”和納賽尔 的民族运动

——薩迪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仅仅几年之前在阿拉伯，特别是叙利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思想。最近来，納賽尔领导的，用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另一出路”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对这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把它当作了得到正式承认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紧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系列的没有间断的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长期革命的道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再加上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使得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物质的、精神的和文化的传统方面所处的悲惨地位。事实已经向他们证明，要想改变他们的这种悲惨处境，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唯一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群众的口号，变成了所有不发达国家中，任何一个希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党派或运动用以号召的旗帜。可是阿拉伯世界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所采取的，随着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外交利益随时更换的政策，特别是这些政党所采取的态度——处处追随着苏联政府，甚至比方像在巴勒斯坦战争的问题上——惹怒了阿拉伯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一向团结在这些党派周围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对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和苏联感到失望，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新的上帝”——要想建立一种

脱离苏联政策和影响的社会主义。其结果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一观念。

1952年的纳赛尔政变正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埃及的巨大革命浪潮的高潮时期。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的巨大浪潮，再加上苏伊士运河区抗击英国占领军日益加剧的游击战，从基础上动摇了法鲁克的统治。这个专制的国王已经对自己的人民失去了统治的能力。那时候埃及已经临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边缘。王宫进行自卫的一次挣扎就是1952年1月24日对开罗的焚烧。可是这一目的在于打击群众运动的斗志并使一向屈从于群众压力的瓦伏德政府失去威信企图，并没有能够挽回国王和他的封建同盟者的命运。焚烧开罗的举动，实在说来，不过是作为一个借口以便推翻瓦伏德政府，并代之以一个“将不屈从于民族感情”和群众压力的新的政府。可是这个新的政府在刚诞生时就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它不但没有能够恢复法制和秩序，而且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显然是完全无能为力。危机愈来愈严重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发动了那一次政变。一枪没有放，法鲁克的统治就像一所纸板搭起来的房子一样完全垮掉了。

纳赛尔的军事政变，事实上是为了防止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运动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活动，这一革命运动很可能会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纳赛尔同时还要遏止群众的活动，使他们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

这一政变的领导人，由于他们所受的军事教育和他们的军人的头脑，对群众是从来不相信的。的确，从一开始他们就对人民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始终对他们有一种害怕的心理。他们攫得政权后的头一项措施就是禁止罢工运动和示威活动。在政变之

后,当亚历山大港的紡織工人宣布举行罢工的时候,馬上就受到警察和軍隊的鎮压,而且有两个罢工領袖被判处死刑。

納賽尔在他的《**革命的哲学**》一书中說,“軍政主义是我毕生的信念”——他的同僚們也全都如此。他們要求“严格的紀律和对命令的服从,群众性的活动总使他們感到惊恐。他們采用軍事独裁的毫不留情的手段尽量粉碎这种活动。納賽尔在同一本书中說,我們需要的是紀律,可是我們发现在我們的队伍中存在着混乱現象。我們需要团結,可是我們发现在我們的队伍中存在着分歧。”

誠然,納賽尔和他的同僚在发动他們的政变时确也有他們的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是很模糊的。他們感觉到有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可是他們并沒有一定的綱領。在攫得政权之后,他們立即面临一大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問題,对这些問題他們从来連想都沒有想过,现在事到临头,他們簡直是給弄得昏头昏脑,完全无力应付。他們甚至后悔不該“冒失地”、“愚蠢地”进行了攫取政权的活動。納賽尔不得不“承认,在7月23号以后我常常不禁責怪我自己、我的同僚以及軍隊里的其他的人們,不該在7月23号作下那种冒失的愚蠢的事。”他自己說“当时的情况在我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令人难堪的危机,可是后来的經驗和进一步的思考以及我从这些事件中体会到的真正意义才減輕了我心理上的反感,逐漸克服了那种危机。”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得出結論說,“我們目前正处在两个革命,而不是一个革命,誕生的前夕……一是政治革命,通过这个革命(每一个国家)将重新从一个强加于他們头上的統治者和未得他們的同意占領着他們的土地的占領軍的手中获得自治的权利,另一个是社会革命,在这个革命中,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将彼此进行斗争,一直到全国人民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国家的情况能从此得到稳定。”

因此帝制被推翻了，土地改革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可是帝制的推翻并没有能够产生人民群众的“自治的政府”。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都未能获得。相反的，一个坚定的军事独裁政权建立起来了。一切政治党派被视为非法，罢工和示威运动遭到了严格的禁止。新的统治者们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始终丝毫也没有减退。土地改革实际颇有限制而且规模很小，但它究竟也多少有些改善了相当大一部分农人的命运，因此他们对新的政权采取拥护的态度。新的统治者原希望贖买时付给地主的款项将会用于工业投资，这样来协助发展国家的工业。可是那些地主由于传统的势力，由于缺乏经验和不相信能在工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却把他们的新的资金仍用在对不动产的经营上。可是不管怎样，土地改革终于打碎了封建阶级的基础并从此结束了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

新的政权诱导私人资本投入工业的企图既然遭到了失败，于是开始依靠国家的资金来兴建新的工业，因而建立了一种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和工业的计划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新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竭力和英国和美国取得谅解，彼此相安，并从它们获得援助。可是由于美国拒绝供给军火以使它们对付以色列的继续不断的入侵，这就迫使纳赛尔不得不转而向工人国家寻求军事援助。这种新的友好关系激怒了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英美两国不惜以侮辱性的言词收回了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壩的协议。纳赛尔立即以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作为报复。这就引起了苏伊士危机，最后并导致英法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发动对埃及的攻击。在这一危机中，苏联对埃及的帮助，提高了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的威信。

同时这种对埃及进行的帝国主义的进攻唤起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并使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群众感到彼此之間休戚相关的关系。于是“阿拉伯的团结”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口号。

在叙利亚,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增强,影响也日益扩大。这情况越来越引起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复兴社会党分子的恐惧,复兴社会党分子实际当时是叙利亚的统治力量。他们匆匆和埃及联合起来要想得到强大的埃及资产阶级的支持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人则挡住逆流,反对彼此联合。

接着在纳赛尔的威信正高的时候,伊拉克发生了革命。纳赛尔当时被看着是整个阿拉伯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团结和社会改革的民族运动的领袖。在伊拉克,则是复兴社会党领导了和埃及进行联合的运动。可是当时在伊拉克最为强大的党派,控制着工会、农民委员会、知识分子组织和民兵的共产党却协助卡塞姆粉碎了复兴社会党和民族团结运动。

叙利亚和伊拉克共产党人的这种反对民族团结的态度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因而开始失势。在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被粉碎以后,卡塞姆立即转而反对共产党,迫使他们转入地下。叙利亚的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已大大减弱,他们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脱离了党组织,和纳赛尔合作。当纳赛尔的社会改革方案激怒了叙利亚的地主和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的时候,共产党竟和那里的最反动的势力联合起来。于是纳赛尔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反对共产党的搜捕和迫害活动,并为此不惜采用了一切宣传手段和警察恐怖的策略。而同时他却又和那些反动势力,甚至一些著名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彼此妥协,以争取他们共同反对共产党。

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自然对埃及的资产阶级是很有利的,因为埃及资产阶级的势力比较强大。和叙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

起来，他們所获得的利潤更为增高了。这情况使得叙利亚的民族资产阶级颇为不满，而納賽尔和那些最反动势力的妥协和合作以及他的独揽一切权力的实行专制統治的办法终于引起了他和复兴社会党的分裂。

納賽尔在埃及和叙利亚所采取的經濟和社会措施最后証明并无实际效果。私人資本的投資并不能有助于国家經濟的发展。新的改革使得許多埃及的资产阶级的財富更为增加了。資金开始慢慢集中到少数几个百万富翁手中。資本家从国民收入中所分得的紅利，在实行工业化以前只是百分之六十八，而到 1961 年竟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可是他們仍然不肯向工业投資。他們把全部資金都用于商业和不动产的經營，因为在这些方面他們肯定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潤。大地主們会用尽一切方法躲过土改法的限制。

所有这些迫使納賽尔不得不采取新的更彻底的措施。1961 年 7 月 20 日，他发布了将銀行和保險公司收归国有的命令。他同时宣布国家将参与某些私人的工业企业。私有土地的最大限度从二百畝减到了一百畝。

叙利亚的资产阶级，他們在本国的地位由于和共产党以及和一部分复兴社会党的合作，由于納賽尔和极右派的妥协，已經颇为加强，对納賽尔的这些措施当然大感惊恐，他們于是利用他們在军队中已經建立的影响，发动了一次反对納賽尔統治的政变，使叙利亚从埃及分裂出来了。

* * *

叙利亚脱离埃及的事对納賽尔來說簡直像一个晴天霹靂。这使他不得不回顧一下他过去所采取的全部政策。从这种回顧中，他看出了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言人曾經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来反对他的統治。他感觉到了在埃及本身所存在的危險，

于是开始寻求人民的支持。他说他发现“几世纪来的苦难和希望已经最后形成了阿拉伯斗争的各种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真正地表明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那就是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他承认一个革命决不是“某一个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而“一个革命的价值决定于它的人民性的程度，决定于它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动员他们的力量来建造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决定于它是否能够使这些群众按着自己的意志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同时也承认，“扩建国家财富的基础的工作决不能留待不负责任的专享剥削的私人资本去完成，”并且承认“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是获得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

在这种基础上，他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国有化的措施，并于1962年5月21日召开了一次“人民组织全国代表会议。”在举行开幕式的会议上，纳赛尔提出了一个“民族宪章”，它同时也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纲领，它表明“我们人民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革命的行动必须有科学的基础。”这一宪章同时宣称：

“我们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消灭剥削，使得所有的人在行使天赋的权利的时候都有同等的机会，消灭阶级差异，结束一个阶级的专政，因而也就消除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但对于个别公民的自由构成一种威胁，甚至也威胁着整个国家的自由，因为这种冲突破坏了人民的权利，从而使国家暴露于外国势力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潜在的危机中，那些外国势力随时都伺机把我们的国家拉入冷战的舞台，要把我们的国家作为它们的战场，让我们的人民去为它们充当炮灰。由于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剥削者和在那种剥削之下受尽苦难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即使完全消除了，也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一切阶级差异，实现社会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然而階級沖突的消除就使得我們有可能，通過剝削階級的消滅，和平地逐步消除階級差異，並為民主的交往開辟道路，從而使整個社會和真正自由的時代愈益接近。”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按照憲章的作者們的設想，如何才能可能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上實現這種“消滅剝削”和“結束一個階級的專政”的目標。

他們在承認有必要“消滅剝削階級”的同時，卻談到“和平地逐步消除階級差異，”並且宣稱“埃及人民拒絕任何一個階級的專政。”可是這個剝削階級如何才能夠消滅呢？難道憲章的作者們相信這一階級，為了他們所渴望的烏托邦式的自由社會能夠實現，將會自願放棄他們的剝削活動嗎？同時，如果他們以埃及人民的名義，拒絕接受任何階級的專政，那麼他們的國家的目的又究竟是什麼呢？難道現在還有必要向他們證明，歷史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每一個國家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而國家的任務仍然總是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反對那些被剝削的階級嗎？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個階級專政的工具。沒有無產階級的專政，剝削階級就根本不可能消滅。

可是埃及的評論雜誌《撰寫者》^①的一期專號上，曾發表過一篇題為“阿拉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章，該文在闡述憲章的意義的時候，完全排除了階級鬥爭。“我們不相信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作者說，“也不相信一個階級應該凌駕於其他階級之上。”他相信“這種階級鬥爭，甚至在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政權之下，也可以有效地加以遏制，”他相信“美國或西歐的工人們，通過基本上應算作是和平的手段，已經成功地取得了很大一部分權力，並且使自己達到了一種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從這裡他得出了一個結論，

① The Scribe.

“无产階級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和为了达到不断增高的合理的生活水平,階級斗争已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了。”

可是在这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階級如果不进行階級斗争,又如何能够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呢?在这些国家中階級斗争真是已经不再必要了吗?美国和欧洲国家中的工人階級经常进行的罢工运动,如果不是一种階級斗争的表现,那又是什么呢?此外,階級剥削在西方已经不存在了吗?仅只是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就能算作是社会主义吗?那就能够结束了階級剥削?根据那篇文章的作者的意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是的。”他说,“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是最主要的因素。”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結論,那就是,“阿拉伯社会主义,在这些拥护宪章的作者的心目中实际不过就是现代资本主义”。

宪章承认“一部分沒有剥削的私人資本也可以参与在总的計划下进行的经济发展工作,”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我們的結論的正确。根据这个宪章,国有化政策,“并不是对私人資本的一种打击,”而“倒是使一般人的經濟利益能够得到发展的一种保証”。

“对于公有部分的任务的加重,”宪章公开宣称說,“决不意味着取消私有部分,私有部分在整个发展計划中也担任着重要的任务。它必須得到保护以使之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要求于”私有部分的,只不过是“力求革新,开创一条新的进行創造的道路,而不要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靠寄生虫式的剥削活动”。

这等于是告訴狼从此以后就只吃一点青草!要私人資本从此不再进行剥削!过去十年的經驗仿佛已經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們証明,資本家如果不是为了利潤就不可能进行生产,因此他們准备讓他們得到“沒有剥削的合理利潤。”可是利潤如果不是来自剥削,又能从哪里来呢?

在土地改革方面，宪章宣称，“在阿拉伯的农业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实行土地国有化，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财产。根据經驗和研究的結果我們贊成土地的私有，但必須加以限制，以防止封建主义的发展。”“埃及土地問題的革命性的解决办法，”根据宪章作者們的意見，“是增加土地所有者的人数。”

他們并且进一步告訴我們，“根据7月法令精心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結構已經完全消灭了剝削的残余，而为願意在普遍发展的範圍內促进一般人民利益的私人投資打开了大門。它同样也是有利于私人資本所有者的，因為他們从其中可以得到沒有剝削的合理利潤。”

我們不能否认埃及的新的政权所采取的、在宪章中提出的各种改革和国有化的措施，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是这些东西还不能算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决不仅限于財產国有化。最重要的，沒有无产階級的政权、沒有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根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計劃經濟基础的国有化政策决不應該是花錢贖买。对資本家的国有化的財產付給贖买的价款，并容許他們以私人的資本进行投資，使他們获得“合理的”利潤，这根本不可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那么新的埃及的政权的階級性质又是怎样的呢？在埃及当权的是什麼階級呢？

新的埃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权的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也許有人会反对說，这个新的国家的經濟基础是国有化的资本主义財產，它甚至还迫害某些資本家。这是完全不錯的。可是这些措施对于整个資產階級來說是完全有利的。納賽尔所說的“进行剝削的”資本家，只是那些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整个階級利益之上，并且不願配合他的发展工业和资本主义經濟的計劃以促进作为統

治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某些個別的人。統治埃及的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官僚統治集團。當前的官僚集團永遠是一個階級的代表和僕從。這個僕從有時可能坐在他的主人的肩膀上朝他的臉上吐唾沫，可是他總永遠是僕人。希特勒儘管曾經採取劇烈的手段反對個別的德國的資本家，儘管他強有力地通過國家機器控制着德國的經濟，可是直到最後他仍不過是德國金融資本的僕從。

納賽爾並不是一個新的希特勒，在埃及建立的新的政權也並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代表高度發展的漸趨沒落的金融資本的希特勒，擔任了一個反動的角色。納賽爾，作為一個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並由於他贊成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卻擔任着一個進步的角色。納賽爾主義並不是一個什麼完全新創的東西。它不過是在新的不同的情況下產生的凱末爾主義和庇隆主義的混合體。

在凱末爾的時代，帝國主義正處於最強大的時期，而俄國革命也正鼓舞着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這位土耳其的統治者對這從兩方面來的壓力感到難以忍耐。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懼迫使他不得不和帝國主義進行妥協，結束了他的改革計劃。庇隆則作了經濟危機的犧牲品。可是納賽爾主義出現的這個時期，正是帝國主義愈來愈弱、工人國家愈來愈強，同時是殖民地革命大量興起的時期。帝國主義不可能張牙舞爪地對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對殖民地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懼以及和工人國家進行冷戰的需要迫使帝國主義盡一切努力在爭取不發達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同時，為了使那些資產階級在冷戰中採取中立態度，蘇聯也不遺余力地支持它們。納賽爾，始終扮演着中立主義的角色，所以他能夠從兩方面得到援助，並利用這種援助來加強自己的政權。

可是在现在，还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替代他来掌握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阿拉伯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领导力量。那里的各个共产党，由于采取了罪恶的政策，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对解放运动的影响。在一开头，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纳赛尔。在埃及和叙利亚成立联盟以后，特别是在伊拉克革命之后，它们又把纳赛尔看作是主要的敌人，甚而至于参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组成的阵线来反对他。当纳赛尔提出表达着广大群众的愿望的两个主要口号——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时候，它们也完全反对。它们公开提出阿拉伯的团结必须建筑在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获得彻底解放的基础上，而它们却没有看到民族团结的斗争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它们教导人民群众，要他们等到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之后，再去开始进行争取团结的斗争。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却认为时机和客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它们抛弃社会主义的口号，号召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国家，“它不代表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却以爱国主义的民主集团的支持作为自己的依靠，这就使我们的国家将能依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和民族特点和平地转化为社会主义。”

就这样，阿拉伯世界的各共产党实际是退出了解放运动，现在是从外部来进行反对纳赛尔主义的斗争。可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应该站在这一运动之外。他们应该参加进去，从内部进行斗争，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口号。他们的反对资产阶级领导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斗争，在性质上应该属于思想意识的范围。他们应该向人民群众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争取工人阶级，并帮助工人阶级取得自己的独立。

納賽尔主义，以其目前的形式，是决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它本身充滿了矛盾。它既想依賴民族資產階級，又想依賴工人階級。可是这两个敌对階級的利益是根本无法調和的。此外，旧的統治階級，大地主和买办資產階級，也还没有完全消灭。它們现在不过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发动一次进攻。西方世界的一次严重的經濟危机就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又开始张牙舞爪起来。对外援助的停止很可能会把埃及推向一次严重的經濟危机。那时工人群众就会更加强他們的斗争。納賽尔政权的領導集团也就会被迫进行选择，究竟是應該依賴內部的工人階級和外部的工人国家，还是依賴內部的資產階級和外部的帝国主义。它将选择哪一条道路显然是不难預測的。只有在工人階級取得运动的領導权之后才能挽救这一資產階級革命，并把它推向无產階級革命。要作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深入到运动中去，从內部把这一革命运动的領導权夺取过来。

1963年2月4日

七、非洲革命

黑非洲走向独立和統一

——让·保尔·馬丁

黑非洲现在正在經歷着它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阶段，以后不可避免地要繼續进行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

要在阿拉伯各国——从埃及到摩洛哥——以南建立一个黑非洲国家，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那里的种族、語言、宗教和习俗都是千差万别的，然而，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却不难看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露出了并形成着一种**黑非洲的民族意識**，它包括黑非洲的所有民族；这些民族的基本种族社会已遭到資本主义的渗入，从而打破了现有的形式，并出现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其特征是城市化，甚至在某些地方是强力的工业化。

这种现在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非洲民族意識，是建立在下列一些穩固基础之上的：**黑非洲的各民族都起源于一种以自給自足的农业为基础的种族社会**，其結構几乎在到处都极其相似；他們有着許多共同的习惯，有着一种远在巨額資本于十八世紀开始渗入以前就由他們的历史造成的共同文化；無論是在买卖奴隶和强迫劳动的可怕的年代里还是在现在，黑非洲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是很低的，这种情形使得他們加速非种族化，并使得他們紛紛流入非洲的城市中心。

在一种共同的地理范围以內，这些經濟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正在产生出一种把黑非洲广大群众改鑄和合并成为一个民族

的力量，它越过种族的界綫，越过广漠无垠、橫貫大陆的沙漠，喚醒了非洲人的民族意識。

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有少数資產階級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才了解这一过程的意义。但是，由于这些人正在很快地变成为改造非洲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新武器，所以城市中优秀人物的这种民族意識的醒觉，对于整个黑非洲的广大群众，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不仅在处在法国势力之下的地区里，而且也在处在英国、比利时、甚至葡萄牙势力之下的地区里，独立的思想和統一黑非洲的思想，已經变成了决定这种政治过程的力量。

要了解作为黑非洲这种发展特征的强而有力的节拍和热情充沛的动力，我們必得先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地区里所发生的事情。

1945 年以来的发展

1945 年以后，帝国主义者对黑非洲的渗入大大加强了，使得整个非洲变成了在退却中的帝国主义的經濟方面和战略方面的最后保留地。只在战后的头十年里，在这里进行的资本主义投資已超过六十亿美元——等于（如果不是多于）1871 年第一次在金伯利发现钻石以后和 1945 年以前这段时期里的投資总额。这些投資的絕大部分是在矿区里进行的，例如刚果的钻石、黄金、鈾等等。

黑非洲的南部发展得最快，在这里的投資約吸收国民收入的 20% 到 30%，經濟增长率約为每年 6%。其次是英属东非各地，以肯尼亚为首。发展得最差的是西部和赤道非洲各地，在这里，农业仍占統治地位，投資还不到本来就很低的国民收入的 8%。

南非的工业生产在战后十年里增加得十分惊人，約每年 30%，

到 1955 年以后才下降到 20%，而这一速度仍然是十分可观的。南罗得西亚的工业生产在战后增加了三倍。在刚果，工业生产也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某些私人工业则有了飞速的增长，例如纺织工业生产增加了 600%，化学工业生产增加了 400%。这三个南部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南非和罗得西亚之间的贸易。

黑非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开发方式都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矿山的出口上，这种办法所保证的投资率不能加速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不能使它们的农业经济多样化，从而也不能减低它们对于世界市场上某些原料价格的依赖性。

因此，这些地方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坏了——尽管也有一些无可否认的经济方面的（包括工业方面的）进步。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帝国主义统治对它们的影响，因为这是当前政治事变的背景。

黑非洲的经济

黑非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虽然有着丰富的矿藏^①和通过使用水电力^②来发展工业的极大可能性，可是它们的主要收入大部分是从农业上取得的。

肯尼亚和乌干达出口的货物中，大约有 90% 是农产品（肯尼

① 加纳的黄金、锰和铁矾土；尼日利亚的锡和铜；塞拉勒窝内的铬、钻石和铁；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铁；喀麦隆的铁矾土；乌干达的铜，等等。

② 黑非洲在水电方面拥有世界潜在动力的三分之二；它的储备量估计为二亿吨。

亞出口咖啡、茶葉和西沙爾麻，烏干達出口棉花)。可可占加納的出口的 70%；花生、棕櫚油和可可加在一起，在尼日利亞和法屬西非的出口中也占 70%。

農業經濟常常是以一種可以出口的產品為基礎的，這就使它特別容易受到世界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戰後十年中，這些產品的價格很高，給予商品農業經濟的發展以一種空前的推動力。

大戰以來，主要農產品的生產增加了三倍或四倍。但是，歐洲殖民者把絕大部分非洲地區的最好的土地都給壟斷了，例外的只是法屬西非、加納、北尼日利亞和烏干達的某些地方，現在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肯尼亞，在這些地方，生產主要是由小佃農來進行的。

留給非洲農民的土地，特別是留給非洲自給自足的農業的大量土地(約為全部耕種面積的 70%)，由於缺乏足夠的投資和科學的耕種方法，生產力很低，而且是越來越下降的。熱帶非洲的日光曬壞了這些土地，炎熱摻雜着驟雨使它們不適於耕種。因此，這種土生土長的農業經濟似乎面臨着一種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方面，如果不增加投資，它就不可能變得更有生產力；另一方面，它本身又不能生產出這種為使它能夠更有生產力所不可或缺的投资。

關於當地農業經濟的各種困難，資產階級批評家們總是喜歡強調種族社會制度的缺點及其對於土著居民心理和行為的影響，認為這些是原始積累率很低的原因。據這些批評家說，擋在進一步發展整個黑非洲經濟的道路上的障礙，主要基因於“土人”及其龐大而不生產的家屬的懶惰，他們把那些還到各處作些工作的人的微薄收入都吃光了；這些障礙也基因於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土地為部族或有親屬關係的集團所共有。

這後一種說法似乎更為重要，值得加以比較仔細的考察。

農民使用土地，可是沒有自由保有权。酋長或族長給每一家庭分配

足够的土地来进行粗放的耕种，轮种周期很长，每四五年的耕种中可能包括五年到十年的休耕（而且他们每年都可以进行重新分配）。①

可是，欧洲开发资本的渗入，再加上由于医学进步、废除奴隶制度和停止部族间战争而造成的非洲人口的不断增加，完全打破了这种耕种土地制度的“自然”均衡。

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尼亚萨兰，以及在法属、葡属和比属各地区，可供更多的人口使用的土地由于让给欧洲人使用而减少了——在大部分这些地区里，这种让给欧洲人使用的土地面积不大，只是在肯尼亚，它约占当时还空阔着的好地的五分之一。在南非，90%的这种土地都转给欧洲人使用了，虽然大部分都处在还没有为班图人占有的地区里——现在有一些正在为班图人重新买回去。南罗得西亚是一个为武力征服了的国家，在这里，50%的这种土地被占用了。②

在帝国主义者侵入非洲以前，非洲种族社会的相对停滞，主要是③由于那里有着进行粗放耕种的可能性，可用的土地很多而人口比较稀少。④现在，构成非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所以贫困，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作为农民所处的地位，和欧洲人的大农场和大企业所经营的农业相比较，无论就他们可以利用的土地的质量和数量来说，或是就耕种方法（肥料、机器、现代农业技术）来说，都越来越差了。

改善这种情况的办法，决不是像那些为资本主义剥削作辩护的人们所说的那样，要废除土地的部族公有制，并用个人私有的土

① 《经济学家》，1958年12月13日。

② 同上。

③ 另一个原因来自这一事实：非洲人口相对来说是彼此互相隔离的，这里辽远和各种各样地理上的障碍把他们分隔开来了。

④ “每当各种经济问题堆积到一起，达到在别的地方可能引起经济关系的改变——从而使社会组织向更高形式发展——的紧要关头的时候，班图人（非洲人）只是迁移到新的地方去，如有必要，还和阻碍他们的道路的其他种族进行战争。”（巴塞尔·达维逊：《非洲的醒觉》）

地来代替它。这种“解决办法”，肯定只能有利于这样一些最幸运的人，他们拥有必要的资本，能够买得足够的土地^① 来用合理的和有利的办法（肥料、机器、适合于热带条件的农业方法）进行耕种；可是这种办法，由于破坏了种族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却会大大增加贫困的土著人的人数。

帝国主义剥削机构的各方面

现在，尽管在行政管理领域内，已经有一些进步表现在非洲优秀人物的任务的不断增加上，可是几乎所有经济的和行政的组织仍然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②

矿场、大农场、甚至当地农产品的贸易、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各种关键行政机关——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权力齿轮还都由欧洲人掌握着。而且，为矿业、农业和工业建设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绝大部分是从欧洲母国那里来的——在最近，这种资本也以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形式来自美国，而且数目越来越大。

为帝国主义母国所给予黑非洲的“慷慨”援助作辩护的人们，总是强调用来发展这些地区的公共投资的重要性；可是他们自然不肯说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现在还从这个“黑大陆”取走大得惊人听闻的利润。^③

让我们再比较仔细地看一看，这些帝国主义母国对于“发展”

① 記住地理条件和热带气候，这种足够的土地的面积，一定要比在别处宽广得多，因为要考虑保持地力、合理轮种等等問題。

② 在中非洲，欧洲人約有五十万，而非洲人是一亿。

③ 巴西尔·达維遜在他那很著名的著作《非洲的醒觉》里，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他所說的上次战争前后的“非洲的巨额收入”，說许多矿业公司的紅利达到50%、100%、200%、甚至300%。他补充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矿业繁荣的年代里，利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相較，即使是初期从印度那里掠夺来的利益，也显得像零用钱那样微不足道了，……”。

黑非洲所提供的这种“援助”究竟是些什么：

非洲各地矿业和农业资源的开发，其本身早就需要有大的基本公共事业：运输、电力、行政机关、为给帝国主义企业维持和训练工作人员所需要的某些保健和教育服务等等。

特别在战后，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人们现在认为有可能进行某些意义深远的工业化计划。^①

做出这种努力所需的资金是怎样来的呢？

在英属非洲地区里，这种资金部分在当地筹集，部分靠母国补助，其情况如下：半数靠当地资源，三分之一靠借款，其余靠母国补助。可是像加纳这样一个国家，它自己却提供了90%的投在开发方面的资金。法国宣称在这一时期里每年平均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而英国在它的属地里的支出是七千万美元。^②当地比利时企业把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又进行再投资，这使得刚果能够得到发展。法国每年要支付二千万美元来弥补它的非洲属地对外贸易方面的美元赤字。可是，由于它从这些属地用法郎购买某些在别处必须用硬币才能买到的商品，这些属地使它每年能够省下一亿到二亿美元。^③

如果考虑到在这些属地的公共投资每年不超过一千亿法郎，私人投资约三百亿法郎，而这一母国用在海外属地的支出总额的半数又以回国私人资本的形式回到国内，^④那么不难看出，这一母国和它的非洲殖民地之间的收支差额实际上是大大有利于它自己

① 计划开发的丰富矿藏有：毛里塔尼亚古罗堡的铁，塞内加尔太巴的磷酸盐，几内亚洛斯和包克的铁矾土；计划进行的工程有：加纳的沃尔特河工程，比属刚果的英古区工程，等等。

② 对比起来，英国私人资本所占的份额大大大于法国私人资本所占的份额。

③ 葛修所作的考查，见1958年9月22、23和24日《世界报》。

④ 同上。

的。这就是非洲地区经济和工业发展很差的原因，也是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少得可笑的原因——平均收入每天还不到一百法国法郎，“如果考虑到城市人口收入较好这一事实，则平均收入或许还要少些”。^①

法国靠着纳税人出钱而送到海外去的公共资金，大部分又通过私人企业、大贸易公司和个人(工资、薪水、红利)而重新回到法国。

因此，这种由法郎区所构成的滤水唧筒具有以下的效果：把公共资本变成私人财富，而这些海外属地从由法国纳税人所提供的资本上，却不能得到任何可以和这些款项的重要性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因为在母国用在黑人非洲的公共开支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投资，而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用于增加生产的。”^②〔黑体字是我用的。〕

用于有效投资的这一部分，不仅一直很少，而且“无论是相对数值还是绝对数值，实际上都是递减的”。^③

这样，在目前的殖民地体制之内，面对着人口的不断大量增加，这些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就绝对不可能有所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原始资本积累率不可能达到占国民收入的15%——比20%—25%低得多——的水平，而这一水平被认为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

帝国主义剥削的资产负债表

黑非洲的传统的种族自给自足经济，转变为一种目的在于输出黑人非洲各地矿产品和农产品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地工业和当地市场的发展，还不足以有利地吸收为不断的非种族化所赶来的群众；以及要减轻非洲经济对于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性——

① 前引《世界报》。

② 同上。

③ 同上。

所有这些因素使旧社会土崩瓦解，造成一种混乱局面，其特征是非洲人民大众变得更加贫困了。

在这种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紛紛拥入各城市中心，反映出传统的非洲经济正在稳步地商业化和工业化。^①

革命热狂现在支配着黑非洲的人民大众，成为不断此起彼伏的政治动乱的基础。这种革命热狂说明，旧日的包皮在一些还不足以把社会改造和稳定工作放在较高水平上的新经济力量的压力下，已经破裂了。

这些新经济力量在其现有发展水平上（即在仍占统治地位的殖民统治所容许的水平上），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积累起来的需要——不论从数量上看（人口不断增加着）还是绝对地看（因为黑非洲人民大众已经看到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他们要求有和享有特权的少数欧洲人一样的生活水准），都是如此。

因此，黑非洲现在到处都有革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又由于以下

① 1953年，刚果非洲人长期住在种族区域以外的总数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人，即约为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战后黑非洲城市发展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这里举几个例子：利奥波耳德维尔的土著人口在1923年是一万六千七百零一人，1940年是四万六千八百八十四人，1945年是九万六千一百一十六人，1948年是十一万八千七百一十人，1953年1月是二十四万四千人，现在则大约是四十万人。伊利沙伯维尔、斯坦利维尔和科基拉维尔的发展速度也和这相同。肯尼亚的内罗比的人口从1945年的五万三千人增加到1952年的九万五千人。杜亚拉西南的乡村人口一空，全都搬到城市里去了。

迅速城市化乃是整个黑非洲的共同现象，成百万的人口源源流入逐渐发展着的商业中心、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然而，“土著区”的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情况是难以想像的。仍以利奥波耳德维尔为例，在这里，人们曾做过很大的努力来改善“土著区”。在旧土著城里，人口的平均密度是每公顷三百零二人。全区没有一所楼房；这就是说，每一百平方公尺的地面住着三百人。1954年和1955年建筑的房屋，其每月租金没有在三比因法郎以下的。可是绝大多数工人每月的收入都不超过一千法郎。如果工资很合理，把三分之一花在房租上可能不算太多；然而，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工资上，土著工人是住不起这种好房子的。

事实而更加深刻了：战后原料和农产品价格高涨的繁荣到 1957 年已成过去；全世界性的政治事件——殖民地革命的斗争和胜利，苏联、中国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帝国主义遭到挫折和困难——和殖民地情况一接触就变成革命的力量，它甚至一直渗入热带非洲丛林的底土里。

最近的政治发展

去年 12 月的阿克拉会议无疑对于非洲自由运动给予了新的推动力。此后便在科纳克里召开了工会会议，并建立了非洲工人联合会，以独立的几内亚总理塞古·杜尔为主席。

然而，早在 1958 年 9 月 1 日，“英属”东非各地——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尼亚萨兰和桑给巴尔——的民族主义组织就在乌干达的姆万扎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乃是阿克拉会议一种准备工作。

一种“泛非洲的争取解放东非和中非的运动”开始了，它的纲领是：

发展泛非主义，把东非和中非从帝国主义、白人统治和经济剥削之下解放出来；必须发展民族主义活动以争取自治和议会民主；纲领、策略、计划和行动必须互相协调。

阿克拉会议以后，西部、中部和东部非洲都有了很重要的政治发展。在西部，当几内亚巩固了它的独立，并打算和加纳组成联邦的时候，所采取的头一步是组织一个新的“初步”联邦，叫做马里联邦，它将把在法国控制之下的地区——塞内加尔、法属苏丹、上沃尔特、达荷美——组织在一起。这一联邦，由于受到法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共同体”领袖乌弗埃-博瓦尼的破坏，昙花一现便解体了。

这一联邦一解体(和“共同体”一样),就产生了不再是联邦的而是统一的塞内加尔和苏丹的国家;并产生了非洲联邦党,主席是桑戈尔,总书记是莫迪博·凯塔。

这一新政党控制着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的议会,并实行(虽然是初步地)全法属西非的“联邦行政”计划;这一计划是1957年9月在巴马科会议上决定的,其后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阻挠和破坏。这一新政党组成以后,只有尼日尔的一部分、达荷美和象牙海岸还留在为乌弗埃所控制的“共同体”之内。在黑非洲目前仍处在法国控制之下的各国走向政治独立的道路上,上面这些发展肯定不是最后的。在1960年,在西非海岸还有三个地区要获得正式独立,即喀麦隆、多哥和尼日利亚。在东方,索马里也是如此。这种正式独立和联盟的趋势在整个黑非洲将越来越快了。

西岸地区在政治方面发展得最快。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气候的关系,这里欧洲人很少。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工业和行政活动都集中在这沿岸地区,这里比较城市化了。

与此相反,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由于种种原因在政治上发展较慢。在东南部,欧洲人比任何别处都多;他们垄断了政权,阻挠非洲人参与,并极力防止绝大多数非洲人所要求的自治。

“白人的非洲”的拥护者,除了南非之外,还有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但是这些国家直到最近还觉得它们可以不受到来自西部的非洲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它们认为它们有一条以比属刚果为中心而以葡属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为其东西两翼的防疫线。因此它们准备把黑非洲东部和中部的一连串国家和联邦放在白人控制之下。

最近在刚果和尼亚萨兰的事件发生之后,这种可笑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像晴天霹雳一样,黑人群众的怒火在利奥波耳德维

尔迸发了出来，把刚果的政治地位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每个人都感觉到，比利时殖民主义的家长統治的时代，已經无可救药地結束了。

比利时政府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通过国王博杜安，它宣布准备“使刚果独立，既不拖延，但也不急于草率从事”。这就是說，比利时的大资本家不打算打一次“阿尔及利亚式的”战争，来保卫在刚果和一千二百万害着独立热狂的非洲人住在一起的八万五千名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人的非法特权。

刚果群众要等多久才能为他們的地大物博的国家得到独立呢？1959年1月31日《經濟学家》說得很正确：“1960年的非洲的整个气氛，将使比利时人不能再坚持他們那‘不急于草率从事’的計劃了。”在黑非洲人們的心目中，刚果的独立将自然而然地消除挡在这整个地区政治独立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处在意大利托管之下的索馬里将于1960年独立，并成为把其他索馬里地区重新联合起来的一个枢紐，以形成一个“大索馬里”，最后和亚拉伯苏丹和埃及联系在一起。烏干达是仍然处在英国控制之下一个地区，欧洲人不多，非洲人約五百万，有着許多民族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的宗旨都是要独立，只是爭取独立的方法有所不同。坦噶尼喀是另一个处在英国托管下的地区，其中非洲人約八百五十万，欧洲人不到两万；它在爭取独立問題上也不肯再等很久了。

在肯尼亚，1954年对于茅茅运动的野蛮鎮压，并沒能使那六万二千名欧洲居民免于“有住在埃特納火山山坡上的情緒。他們现在知道这里有許多熔岩，只是希望火山在他們生前不要爆炸而已。”（《泰晤士报》，1959年1月27日。）不用說，这种虔誠的希望有被席卷整个黑非洲的泛非主义的浪潮冲垮的危險。

在肯尼亚，少数白人（他們垄断着政权，并用白色恐怖来进行統治）和大约六百万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已經紧张到了极点，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为刚果、烏干达、索馬里、坦噶尼喀等充滿民族主义热狂并已有迅速完全独立希望的地区所环绕着，肯尼亚完全和南方的“白人”国家隔离开来了，因而迟早必然会处于它自己的非洲人口的政治控制之下。因此，对于这一灾难重重的非洲地区的特別卑鄙的殖民者來說，遭报的日子馬上就要到来了。

在东非，欧洲人是一种孤立的少数，差不多被包围在极多的非洲人口之中。在中非，欧洲人的地位就显然有所不同。

在南罗得西亚，白人統治是以二十万零七千欧洲人口为基础的，这里的非洲人約为二百五十万。在北罗得西亚，共有七万二千名欧洲人和二百二十二万名非洲人。但是在尼亚薩兰，即中非联邦中的第三个地区，欧洲人在二百五十万非洲人口之中只占极小的少数。总的說来，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大約是三十万欧洲人和七百多万非洲人。

由于有着最好的土地，由于在这里的蘊藏丰富的矿場和各种正在发展的工业里有着大量投資，所以这些地区里的欧洲居民自然倾向于仿效他們南非邻居的极端的种族主义政策；这使他們保有对于中非联邦的絕對政治控制权。中非联邦是 1953 年成立的；尼亚薩兰被迫加入了，尽管它的非洲人口一致反对这件事。

自此以后，非洲民族主义的領袖們屡次要求：（1）立刻退出这一受欧洲人統治的联邦；（2）或者在殖民局的控制之下，或者在和坦噶尼喀、最后和烏干达結成的一种由非洲人統治的联邦之中，实行内部的非洲自治。

与此相反，中非联邦內閣总理和种族主义的欧洲居民的代言

人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却急于要在1960年为这一联邦取得自治地位，以便可以不受阻碍地推行他那种族压迫政策。因此，在3月初，尼亚萨兰发生了黑人群众的骚动事件；这次事件，自从肯尼亚的茅茅反抗运动以后，乃是非洲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这次运动是在南罗得西亚政府以一种想像中的“阴谋”为借口，宣布紧急状态，并逮捕非洲国民大会的领袖们的时候开始的；当时被逮捕的人士中包括这一组织的首脑哈斯丁·班达博士。^①

这次事件以后，白人当局的血腥镇压和非洲人民群众的反抗像燎原之火一样遍布于这一联邦。担心“来自索耳兹伯里的鞭手”，担心白人的压迫，这使得非洲人更加下定决心，不允许再建立一个像南非现有的那种新地狱。

南非是白人主权的拥护者，它同时也起到刺激泛非民族主义的作用，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是作为对于南非联邦的穷凶极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政策，面对着不断增加的非洲人口，尽管欧洲人的居住区十分广大（一个欧洲人对三个非洲人），也越来越走进死胡同了。这是因为，非洲人口构成劳动力的主要部分，而这一国家的经济的兴建和扩展工作是要依靠这部分劳动力来进行的。

其后，极端反动的新总理亨德里克·维沃尔德提出了“班图自治法案”，取消了非洲人在议会中的象征性的代表权，并建立了八个土著的“国家”，处在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宗主权之下。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等于分裂这一国家，同时剥夺了很多非洲城市人口的参政权。

^① 尼亚萨兰的国民运动，是在1916年1月23日至2月4日那次十分重要的非洲人起义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次起义的倡始人是一个当地牧师约翰·智勒姆维。（参阅谢泼尔逊和普赖斯：《独立的非洲人》，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关于葡属地区——东面是安哥拉，西面是莫三鼻给——只需要說几句话。这些地方仍然遭受着可恨的前資本主义的剝削，無論在公共工程里或在私人企业里，都盛行着强迫劳动。但是，在圣多美島中世紀式的監獄里受罪的政治犯人数，以及最近的許多游行示威，都表明国民运动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这种运动现在日益高涨，已伸入甚至黑非洲最落后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非洲革命的問題和前途

这种不可抵抗的非洲独立和統一运动，暂时掌握在意識形态上(如果不是在社会意义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領袖和政党的手里。在非洲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非洲民族主义各政党的參謀本部中，有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在帝国主义母国的首都——巴黎、伦敦、布魯塞尔、里斯本——受过教育的。^① 有时候其中还有一些工会主义者，甚至前共产主义者。法属和英属西非的烏弗埃、馬馬杜·迪亚、桑戈尔、凱塔、塞古·杜尔、恩克魯瑪、阿布巴克尔、阿沃罗沃、阿齐克維等等，中非和东非的姆色亚、齐亚諾、班达、尼雷尔、卡薩武布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人物。

他們所共有的思想——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就是泛非民族主义；这就是說，整个非洲的人民大众，不分阶级，^② 共同反抗欧洲的殖民主义。这些領袖及其政党认为在广大貧困农民和工人之間，土著资产阶级結構也有所发展，因此他們一般都否认阶级斗争，而只是設法为在非洲人控制之下的資本主义的发展創立基础。

^① 在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由于文盲多得惊人，所以知識分子总是起很大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文教会的統計：在法属非洲，文盲占 95—99%；在坦噶尼略和尼口利亚，占 85—95%；在加納和肯尼亚，占 75—80%；在葡属各地，几占 100%。

^② 塞古·杜尔最近告訴《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說，“非洲人只有一个阶级”。

这些領袖为非洲广大群众爭取一种新社会均衡的运动所推动，了解帝国主义的弱点和黑非洲的經濟潜力，并且受到东西方对立局面的鼓励，他們力图提高非洲优秀人物的地位，使其有无可爭議的政治控制权，并在經濟上和帝国主义合作。

为了能够有实力来爭取上述地位，他們就力图违反帝国主义的意志，建立一些联合在一起、甚至統一在一起的国家集团，其面积大于各帝国主义者人为地划定的各个地区——尤其是因为这种統一的趋向也符合于非洲人民群众的願望和真正經濟发展的迫切要求。

各帝国主义者(除了极少的例外)似乎都已了解，不可能再繼續直接控制这些黑非洲国家了。因此，为了保持他們在这一地区的經濟的和战略的有利地位，他們就鼓励这些非洲资产階級优秀人物的这种作用。这样做，他們认为能够改变泛非主义的方向，使它不致和那在现在仍然过分被引入苏联軌道的亚拉伯“中立主义”联合在一起，并使它免于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帝国主义乃是这种买卖中的最勇敢的出价者。它的代表最近在阿克拉會議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和恩克魯瑪——泛非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士——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恩克魯瑪的思想顧問乔治·帕德摩尔确实能够把他导向这一方向了。

但是，非洲革命的进程将会表明(像在亚拉伯革命中已經証明的一样)，統一现在正在形成的黑人国家的历史任务，只有依靠具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階級性质的新的領導，才能完成。黑非洲的統一終将成为非洲革命群众的最强烈的願望；可是各种带有资产階級社会性质的非洲优秀人物終将証明：他們都有其狹隘的特殊目的，都各不相同地和帝国主义有着联系，他們互相敌視，根本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而且，黑非洲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是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由于它那现有的殖民地经济，由于帝国主义各强国施舍援助时很小气并带有“绳索”，黑非洲将不可能实现为在相当短时间内进行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实际上，像其他不发展地区一样，黑非洲毋宁说面临着经济倒退的可能性，无论绝对地说有什么进步，可是和不断增加的人口及其需要相比较，和先进国家的发展相比较，这种进步就未免太小和太晚了。这之间的差距决不是逐渐减少，而很可能是越来越大的。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之中，解决办法就会完全不同了。原始积累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解决，即：把现在为帝国主义掠夺去的剩余价值国有化；使现在正在贫困化过程之中的千百万人民从事生产性工作；工人国家的无私援助。一种勇敢的农业改革，依靠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将可以合理地耕种集体的土地、各种族的地区以及没收和国有化了的欧洲人的大农场。披荆斩棘，修建灌溉工程，就可以开辟新的土地。

这就是黑非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在各种民族主义组织中，和工会运动中进行工作时，必须据以确定方针的前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既要根据各资产阶级非洲组织领导有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独立与统一的斗争的程度，对它们给予批判性的支持，同时也有责任准备组织自主的、受到黑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鼓舞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西非洲已经存在着一些左派中间组织和越来越壮大的工会运动，这些构成今日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萌芽，例如：喀麦隆的喀麦隆人民联盟；塞内加尔的非洲独立党，和由退出塞内加尔进步联盟的一部分盟员组成的塞内加尔-非洲联合党（它和桑戈尔绝裂了）；几内亚的工会运动的战士。

黑非洲革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由于它有着一种超越阶段的倾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出来领导黑非洲人民群众，并大跨步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

1959年4月

八、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決定時刻

——巴布洛于1961年7月18日从阿姆斯特丹獄中
写給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的信

亲爱的同志們，亲爱的民族解放陣綫的兄弟們：

在我向你們写这封信的前一天，沙尔·山登和我因为从事“非法”活动支援民族解放陣綫，被判处了十五个月的徒刑。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现在实际上已經胜利了。帝国主义的最后的拖延和詭計可以阻碍解放時刻的到来，但是，解放的時刻是肯定的了，而且已經比較近了。

这个胜利首先是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奋斗的结果。他們七年来毫不吝惜他們的鮮血，付出了各种各样的巨大的牺牲。

在七年的残酷战争中，革命的根子已經深深地扎到阿尔及利亚人民当中，阿尔及利亚人民培养出的民族革命领导——民族解放陣綫——已經发展成为不可輕侮的、同国际上有联系的、群众性政治-軍事組織。

这一胜利同样也是阿拉伯群众，非洲群众，工人国家，中国，南斯拉夫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給予援助的结果。

国际的革命环境，多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早已确立的新的力量对比，一直在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大大有利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

欧洲和法国工人运动的群众，也对这一胜利作出了同等的貢

献。他們的人数起初很少,但是后来却愈来愈多。当然,在这一领域中,同殖民地国家兄弟的革命斗争比起来,欧洲的工人运动,由于仍然处在传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般來說,是停滞不前的。这种情况在法国有清楚的表现——不仅表现在帝国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和工人阵营中戴高乐独裁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法国社会党的可耻态度上,而且同样表现在法国共产党在初期和现在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所采取的态度上。直到现在,法国共产党还满足于纯粹在口头上反对戴高乐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无产阶级的主要组织的这种态度是露骨的叛卖态度,从根本上来說,也是机会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迫使許多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寻找各种各样带有非常性质的方法和形式来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这种方法和形式当然不可能和群众的真正革命行动具有同样的外观和同样的内容。

然而,法国和其他地方这支有限的先锋队的主动行动和活动仍然是可贵的,因为这种活动唤醒了法国和欧洲工人和民主舆论去注意阿尔及利亚问题,并且引起了更广大的人民的反应。

今天,这就表现在法国各地,甚至还有阿尔及利亚各地,抗議繼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断增长的呼声上,也表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国内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更有力的声援上。

你们知道,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整个第四国际从阿尔及利亚革命一开始时起,就对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虽然这种贡献是微薄的。

我們中間有些人,同法国和欧洲各国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几十位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和监禁的危险,毅然表现出他們热爱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一般的殖民地革命。

当然,这种牺牲同阿尔及利亚人民蒙受的巨大牺牲比起来,是

算不了什么的。我在这里提起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我們也有一点点权利在彻底解放的前夕，作为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真诚朋友，向你们讲一些坦率的话。

你们将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你们打算怎样利用革命的胜利呢？

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它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摆脱帝国主义。

七年来，这场斗争是以没有明确社会分化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为主力进行的。这些社会力量一旦参加到局势中来，就决定了革命的动力，并且在风雷激荡的国内外革命环境中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在这场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还不单是粗糙的民族觉悟。支持革命和战争的社会阶层，阿尔及利亚的高山和农村中的农民，阿尔及利亚各城市和宗主国法国的农业无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通过曲曲折折的道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社会愿望和理想。这种社会愿望和理想现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单纯的民族独立的范围。

革命在开始时采取民族阵线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

在革命初期，信仰，风俗和传统在发展和加强觉悟和民族团结方面，甚至起了进步作用。因为他们面对着帝国主义×××〔此处疑原文有错漏——译者〕来自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这些国家尽管取得了独立，仍然处在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下。

不管革命在自己的动力推动下怎样不知不觉地前进，革命已经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今天，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主力进行了七年战争以后，阿尔及利亚群众的精神已经受到时代的思想，愿望，主要思潮，即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潮的有力感染。任何人都不能

忽視这一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前途，实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阿尔及利亚革命目前是在一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世界上进行的。在这个世界上，变化的剧烈、深刻和加速度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原子能、自动化和宇宙空间研究的领域中，科学和技术最近的进步已经把人类的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的边疆推进到以前完全不可想像的地步。人类现在已经有了生产丰足产品，移动高山和使沙漠繁花盛开的物质力量。

这一新的工业革命为一种新文明，开辟了道路。这种新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物质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这一新的工业革命还同惊人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结合在一起。

这样，这两种过程就互相作用着，注定要稳定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物质和军事力量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在世界生产上及帝国主义和新生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上，留下自己的烙印。

这一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以前受到帝国主义束缚的各国在战后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解放斗争的发展互相起着促进作用。

请想一想阿尔及利亚革命以来非洲的变化吧！以前，这个大陆是最落后的大陆，现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卷入到一场革命高潮中，这个革命高潮正在扩大到森林和热带丛林的最原始的人民当中去。

从埃及到摩洛哥，从尼日利亚到坦噶尼喀，从北非到南非，穿过马里，几内亚，处在革命门槛上的怯尼亚，刚果，号称“新阿尔及利亚”的安哥拉，整个非洲都掀起了革命热潮。这种革命热潮将继续汹涌澎湃，直到这个地区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获得了真正的彻

底解放，并且实现了社会、經濟和民族复兴为止。

在这个历史性过程中，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勇斗争过去起了，现在仍在起着他們自己也沒有充分認識到的非常巨大的作用。

在中东，革命热潮也是同样深刻，不論是在土耳其或伊朗或伊拉克都是如此。在伊朗，国王和封建资本主义买办阶级正在作垂死挣扎，企图推迟不可避免的爆炸的到来。在伊拉克，克伦斯基式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摇摇欲坠，变动频繁，局势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对帝国主义来说，远东的情势也在恶化。老挝、南越的革命斗争的发展，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运动的高涨，南越的长期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世界这一地区已经愈来愈处于紅色中国的影响之下，在那里，革命不久以后就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至于拉丁美洲，在帝国主义的堡垒美国的大门口，可以称得起就处在“恶鬼魔掌中”的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说明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从历史观点来看，它不仅意味着拉丁美洲“演变”的开始，而且意味着北美“演变”的开始，因此也就意味着全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要求和封建-资本主义政权的不稳在整个美洲差不多都是很显著的。事实上，只是由于在所有这些国家和世界各地缺乏能够英明勇敢地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潜力的政党和果敢的革命领导，革命才不能不断加速地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记得，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变化和革命发展比起来，西欧和北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了。

但是，作为这些国家相对社会稳定的基础的經濟昌盛却很脆弱，很不巩固。好些年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工作完成时起)，这些国家的繁荣就是在三个基本因素錯綜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和維持的。这三个基本因素就是：在目前的“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惊人增长，有利于每个国家的工业部分的、对于农民的剝削，以及工业国集团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剝削。

由于生产力增长，实际工資和用于重新投資的累积資本也同时有所增长。

工业国集团对每个工业国的农民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农民的剝削也使工业部分的利潤可以保持高度水平，并且为它的扩大，为累积的实现，带来了必要的市場。

但是，归根結蒂，这就意味着农民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經歷相对的貧困化，而資本主义經濟則背上不断扩大的軍备所带来的沉重开支的負担。同时，資本主义經濟的下降和財政危机从长远来看也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已經清晰可见，在英国如此，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如此。以德国为首的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目前却从这种局面中得到好处。

另一方面，各国通貨——包括美元在內——的不断貶值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现实威胁已經十分清楚地說明了目前的資本主义繁荣的脆弱性。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資本主义世界已經陷入不可挽回的經濟和軍事衰微中。这个过程注定要不可改变地加速起来。每一年都会有明显的事实来証明这一点。

阿尔及利亚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的世界上逼近胜利时刻的，逼近决定时刻的。

帝国主义和它的国内外同盟者也認識到阿尔及利亚革命有走

上“古巴”道路的危險。这条道路可以引向深刻的社会、經濟和政治变革,从而为阿尔及利亚带来社会主义的結構。

在古巴,也像在阿尔及利亚一样,革命基本上是在农民革命軍的斗争的基础上和不存在一个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就其行动和成就来說,古巴革命的发展却比各国怯懦的共产党在它們的政治綱領中所表明的快得多,也果敢得多。

以某种方式把阿尔及利亚革命“資产階級化”,把它局限在无碍于建立一个同帝国主义結盟的阿尔及利亚資本主义政权的范围内,那对法帝国主义及其在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內外的各色各样“布尔吉巴主义”盟友来說,是有利的。戴高乐,美国人,美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切封建-資本主义势力以及阿尔及利亚內部的“布尔吉巴主义”分子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所力求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他們說什么撒哈拉大沙漠資源丰富啦,法国可以在康斯坦丁計劃下对阿尔及利亚的“工业化”給予財政援助啦,欧洲籍“优秀分子”可以前来阿尔及利亚啦,阿尔及利亚移民可以前往法国啦等等,企图利用阿尔及利亚問題的一切方面,来制造幻想,制造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以便把革命引向資产階級和亲帝国主义的方向。

你們願意在別人的誘惑下墜入这种陷坑中嗎?

总之,处于革命胜利时刻的阿尔及利亚需要决定何去何从:突尼斯的解决办法还是古巴的解决办法?

“布尔吉巴主义”的突尼斯已經取得了形式上的民族独立,但是它的根本問題一个也沒有解决: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真正独立,土地問題的解决,工业化,失业现象和文盲的扫除,妇女解放等。它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封建-資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盟友和附

庸。

相反地，古巴虽然是一个小国，投手之間就可以落入“恶鬼魔掌”中，但是它却真正地摆脱了帝国主义，解决了土地问题，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彻底扫除了失业和文盲，解放了妇女。

由于这一事实，这个小国已经具有了国际重要性，置身于拉丁美洲大革命——从历史观点来说，还是泛美洲大革命——的先鋒队中。靠了果敢革命领导的英明和极大的胆識，古巴已经走上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生社会主义的道路。

阿尔及利亚革命现在也有可能取得同样卓越的成就。只要它走上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它就可以在不可避免的阿拉伯和泛美洲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

决不要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机会主义思想家的武庫里借用一些論据，說这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

在社会主义的解决以外，阿尔及利亚明天的基本问题是无法真正解决的。

被帝国主义窃取的阿尔及利亚最好的土地都掌握在富裕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企业手中。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占有的公有土地和个人小块土地数量有限，土壤貧瘠，而且由于缺乏财务、物质和技术援助，都没有能很好地耕种。

可是，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居民絕大部分却是由有地无地的农民組成的。

这些群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军队的基本力量，也是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了不出卖他們，革命决不能拒絕給他們以土地，甚至不能推迟日期。

这样一种政策要求废除农民的债务，沒收富裕殖民者和帝国

主义企业的土地，至少把一部分重新取得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和无地的农民，通过民主的农业工人合作社，以合作方式开垦国家所有的其他土地，巩固公有土地，由国家给农民以财务、物质和技术援助。

但是，如果不同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和改造以及有计划的高度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也将毫无前途。

阿尔及利亚本身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何况还有撒哈拉。撒哈拉有大规模迅速工业化所必需的极宝贵的原料。加上这个地区以后，阿尔及利亚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勇气百倍地面对这一问题。

这样一个经济计划所必需的资金可以用下列办法筹措：把收归本国所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利润用之于生产事业，争取工人国家的援助，利用目前没有就业的大量劳动力，开发撒哈拉的富源。

但是，这一切人力物力需要由国家在一个国有化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并按照一个长远的计划，加以动员和组织。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资产阶级专家也广泛认识到这一措施的妥善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最有资格的专家——从密达尔到希金斯——都放弃了古典理论，不再主张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放任”和“自发平衡”政策，而赞成有计划地发展不发达国家，由国家加以推动，而且大体上由国家加以控制，包括采取国有化措施，实行土地改革，垄断对外贸易……就阿尔及利亚或任何其他国家而言，当然不可能在开始时采取自给自足和完全国有化的经济方针。如果实行这样的方针，那只会在一个整个的时期阻碍群众生活水平的必要提高，并引起危险的社会矛盾。

有计划的国家经济建设必须尽可能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包

括利用外国資本，如果外国願意在长期的基础上和有利的条件下提供資金用于經济发展的話。

这也不是一个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商业和各种手工业完全国有化的問題。采取那样的政策，只会降低生产力水平（相反地，生产力水平应迅速予以提高），并且会使一些重要的社会阶层反对政府。在开始时，采取下列政策是必要的，同时也就够了：由国家把关系經济命脉的银行业，工业，农业和商业企业收归国有，确定个体农民可以占有，但不得轉售的最高土地限額，实行对外貿易垄断。把国有化和計划化的經济扩大到私人可以經營的各部門的过程，应该按照国家的物质和技术力量以及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地进行。

正是在这样一个总方針下，才可以解决撒哈拉問題以及同欧洲少数居民和法国的关系問題。阿尔及利亚国家应该主张和附近的非洲国家一道，并且和法国的資本一起来开发撒哈拉，其具体形式应保持阿尔及利亚对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主权并保証以阿尔及利亚国家为主。阿尔及利亚国家也同样应该願意同法国成立优惠的长期协定，以便使法国可以通过財政援助，通过由法国工厂和企业提供设备的合同，来对阿尔及利亚的經济发展作出貢獻。这种可能的合作方式对前宗主国和新解放的国家都有利。

这种援助排除了政治束縛，可以防止把投資用在不妥当的地方，可以防止榨取可耻的高額利潤以致吸尽受“援”国的膏脂，不但有利于新解放的国家，而且可以保証前宗主国工人的充分就业。

这样来重新安排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关系，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阿尔及利亚境内欧洲少数居民的問題，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一切願意适应新阿尔及利亚国家结构的成分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且可以使被剝夺了财产的人最后得到补偿。这种补偿可

以由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凭借开发撒哈拉所得的收入来共同负担。不过，帝国主义愈是推迟离开阿尔及利亚的日期和解放的时刻，丧失这种解决办法的好处的危险也就愈大。

为了使这种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有可能实现，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及他们的革命军的政权。这一政权必须建立在民主选举的机构的基础上，即乡村、城市和地区的各级代表会议、委员会、一个制宪国民议会，一个对各级代表会议、委员会和议会负责政府。在革命期间成立的政治-军事行政体系的各种代议机关应该成为明天的政权的胚胎。

不过，阿尔及利亚的全部政治和经济前途的关键实际上都系于民族解放阵线的前途。

民族解放阵线是作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和革命的公认领导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它所取得的威信和巨大影响在许多年份内都将在各方面保持下去。民族解放阵线在起初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组织，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当中为民族独立的根本目标而斗争的各种成分和流派所组成的独特的阵线。

但是，实际上，在这场斗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机构，表达了革命的动力和愿望。

现在是时候了，民族解放阵线应该把自己真正变成一个政党，拥有更清楚、更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纲领。

这个纲领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党的纲领。民族解放阵线只有成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才知道怎样充分地表达工农革命群众的思想、理想和愿望，以便不致出卖他们。

另一方面，只有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党进行活动，它才能合法地保持它对政权的垄断，至少在明天的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阶段是如

此。要成为民主的政党，也就意味着要允许各种思想和倾向在这个组织内自由地对垒。作为革命的基础的各种人民力量具有各色各样文化，甚至物质和社会背景。在仅仅存在单一的政党的情况下，这些思想和倾向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但是，也不应该为了维持这种一党垄断的局面，就不准拥护革命的基本果实、在新阿尔及利亚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其他政党存在。只要同意了这一原则，这个单一的政党的存在就完全是靠了群众的信任，而不是靠了党对国家的垄断。党对国家的垄断可以导致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并且使在革命烈火中产生的人民政权退化成一党对群众的独裁统治，甚至退化成党的领导机构对全党和群众的独裁统治。在初期的过渡阶段，由于不能不和帝国主义作某些妥协，由于要处理全国所遭受的破坏，再加上干部不足，文化水平很低，革命的政党可能无法顾及这些规则中的某些规则。但是，革命党应该明确地阐明和宣布这些原则，革命党不能支持国家根据经验实行妥协的日常政策，也不能为这种政策辩护。这件事对革命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只需要再谈谈最后一个问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风俗和信仰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压力问题。

这一传统当然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已经从世世代代的封建主义转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风俗和信仰是群众力求适应一定社会制度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对于在社会内部更经济地组织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保护人种的统一，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情况对于这一具体社会的发展来说，仍然是一个障碍因素。而在这一社会中，得到好处的，基本上只有当地和外国的主要统治阶级和阶层。

在阿拉伯社会中，由于社会的结构和历史发展方面的种种原因，风俗和信仰——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的力量仍然很大。革命不能一笔勾销这一切，强要个人和社会的生活达到二十世纪所要求的知识水平和合理组织的水平。为了消灭和有效地取缔不合时代潮流的、野蛮的和不合理的风俗和信仰，包括宗教在内，必须消灭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必须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并接近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水平。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未来的事了。

在没有充分的物质水平、在文化上还没有达到自然的成熟状态的情况下，单靠宣传（当然宣传也是非常必要的），单靠禁止个人或家庭的这样那样的习惯，是无法达到高度文化水准的。以官僚主义的方式干涉个人或家庭的生活，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移风易俗”，反而容易加强旧风俗的力量，使许多落后的分子和阶层反对政府。只要在社会实现中存在着物质匮乏，文化水准低下，群众得不到真正的民主等现象，群众就会保持他们的风俗和信仰，就总会在遇到现实生活带来的挫折，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希望，不能理解大自然和社会的奥秘的时候，到宗教中去寻找慰藉。

但是，如果以这种历史负担为借口，不把革命贯彻到底，反而去阻碍决定性的结构改革，接受折衷的解决办法，那也会犯不可原谅的错误。相反地，必须在革命胜利的时刻利用群众的巨大的革命热潮。因为，在这样的时候，群众的热情仍然锐不可当，群众要求根本改变他们作为人的处境的精力、意志和愿望仍然极其强烈，以致他们一步就可以迈过许多决定性的阶段。

革命应该宣布宗教和宗教活动是严格属于私人的事情。

革命已经大大改善了青年们和妇女们在古老的家长制家庭里面的地位。这是革命对他们的功绩，对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的理

所应当的表彰。胜利的革命必須巩固和扩大这种改善，特別是要改善妇女的地位，使她們在經濟上，在社会地位上，在两性关系上，获得真正的解放。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这样一个綱領，这样一些成就就会鼓舞馬格勒布的革命，会鼓舞整个阿拉伯民族和非洲，以致成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历史里程碑。以阿尔及利亚为中心的馬格勒布会受到特別有力的鼓舞。阿尔及利亚旁边就是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两个国家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仍然受到封建-資本主义的、亲西方的、亲帝国主义的政权的支配。这种綱領和成就还会鼓舞从摩洛哥到伊拉克的整个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现在正在通过过渡性的联邦方式来寻求統一。但是，由于阿拉伯民族地理上的分散，由于社会結構的多样化，由于阿拉伯民族各成分的历史发展，而且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阻挠，这一統一至今仍未实现。而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統一无疑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应该成为这个革命的光荣的和决定性的开端。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整个非洲的影响也会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別是在黑非洲，现在还存在着一个原始的农民社会。这个社会仍然有根深蒂固的部族經濟和风俗，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商业資本的侵入，已經革命化了。本地的农民阶层和資產階級商人阶层一般是有限的，而且远不如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等中东阿拉伯国家类似的阶层重要。在这些已經取得独立的国家里，国家机构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处在雛型状态，它們的社会命运仍然沒有决定。一切仍然要以国家政权为轉移。它們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穷苦的农民和进入城市的（此处原文不通，揣譯。——譯者）非部族化的成分組成的。这些政治上有局限性的中坚分子想要把城市加以利用。这种社会基础，加上目前的国际环境带来的革命热潮，就逼迫这些中坚分子朝着国有化的、計划化

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本地的资产阶级和潜在的资产阶级分子，加上帝国主义，逼迫他们以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以来的演变为蓝本，朝着买办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发展。

现在已经有人把非洲划分为两部分：“改良主义的”非洲和“革命的”非洲。前者以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各国的现政府为中心，后者以几内亚、马里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加纳为轴心。这种划分很可以说明上述两种趋势。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胜利时刻所作出的抉择将大大影响整个非洲当前的命运。

人们也不能低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地中海周围各欧洲国家所将产生的影响。非洲，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的行动已经震撼了佛朗哥和薩拉查的独裁统治。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影响很可能会加速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垮台。

甚至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雄斗争都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使法国的工人和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阻碍了戴高乐独裁统治的巩固，并且还遏制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从而说明殖民地革命的历史性发展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间目前存在的密切的辩证关系。

历史已经用它的辩证法把基督教的一条原则变成了自己的原则：“最后的一个将成为最先的一个”。这种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思想家也没有预见到。

这种可畏的历史命运将以阿尔及利亚革命在胜利时刻的决定为转移。

你们打算怎样利用这一胜利呢？

请想一想古巴领导者的极大的胆识和深邃的智慧为革命者树

立的举世无双的榜样吧。他们真正理解到了现时代历史的方向和机会。

在今后要走的道路上，一刻也不要犹豫，决不要不惜一切代价使革命的前途服从于民族或党的抽象团结的迷信。

勇敢地举起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历史将给你们以巨大的奖赏，不朽的光荣。

在这一任务面前，决不要后退，不管用什么借口。

1961年7月18日

九、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 阿尔及利亚的决议

(1)经过大约三个月的政治危机之后,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第一阶段随着国民制宪议会的选出和本·貝拉的总理职务的任命而告一结束。

在这次斗争中得到胜利的是在本·貝拉领导下、得到以布迈丁为首的民族解放军多数派支持的政治局所代表的一派势力。布迈丁的支持是本·貝拉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政治局和民族解放军多数派的联盟——尽管在许多方面彼此间有明显的分歧——加强了城市和乡村绝大多数群众的力量,并使他们团结在现在的领导集团的周围。布迈丁的“法农主义”(Fanonist)的或甚至是“卡斯特罗主义”的路线,加上本·貝拉所作的一些声明(尽管其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软弱性,同时包含着他的同盟者的政治方针),再加上阿尔及利亚新政府已经作出的一些决定,表明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有利于(纵然是有限度地)人民群众坚持基本的社会变革,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这一倾向。

在这次政治危机的各个阶段遭受失败的那些势力彼此是极不相同的。某些倾向,从它们对待地方主义的影响,对待混乱而危险的概念或者甚至对待亲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的态度来看,可以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倾向。另一些倾向,比如像第四军区的那些倾向,因为不能代表一个明显的路线,就不能看作是右派、亲资产阶级派或亲新殖民主义派。

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中,真正的亲资产阶级和新殖

民主主义的势力是很难露头的。从主观方面来看，民族解放陣綫的干部和领导人要想充当这种角色就很难办到，因为他们都一致承认黎波里綱領，承认斗争所以胜利是由于革命群众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从殖民主义时代传流下来的摊子里，危险是在于混乱，也就是对一些特殊問題缺乏明确的方針，在于对一些本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犹豫不决，在于对当前的冲突和斗争的社会性质和潜在的客观情况缺乏了解。

可以承认，民族解放陣綫内部的某些干部，包括一些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和先鋒組織，也許可能提出一个比本·貝拉及其同僚所提出的更为民主、更为首尾一貫的革命路綫。但我們同样不能否认在各个团体中(工会,《圣战者报》甚至在反对政治局支持各軍区的人中)也在較大规模上出现了左派。可是那些干部和先鋒組織，即使已經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路綫，然而，首先，由于缺乏具体的群众支持，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基地上进行活动；其次是太无团結力，不能在这次政治危机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因此，主要是以本·貝拉为代表并得到民族解放軍多数派支持的、圍繞在政治局周围的领导集团，尽管是軟弱无力和优柔寡断，尽管是带着官僚主义和甚至拿破仑主义傾向，它仍然获得了胜利，成为在这次爭夺政权的斗争中比当时其他各派更能代表国内和国际革命需要的一派。我們再說一遍，就这方面說来，在这些特殊的势力中得到胜利的是比較进步的势力联合起来的力量。

(2) 在国民制宪議會选出之后，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前一阶段。一切問題现在都以一种尖銳的形式提了出来。甚至就在最近的将来各种重大发展都是可能的。眼下的决战将是反对一切新殖民主义的企图。

最近的事件証明，群众压力远远沒有减弱，而且是日益加大，

尤其是在乡村。当前的迫切需要，人民群众在长期英勇斗争中培养成的深刻的革命情绪，农民和城市贫民不愿放弃在胜利后得到具体的社会果实的希望——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再向前推进，这样，革命的停滞或退却在目前就很少有可能性了。近几周来，这种比较积极的迹象之一就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关于处理被所有者放弃的财产的决定，这实际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乡村的资产阶级，以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一个打击，同时也表示了一种勇敢的捍卫古巴的立场。

各左派团体和势力不团结的情况大大增加了许多军人集团的思想混乱，不过现在似乎是很清楚了：许多军人、干部和领导人已经得到了殖民地革命最基本的教训，就是，要想真正得到胜利，革命必须是“持久的”；必须从一开始就继续不断地坚决反对任何招来新殖民主义势力的企图。这类的因素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必须着重指出：正如国民制宪议会头几次的辩论中所部分地反映出的，在目前的革命气氛里，任何一派，想通过一党专断和国家机构以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方式强行领导并提出自己的措施，都将遭到反对。民主的领导方式将是各个阶层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对真正的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是这个新国家要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民主的、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的政府。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民群众都应当能够确实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力，自由表达他们自己的意志，实现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一切措施。这类机构的某些雏形及实现的客观基础现在已经存在，不管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管它们的活动方式还如何值得讨论。为了把这些原始的机构发展成为真正的新政权机构，为了不仅限

于少数人而是要使越来越大的人民群众阶层認識这种最根本的需要，我們就必須以这类刚具雛形的机构为起点。对于使革命繼續向前发展來說，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类的国家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归根結底，这仍然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机构的问题。它不仅只是关于最好的政府形式或諸如此类的问题，而是把民族解放陣綫重新改造为一个具有群众影响的革命政党的问题。簡言之，这是急待解决的、广义上的革命的政治领导问题。

这个革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假使建立有效的政治领导的问题长期拖延不决，以致在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时期不能及时采取重要措施，則危险的新殖民主义倾向就会抬头，并借口“結束混乱局面”而强力采取可能是基于帝国主义者的諾言或甚至象征性“援助”的欺騙性的措施。通过这样的迂回的道路，新殖民主义就可能会得到某些成就并沮滯(哪怕只是暂时地)革命朝着取得基本社会成果的方向发展。

(3) 第四国际从一开始就支持民族解放陣綫的英勇斗争并一直在繼續号召对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給予无条件的支持，现在也正在給予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现政府以最大限度的支持。虽然第四国际基于自己的立場提出了批評，它现在和将来还是会支持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經和将要作出的各項革命的进步決議的。

阿尔及利亚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急須将民族解放陣綫重新改組，如何重新改組，应当在各級組織的充分討論以后由全国代表大会来作出决定。民族解放陣綫应当制定一个基本的政治綱領并坚决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不贊成无原則的团結。我們极力主张所有的革命倾向和力量都能进行革命的团結，并且建議必須以遵守

黎波里綱領为基础。在这个明确的政治基础之上就有可能分清哪些力量是真正在为革命事业而斗争，哪些力量是甘愿充当保守的、亲资产阶级的角色。这样就可能克服左派之間现在的分崩离析的情况，团结另一些还在犹疑恐惧的力量，从而組成作为阿尔及利亚持久革命的主要推动力的真正革命派。

同时，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争取組織从下面选出、作为真正权力机关的民主的人民委员会。我們已經指出过，这必须以群众所能了解的具体經驗为基础并以已經存在的那些刚具雛形的組織形式作为起点。

更广泛地讲，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提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內容的綱領，坚持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将主要的工业部門、銀行、运输系統收归国有、实行計劃經濟、垄断对外貿易并将对外易貿企业收归国有的絕對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当前的措施，我們提出如下的建議：

- (a) 解除农民的債務并停止交付地租。
- (b) 由工人和农民来管理一切被所有者放弃了工厂和田庄。
- (c) 在所有的銀行和工业企业中建立工人的控制权。
- (d) 建立人民对一切食品、住房和租金等等的控制权。

我們已經指出过，像这样在这个总方針之下所采取的这些具体措施，将会使得这个革命进入重要的新阶段，并克服帝国主义者希望借以在地中海沿岸防止光輝的古巴再次出現的各种障碍。

1962年11月4日

十、安哥拉革命进入第二年

——巴布洛

1961年2月4—6日，安哥拉人民群众，在佩有 MPLA(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标志的战士们的率领下，袭击了罗安达州的监狱、无线电台及军营。

同月5日，葡萄牙的警察军政当局采取了报复行动，在这一天之内，他们屠杀了三千多名非洲人。有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在逃出罗安达屠杀之后，即设法转入农业地区。在农村里，他们把马兰惹州拜亚·都·柯桑日各种植场的雇工们组织起来，进行了反抗活动。

在这一些范例的鼓舞下，安哥拉北部的人民也开始了武装斗争。安哥拉从此燃起扑灭不了的战争火焰。

一切迹象都可以使人看出：在邻近帝国主义非洲最后基地——南非联邦和罗得西亚——的南非洲，一场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开始了。

熾热的刚果还在追求它那流产的革命；一部分非洲尚处于少数欧洲人（他们组织完备、下定决心为其非法特权顽抗到底）的霸占下。夹在它们中间的安哥拉，所需要面对的斗争无疑的是艰苦的。但是，最后结局如何却是无可怀疑的。

战争的直接原因和背景

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次的“暴动”似乎是安哥拉人民群众挑起

来的；葡萄牙帝国主义则是被迫应战，目的只在于“自卫”。但是，实际上，1961年2月的罗安达事件，完全是葡萄牙的罪恶统治一系列的挑衅和种种勒索手段所造成的后果。

1961年2月4日，安哥拉人民群众袭击罗安达的军事监狱和普通监狱时，目的是想营救1959年3月以来被捕入狱的那些民族主义的领导者民族斗士。例如，民族主义者的领袖阿贡斯提纽·内图，是在1960年6月8日被警察逮捕的，后来又被送往里斯本，不經审問就放逐佛德角群島的。当阿贡斯提纽·内图博士故乡的人民聞訊，举行游行运动，要求释放内图时，葡萄牙军队竟在伊科洛和班果对和平游行的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这一次屠杀中，安哥拉人民有三十名被杀，二百名受伤。

仍在1960年这同一年的6月25日，安哥拉著名反殖民主义人士、非洲神父华金·德·安德拉戴，也被逮捕入狱，后来同样地遭到不审問就流放的命运。

1960年6月間，由于刚果独立事件取得大量援助的葡萄牙军队，在罗安达的非洲人居住区和腹地，进行了頻繁的残酷镇压，疯狂地残杀、拷打非洲人。

当然，他們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镇压行动，防止刚果革命的范围向南扩大，特别是有鉴于安哥拉北部的巴刚果族居民同解放了的“法属”及“比属”巴刚果人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且，显然的，刚果事件已給予安哥拉的反抗活动可以說直接的影響。

自从刚果独立之日(1960年7月1日)起，不仅在罗安达的先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而且在喀奔达和安哥拉北部的森林地区及城鎮內，包括武装反抗在內的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当局的思想，就已开始深入人心了。

从那时候以后，在安哥拉北部和喀奔达的森林里，反抗殖民者

的农民群众便在卢蒙巴^①的政治影响下，结合起来。正是这些揭竿而起的农民的小团体，为了回击殖民者制造的1961年2月罗安达大屠杀事件，进行了一场复仇战役。在1961年3月15日前后，他们袭击了欧洲人的住所、种植场、商店、办事处和交通中心。

但是，安哥拉战争的老根和基本原因，自然还得从葡萄牙帝国主义者对安哥拉数世纪之久的奴役之特征与后果上面去找。安哥拉战争只能沿着武装革命的道路，即安哥拉革命的道路发展，别无其他道路。

葡萄牙人的占领包括今天这样的范围的安哥拉领域，是到1885年2月26日的柏林条约（这一条约承认了帝国主义势力瓜分非洲的局面）成立后，方才生效的。安哥拉内地人民进行了那样强大而顽强的反抗和一次又一次的起义——约每十二年一次——，以致迟到1922年，葡萄牙人才达到了在军事上征服安哥拉的目的。这就是说，直到这个时期（1922年），葡萄牙人才实际完成了对这一片广阔土地——面积约等于两个半法国，人口将近四百五十万人——的行政上的占领。

从这个时期以后，欧洲殖民者便开始向安哥拉腹地殖民，庞大的租让企业也成长起来，开始了对广大咖啡种植场、金钢石矿、锰矿以及油田的掠夺剥削。现在，欧洲殖民者为数大约已有二十万人。

其实，远在1482年，葡萄牙人就已侵入安哥拉。十六世纪时，他们已在安哥拉沿海一带占领了许多据点。约自1700年到1850年，奴隶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品；其中仅运往南美洲种植场的黑人即达一千五百万名。^② 1836年，贩运奴隶的贸易才正式宣告废

① 参看下文。

② 根据迪厄多尔神父提供的情况。

止。但是，出賣無數安哥拉勞動者的**隱蔽**的奴隸制——作為葡萄牙帝國主義者的特征——一直是繼續存在的！

安哥拉的勞動者

安哥拉的勞動者可以分為以下的三大類：

(一) **強迫勞工**：這類勞工不折不扣地等於獸重的牲畜一樣。他們大多是農民出身，為數約占非洲的勞工群眾的 50% 左右。雖然，在理論上，安哥拉從 1906 年起，即已實行自由勞動制度。強迫勞工是通過殖民者和行政官之間訂立的契約“召募”來的，他們每天做工的時間經常達到十二小時，而每月平均收入的工資還不到三塊半美元。為了種植咖啡樹、棕櫚樹，行政官並且命令土著頭腦必須給他們挑選輸送強壯結實的勞工。他們把這些勞工逐往湯加和卡太特等地，在軍隊監督下種植勞動。^①無疑的，非洲人在物質、體質和文化上日趨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強迫勞動。

(二) **自由勞工**：這類勞工是根據政府和殖民者簽訂的單方面的合同，在殖民者的企業中做工的。他們的工資固定，按天計算，全月總計只有七美元左右；而且，工資要到次月兩星期後才能拿到。這中間的期間，這類勞工就靠工廠發的一種准許他們賒購的憑証，到殖民者開的店裡去買飯，將來再從工資中扣還。還有一點，他們根本沒有什麼加入工會的权利。非洲的勞工，95% 都被

^① 前葡萄牙殖民部部長馬塞洛·凱塔諾在說明強制勞動的正確性時說道：

“勞工不是自然就出現的……換句話說，需要並不符合於相應的工人的供給。召工的經理人必須到處搜尋，才能羅致適合於種植場、工廠、礦山、港口、和交通方面需要的工人；為了使召工工作紀律嚴明，行政當局也必須干預其事……特別是這樣的，因為國家也需要召工人進行公共工程……而且由於歐洲人不能經常都是在勞工很多的地方置辦產業，通過契約（通過第三者，比如說私人僱主，一般的以三個月為期）召募勞工的工作，便不得不把勞工發送到遠離他們故鄉的地方去。”（M. 卡塔尼奧：《在非洲經濟中的本地人》（Os Nativos na Economia Africa），科英布拉 1954 年版。）

剝夺了一切合法的工会会员的权利。^①

(三) 有知識的劳工: 这类劳工被称为“同化人”。原則上, 他們享有和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利。但是, 他們的人数总共还不到非洲全部人口的 1%。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 安哥拉有八十万劳工, 其中十五万人是工人, 五十万以上做农业劳动。

但是, 实际上, 私人雇主和殖民地国家所雇的工人和强迫劳工(从事修筑和保养公路、桥梁、砖窑、种植場的劳动)就有二百五十万非洲男女工人和童工(年龄不满十二岁)。

安哥拉的民族运动

由于存在上述这种社会条件, 由于 99.3% 的人口——按照葡萄牙的法律, 即所謂“土人”——沒有选举权, 由于文盲的数字占到全人口 99% 以上(只此一端就足以构成取得“同化人”資格的进一步的困难), 安哥拉除了实行“暴动”, 实行武装斗争, 作为爭取民族集体的解放和个人情况的改善的唯一手段以外, 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了。

在安哥拉民族政治运动采取“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道路——武装斗争的道路——以前, 它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一般历史共同具有的各个阶段。

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們抱着种种幻想飲鳩止渴, 妄想和占领者同化調和, 或者“通过合法手段”在同帝国主义者——殖民地宗主国的“联合”与“合作”中, 謀求独立。但是, 所有这一切一切当

^① 合法的工会只有全国司机、铁路工人、冶金工人联合会和全国雇员联合会, 会员主要是欧洲人, 领导人是由总督和殖民部长任命的。

代表非法的工会的有安哥拉黑人工人和劳工联合会和安哥拉全国工人联合会。前者的总部設在安哥拉, 后者設在利奥波耳德維尔。

然只是局限于“进步”的知识分子范围。在这一片大约拥有一千三百万居民的国土上，衰老的葡萄牙帝国主义者采取中古式的剥削手段，设法树立“威信”和经济势力。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上述的一切注定是要失败的。

1928年，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建立。这一政权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加强，推动了安哥拉民族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1929年，罗安达州的非洲人首先创立了非洲人全国联盟(Liga Nacional Africana 简称 LNA)，其后又成立了非洲人俱乐部(Grémio Africano)，后来称为非洲土人地方联合会(African Club 或者 Associação Regional dos Naturais de Angola 简称 ANA-NGOLA)。非洲“土人”往往都支持非洲土人地方联合会(ANA-NGOLA)，同化人则倾向于拥护非洲人全国联合会(LN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连后一个组织(尽管它同人民关系比较密切)也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危机：它的下层群众普遍要求放弃改良主义的方法，而直接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而它的领导却为帝国主义所收买，被警察渗透进去，不能符合群众的愿望。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年，才在安哥拉城市，特别是罗安达青年，以及里斯本和巴黎的青年留学生间，出现了一个民族文化运动(它是目前的民族政治运动的先驱)。安哥拉的诗人、作家、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恢复起民族思想的幼芽，推广了激动战后革命世界并使葡萄牙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自由思想。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贡斯提纽·内图、马里奥·德·安德拉戴、维里亚托·克鲁兹、依利迪奥·马夏多，这些安哥拉新兴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具体地表现了安哥拉青年和群众的民族的愿望。

1956年12月，一个不久以前产生的非法群众团体，即安哥拉

非洲人統一斗爭黨 (Partido da Luta Unida dos Africanos de Angola 簡稱 PLUA) 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聯合組成了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這個非洲群眾的政治組織。它是由從未離開過本國的非洲人在羅安達和安哥拉內地建立起來的。

在安哥拉內部民族運動取得上述發展的同時，移住在當時的比屬剛果的安哥拉民族主義者，1954 年也建立了一個組織：北安哥拉人民聯盟 (União das Populações do Norte de Angola)。1958 年，這個組織改稱安哥拉人民聯盟 (União das Populações de Angola 簡稱 UPA)。

安哥拉革命領導權的性質和問題

在當前安哥拉民族運動中，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安哥拉人民聯盟是要求領導安哥拉革命的主要政治組織。目前還很難確定這兩個組織在安哥拉革命鬥爭中，各自對人民群眾的影響的程度。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所領導的似乎是活動於羅安達、北寬扎 (Quanza Norte) 和馬蘭惹等州內的游擊隊；安哥拉人民聯盟指揮的游擊隊則在安哥拉北部剛果安哥拉邊界一帶活動。在剛果的安哥拉人達五十萬名，他們的祖先二百年前就開始移居剛果。安哥拉人民聯盟同他們是血肉相連的，實際上也就是剛果民族運動的一個分支。因為這樣，該聯盟目前的總領導人霍爾敦·羅伯托，才靠着盧蒙巴的威望，在非洲民族主義者的圈子裡取得了信任。1958 年阿克拉會議後，羅伯托才在國際舞台上初露頭角。會議時代，他好像還只不過是盧蒙巴的門生。

霍爾敦·羅伯托自稱曾發動安哥拉農民的武裝鬥爭。按照他的說法，這一鬥爭是 1961 年 3 月 15 日，在安哥拉北部的剛果州開始的。他拒絕參加組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有權以平等地位參加

的安哥拉解放陣綫 (Angolan Liberation Front)。他并且宣布他的組織：安哥拉人民聯盟為安哥拉革命運動獨一無二的領導。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方面未曾否認剛果州農民所擔任的活動，也不否認安哥拉人民聯盟對後者的政治影響。^① 但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聲明 1961 年 2 月的羅安達事件是由他們領導的，這一事件促成安哥拉北部的農民活動，並且使活動後來擴大到安哥拉中部。另外，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還堅決地主張由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安哥拉人民聯盟成立一個聯合陣綫。

從綱領上看，由於兩個組織都強調爭取民族獨立是民族反帝鬥爭的首要目的，在現階段，它們之間的分歧似乎是無關緊要的。

但是，阿爾及利亞，尤其是剛果的經驗已經清楚地表明：在直接的群眾行動里的永遠存在民族運動的分歧。這既不是出於偶然，也不是個人、部落或種族間的對抗造成的。分歧是很清楚地沿着明確的階級路綫發展的——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實現政治和經濟上真正的獨立，在目前的历史範圍內，民族反帝鬥爭已經有了發展為社會革命的無情的傾向。

但是，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權才能夠確定不移地達到這樣的目標。不過，甚至在革命的民族反帝階段，現在就經常顯示出非洲民族運動已經分成兩種傾向，一種是“布爾吉巴主義的”，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親西方的，一種是“卡斯特羅主義的”，即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而堅決擺脫帝國主義的。

任何人要想很清楚地掌握安哥拉革命發展的情況，他必須特別記住目前美帝國主義，在非洲，特別是黑人的非洲所起的特殊作

^① 并請參閱《武裝鬥爭》一文，載《安哥拉團結》雜誌 (Unidade Angolana) 第 1 期。這份“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戰鬥刊物”是 1961 年 12 月在利奧波耳德維爾創刊的。該刊通訊處是：剛果，利奧波耳德維爾，托姆布·德·塔伯臘街 51 號。

用。

由于经济的原因（这同这个洲的富饶的农业和矿产财富有关系）以及政治的原因（这联系着非洲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美帝国主义决定一方面要驱逐其他较弱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比、葡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要阻止中苏的势力插入这个地区。

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就必须大搞黑人的民族主义，特别支持“民族”政府领导下的形式上的独立，而这种政府是遵循它的经济路线外交路线的。美国目前在刚果通过中央政府的形式所搞的勾当就是一个实例，这个政府一方面反对冲伯（冲伯主要是受英国利益，以及一部分比利时甚至法国利益摆布的傀儡）；一方面也反对基赞加（基赞加不是潜伏的苏联力量渗透的工具；就是刚果真正的革命运动复活的工具）。

诚然，安哥拉民族运动不会不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以及东方同西方的矛盾，以便加速形式上的民族独立的时刻。但是，由于这种独立只有在革命朝着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时，才能完全地实现，相当重要的一点在于：安哥拉群众必须正确地认清在美帝国主义企图操纵的当前安哥拉民族运动中，它的动力是什么。

葡萄牙帝国主义（目前，它动员的兵力已达六万名左右）一年来的野蛮镇压行为丝毫未能制止安哥拉群众的英勇的反抗。

尽管安哥拉群众牺牲了五万人，并且有十五万人逃亡国外，好几百人做了政治犯，已经燃烧起来的斗争火焰仍在继续燃烧着，并且要一直继续到最后胜利的到来。

不过，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斗争必将十分艰苦。安哥拉革命关系着整个南非洲（在那里，欧洲人的居留地是壁垒森严的）的命运。正因为这个原故，罗得西亚及南非联邦才同萨拉查政权积极

地团结，联合国对这项问题的干预态度才有所节制，干预行动迄今都限于口头或书面的方式。

安哥拉战争的延长，战争的向南部蔓延并且由深入转为一场革命，势将把这一片土地燃烧得成为像南非联邦一样的一触即发而且更加动荡的地带。它同时势必导致薩拉查政权的覆灭，这一政权的覆灭会给予西班牙现在正孕育着的革命一个巨大的动力。

帝国主义之所以一致地谨慎起来，原因就在这里。联合国决议劝告薩拉查政权对很多世纪来饱受压迫的安哥拉实行表面上的、有控制的逐步非殖民化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

安哥拉革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摆脱帝国主义势力有力控制下的刚果目前所提供的援助，这有赖于战争的向安哥拉南部扩展。南部的人口虽然远少于中部和北部，但居民都是坚强的游牧民族。

战争的向南扩展可以分散统治势力的实力，同时也可以密切同南非群众的共同战线，南非群众是安哥拉革命的主要的自然而必不可少的同盟军。

另外，早日确定比较明确的安哥拉革命社会纲领，并将重点特别放在土地问题上，可以激励革命的基础组织：农民群众的活动。

安哥拉革命的欧洲同盟军不能仅仅是热烈地希望迅速形成一个全安哥拉政治组织反帝联合战线，而应该以下述几点作为他们的主要责任：防止拖延、脱节等弱点（在他们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行动中标志着这些弱点），更加有效地加速对安哥拉已经展开的革命的积极支持，具体的做法应该是组织有广泛代表性的、在物质及精神上援助安哥拉革命的委员会。

这类委员会应该由所有一切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联合战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以便在

财政上、医药上、技术及军事上援助安哥拉革命,宣传和鼓吹革命的主张,并且发起在商业和外交上抵制葡萄牙法西斯主义。

当前的問題是通过绝对必需的积极而有效的团结,把欧洲革命同殖民地革命重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战线,这个战线要成为尚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人民的解放斗争所知道的最英勇、最鲜明的新战线。

1962年2月20日

十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新阶段

——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决议

(一) 本·貝拉政府在过去几周中所通过的决定,标志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社会阶段的决定性转折点。这些措施符合群众,特别是貧苦农民的最深刻的需要和願望,表明革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是对于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利益的严重打击,是对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资产阶级阶层的公开进攻,并且大大推动了群众的革命动员,促进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积极拥护者的日益提高的觉悟。而且,阿尔及利亚领导的最先进的一翼,还不顾右翼分子的抵抗,不顾亲资产阶级和新殖民主义者的压力,顺利地贯彻了一些最大胆和最富于革命性的解决。

(二) 3月决议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们清楚地揭发了一系列过去只得到部分揭露的问题。它们大大地巩固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化部分,从而创造了先决条件,便于在今后扩大这一部分,甚至超过已经取得的惊人成就(主要是坚决没收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和欧洲人的财产),并且限制了发展特权(此处原意不明,原文为 *The growth privileges*——译注)的可能性和新老殖民主义者伙同他们的“土著”代理人进行阴谋活动的机会。

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对阿尔及利亚的地主和资本家给予打击,并且没收了一定限额以上的庄园,而不问土地所有人的国籍如何,证明它打算沿着彻底的土地改革的道路走下去。这就意味深长地证实了,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不仅具有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立场,

而且具有堅定的反資本主義立場。

從經濟觀點來說，本·貝拉政府發布這些法令也就是批准取締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在一個重要部分中的優勢。這個部分在耕地面積中已經占有很大比重，事實上是產量最高的土地，因此，可以起決定性的開拓道路的作用。

國家和工人對這些莊園的控制可以保證有很大一部分實效和潛在經濟剩餘會用於發展生產和促進集體化。這就是說，現在已經具體地創造了先決條件，可以用來真正解決不發達國家所面臨的一個關鍵性問題了。這種解決不但在帝國主義統治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在民族資產階級的管理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若干其他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同時，我們還必須着重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工業和農產品銷售業的某些部分——暫時還是有限的——也是由集體來管理的。

另一方面，沒收阿爾及利亞大城市的電影院和旅店的措施，也具有極其明顯的政治和社會意義。它已證明是一個非常可貴的措施。這首先是因為它在萌芽期就窒息了土著資產階級的潛在幼芽。如果不採取這一措施，這種土著資產階級就可以首先在這些領域中發展起來，然後把他們的勢力擴大到經濟上具有更重要意義的其他領域中去。

（三）關於無主財產的法令，沒收電影院和旅店的新剝奪措施以及解放最窮苦的某類人的措施（如關於擦皮鞋兒童的措施）就其性質來說，已經推動了群眾的大規模動員。這種動員是在阿爾及利亞革命前所未有的規模上實現的。其所以如此，特別是因為，本·貝拉主義的領導已經通過了關於工業企業自我管理 and 無主農田耕種的重要法令，表現出它願意徹底依靠群眾的主動性和自覺參加。阿爾及利亞革命還繼承了工農民主的最優良的傳統，因此，

必将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在革命民主管理的先进形式的制訂和試驗方面，發揮开路先鋒的作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並沒有忽視这些經驗中固有的困难(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他們並沒有忽視阿尔及利亚形式的自我管理的实现还有賴于有效地运用这一形式，归根結底还有賴于它在經濟上的成功。但是，这些法令的通过和群众的动員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証今后的发展。管理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下一次的召开将标志着3月29日開始的社会阶段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化的巨大高潮。

(四) 在意識形态方面，阿尔及利亚的最先进的一翼(本·貝拉、布迈丁和他們的支持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有了新的进步。它已經愈来愈清楚地表现出它具有社会主义的立場，并且了解革命发展的过程，革命发展的动力，革命发展所要求的斗争方法以及其間的辯証的相互作用。它已經具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明白地和直接地援用了別人的反資本主义的革命經驗，特别是提到了古巴革命和它的国际意义。它已經表现出，它具有深刻的国际精神，因为它坚决地不肯让整个一个国家的人民或整个一个种族来对殖民主义的罪行負責。它不断地呼吁欧洲人，包括法国人在內，帮助他們建立新阿尔及利亚，并且要求自己的群众不要采取任何报复或复仇的措施，虽然他們过去受到过不分青紅皂白的野蛮鎮压。它証明它了解阿尔及利亚革命对非洲革命的作用和职责。它力求援助那些正在为反对传统殖民主义和最残暴的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而斗争的人民(安哥拉，南非)。

(五) 从阿尔及利亚的經濟和社会結構的观点来看，在采取上述最后几項措施以后(这些措施现在正在执行中)，阿尔及利亚已經进入明显的过渡阶段。从这个阶段中，将产生一个工人国家。

事实上，还有两个部分存在下来：在农业部分中，革命已經揭开了革命性的结构改革的过程，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实力地位。在工业、銀行和商业部分中，殖民者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仍然占着优势。而且，应该說，阿尔及利亚的参加“法郎区”和它在金融、货币和商业上对法国的依赖，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

在土地改革扩大后产生的大多数問題上，都会发生决定性的斗争，来争取控制关键性的工业部門和争取摆脱商业上和金融上的束缚。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从现在起，革命就应该准备必要工具，以便在这个經濟部門中取得实力地位。在今后的年代中，这个經濟部門在一切方面都将发挥头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本·貝拉一派已經用它最近的态度十分清楚地証明，它决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貧苦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意志，并且决心通过大规模动员群众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这也就是說，在革命所处的过渡时期，在未来的严酷的斗争时期，在各种各样反动派必然要施加的打击面前，革命必須着手准备力量，工具，政治方案和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要能抱着现实主义的乐观态度来应付他們面前的任务。

(六) 第四国际从一开始就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斗争，立即就对本·貝拉政府給予重要的支持。现在，第四国际热烈欢迎1963年3月通过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意味着重新肯定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不可爭辯地說明了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对非洲的开拓道路的革命发展的影响。第四国际深信，阿尔及利亚革命将在正在酝酿的新的重要战斗中取得胜利，并且将沿着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第四国际認識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发展将在整个非洲、中东甚至欧洲，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第四国际从另一个角度又認識

到，这一发展紧跟在許多方面都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相似的古巴革命之后，将在我們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和实践的許多領域中，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丰富的新經驗。

第四国际认为，在今后不久的任务当中，下列任务最为重要：

(甲) 保証以民主的方式有效地实现关于沒收和自我管理的法令，扩大加以沒收并交給工人自行管理的企业和农田的范围，举行管理委员会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这些机构可以成为新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革命民主結構的重要成分。

(乙) 扩大工业、金融和商业領域中国家和工人的管理范围，以便为重要部門的国有化尽速作好准备，并且在工业、銀行和商业企业中实现工人管理。

(丙) 保証国家控制重要农产品的貿易，并实行国家垄断对外貿易。

(丁) 在一个民主的結構內，通过已經开始的革命过程，并根据随时产生的具体任务，有效地組織民族解放陣綫，使它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成为体现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意志的先鋒队和斗争工具。

(戊) 扩大在自我管理法令的有效实施中可以起重要作用的“辛迪加”組織，并真正地运用这些組織，使它們能够不单是發揮保卫工人和貧苦农民的眼前物质利益的天然作用。在农村中，尤其要如此。

(己) 制訂經濟发展和工业化計劃大綱。

第四国际支持朝着社会主义迈进的一切阿尔及利亚革命力量。它号召自己的一切支部利用一切可能的援助和动員形式，去支援新阿尔及利亚。它呼吁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把这一声援运动扩大到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一切力量当中。

(譯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3年10—12月号)

十二、建立反帝統一戰綫和无产階級 統一戰綫，促进拉丁美洲群众 爭取解放和自決的斗争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呼吁书

拉丁美洲的不穩局勢正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拉丁美洲被剝削的人民正在奋勇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一切中間和貧苦阶层，小商人，农民，工人，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代理人和同盟者的实际活动中，在各种示威和斗争中，正在团结起来，或者正要团结起来。

尼克松已經在秘魯、哥伦比亚、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群众的反对，石块和唾唾下逃之夭夭了。7月26日运动的代表团，古巴革命的代表們，在周游拉丁美洲的时候，受到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热烈、一致和兄弟般的接待和欢迎。

各阶层被剝削人民在控訴、抗議、反抗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动机上，有共同的基础，不管是在电力問題上也好，在石油問題上也好，还是在推动千百万农民起来斗争的土地問題上也好。拉丁美洲全体被剝削人民以尖銳的和經常化的方式表现出他們的意气风发的斗争精神。

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爭取赶走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爭取土地改革的斗争正在拉丁美洲各地以經常化的形式出现。这些运动的具体性质并不是明确而清晰的。7月26日运动在开始时只是一个

“感化”现政权的运动，到后来才展开游击战，并击败了美国佬帝国主义军队所供应和武装的巴蒂斯塔的军队。民族解放运动在现在或在开始时采取什么形式，那并不重要；从根本上来讲，民族解放运动中就包含着社会解放的历史社会因素。各国人民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力量比美国佬帝国主义的军队或者它所武装的军队中最强大的军队，都更为强大。

生长期危机的过程每一次都导致了更大的爆炸和更为严重的不稳的表现。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帝国主义，都没有办法限制或控制这一过程。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政府现在都通过实施长期的戒严、颁布各种行政法令和非常权力，经常出动军警、采取威吓镇压措施和对群众实行军事管制等办法，来进行统治。对他们来说，议会及特殊的法律和权力都不够了。

民族资产阶级寻求帝国主义的保护

生长期危机的問題促使所有的政府(全是资产阶级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让步的基础上，寻求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佬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来讲也是美国佬帝国主义)的保护，并和他们结成联盟，勾结起来。而让步的结果，又是在社会、政治和工会事务方面对被剥削的群众进行压制。群众不能答应；他们拒绝、反抗这一局面，并且与之展开积极的斗争。

资产阶级为了对付群众，只好更加依赖美国佬帝国主义，别无他法。资产阶级在财政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因此不能不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和利益。但是，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所以自觉地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反对群众，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前途。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财政方面，社会方面或政治方面，他们都没有希望找到任何别的出路。

玻利維亞和古巴的革命，阿根廷、哥倫比亞、秘魯、墨西哥、危地馬拉、委內瑞拉和巴拉圭的鬥爭——所有的群眾都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鬥爭。一個囊括整個拉丁美洲的強有力的過程正在發展中。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游擊鬥爭正在擴大。在巴拉圭和危地馬拉，正在準備展開游擊戰，以推翻獨裁政權；而且在那裡，像在尼加拉瓜、聖多明各和海地一樣，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當中為帝國主義服務的階層，正企圖出來領導正在準備中的反對獨裁政權的解放運動。

7月26日運動表現出，它正準備展開武裝鬥爭，來推翻薩摩查和特魯希略的獨裁統治。在所有這些運動中，即令運動是在資產階級政黨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領導之下，群眾也都要求把土地歸還農民，實行國家工業化，改善和增進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實現社會解放。這就說明人民希望推翻獨裁政權。

7月26日運動正在組織人民起來推翻薩摩查，而且表現出它還準備推翻特魯希略。這部分地也是為了直接防范可能的和現實的反革命政變。總之，儘管所有這些運動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並且提出了不超出資產階級範圍的鬥爭目標，它們仍然說明了反帝浪潮的存在（這是它們的領導集團竭力要加以掩蓋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所有那些獨裁者都是美國佬帝國主義豢養、扶植和支持的代理人。

現在有一切條件掀起一場洶湧澎湃的運動，來建立一個反帝統一戰綫，以便在現階段促進廣大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被剝削群眾的要求、願望和需要。

這一過程正在震撼着拉丁美洲的整個社會結構。必須更有力地推進，加強並且協助支持和發展這一革命過程。這是拉丁美洲的進步的道路。

帝国主义准备从圣多明各和尼加拉瓜进行侵略

美国佬帝国主义正在从圣多明各和尼加拉瓜准备和组织政变与反革命。回答的办法不是组织进攻和游击战。必须唤起和号召这些国家的群众去夺取土地，首先是在古巴分配土地，立即实现对群众有利的社会和經濟改革，剥夺帝国主义的财产，实行工人管理，并且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必须号召群众实现这些社会和經濟措施；必须号召他们展开游击战来达到这些目标。

起来斗争的群众自己会决定他们是否希望或需要军事援助以及什么样的军事援助。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可以而且必须提供的援助是，派遣工人民兵并且把他们置于具有阶级纲领的机构的领导之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斗经验说明，他的胜利的真正基础就在于依靠农民，保证为实现一个土地改革和反帝国主义的纲领而斗争。

这就是赶走、推翻和绞死拉丁美洲剩下的独裁者的道路。这里所说的独裁者不仅是指那些明明白白的独裁者，也是指其他独裁者。7月26日运动的游击队员在周游拉丁美洲时宣布，他们将指责美国佬帝国主义，把革命进行到底，并将分配土地。这就说明，群众正在对他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工人们已经一再地夺取了帝国主义的企业，并且要求把这些企业收归本国所有。表现了拉丁美洲全体群众的要求和愿望的过程就是这样。

最近，在玻利维亚，为了反击《时代》杂志上一篇建议分割玻利维亚的文章，工人革命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号召群众动员起来，举行示威。结果，那里的群众就动员起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斗志昂扬的示威。

在哥伦比亚，游击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群众还在继续夺取土

地。在委內瑞拉，工人們表示要把石油收归国营。工人的工会和联合会，工人和农民的团体必須发出号召，要求在一个剝夺和驅逐帝国主义的綱領的基础上，建立反帝統一战綫。

階級統一战綫

拉丁美洲的革命，民族解放的过程，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必須有意識地給予推动，使它發揮出自己的全部潜力。

在中美，在特魯希略、海地、危地馬拉、薩摩查的共謀和幫助之下，有人把尼加拉瓜作为軍事供应和指揮的基地，两次企图侵入圣薩尔瓦多，都遭到了失敗。維持、接济和支持这些活动的正是美国佬帝国主义。它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搅扰，在必要时限制和扼杀（如在危地馬拉）反帝国主义和反寡头統治的运动和反抗独裁政权的浪潮。

而且，中美的这些冲突和爭端以及侵略和政变的威胁也正表现了生长期的危机，表现了帝国主义无力控制和支配这个发展过程和革命动員的过程。

拉丁美洲的这一动員和革命的过程是世界范围的殖民地革命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它也服从自己的过程的动力。这个过程反过来又对殖民地和世界革命的发展有所貢獻。

由于缺乏階級的工人領導和階級的革命政党和綱領，这些由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領導的运动在同帝国主义发生法律糾紛的时候，就往往向帝国主义屈服。但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基础却比这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領導表现出的，要深刻得多。因此，我們說，同社会解放結合起来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正在成熟中。处在一个仍然在逐步激进化的小資產階級的领导下，这个过程的巨大的經濟、社会和革命-政治潜力的發揮受到了限制。

抱着这一观点来领导它，来决定它的方向、因而使它陷于闭关自守的状态并具有了局限性的，正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可能，也不愿意让它全力发展，让它发挥出拉丁美洲群众的革命过程的全部潜力。

敲起警钟，号召解放圣多明各、海地和尼加拉瓜是正确的，但方式是不正确的。必须把群众的力量引向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剥夺帝国主义的财产，把主要经济资源收归国有，如垄断对外贸易，银行和保险事业收归国有，并建立工人和农民政府。

帝国主义对于拉丁美洲的动员和革命过程，并没有袖手旁观。拉丁美洲的革命在古巴、玻利维亚或委内瑞拉每前进一步，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权威、控制和前途。美国佬帝国主义通过《时代》杂志号召瓜分玻利维亚，就说明了它现在和将来不惜采取什么手段。目前，为了阻止革命的发展，它正在唆使它的代理人，即圣多明各，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制造纠纷，威胁和侵略古巴，制造军事冲突，甚至要在中南美国家之间挑起一场战争。

必须号召拉丁美洲各国群众和人民把他们的生产联合起来，实行计划生产，并且建立原料联营机构，以便销售自己的产品。不是像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政府那样去同帝国主义一起“计划”，而是在自己当中进行计划，看看怎样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且同工人国家进行贸易。

学习中国群众的榜样

中国的群众树立了坚毅不屈、勇于牺牲、富于主动性并终于取得成就的榜样。他们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进行生产和斗争是为了真正地、直接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工业

从一个落后于巴西和阿根廷十倍的发展水平开始，现在已经至少超过巴西和阿根廷十倍了。而且，这一成就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的领导下取得的。工农政府形式及经济和生产的计划化是克服中国世世代代的落后状态的基础。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软弱无力，却提出了一些卑鄙的重工业发展计划，要保持群众的低下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的（即经济的）落后状态，而让主要的利润和利益保留在帝国主义和一小撮民族资本家之手。

为了提高拉丁美洲革命的速度和水平，必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在古巴，如果能够走这条道路，革命的真正进展和巩固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这条道路也就是去剥夺帝国主义的财产，实行国有化，实行工人管理，垄断对外贸易，在吸引群众参加和照顾群众需要的情况下实行计划化。

古巴，玻利维亚或委内瑞拉的革命走上这条道路，就能迅速提高斗争的水平；要加强和巩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就要同时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还没有起来自觉地领导拉丁美洲的革命。由于缺乏工人阶级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拉丁美洲革命的不自觉的和客观的过程就无法在反对独裁政权和帝国主义的每一斗争中，全力发展，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潜力。

在古巴，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需要有独立的阶级工人政党，它们要拥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在为组织这些政党准备条件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工会的基础上组织这样的政党），工人的工会运动本身也有必要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去。除了在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没有在这一过程中起领导作用，而且也没有力量这样做。

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条件的现在已经成熟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成熟。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里，群众都受到比以往更加苛重的

剝削。在他們的苦難的逼迫下，他們都覺得需要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寡頭統治，反對獨裁統治。

掀起驅逐帝國主義的鬥爭！

工會組織——大的勞工聯合會和全國性的行業工會——必須號召群眾動員起來舉行示威、罷工、群眾大會和集會，來支援古巴和玻利維亞的革命。但是，同時，也必須在工廠中，在住宅區和總部的集會中，在文化和政治集會上，進行鼓動，並且通過一切其他方法組織對古巴人民的切實物質援助，聲援他們，主動地組織支援古巴和玻利維亞的民兵，反擊帝國主義和寡頭集團的干涉。

工會組織，工會，農會及工會和農會的聯合會有必要召開一次拉丁美洲大會，來鼓吹和領導一個統一戰綫，以便把帝國主義從拉丁美洲趕出去；以便保衛各國人民的自決權；以便支援人民反抗獨裁政權的革命和鬥爭；以便實現一個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綱領。必須建立一個全拉丁美洲的反帝統一戰綫機構。工會聯合會和工人政黨必須負起這一責任，並號召群眾動員起來。需要在拉丁美洲展開經常化的宣傳鼓動工作，需要經常地組織人們支援拉丁美洲人民反帝革命，以便召開拉丁美洲反帝統一戰綫大會——如果可能的話，在古巴召開。帝國主義是虛弱的，希望求得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拉丁美洲群眾的鬥爭已經壓倒了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力量。

為了團結一致地對帝國主義進行打擊，必須建立反帝統一戰綫；把一切運動，一切階層的人民都卷到、帶到、吸引到反帝鬥爭中來。要發展經濟，要提高生產，要克服生長期的危機——帝國主義的貸款和金融投資不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手段；相反地，它們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最大障礙。

拉丁美洲的群众組織和工人組織，只要采取坚决态度，就能鼓舞古巴群众，造成压力，推动他們去提高古巴革命的历史社会水平。

为了汇合、加强和推动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革命过程走向摆脱資本主义謀求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反帝統一战綫，它要建立在一個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反資本主义的階級綱領的基础上。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号召进步的文化和科学組織、工会和农会、工人階級的政党、穷苦的小資产階級，建立一个反帝統一战綫，成立一个机构来統一规划和领导把帝国主义从拉丁美洲赶出去的斗争；召开一次拉丁美洲所有无产階級和农民的工会和政治組織的代表大会，以便成立一个无产階級的統一战綫，在反帝統一战綫内部，以互相結合的方式，为实现被剝削群众的綱領和反資本主义目标，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

1959年3月13日

十三、殖民地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

(步孟什维克后尘的拉丁美洲斯大林主义分子们)

——厄内斯特·杰尔曼

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一个新阶段

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日趋高涨的新的阶段。这并不是说，在最近这几年中，拉丁美洲的革命完全处于低潮中；它实际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内一直在那里发展并几乎已遍及各地。可是，在最近几个月里，斗争的范围的扩大和劳动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的确曾有一种飞跃的发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称它为一个“新阶段”。

在这里，我们且不要讲哥伦比亚的使许多省份陷于瘫痪状态的游击运动、阿根廷的不胜枚举的长期坚持的罢工运动、委内瑞拉的再度赫然兴起的革命运动、巴西的争取铁道国有化的胜利斗争，甚至也不要讲在经过六年的革命之后仍然拥有惊人的力量的玻利维亚人民运动。因为最足以表明这个新阶段的乃是古巴革命的急剧发展——跳跃过革命发展阶段的古巴革命正以一連串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加之于帝国主义和古巴的资产阶级，而其动员人民群众的规模之大，在西半球的这一地区更是未之前闻。

在我们正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从这一岛国的各个角落赶来的五十多万贫苦的农民，已经聚集在哈瓦那，庆祝7月26日革命的第五周年，他们并且要求政府坚持既定的土地改革政策。古巴人民的革命热情发出的火花已经飞向加勒

比海附近的各个地区。我們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些火花一定会在大陆边缘的某些国家中引起熊熊的烈火。

在拉丁美洲革命的这一新的高涨的阶段——它和黑非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的加强、和錫兰的爭夺政权的条件的日趋成熟（这一情况无疑将为东南亚的革命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是彼此呼应的——一切革命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責任冷靜而客观地研究一下现在正力求贏得劳动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缺点和矛盾。因为，尽管群众性的运动已經發揮了巨大的威力，但如果沒有一个革命政党的正确領導，最后的胜利仍是无法取得的。而这一政党的中心目标，必須是坚持不懈地爭夺政权、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不管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还是帝国主义的）、建立新型的国家，即和貧苦的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專政。

一张悲痛的貸借对照表

现在領導殖民地革命的那些以自己不仅和莫斯科有連系，而且还和胜利的中国革命有連系因而引以为荣的各个共产党，許多年来都把有用的精力和可貴的坚忍精神用来限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群众革命运动，使之不超出“民族”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范围。群众运动的巨大力量竟沒有能够防止这些共产党所采取的严重錯誤的路綫，而使它們接二連三在伊朗、在危地馬拉、在埃及、在伊拉克造成可怕的錯誤——这种所謂支持弗朗迪西、支持班达拉奈克、支持苏加諾的慘痛的經歷，它們甚至也并不十分隱諱地支持尼赫魯，那个最机灵同时也最危險的殖民地資產階級的領袖。

一点不錯，这种政策反映了苏联官僚統治集团的根本路綫：那

就是和殖民地資產階級一起組成一個世界性的集團，借以“挫敗”帝國主義。蘇聯官僚統治集團和殖民地資產階級都只要求有限度地動員人民群眾——只求其足以構成對華盛頓的威脅，而不足以使已經建立的秩序受到危害——并無意進一步推動革命的進程。可是各個共產黨的領導人決不能說因為考慮到克里姆林宮的利益，所以他們採取違反本國人民群眾利益的政策是完全正當的。因而，他們不得不說到所謂的殖民地革命的“策略上的需要。”同時，由於他們經常和年輕的一代或一些在政治上才剛剛有一些認識的人談話，他們慢慢習慣於厚顏無恥地滿口列寧或中國革命的經驗，借此來推銷他們自己的貨色——而實際他們所引用的那些話沒有一句不是對他們自己的嚴厲的譴責。

羅德尼·阿瑞斯曼迪在《國際新評論》^①（共產國際的機關報）第9期和第10期上對“民族資產階級在反帝鬥爭中的任務”的問題所作的裝腔作勢的研究，就完全是這樣。許多批評家指責共產黨對殖民地革命一貫採取機會主義路線，阿瑞斯曼迪企圖就這個問題進行答辯，而他所講的實際只是一大堆胡亂堆在一起的字句——語無倫次，矛盾百出，文章的形式也和它那空虛的內容是完全協調的，滿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沒有一行有一個清楚明白的意義，既談不上什麼革命的遠景，更談不上什麼行動的綱領。

有幾句話我們必需先說一說。阿瑞斯曼迪自然承認許多共產黨都犯了“某種過高估計[?]民族資產階級的錯誤。”這種含糊的“自我批評”常常不過是使真正的革命的批評解除武裝的最好的方法。而阿瑞斯曼迪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產黨在這方面經常犯的那些錯誤，却始終沒有肯提出一個具體的例子。

① Nouvelle Revue Internationale.

他沒有提到，直到納賽尔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牢和集中营以前，他們对納賽尔的无条件的支持，他們在納賽尔的面前一貫自甘屈辱的作法……^①

他沒有提到錫兰共产党对班达拉奈克的无条件的支持，其极端化的程度，甚至到了公开組織工賊的队伍来协助政府和“民族資產階級”破坏科伦坡的碼頭工人罢工运动。

他沒有提到共产党給与弗朗迪西的支持，弗朗迪西在不到几个月之后，馬上就使用他的全部力量来对付工人运动并且宣布了迫害共产党的紧急法令。

他沒有提到苏加諾所得到的无条件的支持，他一直是努力要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政权，这一政权只要一有机会就馬上会把印尼的工人运动置于它的鉄蹄之下。

所有这些以世界各地数以百計的无产階級的鮮血作为代价的活生生的經驗教訓全都不是阿瑞斯曼迪研究的材料。为了解决“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他却不得不进行一种抽象的具有危險性的走鋼索的游戏，而同时他更尽量避免提到过去历史上的經驗——首先像 1925—1927 年中国共产党所經歷的丰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經驗，其次是使第三次中国革命所以能获得胜利的 1946—1949 年的經驗。

我們回头自然得陪同阿瑞斯曼迪在“理論”的戰場上走一走。不过我們实在不能不先請他清醒地想一想。許許多多共产党人的血已經白流了。如果让阿瑞斯曼迪之流的家伙再这样用一堆“理論的”公式来掩盖他們的无耻的向資產階級投降的政策，那就会有

^① 更有甚者，在这个对待納賽尔的机会主义政策之前，当斯大林主义分子称他为法西斯分子（正和他們称庇隆和 1945 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党为法西斯分子一样）的时候，他們更采取了一种拒絕理論支持的宗派主义政策。

更多的共产党人的血白白流掉。

殖民地革命和民族問題

半个世紀的經歷已經使我們有可能把革命政党在殖民地革命中的責任歸納为簡單而明确的几点：

1) 首先，組成一个无产階級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在工人运动中尽量消除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影响（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和民族資產階級）。

2) 及时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統治的一切行动、一切前进的步驟和一切真正的运动，不管那一运动的領導者是什么样的人，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活动（把墨西哥的油、玻利維亞的錫、伊朗的油、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古巴的糖料作物土地、苏彝士运河收归国有等等）。

3) 让自己代表着这种运动中的最活跃最激进的力量，也就是那些为了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全心全意不顾一切牺牲进行战斗的力量。

4) 警告劳苦的人民群众——城市中的和农村里的全都一样——如果运动的領導权始終掌握在搖擺不定、不可能有效地動員全体群众来进行革命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手中，反帝斗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民族复兴就不可能实现。

5) 沿着这一方向爭取无产階級在革命运动中的絕對領導权，那也就是說，使工人階級的革命政党贏得对工人和貧农的領導，然后站在他們的最前列一同去推翻資產階級的秩序，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蘇維埃的秩序。

以上各点并不仅是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也并不仅是第四国际提出的。它們也是列宁和1905年革命以前的布尔什維克党的主张。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并不牵涉到这些基本的真理，而只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反帝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者之間究竟存不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問題。现在，对这个問題，历史已經为我們作出了解答：在俄国、在南斯拉夫、在中国、在越南，历史經驗已經向我們表明革命的資產階級民

主义的任務，只有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取得政權之後，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以後，才有可能完成。

可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從來也沒有牽涉到我們這個時代落後國家中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任務問題。

決定殖民地革命的民族性的不外兩種情況，一是完全沒有民族自主權（嚴格意義的自主權），一是遭受着帝國主義的經濟統治，而這種統治在本國絕大多數人看來，乃是使他們的國家不能成為一個真正國家的主要障礙（像拉丁美洲的那些半殖民地國家）。在後一情況下，當這個國家的經濟仍是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的時候，它要想取得一個足以推動工業迅速發展的國內市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這裡就必然會在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產生了真正的矛盾。這一矛盾包括着許多方面的衝突——政治的、經濟的、財政的、文化的，以及甚至軍事上的衝突（蘇伊士），這一點誰也沒有否認過。這甚至表明民族資產階級也可能不得不部分地動員人民群眾來反對帝國主義——阿根廷的庇隆就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例子，而阿瑞斯曼迪卻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輕率，稱他為“法西斯分子”（《國際新評論》，第 10 期，第 62 頁）。但這並不是說民族資產階級，不管是在拉丁美洲還是在沙皇時代的俄國——面對着一個人數眾多、曾經有數十年組織工會運動的經驗、全力爭奪政權的無產階級——有可能變成一種革命的力量。

這一點正是列寧主義——甚至是 1917 年以前“老牌”列寧主義——和今天的共產黨的實踐之間的分歧所在。

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枷鎖，以及解決革命的民主主義任務的需要（首先是土地問題），使得民族資產階級變成了革命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使它也有可能參加爭取民族解放的民主陣綫。看來〔！〕這

一根本論点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可以算得一个經典的[!]例証，它正和1905年以前列宁所采取的策略一样，变成了参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取得革命領導权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基础。从这里我們也就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指南針。[《国际新評論》第9期，第76—77頁。]

該文作者的无耻真可以說是沒有底的。什么列宁的“可靠的指南針”，什么“無產階級在反帝革命中的領導权”等等，以及对中國革命的含糊其辭的提法（哪一次？是1925—1927年的革命，还是1946—1949年的革命？）——所有这些炮弹无非是用来掩盖那个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乃是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的論点罢了。对于这一論点的真实性，列宁是始終否认的，只有右派的孟什維克在1905年以前曾一再为这一論点辯护。

讓我們查查列宁談論这一問題的主要論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怎样讲的。除开其它許多話之外，有一段話是这样的：

但是，我們每个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論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地方自治派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資產階級拥护革命是不彻底的[正和弗朗迪西采取反帝的立場一样——杰尔曼]，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只要它的自私的狹隘的利益得到滿足，只要它“退避”彻底的民主革命（而它現在已經在退避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①（黑体系引者所用。）

可是，阿瑞斯曼迪既然已經有声有色地說开了，当然决不肯輕易停住。再下去沒有几行，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声称，如果誰要是“低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那他

在实践中就会模糊了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特性：把民族資產階級視作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82—83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帝国主义統治的简单工具 [!]，无产阶级的孤立 [!] 就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一錯誤結論所以会产生当然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确常常会 [!] 叛卖和迫害无产阶级。可是人們却忘了在这个問題上，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最富于妥协精神，它 [民族资产阶级] 和帝国主义之間的敌对情緒却是經常存在的。[《国际新評論》第 9 期，第 77 頁。]

这就是他們想利用列宁的名义蒙混出售的那一路貨色！

我們在說到，在我們今天的这个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作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的时候，誰也沒有意思“否认”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間的敌对情緒；如果說我們把资产阶级看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列宁更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完全看作是沙皇統治的工具，他曾經強調說，如果一个真正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开始以后，他們全都会跑到反动的一边去。

我們的这些拉丁美洲的孟什維克也和俄国的孟什維克一样完全不理解的是，**在一个革命来临的时候**，当千千万万貧穷、可怜、然而并不以为耻的剝削制度下的牺牲者忽然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推翻一切的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敌对情緒就会居于更为突出的地位。一切资产阶级，不管是民族主义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是，而且永远是旧秩序的維護者。私有财产是他們最先考慮的問題。一旦私有财产受到威胁，资产阶级馬上就会倒向反革命陣营；而在我們这个时代，**任何革命都包含着对私有财产的威胁**——不管阿瑞斯曼迪之流的这些可怜的“共产主义者”如何向资产阶级一再保証說，决不动他們的一根毫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許多的演說、書籍、會議、群众示威运动（我們当然記得庇隆！）、党派或国家领导人的會議、訪問演說，甚至到莫斯科訪問的演說……都大談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間

的敌对情緒，而已动員起来的**革命的群众**都决不如此。任何人如果厚顏无耻地坚持与此相反的意见，那他真可以說是連列宁主义的A.B.C.都忘掉了。

阿瑞斯曼迪說，如果不幸“民族”资产階級不肯参加革命，那么革命就会失去了它的“民族”性，这种說法也是同样荒唐得难以形容的。这么說，由于资产階級参加了反革命陣营，因而1917年的革命就不能算民族革命了；1946—1949年的中国革命当然也不是民族革命，因为你拿着放大鏡也不可能在毛澤东的陣营里找到一个“民族资产階級！”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因为在那些国家中，资产階級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现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却正在向今天拉丁美洲的工人們宣揚这一套东西……

列宁的《两种策略》的第十二章全部就是在討論这个問題。这一章的标题是“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階級退出而縮小？”列宁通过深刻的辯証法的論断，嘲笑那些維護这种“邪恶思想”的“高加索的孟什維克”。他如果能讀到今天“拉丁美洲的孟什維克”所写的那些东西，那他更会讲些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階級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資格同无产階級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階級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們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階級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量（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出”、做到“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們因考虑不周而害怕的那个地步的力量）。①（黑体系引者所用。）

这里，我們有两种彼此針鋒相对的立場。阿瑞斯曼迪悲叹說：“民族资产階級常常会叛卖和迫害无产階級。”如果不幸“革命的过火行动”把它赶到反革命陣营里去，“革命就失去了它的民族性。”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85頁。

那么,让我们赶快向那些弗朗迪西們、罗特們、班达拉奈克們、尼赫魯們、納賽尔們、苏加諾們低头吧, 哪怕他們会把我們关进監牢或者把我們丢进火車头的鍋炉中去活活烧死(像第一号“民族資產階級”典型代表蔣介石曾經作过的一样)。列宁的回答是: 既然民族資產階級“必不可免”地将参加到反动陣营里去, 那我們就不要为了要使它留在革命陣营中, 而使我們自己陷于癱瘓状态。讓我們大胆地喚醒农民群众, 讓我們把他們动員起来, 随着工人一起, 来完成我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資產階級的革命。

在这两种观念之間存在着一条真正的鴻沟。这也就是把孟什維克主义和布尔什維克主义分隔开的鴻沟。这也就是存在于今天的拉丁美洲和其它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和第四国际所主张的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策之間的鴻沟。

“孤立”无产階級的艺术

我們现在暂时丢开列宁提出的有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套公式——这个我們下面再談——先看看阿瑞斯曼迪的文章中最典型、最能說明問題的一段話: 要是“低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 [……] “那无产階級的孤立就完全是咎由自取。”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无产階級拒絕和民族資產階級联合起来, 那它就是“使自己陷于孤立。”

阿瑞斯曼迪應該拿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或任何其它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且不去說它——国家中的社会結構画出一个图表来, 讓我們看看在哪一个国家中民族資產階級这一社会力量在数量上具有如此的重要性, 如果无产階級拒絕和它联合, 就会“陷于孤立”了。当然, 这样一个問題是无法解决的。落后国家, 那些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恰恰正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在数量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都比无产阶级更弱，这些无产阶级不但为“民族的”老板工作，同时还（而且常常特别是）为外国资本工作。

不管怎样，阿瑞斯曼迪仍拿“孤立”的指责来进行攻击：

有那么一小撮无聊的托洛茨基分子竟然也跟着为无产阶级的孤立欢呼……

他在第 79 頁上这样写道：把智利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科尔巴兰的那套公式的精华完全接受过来，科尔巴兰在同一杂志第 8 期，第 101 頁上曾写道：

托洛茨基分子正极力支持左的倾向，希望[!]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招致失败。①

可是，这其中的奥秘也可以有个解释：阿瑞斯曼迪实际担心的是怕无产阶级在农民中陷于孤立了：

阶级斗争的加强和罢工运动的急剧高涨——这是当前拉丁美洲局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使得那些只知道从表面上来分析问题的人们，把他们自己的希望跳越过革命发展的必要阶段的愿望当成一种理论。马克思曾经指出，没有农民阶级跟着一起合唱，无产阶级单独表演的革命独唱，很可能就有变成临死的哀歌的危险，这话对于范围更为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是完全适用的——也许还更为切合。[《国际

① 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已不再是什么外国间谍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只是“已被彻底打垮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们究竟为什么希望无产阶级陷于孤立、遭受失败呢？是出于一种自我虐待狂吗？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右手仍然不知道左手写的是什么呢？

至于说到那“无聊的”“一小撮”托洛茨基主义者，让我们且只回想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选举情况，在那里的最近一次选举中，他们得到的选票等于共产党的 25%，虽然他们只在三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全省每一个选区都有竞选者；同时，当尼克松访问利马的时候，领导学生举行盛大的示威运动来反对这个帝国主义代表的也是他们；在玻利维亚，政府的官方报纸一连几个月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来反对他们，公开宣称，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新評論》，第9期，第79頁。]

現在，我們明白了：由於“低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作月”——就是說，由於拒絕和資產階級結成統一陣綫——無產階級就會在農民中陷於孤立！

可是，列寧的話却正好相反：

誰真正了解農民在必勝的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夠說革命的規模會因資產階級退出而縮小。^①

更重要的，他曾經在他的文章里說，革命的結果如何，關鍵問題是：誰來領導農民，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這裡所指的——這在阿瑞斯曼迪的話中是沒有意義的——就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絕對領導權，而阿瑞斯曼迪卻把它跟他的極端機會主義的、孟什維克的觀點混為一談了——這話的意思恰恰就是：從資產階級、從資產階級政黨、從富有的律師、醫生和商人、從工業資本家的手中，把對農民階級的政治領導權爭奪過來，他們那些人一直是在那裡麻痺農民階級，竭力阻止它充分表露出它的反帝的怒潮和要求劇烈變革的願望！

要想孤立無產階級的正是你，阿瑞斯曼迪先生，你要它跟資產階級的政黨結成聯盟，而這一政黨卻正在麻痺農民階級，並借此防止它跟無產階級聯合。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反對孟什維克的這種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遠不是要孤立無產階級，而正是要為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革命聯盟創造條件，這種聯盟的先決條件，就是把農民階級從資產階級的“領導”下解放出來。

此外，我們看到列寧在1905年提出的這一論點的確有一個缺點——唯一的一個缺點。在他的那些話里，連孟什維克主義的影

^① 《列寧全集》，第九卷，第85頁。

子也找不到，他既沒有提到对資產階級的幻想或对它的妥協主義，也沒有提到唯恐“吓跑資產階級”的机会主義分子的恐懼。他唯一的一个幻想是农民階級也許可能在革命中担当起**独立的**任务。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談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阶段和无產階級革命阶段是截然不同的。前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工人党和一个农民党的联盟(“无產階級和农民的民主專政”)；后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則是无產階級專政。

可是列宁和今天的阿瑞斯曼迪之流，除开其它許多方面外，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他能够进行真誠的自我批評，而不是搬弄一套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錯誤的虛假的东西。1917年的經驗让列宁明白了独立的农民政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农民階級，正像托洛茨基早在1905年即已明白指出的，能够作出許許多多的英雄行为；可是它就是不可能脱离无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独自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因此，无產階級和农民階級的联盟决不可能表现为革命政党和一个农民党(这样的一个組織，尽管自称是农民党，实际不是一个**資產階級**政党就是一个机会主義的**工人党**)联盟的形式。因此，民主革命要获得胜利也必須要无產階級取得政权，那也就是无產階級專政，二者是互相适应的。

很少同志知道，关于农民階級无能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問題，列宁明确地提出过这样的自我批評。所以让大家注意看一看苏維埃国家的締造者对这一問題所讲的一段話，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第二种力量，就是处在发达的資本与无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即小資產階級，小業主，也就是在俄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主要是小業主和小农民。农民中十分之九就是这样的农民，正是这样的农民。他們并不經常参加劳資間的尖銳斗争，他們没有受过鍛煉，經濟和政治生活条

件使他們不但不能彼此接近，反而使他們分開，彼此隔離，使他們變成千
百萬单个的小業主。這些事實你們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我們根
據本身的經驗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說一百五十年来的一切革
命發展過程也証實了這一點——無論何時何地，結果总是這樣：一般小
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要覺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領導經濟和政治的
一切企圖，最后都遭到了破產。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或者受資本家領導，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夢想中間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
[……]

[……]在無產階級還不能領導革命以前，這種力量总是受到資產階
級的領導。①[黑體系引者所用。]

這就說明了關於“階段”的理論到底是什么：徹底的失敗。在
“民主”革命中，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恰恰就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
級之間進行的鬥爭。恰恰是為了使農民階級革命化，使它不要脫離
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才必須不依賴什麼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才
必須進行鬥爭尋求自己的革命的方案。古巴的例子已經表明，土地
改革——即使是相當溫和的，只要它是用革命的方法、在革命期間
進行的，同時又越來越使農民動員起來——就能把烏魯蒂亞之流的
“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反革命陣營里去。任何一個不希望脫離農
民的政黨就必須盡一切力量朝那個方向追趕。任何一個工人政
黨，如果為了不要“跳越過革命發展的必要階段”，因而在實踐中不
肯放手對工人和農民群眾進行革命的動員，以防吓跑了卡塞姆、納
賽爾、蘇加諾、弗朗迪西、羅特、班達拉奈克之流的傢伙，那它肯定
就會在農民群眾中陷於孤立，並且是準備把自己置于民族資產階
級的鎮壓之下，民族資產階級也一定會再一次“出賣”它。

在革命陣營中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個人、小集團或小資產階
級、中等資產階級，或甚至資產階級政黨，那自然都不是什麼具有

① 《列寧全集》，第32卷，第263頁、264頁、265頁。

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但是阿瑞斯曼迪那样毫无分辨地说到什么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存在”；什么“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什么和反帝的资产阶级结成“民族解放阵线”；以及最后还有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等等，只是十足地说明了斯大林主义分子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思想上的混乱。

这些概念，不加分辨地胡乱使用，其所包含的现实意义就可能会完全不同。没有人会只是因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是资产阶级就把他从工人政党领导的反帝联合阵线中驱逐出去（尽管我们对他必须抱着几分怀疑——因为列宁说过，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跑到反革命阵营里去，我们事先又如何能肯定某些资产阶级一定是例外呢？）。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不能同意借口怕吓跑了民族资产阶级因而就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一样，决不能考虑到把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置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诸如，投票赞成弗朗迪西、在纳赛尔还没有和苏联绝裂以前拒绝维护反纳赛尔的工会的独立性；以及拒绝支持反班达拉奈克政府的罢工运动等等。可是，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斯大林主义的党近来常犯的却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罪行。

阿瑞斯曼迪曾提到中国的例子。我们相信他自然愿意避而不谈中国共产党 1925—1927 年的政策，那时的政策，就是由于借口不要“跳越过革命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了“四个阶级的联合阵营”，而结果却是加速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血腥的失败。一点不错，在 1946 年以后，当第三次中国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仍继续在那里宣扬“两个阶段”的理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先实现“民主革命”，然后再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我們有必要請大家想一想那句古老的格言，不过得把它倒过来说：照我做的做，不要照我說的做。毛澤东讲的什么“民主革命”实际不过是空說說，因为不容有絲毫怀疑，1949年在北京的天安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人国家、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想一想，这个国家是經過一次极端残酷的内战之后誕生的，我們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在内战期間，除了少数一些为了迎合时流成为本阶级的逃兵和叛徒的人以外，整个资产阶级都加入了蔣介石的陣营。另外，我們也可以回想一下，世界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表示的那种极端强烈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并不是从最后一个紡織厂收归国有时开始的——碰巧这事那时还没有发生——而是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特别是在朝鮮战争爆发以后就开始了。

我們也可以对阿瑞斯曼迪这样说：如果你不单是摹仿中国人的机会主义的理論，同时也摹仿他們的行动；如果，在你一方面滿口贊揚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的时候，你在实践中却像毛对待中国的类似的分子一样，去对待那些弗朗迪西們、罗特們、納賽尔們；如果，你不去宣揚什么无产阶级将有陷于孤立的危险，而在实践中組織农民起义，发动毛式的农民战争，或甚至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战争——那么历史对你的这种理論上的錯誤也将还有几分宽容。可是如果你，相反的，始終照着你所說的話做去，那将不仅是繼續在那里麻痹无产阶级，而且是要出卖它。在那种情况下，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諒你。

我們这里决不是要低估錯誤的理論的危害性，即使在实践中你不照着那种理論去做，也同样是有危害性的。同时，中国的例子也說明了这样一个問題：中国共产党用来掩盖它的具体实践（自

1946年以后,是真正革命的)的那些虛假的概念,今天却妨碍着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去采取毛的道路。或者,更荒唐的是: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滑稽可笑地提出的所謂“毛的道路”,不是組織革命的游击队;不是动員农民群众来反对出身贵族的或資產階級的、外国的或本民族的財產和土地的所有者;不是通过武装斗争,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执政党——这个党,我們不要忘了,也还能够,以自己的那种迟疑不决的方式,进行着一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彻底地毫不留情地絕裂;也不是——甚至在那次战争进行的期間,同时尽管有那么一套关于“民族陣綫”的机会主义的方略——坚决拒絕交出自己的军队和土地。不,他們滑稽可笑地提出的所謂“毛的道路”乃是**1927年的失敗的道路**,是拒絕彻底地发动群众(“为了不要把民族資產階級从反帝陣营中驅逐出去”);是使自己从属于这个資產階級的政治领导;是放弃举起自己的旗帜来爭夺政权的一切企图;是肯定“在现阶段”这种爭夺政权的斗争还不能提上日程。一句話,这是1905和1917年的孟什維克的道路,这一道路,由于斯大林的搬用,曾在中国和西班牙造成极端可悲的后果。

拉丁美洲的特点

当列宁判定沙皇俄国的自由資產階級的作用的时候,他所說的是一个工薪阶层占全国青壯年人口不到20%的国家;他所討論的是一个沒有工人国家、沒有无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唯一有的,是許久以前的巴黎公社的經驗)、沒有殖民地革命,而且是处于資產階級坚固的統治之下的世界。可以理解,当时所有的这些情况使得自由資產階級有可能采取更为革命的行動,因為他們不会像今天的資產階級那样害怕被无產階級压倒,在当时如果有人說有可

能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来，那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笑话。

如果，尽管有那么多有利的条件，而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强烈程度仍足以使它不願看到革命向前发展；如果，尽管有那些条件，它仍要在听到第一陣雷声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携家带眷往反动阵营里跑——那么，在今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存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消灭，东欧、中国和越南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在未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下不寒而慄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又更是如何不可能忽然去参加真正的拉丁美洲的革命。誰要相信，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可能願意革命——不仅是那些极端落后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甚至还有比如像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资产阶级，在那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比 1905 年的俄国不知已强大多少倍了——那他肯定认为什么阶级斗争之说不过是瞎扯。

阿瑞斯曼迪非常生气，认为哥斯达黎加的前总统菲格雷斯，一个十分典型的拉丁美洲自由主义者，不该在华盛顿不加思索地嚷嚷说：“在我们美洲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那也就是，商品价格问题。”这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找不到别的回答的时候，只得说出了这样一句富有戏剧性的话：“只要提高商品的价格，马上就会有一个国家，一个大陆，甘愿把自己整个卖掉！”是这样：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一如沙皇政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冲突一样，关键问题只是：在分配剩余价值的时候多占点便宜，自己一定要分下最大的一份，而把极小的一部分留给“外国人”或“沙皇”。如果运气好这一要求得到了部分的、甚至是暂时的满足，民族资产阶级马上就会跑到敌对阵营里去，因为这时的問題

是如何**維護剩餘價值**，防止那些衣衫襤褸的工人和貧苦的農民把那個大鯨鯨整個兒給奪去了。以“**維護民族工業**”的誓言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分析，這不是今天的共產主義者的任務，這一任務另一個時代的共產主義者早已欣然拋棄，讓別的一些政治組織去承擔了。

阿瑞斯曼迪，關於“**擴大統一戰綫**”和農民階級結成同盟，等等，談得很多。可是他却很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佃農們所耕種的土地是屬於誰的？全都是大地主的嗎？在哪些國家中有很多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同樣擁有土地？是不是因為古巴的情況特別正是如此，所以當地產一受到侵犯的時候，那裡的資產階級立即都跑到反革命陣營里去了？拉丁美洲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進行這類精確的分析，而不是答應說，如果菲格雷斯明天願意仁慈地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那我們就會跟他同在一个陣營里。

拉丁美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雖然肯定比阿瑞斯曼迪之流所描繪的要豐富得多，但是和其它地區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相比起來，却肯定是遠遠不及的。在1920年以前，已經成為群眾性的革命政黨的共產黨在拉丁美洲是並不很多的。但如果阿瑞斯曼迪蓄意避免提到這個傳統，却不大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是因為這一傳統在他所寫下的每一頁中都會指出他的那些機會主義的、孟什維克的觀念全都是虛假的。

當列寧還活着並且親自參加共產國際的活動的時候，共產國際專門研究拉丁美洲問題的文件是極少的。但其中有一個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文件，很值得請今天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者讀一讀。文件上的日期是1920年9月，是由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草擬的，當時列寧就是執委會的委員之一。文件的內容是對所有南北美洲的工人發出的一个呼喚，題目是“**美洲革命**”。儘管由於當時對世界這一地區的革命運動缺乏經驗，文件中的某些段落不可避

免地显得有些抽象和一般化，但是文件中所作的分析和得出的結論，在今天却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实，特别是因为它号召南北美洲的工人联合起来一同进行斗争，以求在西半球**推翻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那个文件中，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什么和民族资产阶级成立联盟的废话。下面就是这一呼吁中有关拉丁美洲共产党人的任务的一段——那个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比今天不知要差多少倍：

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組織一个明确的与众不同的、坚决的和自觉的共产党。这个党在刚一组成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强大的；可是，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綱領，必须坚决地从事对革命原則和革命策略的宣传工作，必须坚决地和那些迷惑群众、把群众引向錯誤方向的人們进行斗争。这个党必须是由群众中的最好的、最誠实的代表組成的；它必须逐步推进真正的群众运动的綱領，它必须完全和群众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并以高度的耐性和决心把这一运动領上越来越宽广的道路，領向越来越重要的目标。

只有共产党能够使拉丁美洲的运动具有明确的方向和光明正大的态度，只有这样，这个运动才能和美国以及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连成一口气；也只有通过这条道路，它才能够在世界革命中占据它应当占据的地位。

土地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农业在拉丁美洲仍居于最主要的地位（甚至在阿根廷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国家，在超过八百万的人口中，产业工人已将近四十万人）。农民正受着最残酷的剝削，他們生活在极端可怕的压迫和貧困中；他們在一切軍事冒险活动中充当炮灰。墨西哥的經驗已經讓我們看到了一个典型的、悲慘的例子。被奴役的农民起而反抗，发动了一次革命。而他們的胜利的果实却被资本主义的剝削者、政治上的冒险家和“社会主义的”空喊家全部夺走。被压迫和被出卖的农民必须被发动起来，讓他們参加革命的行动和組織，必須讓他們知道，他們作为农人，要想单独获得自己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他們必須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进

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共产党必须接近农民。这决不能只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和理论，而必须是一个适合于发动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具体的纲领。贫农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因素：**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通过推翻资本的势力，使农民获得解放，只有土地革命能够防止无产阶级革命被反革命势力所粉碎。**

这就是在共产国际时期列宁曾经讲过的话。我们承认，这些话极为抽象和一般化。可是这很少的几段话所包含的革命真理，远比阿瑞斯曼迪的长达三十页的充满矛盾的文章要多得多。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是非常明确的——尽管那时无产阶级的人数才不过只有几十万——而现在由于四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更为丰富，而且更进一步发展了，拉丁美洲的第四国际的组织——现在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可以以百万计，而且正组织起来在进行斗争——正是在把这一路线应用于今天的拉丁美洲的现实。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59年秋季号）

十四、玻利維亞的土地改革

它在六年以后的情况和任务

——赫多·卢塞罗

I. 农业方面的状况

一些数字

玻利維亞的人民主要从事农业。农民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占总人口的 63%。^①（1950 年的調查数字是一百七十万三千三百七十一人，估計占总人口的 63%，因此所占的百分比实际上并无变化，不过要注意住在森林里的居民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在所有这些人中間，估計只有十万人說西班牙語。）

在玻利維亞总生产量中，农业所生产的份額也最高：在 1950—1955 年期間，农业生产占国民总产值的 29%，而采矿与石油工业只占 25%。

根据 1950 年的調查，玻利維亞的农业土地共計八千零八十万英亩。其中，已开垦的有一百六十一万六千英亩。（虽然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估計的数字要低得多，只有九十八万八千四百英亩左右。）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組織所作的估計是：全部农业土地面积是五千三百二十九万九千英亩（五千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亩天

^① 除特別說明者外，本文所引用的数字都来自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在 1957 年所作的研究报告《玻利維亞經濟的发展》。很难，甚至不可能得到更近的可靠的，整理得很好的統計数字。

然牧場，一百四十万八千亩耕地)，林区土地面积是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七千英亩，其余一亿零四百五十二万三千英亩是不可耕种的土地。

把这些数字比較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已开垦的农业土地所占的百分比极小，只占全部农业土地面积的 2% 到 3%。根据 1950 年的調查，已耕地中有 90% 都在〔拉巴斯以南的〕阿尔底普拉諾高原和河谷地区，而在东部平原(它占玻利維亞領土的三分之二)上的却只有 10%。

按全国总人口計算，每人平均只合到五分之二英亩的已耕地，同拉丁美洲別的国家比起来，这是一个极低的数字：在 1955 年，玻利維亞每个居民有耕地十分之四英亩；墨西哥是一又百分之八十八英亩，智利是一又百分之六十一英亩；厄瓜多尔是一又百分之十一英亩；巴西是百分之八十六英亩。

要是只按实际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口計算的話，那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每个劳动力一又百分之六十六英亩，然而增加得极小，更何况这里的土地都是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极为貧瘠的土地。

这个数字同中国的数字相去不远，据估計，那里每户只有二又百分之四十二英亩的土地。^①

土地的灌溉面积也极小。实际上，只有两个灌溉水壩：一个是在科查邦巴的拉·安哥斯都拉壩，可灌溉土地二万四千七百英亩左右；一个是在奥魯罗的塔卡瓜壩，可灌溉土地一万二千八百英亩左右。尽管自然条件对兴修水利极为有利，其他地方的农业却全要靠天吃飯，而气候条件又是变化无常害多利少。圣大克卢斯的維雅蒙台斯水利工程已經停了下来，已經完工的部分(大体上有一

① 见阿德勒(Solomon, Adler)著《中国的經濟》，1957 年出版。

半)有趋于毁坏而致前功尽弃的危险。水利是玻利维亚农业上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把 1955 年的农业生产数字同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 的数字对比一下,可以得出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的价值是一百一十九美元或者四十二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每个劳动力每年生产毛值的四分之一,也相当于拉丁美洲全体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收入(三百九十三美元,或者一百四十英镑)的大约四分之一——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低了。要是把全部农业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每个人每年的生产毛值勉强达到四十美元,或者十四英镑(而在非农业工作中,每人每年的生产毛值是一百八十美元,或者六十四英镑)。

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玻利维亚农业人口的比例这样高,食物和农牧业生产的原料还要占到它进口总值的 38.5%,成为耗费国家外汇的一项最大的漏卮。^①

1953 年 8 月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以后,生产下降了大约 15% (以 1954 年的收获量同 1956 年相比)。除其他的原因外,这种下降是耕地面积特别是种马铃薯、玉米和小麦的土地,大量缩减造成的。对土地改革所感到的不安与前途莫测的心情是耕地面积缩减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玉米和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上表现了突出的增长,这表明了农民一旦不是为地主而是为自己耕种土地的时候,即使没有改进耕作所必不可少的帮助,也会提高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数字如下表。

虽然如此,农业产量之极度低下的基本状况并不是土地改革

^① 农业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不但完全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也可以以出口各种农产品来换取外汇,这些农产品(其中有些今天已有少量出口)是:橡胶、核桃、古柯、咖啡、可可、除虫菊、茶、奎宁、香草等等。

主要农产品的收获面积,总产量与单位面积产量

产 品	1950			1954			1955		
	面 积 (a)	总产量 (b)	单位面积产量 (c)	面 积 (a)	总产量 (b)	单位面积产量 (c)	面 积 (a)	总产量 (b)	单位面积产量 (c)
玉 米 (去壳)	257.7	124.0	1,057	105.0	85.0	1,781	111.1	90.0	1,781
馬 鈴 薯	209.8	140.0	1,485	82.3	100.0	2,671	98.8	120.0	2,671
大 麦 (去壳)	152.7	44.2	637	173.0	50.0	637	155.7	45.0	637
小 麦	187.5	41.0	481	84.3	17.5	456	84.3	17.5	456
大 米 (去壳)	30.9	14.4	1,027	21.3	10.0	1,027	22.5	10.5	1,027

(a)单位千英亩; (b)单位千吨(公吨,即“长”吨); (c)单位磅/英亩

的结果,而是旧的耕作方法和在玻利维亚实行了几世纪的土地所有制所遗留下来的后果;对任何农业发展说来,半封建的制度都成了最大的拦路虎。^①

①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对这种情况是这样说的:

在造成玻利维亚农业落后的许多原因中,必须首先提出的是直到1953年8月土地改革法颁布的那一天以前一直存在着的土地所有制。一直存在到那一天的大庄园主和半封建制度证明是几乎完全无法实行什么农业技术革新的,在大部分的庄园里都仍然还使用着极其古老的耕作方法,而农民的生活仍然极其贫困。庄园主——通常是在外地主——把责任交给管家,他们的技术知识并不比他们的主人强,他们拼命向地力日趋耗尽的土地榨取产品而根本不关心如何恢复它失去的肥力。保持牲畜健康防止种籽退化,使用肥料和保持水土的方法根本没有人听说过。同样,劳动的工具也极其原始,同殖民地时代使用的差不多。农民每星期要在地主庄园中劳动两天到四天,作为租种那一小块称做份地(Sayaña)的田地。他们在自己这份田地上大体上也是按照在庄园主田地上的耕作方法耕种。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单位面积产量极低,使农业生产仅能维持农民生活,说不上有什么商品生产的打算。广大农民只是把最低限度的一部分产品拿到市上去卖,以便换一点钱来买自己土地上生产不出来的货物。由于同样的理由,当地人几乎从不对自己的劳动定什么价值,使得市场经济式的企业无法同他们竞争。

对这一段话还必须补充说一下,佃农和他们的家属对地主和“庄子”(Estate Mausion)所负担的封建式的人身义务和无偿劳动,以及他们那种附属于土地的农奴身分,所给予农民的压迫还要比这段话里所说的简单的租佃关系重得多。

农业方面这种长期停滞的状况由于采矿业的迅速发展而更趋严重。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大矿场感到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原料要比刺激国内农业的发展便宜得多，这样，玻利维亚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大，国内的停滞状况也就越来越难改变，这不但是由于大矿场的购买政策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公路，铁路，电力，信贷等等）片面服从采矿业的利益而畸形发展的结果。

四月革命和土地改革，把大的采矿公司收归国有了，并且打破了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然而，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变由原来那种状况下产生的其他条件：耕作方法的落后性，人口与耕地的不平衡性，道路的稀少等等。不但如此，这次改革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用木犁耕地（倒还不是用脚犁，即以脚踩一根普通的木棍来耕地）仍然是玻利维亚农业中占压倒优势的耕作方式，是玻利维亚农业的象征。这一切都是农业生产停滞的原因。

土地改革给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因为没有辅之以其他措施，这种条件没有产生效果。

两种土地改革

如果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土地改革范围有多广？

首先要知道，有两种土地改革，一种是法律上的土地改革，一种是事实上的土地改革。事实上的土地改革是农民自己进行的，开始于1952年而在1953年和1954年达到高潮。农民们武装起来夺取并且分配了土地。这次土地改革是导致1953年颁布土地改革法的决定性因素。颁布土地改革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制止农民夺取土地。

由农民自己自下而上进行的土改，范围及于这个国家广大的

传统的农业地区。没有足以说明其范围有多广的数字，但是分地的运动主要是在拉巴斯，科查邦巴，波多西和奥鲁罗这几个地区进行，涉及到大部分的庄园，塔里哈和丘基萨卡两个地区所进行的规模较小（虽然范围仍然很广）。东部的圣克鲁斯，贝尼和潘多（在东部平原）几个地区所发生的只是一些余波而已，因为那里的剥削方式有所不同，也因为那里的农业人口较少（这些地区的耕地只占玻利维亚全国耕地的 10%，没有印第安农民）。

另一方面，那次法律上的土地改革，按照 1953 年的法令的计划要比事实上的分地运动范围远远小得多。下面就是数字：

根据 1950 年的调查，全国共有农业田产八万六千五百三十四处，总面积计八千零九十二万五千英亩。其中，据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数字，到 1959 年 8 月止，交给（有地契）农民的只有八百零六处田产，总面积为一百八十七万二千八百英亩。得到地契的农民只有二万九千二百十六户。（同一材料估计各农户的总数，亦即有权分得土地的户数是五十三万二千六百八十户。）

这就是说，到土地改革法颁布六周年的时候，还有不下七千九百零七万二千英亩的土地有待依法分配。即使考虑到，在这个总数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东部，那里的农民并没有要求分配土地，已分配的土地的数字看起来也十分滑稽，而已经“依法”成为土地的主人的农民的数字看起来还要更加滑稽：在全国二百万农民中只有二万九千二百十六人。

同有两种土地改革一样，也有两种对土地改革的阻碍。

一方面是，把地契给予农民的合法的土地改革由于按照土地改革法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官僚机构而弄得无法进行。这个机构老是决定不了土地该怎样分配。烏庫伦尼亚的农民中心曾解释过在决定每一张地契交给农民以前要经过多么不可思议的繁文缛

节。①

① 1958年12月20日烏庫伦尼亚的农民中心批准了下述決議，由它的兄弟代表团提交在拉巴斯召开的第三届农民大会：

鉴于：

土地改革根本法虽然已頒布了五年多，但是并没有及时实施。由于这种延擱，使人们对它的好处感到不信任，对它的热情下降，并且造成了一种反对它的气氛，为反动派为了想达到重新掌权的目的而加以利用。

土地改革計劃因为太多的官员插手而耗費极大，进展极慢，使这一法律未能及时实施。

五年以前向农村委员会提出的要求，照例又石沉大海，大多數的問題仍然是迟迟不得解决。

在规定的两次意见听取会以后，专家提出了計劃和报告，把它們交給土地改革法官，在那里，把对土地要求写成正式的呈文，还要提出有关这项要求証明材料，同时还要呈交地契，这块土地的地价稅的証件和証人的見証。

一旦判決作出以后，有关材料就要提交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由該委员会的一个秘书处处长。然后它們又轉到法律与判決处，由那里拟定各项有关报告，以备由名叫口头陈述官的官员来准备判决书。等到判决书被批准并且通知各有关方面以后，各有关方面可以提出特別申訴，申請重新考慮到底能否执行要由委员会的全体會議来决定，这种决定是很难作出的。

假定一項要求分得土地的申請竟然能够通过所有这一套繁复的手續的話，它就要轉到农村事务部，在由法律处对之审查并提出报告以后，再拟出一項最后决定，然后轉交給共和国总统，又由他那里的法律处再度审查，这个法律处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取消任何在此以前已經办好了的一切事情。

一旦作出有关的最后决定以后，这项申請又要回到农村事务部，然后再轉到土地改革委员会，又从土地改革委员会轉到原来的土地改革法庭，它往往不顾最后决定而重新予以审查。

等重新审查完成以后，全部材料又要轉回到土地改革委员会来准备地契，为此又要由法律和判決处来划定地界，再由地契处填写地契。

地契填写好了，它是由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签字的，然后又要呈交共和国总统，等总统签字以后再次轉到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

最后，地契还要保留到某一个日期，然后，与土地改革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相反，又要組成一个成員庞杂的委员会来发放地契，这要化掉财政部很多的錢（它以后又以此为借口推諉說没有錢用于真正需要的和真正迫切的开支），以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情况：即使有了一个具有法律形式的文件也还不能确立一項肯定的所有权。

有了必要的法律文件的証明书，以及地契原件和农业稅登記处的登記，就可以作为有关双方的官方正式地契，双方可以把他們原来文件分开保管。

另一方面，从资产阶级法律的观点来说，这种地契的法律效力可以很快地因为一个新的反动政权上台而发生问题。一个西莱斯派的議員已經說明政府本身就在准备条件，好让地主們在适当的时机要求宣告这种地契为非法，要求归还他們的土地。^①

在事实上的土地改革中，农民們在 1952, 1953, 1954 年（这是分田形成高潮的三年）占据了土地，而且一直为自己而劳动。但是这种土地改革也碰到了另外一种困难：农民虽然有了土地，所有其他的生产因素（种子，肥料，水利，耕作方法和耕作工具，市場条件等等）却全跟过去一样。农民們只有各听天命。土地改革停留在仅仅占有土地这一点上了。

生产率仍然处在极低的水平上。举例来说，在的的喀喀湖地

鉴于：

由于这种司法程序的拖延，在各小块土地上当前的劳动情况同在这个过程中所提出的材料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判决书同最后决定同实际情况之间并不符合，更不用提这种过程耗費巨大到足以破坏农民的经济了——

“因此应当決議：

一条：要求国家当局縮短土地改革的程序，使之更加灵活和有效，好不致于被革命甩在后面。”

①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議員阿維拉 1957 年 2 月在向农村事务部长就土地改革进展情况提出质詢的时候这样說过：

我有时深为忧虑，如果政治情况万一发生变化而致目前的革命政府有所更动的話，目前持有地契、拥有土地的农民会陷入何等狼狽的地步。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得到了地契，許多人占有了土地，但是能不能說这些农民能够永远地保住他們的产权了呢？我以为不能。議員們，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悲观，理由如下：根据 1953 年 1 月 15 日的 03525 号法令，农民由于取得土地而必須付給地主的价款必須以为期二十五年的債券分期撥还；在这个期間所有的田产、收成、农具，在法律上說都仍然只能算是抵押給玻利維亞农业銀行的。誰是发行这种債券的人呢？是国家，是以共和国會計检查长和出納局长的签字为担保的。好，議員們，这些債券现在并没有；因此，农民們并没有偿付土地改革所給与他們的土地的地价。因此，如果从古典的对待契約的观念来看的話，对于已轉手的東西或者貨物的价款尙未交割，契約是不完全的，合同并没有正式实施（政治宪法第十九条，和民法第二百九十条）。

必須补充說上一句，議員阿維拉是丘基薩卡的一个地主。

区,由于耕作方法原始,每英亩的馬鈴薯产量只有二千六百七十磅到三千五百六十磅,而在秘魯的阿尔底普拉諾高原区每英亩可以收到八千九百磅左右。

在畜牧业方面的情况也一样,据联合国拉美經委会的說法,它的产量“低得惊人”。而畜牧业对玻利維亚农村的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农业部門生产总毛值的40%以上。在阿尔底普拉諾高原占有主要地位的牧羊业方面,每头羊所产的羊毛比一磅多不了多少,这个数字只合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每头羊能出的肉只有二十二磅,比起其他牧羊业先进的国家来还不到一半。^①

这就是說,这里畜牧业完全处于仅能維持农民生存的水平上。

除了每个居民所种的土地面积积极少这一点而外,还必须說明,几百年来对这些土地的利用率都极低,不施天然的和化学的肥料,水土流失的情况已达到十分严重的阶段,特别是在阿尔底普拉諾地区——这些情况都造成了土地肥力极低的情况。在阿尔底普拉諾高原上(除了在的的喀喀湖周围的比較肥沃的地区而外),每年

① 一个联合国粮农組織的专家,奎扎达描述奥魯罗区阿尔底普拉諾高原上的畜牧业情况如下(见联合国拉美經委会所引用的《对达冷塞省社会-經济和农业情况的研究》):

“那里没有什么牧场,或者特别的牧区:根本不选择水草;也沒有牧草輪作制,除了大麦而外不种什么飼料,没有什么儲藏草料的地方,沒有人知道飼养牲口的基本知識,沒有純种牲畜,农民們連最起码的配种和兽医的知識都沒有。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消极因素,牲畜的体重和繁殖力低到极点。在这个地区,养一头牛要三十到六十二英亩的土地,养一匹駝馬要十到二十英亩,一头羊要五到十英亩。所养的牲畜全是本地种,所有的外来种全已同化和退化了。一点儿盐都不給它們吃;不給它們种疫苗,也不給它們施药剂。气候,特别是那种干燥劲儿,也对它們不利。

在这个地区,一头母牛平均要三年才生一头牛犊,只能挤一个月的牛奶,每天的产奶量只有一夸特左右。羊要两年才剪一次毛,每头羊只能出一磅半的羊毛。平均每头母羊一年只下一头羊羔,只能挤两个星期的羊奶,每天的产奶量只有三磅半。猪很少,从它們的体重之輕(最多只有七十七磅)就可以知道情况如何慘了。

只有很小一部分可耕地开垦，其他的土地都摆在那里休闲，时间竟长到九年之久。举例来说，在达伦塞省（奥鲁罗），三万五千六百英亩耕地中，每年实际耕种的只有八千九百英亩，也就是只有四分之一。

因为目前的耕作方法极其原始，只要稍加改进，所有上面那些数字就可以大大提高。但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政府在这方面连一点点土地改革也没有进行。对它那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同迟迟不发给农民地契一样严重或者说更加严重的一项过失。

在这两个方面，资产阶级政府都不但使土地改革陷于停顿，而且事实上——尽管它以此作为一个宣传上的幌子——对之实行怠工，千方百计破坏土地改革而为地主帮忙。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在它的帮助下，他们给农民围上了两道墙，一道是法律之墙，一道是饥饿之墙，近来，他们还在打算再围上一道军事之墙。

II. 农民的状况

生活水平

虽然生产停滞不前甚或有所下降，革命仍然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生活水平从消费方面说总的有了提高，因为农民不必再向地主缴纳地租了。过去落到地主手中的剩余劳动现在留给农民自己了。

但是，对农民来说比消费水平的相对提高——它由于通货稳定计划所造成的全面贫困化而再次下降了——更加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农民附属地主和土地的那种封建式的人身

劳役，所謂“邦格阿赫”(“Bongueaje”)和“密塔那赫”(“Mitauaje”)现在废除了。

这是主要不同于过去的地方，也是农民为什么手执武器起来抵抗，而且将继续抵抗任何复辟企图的主要原因。农民在农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在人的尊严方面所得到的东西，在统计数字上是表现不出来的，然而在每个农民的心灵上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好东西，是像麦子和玉米一样具体的东西。

农会，农会民兵，普选，議論和参加——即使是有限地——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对地主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这些人全被猛烈地赶出了农村)的胜利，所有这一切对农民说来，都等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仅如此，这种提高还意味着其他劳动人民在生活水平方面，在收益方面，在自由方面的自动提高，因为大家知道，他们的境况，即使是条件特别优越的那一部分人的境况，也都是永远受到人数更多，受剥削更重的农民阶级境况所制约的。

“村社”^①

不但如此，就是那些在土地改革前已经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境况也因此而有了改善，许多“村社”的情况就是如此。一般认为“村社”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部分。它们的数字在土地改革以前(1950年的调查)达到三千七百七十九个，“村社”的社员一共有三十二万八百十八人。

由于“村社”的土地被附近的地主永久强占，它们只剩下了收成最低的最贫瘠的土地。不但如此，“村社”自身就包含了使自己

^① “村社”(“Comunidad”)是一种从印加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集体占有和集体耕作土地的制度。它是已越来越退化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

瓦解的种子：在许多“村社”中每一个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归大家公有的只有牧场，社员中形成了富农，中农，贫农几个阶层。贫农只有最坏最小的土地，富农以放债之类的方式以中农、贫农为牺牲来不断增殖自己的财产，除此而外，“村社”惯于把工作给予社外的人来干，上等阶层因此而变成了对社外劳动的剥削者——给社外农民的报酬当然是极其少的。

这些“村社”还要受到附近的地主永久的压力，要受到省当局或者区当局（警察，法官，市长等等）的横征暴敛，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还要受到中间商的剥削，而得不到任何的支持或者帮助。在四月革命以后，农民的力量增强了，这一切猖狂行为虽然还没有完全废除，却受到了更大的打击，“村社”里的印第安人享受到了一系列在此以前享受不到的自由，其中包括到市场上去买卖的自由（虽然中间商的猖狂行为并没有停止）。

革命的停顿

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革命的停顿却使农民深受其害。国家落后状态的全部压力仍然压在农民身上，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对这种落后状态甚至连一部分都克服不了。

农民最迫切要解决、最经常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教育问题，这件事是过去的寡头政权所完全不加理会的。在农民自己的压力之下，政府作了一些努力来消除文盲，在农村建立了一些学校，相当大量地增加了小学教员，并且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

但是在令人触目惊心的文盲数字——占人口的70%——面前，已经做的工作实在是很少。文盲如此普遍的情况，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自己动员起来，尤其是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话，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官方的行动从上面来加

以根本改变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仍然是同文化隔绝着。不但如此，教农民读和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问题（不是读写西班牙文，事实上它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外国语）还根本没有受到正视，而只有教农民读写自己的语言文字才是唯一有效的消除文盲的办法，不但在教育儿童方面是如此，在教育全体成年农民方面也是如此。^①

像社会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还没有达到农村。医药卫生条件仍然十分欠缺。婴儿死亡率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比例最高：一岁以内是千分之一百五十，一岁到四岁是千分之三十点三六——这是全国总平均数字，因此也就是说，农村地区的数字还要更高，那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医药卫生事业。

每日三餐吃的极坏，这是从绝对的意义来说的，比消费水平最低的拉丁美洲国家还要低。根据统计，阿尔底普拉诺地区（贫穷地区）每年每人消费的主要食物如下：小麦三十一磅；肉九磅四两；马铃薯八十四磅四两；玉米六十四磅八两；糖二磅三两；大米一磅一两。^②

上面已经指出，玻利维亚的个人平均收入同拉丁美洲其他落后国家比起来也是低到极点。还有一些别的材料有助于判断农民的处境有多么困苦。缺乏连接产区和市场之间的道路和桥梁，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不但如此，运输费用还十分昂贵：一个玻利维亚的农民要带着他的产品坐一趟卡车所花的钱，比一个美国旅客

① 阿森尼奥·阿瓦兰加(Asthenio Avaranga M)在《玻利维亚人口的一般情况》1956年版第94页中以统计表和与之相应的图表逐省对比说西班牙语的人数同能识字的人数，表明这两者是成正比的，两项数字的曲线几乎是平行地起伏的（主要的当地语言是奎丘阿语和阿依玛腊语）。

② 见前引奎扎达的文章中《达伦塞(奥鲁罗)一户典型印第安农民的消费》。

坐一趟最新式的公共汽車所花的錢还要多。^①

玻利維亞电气化程度之低不仅在工矿企业中可以感觉得到，在农业地区尤其严重，这是当然的：百分之七十的玻利維亞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电的好处；这个百分比包括了全体农民。^②

可 耕 地

某些地区的土地問題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人多地少。这种情况由于有潜力的，富饒的农业地区同消費市場隔絕而更形严重（举一个例子來說，上貝尼同拉巴斯就相距六十二英里半之遙）。

在阿尔底普拉諾高原的某些地区和河谷的某些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人口压力。在圣大克卢斯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二点一人，而在科查邦巴就高达二十五点四人，在拉巴斯是二十点二人，在苏克里是十五点五人。然而这些平均数字还不能使人了解农业最集中地区的人口密度的情况。举例來說，在科查邦巴区的約但，契拉科洛和普那塔省，人口密度分別达到每平方英里一七〇点九人，一五五点四人和一六〇点六人。不但如此，阿尔底普拉諾地区

① 见阿尔瓦雷茲(J. Roy Alvarez)(一个联合国的专家)：《奥魯羅經濟潜力的調查》第 10—18 頁；

“一个搭乘卡車的旅客每一公里要花八分美元（每一英里花一角三分美元），他只能自己設法在卡車所裝的貨物上找一个座位，也沒有什么东西可以給他挡风雨太阳。而在美国，一个搭乘有冷热气設備和躺坐两用的座位的公共汽車的旅客，每一英里只要花一角美元左右。”

② 这里大可引用一下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关于电力消費的統計数字，以便从同別的国家比較中看出玻利維亞的发展水平。1954年下述各国每个居民消費的电力是：玻利維亞五十七度；烏拉圭三百五十九度；阿根廷三百三十九度；智利三百二十九度；巴西二百零五度；古巴一百七十四度；哥伦比亚一百五十七度；秘魯一百四十八度；厄瓜多尔六十四度；多米尼加共和国五十五度；尼加拉瓜四十五度；薩尔瓦多四十度；巴拉圭三十三度。在这項数字中，玻利維亞和智利是扣除了大矿山的工业用电量，但是沒有扣除矿业人員的用电量。

和河谷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两万五千人一年，而那里已再也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了（除非耕作、灌溉等方面的方法有改变），新增加的人口只有一部分能被其他地区或者其他行业所吸收。政府的移民计划只不过是把农民从阿尔底普拉诺地区和河谷地区迁移到东部的圣大克卢斯平原去（近来也把他們迁移到像卡腊瓦尼这样的热带地区去），然后就一任他們自生自灭。移民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也没有人管他們，因此这个计划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在科查邦巴河谷，人口压力又形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土地问题。在那里，年青人到成家的时候要求把原有的大约二英亩半左右的小片土地重新划分，而老年人则当然拒绝把已经太小的土地进一步分小。农民把这种划分叫做“伊瓜拉”（意思大约相当于“平分”），它是在河谷地区引起纠纷的一个原因。

所有这些问题只得到政府方面极小的注意。这不但是因为它执行不顾群众要求的资本主义政策，而且也因为在群众与体现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农村广大群众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是没有群众的主动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任务。由于农村极为落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极为繁复，即使政府想有所作为，这个任务是不能从上面来加以解决的，它会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政府把在某些方面进行试验的工作托付给了帝国主义的机构：让美洲国家农业局来搞生产技术，让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来搞教育。这两个机构都有着臃肿的官僚机构，浪费了玻利维亚不少的钱，实际效果却很小。它们大搞其帝国主义的宣传，结果只是使它們在农村受到敌视。^①

^① 《工人斗争》（《Lucha Obrera》）（第102号，1959年1月上半月）刊载了下面的一段消息：

在科查邦巴河谷，有一些农会开办了学校，由农民自己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其結果要比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办的学校好得多，因为它们是根据农民自己的需要、問題和心理来办的。阿尔底普拉諾的“村社”也办了自己的学校，用自己的錢来聘請教員，但是它們的錢很少，也很难找到合格的教員，因此教学方法十分落后，学童們得花很多年才能学会讀書和写字。

III. 农村的政治状况

农民革命

农民并没有直接参加 1952 年 4 月的起义。但是革命在农村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陆軍被消灭以后，在地主寡头政权命令下的軍隊屠杀农民的威胁消除了，这一点很可能鼓励

烏庫伦尼亚的农民通过了一项提案，由他們所派出的兄弟代表团提交拉巴斯的农民代表大会，评价美洲国家农业局的工作說，“它无人监督自行其是”，并没有完成預定的計劃。这一提案表明美洲国家农业局并没有能提高农业生产；它并没有直接教給农民如何改进耕作方法；它并没有帮助农民搞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新式农具和生产工具。

除了没有完成这些計劃而外，美洲国家农业局把本国的农业技术人员甩在一边，而用了一批不合格的外国人。他們住在玻利維亞的各大城市里或者住在美国，只是极其难得地到他們的工作地点——农村去走动一下，他們对农村的需要毫无所知，对玻利維亞印第安人的特性也是毫无所知。

美洲国家农业局有着繁复的官僚机构，那些官僚們安閑地坐在有着从美国进口的豪华設备的办公室里，而玻利維亞的印第安人却每天都在同干旱、冰雹、风沙、霜冻、虫灾、水土的不断流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而得不到任何技术上的指导，然而这种技术指导还被大肆宣传，并且附有大量实际上不过是虛构和欺騙的照片。

美洲国家农业局把奖学金給它自己的雇員，好让他们到北方的那个大国去到处游逛。那些領奖学金的人回来以后并没有給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白白浪費了玻利維亞許多本来可以用来切实解决农业基本問題的金錢。

美洲国家农业局包庇了所有的大地主，他們对土地改革实行怠工，以此来对之进行报复。

了农民加速夺取土地。

手执武器，自下而上来进行土地改革的革命的方法又一次表明是均分土地摧毁农村封建主义唯一有效的方法。

不但如此，农民动员起来以后，还给了工人们以不可缺少的群众支持，使他們能够保持四月起义所取得的果实。玻利维亚总工会成了四月起义以后所形成的工农联盟的組織形式和行动工具。

随着夺地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农会运动的高潮。而随着农会的成立，农民民兵也組織起来了，他們的实际上的中心就在土地改革的首都烏庫伦尼亚。

四月革命以后国内所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工会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任何别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比在农会和它們的民兵身上表现得更加深刻了。在像科查邦巴河谷这样农民最集中，农民斗争传统最强烈的地方，真正是形成了国中之国。农会在自己的轄区以内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行使着超乎国家以上的权力：它們分配土地，审判案件，作出判决，拥有民兵和监狱，批准或者不准通行，甚至批准或者不准結婚和离婚。

在大庄园消失、大地主被赶出农村以后，农会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只是把它們理解为农村劳苦大众对剝削他們的地主們进行經濟斗争的工具的話。但是农会取得了一种新的性质：成为保卫他們所获得的果实，首先是土地的工具；成为解决农民生活中一切問題的議事机关和执行机关，亦即农民的权力机关。农民的武装和民兵成了农会运动的一大支柱。

实际上，这种群众武装是防止了或者抵挡了反革命复辟的力量，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防止了或者抵挡了资产阶级政府夺走革命果实的希望。

农民通过农会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农民的心目中，取

得选举权一事是同通过农会来表现其政治要求一事联系在一起的。农会或者农民中心是农民参政或者农民干政的关键问题。

这是玻利维亚革命中最深刻和最不可逆转的进步。四月革命以来在玻利维亚兴起了并且形成了一种同旧农民不同的新农民：他们参与农会的生活，虽然是有限度的；他们有着自己的步枪或者手提机关枪，得到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感到自己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这个革命不是从上面发动的，而是他们自己在农村里发动的，是他们自己不止一次手执武器予以保卫的；他们，集体地说来，通过农会和玻利维亚总工会，有了某种程度的集中化和某种程度的政治生活，并且感到自己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某些份量的因素。农民已经不再是反动派的基础了，不再是反动派在抵挡无产阶级时总是指望可以向之取得支持和保护的落后而且不觉悟的群众了。

农村中的斗争

几年的土地改革并没有使农民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有什么显著的提高，而土地证迟迟不发，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农民领袖们却滥用职权发财致富，所有这一类的事情不断引起农村中的不满。四月革命并不是为了这样的一切事情才发动的啊！

1957年和1958年以来，一系列新的农民斗争开始了，不过看来显然是彼此没有关系的。

农村中的斗争的演变形成了1959年的革命的一个主要事件。这种演变生动地反映在前农民事务部长普拉塔的个人遭遇上。在4月份他由于全国农民的反反而不得不辞职。（这种对一个部长的反对实际上是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在以后几个月里他进行了一个运动来分裂阿尔底普拉诺的农民组织。在11月份，他在

为西莱斯效劳而进行分裂活动之际被阿塔华尔巴尼（靠近阿查卡契的农民中心）的农民杀死了。

阿尔瓦列斯·普拉塔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武装斗争的一部分，是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战争的开始，这场农民战争从1957—1958年的北波多西事件发展到1959年科查邦巴的冲突和阿查卡契的斗争。大量的武器继续流入农村：农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武装自己。这不是什么个人的冲动而是一种集体的倾向，它预示着新的事件和更加严重的冲突正在到来。

农村中的动荡和冲突并不是起源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不过是触发了这些冲突而已。它们毋宁是农民的深刻不满的表现，这种不满目前找不到其他发泄的出路。

它们也表现出对农民运动缺乏任何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以给予农民的需要和要求以革命的出路。它们还表现出，在农民中重新出现战斗精神和动员状态的同时，革命的力量也在分化，这些力量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而在混战一气。

农民的新的动员，阿尔瓦列斯·普拉塔之死，科查邦巴对陆军的反抗，阿查卡契农民“据点”的设立^①——这一切打开了农民的政治觉悟的一个新阶段。迄今为止政府进行统治的基础一直是依靠了工人和农民的斗争的彼此隔绝和这种斗争的水平不同，依靠了对农民的控制，依靠了工农联盟由于实行莱欽主义的放弃农民，破坏联盟的政策而陷于解体的事实。

这种统治的基础正在消失。农民的动员状态越来越扩大，使得政府同农民彼此正面对峙。长枪党在4月19日失败以后垮台了，这是又一个因素迫使政府不得不赤裸裸地表现出反对农民的

^① 见《第四国际》第8期，1959—1960年冬季。

立場。失去了长枪党，資產階級政府就失掉了它对农民行使压力的最宝贵的工具，来迫使农民克制并且迷乱他們的眼目。它再也不能像过去慣做的那样說，工人和农民的任何动員都会在客观上有利于阴謀分子并且会使革命陷入危險了。它再也不能用过去特别是用来对付农民的长枪党这个稻草人来吓唬人了。政府现在已经不得不直接来扮演阻挡农民前进的角色了。所有这一切都在加速农民的政治进步，在进一步破坏政府的稳定性的根本基础，并且在形成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西萊斯派的领导人就成了执行萊欽主义的压制和分散农民力量的政策的最好的人选，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出背叛的和罪恶的面目。工人的领导，特别是矿工的领导是农民所需要的自然的中心，对他們目前的问题來說，这一点尤其迫切。政府所最害怕的就是工人和农民的重新結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玻利維亞工会联合会繼續处于分裂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中，并且粉碎任何重新統一的企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就以萊欽主义为代理人，后者已成为巴斯·埃斯登索罗的政策补充，并且有意識地在工人斗争内部和农民斗争内部保持分裂，在工人和农民运动和小資產階級之間保持分裂。

萊欽主义的这种行为只有在还没有有足够力量、决心和权威的革命领导起来进行重新統一的工作的条件下才能办得到。客观的形势，农民和无产階級的觉悟的提高，他們同政府的对立的加剧——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一个领导，有助于为它創造更好的前提。

但是只有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具体存在，只有虽然是少数但是却占有根本性的位置的革命工人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一前景。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领导还不存在或者还軟弱，萊欽主义才

有可能繼續做它那出賣和投降的勾當。歸根到底，也正是由於這個弱點才能說明為什麼那些使革命陷於停頓和歸於分化的因素能夠發展，為什麼這些因素在农村中表現為農民內部的衝突並且表現為對已經到手的權利的放棄。

農民的新的領導

農民群眾像工人群眾一樣一直到今天都在以聞所未聞的英雄主義，忍受着不可思議的困苦進行着抵抗，每天都眼看着領導人開小差和投敵。農民和工人群眾在衣食不給的情況下，幾十次手執武器反對政府來保衛自己的革命，保衛自己的果實。他們的行動和武裝鬥爭制止了民族主義革命運動黨建立資產階級獨裁，這是西萊斯、夸德羅斯·基羅加和格瓦拉都打算干過的。群眾使許多想當獨裁者的人鎩羽斂迹，不獨是對翁扎加·德·拉·維加一人而已。

但是政府和帝國主義也在繼續指望飢餓困苦的生活、失業和極低的農業產量會迫使工人和革命後退。政府這種行動的根本動機並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它今天的主要目標不是增加生產，而是解散并存的双重政權，結束工會、農會和民兵的政權，特別是在农村和礦區。就連各項移民計劃（聖大克盧斯，卡腊瓦尼等地方）隱隱中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平衡力量阿尔底普拉諾高原地区和河谷地区來同貧苦而富於戰鬥性的農民相對抗。在這一方面，它到今天為止並沒有能成功。

生產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是使工人和農民分化的一个新因素，而政府打算不惜一切手段來分散工人和農民的力量。這種打算表現在它多次惹起礦工罷工上（1958年3月的罷工就是最明白的一个例子），也表現在农村中，它在那里的政策是用飢餓來使農民軟

弱，以便以后用武装来包围他们。这个政策是帝国主义授意的。这就是它所提出的，以它的援助来维持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保持政权的条件。

从下面发动的土地改革要比资产阶级政权认为适度或者可以容忍的程度彻底得多。为了要使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充分展开活动，土地改革必须后退，农村——像矿区一样——必须再次成为资本投资的场地，资本主义必须回到农村。不过这一次不是以旧的形式（那是不可能卷土重来的了），而是要取消农会和民兵，并且为资本主义式的农村财产的集中扫清道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理论家坚持要以墨西哥的革命作为自己将来的榜样，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农民运动需要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领导，但是农民本身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集中的领导的。在前一阶段已经有小资产阶级从上而下给了它一个领导，这种领导是以莱欽主义的工人领导机构为基础的。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出现并且为农民所接受，它就将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农民的新的集中领导打开道路。

不论农民的组织和斗争要经历什么样的波折，倾向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能从上而下地硬要他们接受一个大体上站得住的领导了，资本主义也不再能消灭或者推翻玻利维亚的农民革命了。“但是新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和全国性的农民领导机构只有在农民固有的斗争性同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

“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内农民状况的变化，农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具有特别丰富的内容。其中存在着革命和工农联盟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革命进一步走向分化和走向错误方向的严重危险。

“要保證这样一个危机能得到一个革命的結局,要避免革命进一步走向分化以致走向失败的危險,决定性的因素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領導,亦即革命工人党的干預。这是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的保證。这种干預要有切合当前的問題和切合通过主要的工会和农会来进行的斗争的綱領,它們將給革命的前途找到一条肯定的出路。”

IV. 土地改革的“失敗”

双重政权和生产

在土地改革宣布以后六年,它还没有能实现它所許諾的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面的巨大增长。它的敌人正在指望它的“失敗。”

“首先是,經驗表明,任何革命,任何农民革命也一样,在一开头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总是生产的下降,直到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組織了生产才会有轉变。”双重政权并不会造成特別适于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环境,它是一种不穩定,老有斗争,并且在国家生活方面缺乏有效的領導的环境。“革命的利益要求尽快地通过双重政权的阶段而建立新的工农政权来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組織国家的全部經濟和政治机构。”

在玻利維亞,自从1952年4月9日以来一直存在着双重政权的局面。虽然資产階級政权控制着城市,虽然工人和农民的政权看起来似乎被掩盖住了,遭到了压制,却仍然存在着一种不穩定的,沒有中央領導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無論在工业方面还是农业方面,生产都不可能穩步增加。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所有的資产階級理論家們都举出了这个事实,以此来要求实行更加反动的

政策。他們在必須取消双重政权这一点上是看得完全正确的。但是問題是誰來取消它，應保留誰？还是由資產階級政权來結果掉工人的工会和民兵的政权來強制推行資本主義-帝国主义的律呢，还是由工人政权來結果掉資產階級的政府和目前的混亂状态而建立它自己的无產階級秩序呢？^①

上面已經談到农民如何被国家抛弃，土地改革如何在发放地契和援助生产者两方面停滯不前，农业經濟如何在听天由命，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落后状态。最后，还有其他的因素决定着土地改革的危机。

土地改革和工业发展

农业生产是同整个經濟的发展，首先是同工业的发展密切联

^① 在上面引用过的那个研究材料中，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提出了資產階級对生产下降的問題的某种程度的理解。它是这样說的：

虽然如此，耕种地区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并不能仅仅用不利的气候条件来完全解释。其他的因素在近年来的农业情况有着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首先必須指出迄今为止施行土地改革法令的錯誤方式。按照这一法令规定的数量分配土地的判決，以异乎寻常緩慢的速度在进行。造成这种緩慢情况的一些原因是：进行这种工作时缺乏經驗和組織，几乎完全没有測量人員，以及发给地契和分配土地的程序相对來說頗为复杂。由于这种情况的結果以及近几年来在这个国家内所存在的革命以后的那种很自然的动蕩的結果，在农村中已經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气氛，在以前的地主和新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好处的农民中間都是如此。前者被农民公开向他們表示的敌意吓坏了，农民侵占了他們的财产而且事实上不許他們再回到自己的田地上去了。他們即使能够回到自己的田地上去，也无法雇到雇工。在农民方面也感到不安全，因为他們并没有拿到合法的地契，害怕随时会失去现在判決归他們所有的土地。除此而外，他們并没有必要的技术上的和資金上的援助，好帮助他們有效地在他們新获得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由于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也由于缺乏面面俱到的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大部分原来由以前的地主直接耕种的土地现在实际上无人耕种，只是用来为农民的牲畜长草——这对土壤往往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繼續照旧耕种的土地是从前的小块土地——“份地”，目的主要是为这些土地自己的主人生产食物，只有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能拿到市場上去卖。这說明了近几年来在为城市供应粮食方面所发生的巨大的矛盾。換一句話說，玻利維亞农业那种仅能自給的性质甚至进一步加重了。

系着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以苏維埃国家初年的經驗为根据，认为工业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的提高两者之間的关系有着最大的重要性：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然而除非他們能通过交换农产品来取得所需要的工业品（这是說，用出卖农产品得来的錢来买工业品），农民是不肯提高生产的。

土地改革，由于使广大农民加入到貨幣經濟——市場中来，本来有可能为工业产品創造更大的需求。但是如果工业并不能滿足农民的希望，农业經濟就仍然只会自給自足，退居仅能維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經濟，并且降低它的购买能力。这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随着市場的收縮，工业生产就会下降，雇用的工人就会减少，滿足农村的程度甚至还要下降，——而农村也就会进一步退入到仅能自給的經濟。

玻利維亚的工业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滿足农民的需要，玻利維亚的工业生产在这方面也沒有最低限度堪称为根本計劃或者方針的东西。^①在第一个阶段（1952—1956年）通貨膨脹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損害，因为工业品的价格总是比农产品的价格涨得快。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1957年以后），通貨的稳定也並沒有使情况改善：城市消費者市場的急剧收縮和工业品价格的繼續上涨对农民經濟有着直接的打击。

同市場的关系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同市場的关系甚至比过去还要更加不稳

^① 工业生产只占国民总收入的9%。但是即使是它的发展有限，也沒有加以充分利用。举一个例子來說，虽然有的工厂倒閉，有的工厂减少生产，但是市場上却仍然存在对简单农具的迫切需要。民族工业并不生产这些农具，然而这却完全是它目前有能力生产的。

定。在过去，虽然地主取走了农民劳动的大部分产品，在城市和农村之間倒还由于地主的活動存在着一种传统的交換关系。地主在玻利維亞大部分农村中消失以后，这种联系也就归于消失，而没有另外一种同样集中化的联系者来代替他們的位置。小农經濟的分散性削弱了同全国市場的这种联系并且損害了生产。

除了农民們直接到城鎮的集市上去出賣自己的产品而外，还有中間商到产地来收购农民的产品。在这种市場活動方式中，农民得让中間商取走很大一笔赚头，后者轉卖给消費者时所收的价錢要高得多（虽然，农民从前到手的比例还要更小，因为地主把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况損害了生产者和消費者两方面的利益，使市場萎縮，对生产不利。^①

本来可以以組織合作社的办法来作为改善农民和市場关系的第一步，它既有利于农民自己的消費，也有利于农产品的銷售，但是政府却并不予以发展。

目前只成立了很有限的少数合作社。^②但是这种合作社大多并不是“合作社”而只是当时人們所說的“定額社”（“Cupera-

① 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的材料，美洲国家农业局在1956年5月所作的估計表明当时拉巴斯城桔子价格的成分如下：

	所占百分比
生产者	21
运输費用	15
批发商	22
市場半批发商	25
城市零售商	17
	100

② 据議員阿維拉說，在1957年大約有四百来个合作社，“其中只有三十多个可以称得上是合作社，其他的只是买卖机构，毫无組織，而且甚至根本没有学过合作社經營的原理。”

tivas”）。^① 政府給每一个正式登記注册的合作社发給各种消費品（如食糖，面粉，大米，托古犹〔一种粗棉布〕）的“定額”（“Cupo”），这种定額是按照美元同玻利維亞諾^② 的官定比价规定价格的。按照官价，一个美元折合一百九十个玻利維亞諾，而在黑市上却值六千和七千玻利維亞諾，最后竟达到一万二千玻利維亞諾。当然，这些合作社有許多只是存在于紙面上，目的只是为了要取得定額供应。就是在真正的合作社里，定額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起到使少数特权分子发财致富的作用，上述那些低价的消費品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能到达农民手里。

但是在通貨稳定以后，合作社运动也并没有能发展下去：症結之点在于这个运动是不能以上面来办的，只能动員农民，由他們自己發揮主动性来办。但是对农民是不能在一件事情上要他們起来而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又要把他們压下去的，而这正是所有資产阶级政府想玩的把戏。

政府和反动派想在政治上利用合作社，这也是妨碍真正的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他們在教士們的公开支持下，打算使合作社反对工会，使合作社运动成为抵銷农会运动的力量，最后以合作社运动来代替农会运动。农民們对这个以反对他們自卫和斗争的主要工具为目的的計劃当然要抵抗，結果就使得合作社声名扫地。

对 外 貿 易

另外一个直接对农业有影响的問題是它在农产品价格（虽然这些农产品并不是打算出口的）方面，在机器、肥料等等的进口方

① 这种文字游戏是从西班牙文“Cupo”这个字来的，意义相当于定額。

② 玻利維亞货币名。——譯者

面同世界市場的关系。

就价格而論，大量以低价美元买来的农产品的进口（如大米，小麦，馬鈴薯等等）固然对城市消費者有利（特别是对那些分配定額和外汇的人有利），对国内的生产者來說却是一种致命的竞争，使城市和农村难以建立正常的交换关系，促使耕地面积縮減，使农村經濟更加只能自顧自而整个国家更加依賴对外貿易。

就机器、肥料、农药等方面而論，耕作方式的原始性已經使国家对这方面投資甚少或者毫无投資的现象成为一种陈年痼疾。在1953年以前，农业机器进口的数量还不到資本貨物进口总值的5%，不到全部进口总值的1%（这是一个农业国啊！）。到1953年才算有了些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美洲国家农业局为开展工作而运进了一些机器，另一方面是因为同外国商行訂有合同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笔购貨。但是这些合同与其說会使农村机械化，不如說会使少数特权分子发财致富，因为，除开这些机器是高价买进，而且在許多情况下根本不能用之外，像拖拉机这样的东西通常是到不了从事生产的农民手里，而往往落到了某些“有势力的政客”手里，他們从中大賺其利。农村的机械化成了一場笑剧，原定用在这上面的美元全落入了私人的口袋。^①

通貨稳定以后，利用外汇官价牟利的事儿算是結束了。但是农业机械和农具的进口也被冻结了起来。虽然现在可以自由进口了，玻利維亚的外汇是由那些能进口在国内能銷售完的商品的进口商使用的，这也就是說，是由那些进口除粮食而外主要供富裕阶层消費的商品的进口商使用的。对于农民說来，一架拖拉机在过

^① 人为地定得很低的外汇官价也刺激了对各种貨物不按計划，不加区别濫行进口的现象。1956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现有設備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于缺乏备件和操縱这些設備的專門人員而无法使用。

去是一种幻想，在现在已成了无法实现的美梦。

在土地改革期間，生产的发展同对外貿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必须有对外貿易方面的国家垄断，由工农加以掌握，保証他們的財力首先要用在发展的需要上。沒有这种国家垄断，不論土地如何分配，农业生产都不可能发展。这是为玻利維亞的革命所証实了的又一項經驗。

对农业地区的投資

“土地改革要求增加农业方面的投資，不但在机器方面，而且也在道路、水利、教育和上面已經提到的許多其他方面。要是沒有这种投資，沒有地方的和国家的与之相平行的和成比例的发展的話，土地改革就会停滞不前。”

在生产仅能維持农民生活的那种农业中，在地主被赶出农村以后，是没有什么正常的儲备可以用于投資的。这种投資只能由国家来筹集、来供給。但是如果經濟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活动的話，如果資本积累仅限于私人来搞的話，如果命脉所系的信貸繼續控制在私人銀行手中的話，投資是到不了受到革命的震蕩的农村，到不了无力償清貸款的——尤其糟的是，甚至“在法律上”还没有占有自己的土地——的农民手中的。^①

由于“玻利維亞式”的土地改革，农业地区部分地逸出了通常的资本主义經濟活动的范围。资本主义和它的国家只有在重又能够自由买卖土地和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利潤的地方才肯投資。

^① 地主手里还有一定数量的貸款，不过这是他們目前不肯給予农民的。由于这个原因，玻利維亞农业貸款的数量一直很小。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估計，在1950年到1955年之間由农业銀行发放的貸款还合不到玻利維亞农牧产品总值的0.5%。后来設立了美洲国家农业局的抵押貸款，但是这种貸款总是优先給予圣大克卢斯的农业資本家，給予貧苦农民的只有极小一部分，而且还是附有政治条件的。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权执政头几年对农村地区和土地改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群众运动压力下采取的，它现在已轉而下定决心在农村中重建資本主义。这与其說是一項經濟的行动，不如說是一項政治的行动。格瓦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理論家。他打算提出一种唯一行得通而且适合于資本主义的方式：不是干脆地把土地退回給大庄园主，这已經办不到了，而是承认土地的分配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事实，可是又要开一条路容許农村产权重新集中到資本家的手中，再一次用“合法的”手段（法庭判决，抵押，占用，而在背后的是武装部队）从农民手里剝夺掉最肥沃的土地，并且維持中农和貧农这两个阶层为农村中的新主子供应廉价的人力。格瓦拉是反对“双重政权”、“农村无政府状态”、“农民堡垒”和“农村軍閥”的急先鋒。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种經濟行动。农民今天有力量，有决心也有武器来抵抗那些太明显的要把历史拉向后轉的企图。但是，农民的貧困、农村的凋蔽却是使农民泄气的因素，而政府也正在有意識地想使农民泄气。土地分割过小的情况和仅能維持农民自身生存的經濟不但使貧农連进行最低限度的資本积累都不可能，而且造成了使农民內部容易发生冲突的条件。

在一切落后国家內目前都是普遍的农村人力的巨大浪費，^①

① 但是在一个有着大量就业不充分的农民（更确切地說应当叫做乡村居民）的国家里，并不一定要用很大的資本投资才能使平均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的。

在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住在乡村中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人口实际上每年只工作一百五十天到二百天，这个事实不是就业不充分，又是什么呢？（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計划估計印度农业中的成年男人竟达到七千万人的惊人数字！）在一年中其他的时间里，他們就无事可干。如果能够在这些日子里給他們一点活干，让他們做一点无需大量固定設備的生产工作的話，他們的年生产量，因此也就是他們的年生产率就可以大大增加。实际上，虽然无活可干，他們也仍然要吃飯。只要給他們多吃一点儿，让他們去劳动，就可以使他們的增产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产品成为社会剩余产

在玻利維亞农村中不仅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不充分就业中所潜藏的积累基金”完全被浪费掉了。资产阶级政府要使农村在政治上**复員**,这是它最重要、最迫切、最紧急的要求,因此它不可能使它在经济上**动員**起来——远远谈不上这一点。它不但不知道怎样来做到这一点,不但没有必要的兴趣、手段和权威,而且它也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不相宜的。

地主們从革命的时候起就不再抽走相当大部分的农产品收入了(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已镇压了地主阶级)。尽管其他许多对农民**誅求迫害**的现象仍然存在(通过法官、官吏、警察、赋税、工会官僚等等表现的),比起过去来还是少了。

用这笔资金——且不提可以得到的其他的资金——就不但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可以发展一笔积累基金,它可以同由于把煤矿收归国有而集中到国家手里的收入一起用来发展经济。

“进步”资产阶级的失败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办法是通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管制来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使利益落入私人之手。政府以贷款的形式和异乎寻常便宜的外汇的形式转交给这种“资产阶级”的资金实际上主要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从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生产阶层搜刮来的。这个“资产阶级”在玻利維亞并没有一个稳妥可靠而有利可图的**投資場所**,在农村中更是

品,用作社会投资基金了。(见:盖尔曼著《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载《第四国际》第四期,1958年秋季。)

虽然在玻利維亞的人口问题还远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提出来,但是毫无疑问存在着农民的半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农民至少占人口的64%),这种情况由于国际货币基金强行要求稳定通货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而更加严重了。

沒有这样的地方。政府給与它的資金不是逃到了国外就是被用来进行投机。过去那种私人开矿的潮流繼續盛行，这使得玻利維亞竟然能儕身于“輸出資本”的国家之列。

这种資金在收归国有和集中起来以后本来是足以使工业和农业得以开始平衡发展的。然而事实却是：工业和农业并肩向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走向危机和生产的下降。

在玻利維亞，失败的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資本主义的**土地改革，是由資產階級国家所主办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失败而是一场危机。造成危机的是摆脱了資產階級控制的，由农民自己进行的农民革命同繼續存在的資本主义的国家政权和經濟結構两者之間的矛盾。农业危机是双重政权的危机在农村中的表现。

資本主义企图按照自己利益用**政治的和經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危机。我們下面就可以看到，这在今天就是成立工农联盟的基础。

V. 工农联盟: 它的基础和任务

“玻利維亞的經驗証明：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同資產階級的繼續存在是势不两立的。尽管土地改革就性质上說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时代落后国家内的土地改革发展的邏輯必然是反資本主义的。要不是成立工农政府，以政权来支持和发展农民革命，資產階級政府很快就会公开地或者隱蔽地同地主結成联盟对农民群众把土地改革进行下去的要求实行怠工。”

小資產階級政党和主张在落后国家发展資本主义的理論家們的幻想是：改革土地制度，在农村中消灭封建主义，把土地交給农

民，就会为工业形成一个国内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资产阶级建立基础。

但是“玻利维亚式”的土地改革的第一个后果并不是建立一个广大的市场（如果有发展的话，这要以后才能出现），而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力量，投资和积累的一个基础——同地主的联盟，地主对无偿的农民劳动的直接剥削。

“土地改革改变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一方面，由于农民群众实行武装动员，径自进行了土地改革（要不是如此的话，真正的土地改革，真正给农民分配土地是办不到的），无产阶级得到了一个力量强大而且完全行动起来的朋友。另一方面，地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消灭了，这就使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它——除帝国主义而外——最可靠的共同反对群众的盟友。”

“农民革命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帝国主义是它最后的最可靠的反对群众的同盟军。”

反之，农民革命，农民为取得和保卫土地而实行的武装动员，农民对四月革命中所产生的政权（农民认为它是保卫自己的胜利和自己的土地的）的支持，体现在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和群众行动中的工农联盟——这一切乃是维护革命的绝对的基础。

要是没有农民的武器，没有农会，没有他们同矿工和工人的工会之间事实上的联盟（尽管工会领导上对此实行怠工），一句话，要是没有双重政权的话，玻利维亚的革命早就会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力和打击屈服投降而失败了。

要是没有双重政权，而是在一个稳定的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论它可能多么“进步”和“民主”）之下的话，土地改革和革命，早就已经被摧毁了。

但是，反过来说，玻利维亚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每天都在客观上起着不利于土地改革的作用。

除非在土地改革之外，还同时采取其他以反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措施，土地改革就会仍然处于孤立状态而且受到封锁，而且会开始使群众感到失望而失去热情。虽然如此，这并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情：一个农业国家内武装了起来而且占得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阶级会表现出很大的抵抗能力，尽管他们并没有解决政权的问题，这种抵抗也会持续很多年，如果工会中也保持着（即使仅止于保持）无产阶级的基本团结和抵抗的话，就尤其是如此。

政权的问题

政权的问题成了农民革命能否胜利和国家工农业能否发展的关键问题。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使国家脱出其封建落后状态和使之发展资本主义的。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实物税》里面说，工人的政权是在落后国家内唯一能在工人的国家的监督和指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权。

托洛茨基在第二篇论《不断革命》的文章中也说过同样的话：

在资本主义迟迟没有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的理论意味着，它们的民主要求和民族解放只有靠代表被压迫的民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尤其是农民群众的专政才能全盘而有效地解决。

但是政权的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没有工农联盟，在一个落后国家内进行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是不可想像的。

工农联盟是拉丁美洲革命的基础。建立工农联盟的前提就是无产阶级号召进行并且亲身参加斗争，其纲领是实行土地改革，支持分配田地，号召农民起来斗争，争取建立工人政权，成立支持和保卫分田的工农政府。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评论》第9期的社论）

“这就是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工农联盟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玻利维亚，自从四月革命以来，在平分了土地和成立了双重政权的情况下，这个前提还需要以一项纲领来补充，这项纲领要让农民看到，已经开始的改革只有在工人政权之下，只有有一个从目前阶段过渡到工农政府的纲领，才有光明前途。”

在玻利维亚，后来在古巴，更后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出现的情况是，那里的群众运动的力量足以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永远办不到的——这种土地改革以双重政权或者双重政权的萌芽为支柱，然而却缺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或者这种领导很软弱，使得这种双重政权不能发展成为工人政权。成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但是有一种萌芽状态的工人政权与之同时并存，农民革命又动摇着它的基础，和它取得稳定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在形成群众的革命的工人的领导的过程中高度革命化的客观条件和十分落后的主观条件两者之间存在距离的典型结果。

工农联盟的基础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提出下面的问题：促成工农联盟的纲领是什么呢？还有，建立工人领导的纲领是什么呢？

农民不用很久就会看到土地改革并不是什么万应灵药。它被宣传成为一项根本措施，而群众也为之而动员了起来，但是它必须辅之以其他的措施，不然它就要垮台。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要有能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这是继续维持工农联盟的又一个条件。

当土地改革完成了一半的时候（土地大部分已经分配，但是其

他什么都没有做),农民要看到工人不但是以争取土地为中心的斗争的领导和保卫人,而且也是支持、指导和领导他们发展经济的人。农民是从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益来衡量工农联盟的成果和好处的。他们知道无产阶级可以保证反对大庄园主的复辟,因此而支持无产阶级。但是要他们再进一步反对要对土地改革中的危机负责任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就不够了。

工农联盟,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的话,不但要能抵抗大地主政权的公开复辟,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同资产阶级政府和他们对农民的影响进行斗争。把工农联盟提高到进行这种斗争的办法必须以当前的形势和当前的发展阶段为根据。

工农联盟并没有破裂,然而它已经衰退了。它现在只是作为一个进行抵抗,保卫已经赢得的果实的障线而维持着。它需要转变成向新的革命阵地前进的障线。

衰退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领导的政策,不论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有多大。它也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衰退,由于经济倒退到仅能维持农民自给的地步,由于对农民的需要忽视。政府很明白这些都是引向涣散的因素。他们利用工会上层领导无所作为,一味顺从,对农村不管不顾的态度,有意识地使得那里的情况更加严重。

在六年正式的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还没有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生产。他们已经发现光靠土地,不论有没有地契,是不够的。这并不是他们对土地改革原来的期望。

从现在起,工人运动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成为在计划方面和斗争方法方面的指导并且提供切实的帮助,来提高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它必须在实践中表明(那怕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只有工人和农民的政权才能保住农民的斗争果实并且改善他们的境况。如果从现在起工人运动表现出工人政权有方法,有可能提高农民

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話，已經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被爭取过来，而参加到爭取工人階級政权，反对資產階級政府的斗争中来。”

工人政权和土地改革

这并不仅仅是計劃的問題。計劃到处都有，就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也提出了为改善玻利維亞农村情况所要采取的措施。毋宁說，这是由誰来实行計劃的問題，由什么力量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計劃的問題。使农民作出决定的是实践而不光是計劃；綜合起来說，措施、方法和实行的力量就是綱領。

因此，这就是一个政权的問題：由誰来統治，为了誰的利益。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是不能从上面，从資產階級的国家落实到农业地区的。这个政权不論把計劃制定得多好，都不能动員力量来实行这些計劃。而——主要的一点是——它甚至并不打算这样做。

只有工人政权才能喚醒和动員这种主动精神，并且使它充分发展。工人政权同农民动員是并不矛盾的；相反，它为了政策的目的和經濟的目的都需要农民动員。資產階級政权是同农村的任何动員相矛盾的。它正在发动一項运动竭力想瓦解农民并且在政治上使农民涣散，它无法把他們动員起来搞生产。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沒有群众的动員和参加，生产是不可能提高的，更不用說农业生产了。

要实行发展农业的綱領，要使它同发展工业的綱領平衡地配合进行必須要有国家政权。只有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两个方面結合起来而不致有失去平衡和引起震动的危机。^①

^① 在落后国家内，主要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和从一开始起就采用商业的方法和

毫無疑問，只有在全拉丁美洲實現社會主義統一以後才肯定有可能配合協調地解決這些問題，要在每個國家內孤立地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階段，革命和奪取政權的鬥爭在每個國家有自己的規律和問題。

必須要有國家政權才能支配和確當地分配在一個落后國家內往往是很稀少的資本資源，才能組織和執行合乎發展需要的投資政策。沒有一項投資政策，沒有在投資方面輕重緩急的次序，綱領就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東西。這樣的一項政策，和這樣的一個次序只有處在國家政權的地位上才能制定。

最後，必須要有國家政權才能控制和使用信用貸款和對外貿易的資源，沒有這種資源，農業生產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這個政權必須以無產階級的民主為基礎才能保證群眾發揮其全部主動性和創造性，並且控制各經濟部門協調平衡的發展。

必須要有群眾的民主參加才能解決這個計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問題：工業從農業所接受的東西和它所給予農業的東西之間的平衡；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係；用於基本建設的基金和用於工資的基金之間的關係；國民收入的分配。無產階級民主，無論作為一種經濟上的刺激因素還是作為使計劃平衡發展的一個因素來說，都是必要的。（巴布洛：《過渡時期國家的經濟問題》，見《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社會主義》，第四國際版第 26 頁。）

實踐應當盡速用下列兩項補充措施使之臻於完成：高速度工業化的規劃；農業經濟的逐步集體化，特別是要與工業的能力相適應。（巴布洛 Michel Pablo：《過渡時期國家的經濟問題》，見《無產階級專政，民主，社會主義》，第四國際版第 22 頁。）

當然，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是靠被認為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的合作社來進行的，而是靠以普遍工業化為基礎的合作社來進行的。這也就是說，農業的技術進步和農業的社會主義發展是不能同工業在一個國家總的經濟中的主導作用的上升分開來的。（托洛茨基在《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書中所說的話，見上引巴布洛書第 23 頁。）

从 何 着 手

“但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应当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力量着手来取得政权？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工农联盟组织得如何？”

“可以在一个不那么高的基础上，那就是以农民的本身利益为基础，来建立工农联盟。为了重建工农联盟，必须把农民在这一阶段的利益为基础，那就是：确认农民取得土地的权利和农民的斗争果实；提高农民的生产，销售农民的产品并且使他们得到他们所要求从城市得到的东西。

“农民要能建立起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农民必须要看到工人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他们必须要看到工人能够在资产阶级政府对他们置之不顾的那些方面给他们以真正的帮助。

“工人运动必须组织对农民的政治上的保卫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进攻。它必须永远地、公开地做农民在城市里和矿山里的政治同盟军，同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农民的援助下，制止政府派遣军队去农村。

“但是工人运动也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表明自己是农民的经济利益的唯一坚强支柱，只有它才能使农民脱出目前的危机局面。因此它必须证明，农民眼前的个人经济利益和农民对成立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前景的支持和参加是一致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农民争取过来作为同盟军。建立这个同盟，不但是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阵地，而且也是为了向威胁着这些阵地的敌人——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主义——进军，并且把它们打败。”

必须在农会和(矿工,工厂工人,铁路工人,卡车司机的)工会

之間訂條約和協定，以便以农产品供应“零售店”^①，以成本的价格供应农民集市以工业品，为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提供便宜的运输条件。銀行雇員，举例來說，必須进行有关农民信貸要求的調查研究，并且通过自己的工会要求銀行发放这种貸款。工会、农会和大学学生会必須研究要以低的費用迅速提高生产，該在肥料、种籽、水利工程等方面作多少投資，并且制定投資的計劃，还要为国家的收入制定一个恰当的投資政策，这是在矿业公司和某些矿区(例如烏安尼)的工人监督机构已經开始初步做了的。农会，在大学人士、技术人員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必須推广和实行若干基本措施来增加生产。它們必須同工会一起保証农产品能以对农民有利的价格通过工矿区的零售店卖出去，而不必經過中間商。它們可以同大学教师工会和小学教师工会，采取措施来消除文盲，发展资产階級国家对之不感兴趣的教育事业，并且要求得到实行这一計劃的經費。反之，农村也应该保証支持教师們自己的要求，就像支持其他阶层一样。也可以考虑同石油工人、卫生工作者、建筑业工人、互助会等等采取同样的行动和訂立同样的協定。

工会必須起到經濟方面的基层政权的作用。它們即使有局限性，取得几次成功也会有很大的意义，并且将打开一条路，使得存在时期极长的双重政权向工人政权轉化。

这样，工人政权将繼續加强，繼續提高自己在双重政权中的地位，并且提高广大群众对自己和对工人政权的信心。

很明显，沒有国家政权，这种实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且不会对革命的問題提供全面的和持久的解决。但是，这种实验

① “Pulperias”，在字面上原来的意思是“公司商店”，几乎是唯一以低价供应食物、衣着和其他必需品的地方。甚至在国有化以后，它們也仍然可以被利用来以操纵价格和制造缺货等等办法来对工人施用压力，在偏僻的煤矿区尤其是如此。

所取得的成就，加上工人和农民之間的团结和在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将指明重建工农联盟为工人政权而斗争的道路。他们将表明工农政权可以有多人的力量，农民对这一点在实践中看到的要比在解释和一般宣传中看到的多得多。

工人的电台，矿工的电台，是广播和宣传工农团结的这种經驗的有价值的工具。农民需要工人告诉他们消息，需要工人有意識地去争取他们，同他们建立联盟。矿工的电台是打破农民的与世隔绝的状态的工具，是促使农民实行全国团结的工具，使农民同全国各地的阶级兄弟的斗争团结起来的工具。如果农民们知道他们可以听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奎丘阿語或者阿依馬腊語)广播的新聞和节目，矿工工会发起的供应全国各地农会和农民中心以无綫电收音机的运动将产生巨大的反响。电台的力量确实要比报纸大得多。

同时，工农联盟的中央机构玻利維亞总工会，应当在新的条件下为了新的任务而改組——不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附属物，或者作为一个同资产阶级政权談判的机构，而是作为它的敌人，作为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会、农会和民兵力量的集中者。

使农民在政治上脱离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它的政府的任务必須加速进行。工厂工人和矿工的每一次罢工都必須要求农民的支持，必須以这种支持来加强自己，这在今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須使作为各地区的中心机构的非常委员会重新活跃起来，使之成为工农联盟的基层机构，成为领导运动的机构，在一个地区成为集中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的机构。

工农联盟最后必須成立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和全国工人和农业劳工代表大会来保証，由之在全国推行工农联盟的政策。

“要再一次建立工农联盟并且执行它的綱領，要使革命脱离現

在所处的停滯状态,要利用现在震撼着农村的新的动員,要防止这种动員在混乱(这种混乱正在使多年来得不到出路的革命瓦解)中归于消失的話,就必须完成这些任务。”

要完成这些任务的前提和条件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充分和及时的参加,这种领导要作为重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中心和刺激一切革命力量的力量,而政府和它的官僚机构却正在竭力瓦解和破坏这一切革命力量。

VI. 革命政党和新的工人领导

需要新的领导

“全面重建工农联盟的斗争是同争取新的工农领导的斗争联系着的,无论在工会农会运动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目前的领导对这个联盟不感兴趣;事实上,这对它本身和它所属的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来说都是危险的。但是争取工农联盟的斗争是同争取新的工人领导的斗争同时并且是沿着同一条路前进的。因此,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革命工人党能否有意識地起这一作用是有决定性的。①”

革命政党的作用不但是同組織工农联盟以夺取政权的斗争分不开,而且也是同在取得政权以后維持政权,組織和发展生产,建立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工作分不开的。

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設如果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高度的自觉的参加是无法发展的。无产阶级民主給这种参加准备了条

① 參看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在 1959 年 3 月給革命工人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其中对本节的論点有更充分的闡述。本节就是根据那封公开信的基本論点写的。

件,但是要革命的政党来提出自觉的方针,讨论并且确定目标,为工人的先锋队争得,并且保证它得到指导这一进程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确保广大群众和他们的领导之间的密切联系。

农民问题比起任何其他的问题来,都更加是一个动员和唤醒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主人翁感觉的问题。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动员,就不可能弥合农村的历史的落后状况同我们时代的最高任务之间的差距。没有扎根在群众中的革命政党,这种动员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缺少了杠杆和工具。

革命政党的地位并不是在夺到政权以后的第一天从天上降到它身上的。这种地位是党自己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如果革命政党的干部不参加到各阶层的群众中去,参加到工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任务中去进行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这些干部不同群众中的各主要阶层一起参加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为了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为了建设工人的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工人党需要立即在目前阶段培养和发展这样的一批干部。

为了发展农民革命和工农联盟,需要培养一批农民干部,在农民集中的地方,在烏庫伦尼亚,在北波多西,在阿查卡契,在丘基薩卡等等地方扎下根子来。党需要建设它自己的农民组织,它的农民支部,在发展农民支部方面,矿工支部的支持和经验要起主要的作用,特别是要在矿区和农村中建立党正在努力加强的密切联系。

农民支部在全国和省級都必须以集中化的方式活动,举行自己的会议(像上次在烏庫伦尼亚开的会那样),出版自己的报纸,党的农民干部在下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争取农会的领导地位,以便他们可以在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其他机构的支持下,开始在实践中

中表明如何实施农村的过渡时期綱領，激励其他阶层的斗争，組成工农联盟。党在矿工工会中已經取得的领导地位，这种地位一定可以在农村中助成同样的过程。

党从少数几个工会和农会出发，在各个矿工的工会和农会中（也在其他阶层人民中）建立革命的領導以后，必須从这些有利地位发动一个复兴工农联盟的运动，把农会轉变为支持农民要求，解决农民問題的支柱，开始締結条約，組織联盟，給农民以实际援助，把某些过渡性措施，把綱領中的以及組織生产等方面的某些可以立即付諸实行之点付諸实行（即使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这些农会成为其他农会和农民中心可以效法的实际榜样。

这一政策将給予新的领导以极大的力量，即使它的基础在起初可能只是一个农会。它可以因此有利地利用今天由动员了起来的、准备好战斗的农民所代表的巨大力量。

革命工人党的机会

“其他的工人领导——斯大林主义，萊欽主义——已經完全抛弃了农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面前，它們已表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对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工人党来說，这是又一个有利条件，它已經表明自己是挺身而出在这一阶段来领导农民的斗争和解决农民的問題的唯一的政党。革命工人党要在农会中贏得地位，要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农民干部，可能性是极大的。

“革命工人党是当全体反动派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来对付北波多西的农民的时候，唯一支持北波多西农民的政党。革命工人党是唯一呼吁停止烏庫伦尼亚和克里扎之間的冲突，同时要求軍隊撤出农村，由工人运动来进行調解，召开一个农民會議来解决这个問題的政党。当其他的工人领导都退在后面并且响应政府对农民

使用暴力的行动的时候，革命工人党是唯一从最初的时刻起公开出面保卫阿查卡契的农民的政党。革命工人党通过它的传单、它的报纸和它在阿查卡契的代表所表明的方针，在支持农民的抵抗并且防止它由于混乱和缺乏方针尤其是由于孤立而趋于衰竭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革命工人党打破了政府包围和孤立阿查卡契农民的企图。”

烏庫伦尼亚的，克里扎的，丘基薩卡的、波多西的和阿查卡契的农民每一次都表现出他們听到了并且响应了革命工人党的号召和指导。现在沒有任何人可以从农民心目中抹煞在阿查卡契，在烏庫伦尼亚，在一切农民动员起来的地区所取得的成就。

革命工人党现在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組織和培养它的农民干部，去收获和利用所有这一切声望和权威，使自己变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要完成这一任务是有一切可能的。

“为建立革命的新的领导而进行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为重建工农联盟而进行的斗争的前提，两项斗争都要发展，要互相影响，来給玻利維亞的革命打开一个新的跃进的局面，給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新的彻底的打击，加强工会、农会和民兵的力量，把更广大的群众爭取过来为建立他們自己的国家政权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VII. 现阶段农民革命的綱領

甲、經濟問題

1) 把土地全部交給农民。承认农民对已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而不再經過什么司法程序。分配尙未分掉的大庄园的土地。

2) 把基本的耕种工具分配給农民，在不必付出大量資本投資的条件下，使耕作方法现代化。由工业来制造这些工具，以此来为

停工或半停工的地区(例如普拉卡育)提供就业机会。逐步推广拖拉机和其地农业机器。

3) 大量推广由国家在农会的合作和参加下选好的种籽。

4) 用同样方式大量推广自然肥料和化学肥料的使用,集約耕作和最有利地使用耕地,消除现在十分普遍的土地休耕期过长的现象。

5) 建設水利工程,打井,修排水渠,筑水壩,防洪,这些工作应由国家供給資本并且由农会組織农民以有償的劳动来进行。供应水泵,以供提水之用。

6) 发放大量的低利农貸,把农业銀行收归国有并且增加其資本額,在主要的农民中心設立分行,組成有工农代表参加的董事会。把私人銀行收归国有并且不予賠償,由工人加以监督,把它們的資金用于国家的需要。

7) 給农民以技术援助,技术人員归农会管轄。由工人国家向外国,特别是那些最近才实行了自己的土地改革的国家(中国,南斯拉夫等)邀請农业技术专家,还有計划专家。

8) 建設道路桥梁便利农产品到达市場,这项工作应由国家供給資本并且由农会組織农民以有償的劳动来进行。

9) 由工人国家請求外国貸款(以貨币或机器的形式)用来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拉巴斯的农民联合会已經請求苏联提供貸款来用于这一目的了)。

10) 按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成功的經驗,普遍发展生产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国家以技术人員和資金来帮助組織合作社。改組合作社理事部,取消它那整套不事生产的官僚机构,任命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担任这一工作。請工人国家派遣合作社专家予以援助。組織农民生产和銷售副业产品以充分利用

农闲时间。每季庄稼均由国家在播种前按照全国工会农会所制定的农业发展计划规定价格。取缔市场上的一切中间商。

12)① 由农会在专家帮助下制定包括上述各点在内的农业发展计划,它要能解决由于人口增长而土地愈形稀少的问题;移民垦殖计划(要由农民自愿接受,国家在他们落户的头几年要予以全力支持),农业技术改造计划(即使只是初步的),集约耕作计划,在农村公共工程(如上面所举出的)方面使用人力的计划,发展工业的计划。如每个省和县的农民和农会制定省和地方一级的简单的计划。农业发展的总计划必须同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和工业发展的计划相配合。

乙、社会问题

1) 由农民自己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诸如农会,委员会等等组织劳动和相互援助。

2) 按照上面已经说过的方式建设学校。

3) 消灭儿童和成年人中间的文盲。教他们读写自己的语文,奎丘阿语或者阿依马腊语,扩大小学教师的数量,改善他们的训练,提高他们的待遇。

4) 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在农民中心或者附近建设诊所和医院。展开宣传运动,教育人民基本卫生常识。

5) 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国家同农民合作来建设和改善他们的住房,他们的家庭用具,他们的饮食习惯等等,把工人在社会福利方面得到的果实,如社会保险,扩大到农村中。

6) 制止地方当局和官员对农民的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农会

① 原文缺(11)条。——译者

本身应当做这项工作，直接惩办那些要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

7) 解放农民妇女，吸收妇女加入农会，参加农会的生活和工作，参加农会的领导。在农会中成立农民妇女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妇女的问题。吸收妇女参加民兵，组织辅助部队和妇女营。

8) 反对在城市中和国家机构中的种族歧视和反农民的歧视，严厉惩办有这种歧视行为的人。

9) 由矿工电台在农会和农民中心的合作和协议下用奎丘阿语和阿依马腊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的教育。在每一个农会和区内设置农民电台和相当的收听设备。

丙、政治问题

1) 实行工会民主。工会独立于国家和执政党之外。

2) 反对农民领袖官僚化，反对农会违法乱纪、专权独裁和使用恐怖手段。

3) 通过农会和农民中心的正常活动发展农民的权力。农会和农民中心是每个区内最高的唯一的权力机关，解决一切问题。

4) 加强民兵，增加农民武装，按区集中指挥民兵，由基层民兵民主地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和军官。

5) 从农村中撤出任何军队，在可能被派赴农村作战的警备部队中进行宣传，号召士兵们对农民友爱，并且在一旦发生战斗时投向民兵方面。

6) 从农村和从国内驱逐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美洲国家农业局和美洲国家教育合作局。

7) 举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来讨论和批准目前阶段农民革命的纲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农民的力量来予以实施。

8) 工农联盟，通过工会对农民的纲领和农民的动员的支持，

通过农民对工人的动员和工人的要求的支持，以建立工农政权为最高目标以确保一切斗争果实。

9) 举行全国工农代表大会，讨论国家的和革命的一切问题，改组玻利维亚总工会，制定工农联盟的纲领，把它的决定作为革命的和群众的最高准则。

10) 以工会和农会和它们的民兵为基础建立工农政府，成为民主的权力机关，和全国劳动大众政府。

1959年10月

最新材料补遗

最近几个月来，玻利维亚的形势受到若干重大事件的影响。在本文写好(1959年12月)以后，不但农民的动员继续向前发展，工人们也对它们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重大的打击。看来是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有了使革命脱出被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领导人所给它造成的停滞状态的新的可能。

在这些事件中值得提出的有：

1. 由阿查卡契农民所发表的阿查卡契宣言，它有一系列纲领性论点是从革命工人党那里来的，而且是受到革命工人党的鼓励和启发的。

2. 乌安尼矿工民兵武装斗争的胜利，矿工起义反对工会机构。这个工会机构是由政府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格瓦拉)所建立的，它在本质上是恐怖主义的，而且是武装到牙齿的。这次起义得到了卡塔维-二十世纪的矿工民兵的支持，工人们得到了完全的胜利。

3. 维克托·巴斯·埃斯登索罗和胡安·莱钦在1960年2月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大会上宣布为下届总统选举(1960年6

月)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击败了以格瓦拉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所提出的候选人。

4. 1960年3月格瓦拉集团为反对巴斯-莱钦为总统候选人而发动的政变失败了,这场政变是由一批骑兵发动的,他们在同一批军队和工会民兵战斗了一天以后投降了。

上面所列举的事实到目前为止表明了同帝国主义联系最深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右翼的失败。巴斯-莱钦的候选人地位加强了,他们肯定可以博得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因为农民仍然希望巴斯·埃斯登索罗会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工人们也认为莱钦是自己的领袖,愿意见到他出任副总统。

但是,虽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可以这样维持一个时期的对群众的控制。这种控制也只能在同过去大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了。这是因为群众不但已经在对以西莱斯为首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政府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从上而来的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己赢得了胜利,因而加强了他们的自信,大大地增加了他们对执政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官方机构和独立性。

巴斯和莱钦出任候选人一举,虽然给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以某些喘息时间,也是对群众斗争的鼓励,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寡头统治集团,和巴斯·埃斯登索罗所怕的正是群众运动。正因为如此,右翼反对派才弄到要举行武装政变的地步;选举以前预料将一直不断会有新的压力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瓦拉集团政变的失败也意味着是鼓励群众斗争,削弱亲帝国主义倾向,削弱巴斯自己所起的对群众的牵制作用的又一个因素。

这些事件都是鼓励工人和农民继续进行斗争使革命脱出它目前所处的停顿状态的,因此,巴斯·埃斯登索罗在当选总统以后,

不可能对革命的深一层的问题提出什么解决办法。玻利维亚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起不了作用了，可是巴斯·埃斯登索罗在莱欽的帮助下，还想竭力保卫这个政权，使它免受群众的攻击。

所有关于土地改革，煤矿国有化，工人监督，提高劳苦大众生活水平等等的一切问题，在下一个时期都将以不同的程度更加尖锐地提到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面前来，这个运动虽然在选举中支持巴斯·埃斯登索罗，却已经具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而对自己的力量（它集中并且组织在群众性的工会和农会以及武装民兵中）有了很大的信心。

除此而外还必须加上鼓励群众运动发展的又一个因素，这里指的不但有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且有了古巴革命的具体榜样，这一革命在玻利维亚群众心目中有着极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将发现它——这一次是由它最后一点威望所寄的巴斯·埃斯登索罗和莱欽为代表——面临不可避免的危机。革命工人党应当置身于群众的前列，对群众在这一整个时期中所为之而动员起来的要求，以纲领和组织的形式提出一个答案，它只能在循着为争取实际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才能找到确实的解决。

由于资产阶级政权和它的“左派”（巴斯·埃斯登索罗-莱欽）没有能力对本文所提到的有关农民革命的一切问题提供最细微的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都将在下一个时期更加尖锐地提出来。

（《第四国际》编者注：本文第三部分由于本刊篇幅有限有相当大的删节。）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0年春季号和夏季号）

十五、关于古巴革命的性质

——第四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決議

(一) 革命前古巴的最显著的面貌,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的矛盾。工业发展是非常有限的,并且是服从帝国主义者的经济需要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一年一次收成的,而且直接受外国托辣斯的支配。失业的比重非常高,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没有被利用。群众一般是在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下生存。“民族”资产阶级是有限的,他们不能够作任何独立的发展,而且主要是寄生性和腐败无能的。政权是独裁的,并以残暴的镇压为基础,这里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保证或权利。

在目前的国际和拉丁美洲形势下,这一些基本的客观条件,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先锋队发动的革命行动来说显然是有利的。尽管在开头的时候碰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同马埃斯特拉山区贫农阶层的联系,却在运动的初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起草土地改革的纲领草案。在这些条件下,菲德尔派的先锋队就能够很快地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能够取得其他阶层劳动人民的支持而逐渐扩大他们的影响,能够在国内的一个地区中立足下来,并由此在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内准备了胜利的起义。基本上就是在世界上这一地区中前所未见的、一次非常强大的群众运动的诞生、发展和成熟,造成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失败,使首先反对帝国主义而后来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攻势有可能越来越扩大,并且成为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

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者企图实行这种侵略，以改变妨害他们利益的局势。

(二) 古巴革命到现在为止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菲德尔派运动初期时把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局限于“劝告执政者”以及用一小群人企图争取一部分军队以发动武装行动这一纲领之内，其后则发展为反对执政者的斗争，而主要的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以及越来越进步的农民的要求。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是第一次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土地改革。第三个阶段的高峰是在1960年夏季对帝国主义产业的致命打击，以及包括同年10月把本国资本家产业收归国有在内的国有化的起决定作用的浪潮。

在特定的政治方面，在第一阶段中，人民革命力量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代表们签订一个条约(1958年7月)。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以烏魯蒂亚为总统的一个有自由派-保守派分子参加的政府的成立(1959年1月)。最后发生了同上述这些人的无可避免的分裂，这一分裂主要是由宣布土地改革所引起的。

因此在前两个阶段中，古巴革命作为一个激进的反帝民主革命而发展起来，而在第三阶段中，它便实行转变到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不只消灭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而且消灭了本国资本家的产业。在政治领导方面，发展的形式远超过它的实质，因为甚至在取得政权后到烏魯蒂亚下台前的这个特殊的两重政权的时期内，真正的政权是在起义军和菲德尔派总部的手中。

如果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真正决心要打败敌人，实现它的根本目的，以及满足群众基本的經濟、政治和社会需要的話，它就必须具备一种永久的性质，而古巴革命给予这种性质以一个新的、显赫的証明。

(三) 在革命目前正在經歷的显然过渡性的时期中，古巴不再

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通过 1960 年 10 月国有化措施的实行，而成为一个工人的国家。这一个社会分析主要是以下列三个因素为根据的：

(1) 在实行把外国企业和财产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古巴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失去了政权，但仍旧保持它的经济地位，甚至革命后新的机构还容许它继续积累剩余价值。但是在 10 月 14 日政府的决定以后，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也被消灭。而资产阶级的产业——包括甘蔗种植园——在这个岛上实际上已不存在。不错，中等规模的和小的产业原则上继续存在，甚至享受某种援助。但是，特别在像古巴这样一个国家里，它们仅仅代表一种次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从社会分析的观点来看，它们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的。

(2) 土地改革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大概也不会，涉及农村地区的关系的真正社会化——因此在苏联和其他工人的国家都没有把它实现。但现在所谈的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措施，它消灭了帝国主义的财产和资本家的大地产，并建立了一个非常广大的和急速发展的合作机构。而且，国家以全国土改委员会为桥梁，完全有可能实行干预和统制，其办法是防止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新农业机构在现阶段上不可避免的矛盾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这些矛盾是：各个合作社经济上的差别；属于合作社社员的农民和非社员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实行合作农业机构的地区和个体农民产业继续存在的地区之间的裂缝，等等。）

(3) 国家在本质上建立了对外贸易方面的垄断，并能够以此作为手段来对经济生活起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在古巴这个国家，对外贸易一直在起，并继续在起极其重大的作用，所以这个措施是更加重要了。）

结果是，在古巴建立了一个具有特殊根源的和新型的工人国家。

(四) 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主要地被革命所摧毁，这特别表现在军事和警察镇压机器被摧毁这种形式上面。

然而，旧的机器还没有被符合新的所有权关系的新机器所代替，还没有被以工、农、兵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机构所代替，而这个严重缺点在现阶段中是革命的主要弱点。但是，在实质上，起义军——它的作用远非纯军事性的——和民兵以农民、工人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为基础，已经保证对机器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虽然是非常不够的革新。

另一方面，虽然存在着重要的官僚主义局限性，群众通过工会、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是选举的，不是委派的)、七月二十六日政治运动及其他政治集团，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群众参加巨大的集会和听取电视演讲等等，这些是群众动员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公民投票的民主”的形式，它虽然主要是温情主义的和充满危险的，但是比起革命前的政治条件来，它对群众还是具有具体作用的。

(五) 在实行基本的机构改革以前或以后实施的一系列的改革，证实了古巴革命的进步性质。这些改革，如在教育、房租和住宅方面，关于被剥夺继承权或没有地位的若干类人的生活条件方面的改革等等，具有一种真正的革命魄力，并且表示同过去的野蛮状况的完全分裂。

(六) 古巴革命有着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革命共有的特点，同时也有着这个国家(或这一类国家)本身特有的特点。

共同的特点是：(1) 农民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特别是已经接近于夺取政权；(2) 事实上，城市无产阶级虽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政

治和工会传统,但比起主要社会成分是农民的革命军队来,起着較小的决定性作用;(3)由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階級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

但是,要說明革命的胜利,必須考虑到若干特殊的因素:

(1)农民之所以能够起显然革命性的作用,主要不是因为他們在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古巴比起同类国家还小得多),而是因为他們的特殊的社会結構(农业工人的决定性的比重以及占有土地的小农的极端貧困)。还須补充一点:在古巴农村地区中,若干在历史上倒退的意識因素(如宗教的影响)只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起作用。

(2)在制糖工业中有相当大数量的工人,他們在农村地区工作,并同农民有許多联系,这在事实上有助于在农民和集中得多的无产階級核心之間建立联盟。

(3)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对最广大的群众阶层的反帝动力給予一种巨大的和爆发性的推动,同时残暴的巴蒂斯塔独裁統治則帮助了小資产階級甚至自由派資产階級若干阶层的动员。

最后,必須特別說明的是,虽然在推翻巴蒂斯塔方面,无产階級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但它在防止小資产階級或自由資产階級控制新政权方面的作用却是主要的,而且它容許革命的反帝和反資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所有这些因素会合在一起,使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还有一件事实是:本国資产階級极端脆弱和完全依賴帝国主义,同时在世界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不能够直接干預,来支持那些本身无法应付农民和工人群众强大运动的旧的統治階級。

(七)菲德尔派的领导,作为一个急进民主主义的总部而出现,它具有非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社会成分和意識,但它一开

始就同农民群众有联系，而后来，特别是在取得政权后则同无产阶级有联系。在像古巴那样的局势下，以及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它越来越遭受这些群众的影响，摆脱了小资产阶级和它甚至曾经与之订立暂时协定的保守派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远超出它所曾经想像的目标，因而经验主义地，然而大胆地使它自己适应于永久革命的逻辑。

甚至在估计菲德尔派领导的性质和作用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它与之联系的农民的激进性质。还有，在意识方面，虽然他们的理论被渗入了根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折衷主义（“人道主义”），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些直截了当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迅速地就表示对革命动力的一种清楚的政治觉悟。这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经验主义行动的消极面。

我们也一定不要过低估计了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菲德尔派的领导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由那些曾经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课程的人们所担任的。

（八）古巴革命在国内范围的重要意义是很大的，然而它并不局限于这方面。

1959—1960年的革命给帝国主义的声望以重大的打击，表明它已遭到严重的政治失败。这次革命有助于进一步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使之对资本主义不利。

这次革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群众运动的发展，注定要发生一次非常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它已经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这次革命使工人国家和殖民地革命之间事实上的联盟有可能进一步具体化起来。

(九)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运动,能够和必須从古巴的經驗中吸取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整个一系列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教訓。

第四国际必須掌握这样宝貴的一个时机,集中它全部注意力在这些問題上,以丰富它的理論遗产,同时它必須制訂出恰当的战略,以便当相类似的现象在同类結構的国家中在同样的局势下发生时,能够准备进行干預。

必須吸取特別有关下列各方面的教訓:进步的农民阶层在若干特殊的局势下所起的作用;作为反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的,具有主要属于农民的根据地的游击战的范围;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起的作用;农村地区中的合作化实验的急速普遍化;民兵的組織;以及革命軍队在某些特殊时期中、甚至在經濟組織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关于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在特殊的——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情况下如何誕生、培养、形成和走向成熟的問題。因为,在一个在許多方面都是嶄新的革命中,最新鮮的因素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权首次地被一个在领导上同传统的工人政党沒有联系,也沒有受苏联官僚主义影响的运动所推翻。

(十) 假如古巴革命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大地描写为历史性的話,它的繼續需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是巨大的。

在最近的将来,古巴必然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甚至軍事威胁。但除了可能进行的軍事防卫以外,革命的命运有賴于它是否能够保証国家首先以真正工业化为基础来实行調和的經濟发展。在政治方面,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結構必須从头建立起来。

革命目前正在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这是由于所获得的革命政治后果和已經完成的經濟进展,同时也由于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必須巩固这个地位,稳定地发展,并逐漸消灭遺留下

来的矛盾。

我們的古巴同志的任务，特别是要制訂一个詳細的、过渡性的綱領，以便向古巴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提出。

这里我們限于一般地着重提出下列各点：

(1) 革命必須肯定地取得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群众，以及在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援。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的根本責任，是在一切国家中发起和組織对古巴革命分子的各种形式的支援，其中包括鼓励派遣技术人員，成立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以及派遣志願队。

(2)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在各方面无論如何必須經歷困难的情况下，新的政权必須建立一种真正工人的和农民的民主制度，以保証工人和农民真正地和直接地执行政权并在經济管理上起領導作用，这样才能加强自己并成为不可动摇的。这样的无产阶级民主結構显明地同資本家的哀悼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毫无相似之处。

(3) 从工业化着眼的經济計劃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客观需要。如果沒有建立起一系列由技术人員、工人和农民組成的民主計劃机构，这是不能够实现的。

(4) 如果革命能够根据社会平等的精神避免任何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那么人民群众将毫不松懈地支持革命。必須避免將經济特权交还给一般行政人員、技术人員、政治、經济和軍事的領袖。

(5) 工人們有責任在革命的經济发展中忍受牺牲，但他們必須得到保証，充分保障他們的特殊利益。这就是說，他們必須保存工会組織的完全权利；只要工会保証自己在建設社会和保卫革命政权中同国家合作，它們必須保持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

(6) 所有接受新的革命法律义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政党、集

团和派別，必須保持組織和自由表达自己意見的權利。

在今后的革命阶段中，在工业化和經濟計劃的进程中，工人階級注定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一些灵活得多和較少僵化的經濟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客观上成为越来越大的需要。在这方面，工人階級的作用也是无法代替的。

这样，同时就有更大的需要和更有利的条件来建立一个能够克服經驗主义、局限性和目前領導的矛盾的、永久革命的馬克思主义領導。

这个革命政党的任务基本上将是保證革命在今后各个阶段中，有一个意識到革命的最終目的，并能够英明地选择过渡性的目标和选择适当手段的領導。

同时这个領導必須实行摧毁帝国主义和本国資本主义的最后痕迹，并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化的危險，这种危險今天虽然由于群众的动力而受到限制，但它在目前古巴那样的客观条件（落后的經濟地位、低下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从外面来的压力）下基本上是存在的。

这个革命政党必須进一步坚持成立“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合协会”的前景，作为真正解决地球上这一地区經濟和社会問題的办法，并在开头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联合会”在整个中美洲的战略任务，以作为动员群众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十六、保卫古巴革命

——智利革命工人党決議(1961年6月)

任何一个自认为馬克思主义政党或革命党的党都不能逃避确定古巴国家的性质的責任。我們智利革命工人党——它自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以来已經給了古巴革命以充分的支持——已就古巴国家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理論問題辯論了一个时期，这个问题的闡明可以导致重要而切实可行的行动口号。在我們大家看来，十分明白，在去年10月实行剝夺以后，古巴已不再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了。现在重要的事情是詳細說明这个已經出現的新型国家的內容。

我們強調“詳細說明”这几个字，因为各种馬克思主义傾向已用各种方式說明古巴国家的性质。有些說它是一个自成一类的工人国家，另一些說它是一个处在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或沒有任何限制条件的工人国家。我們暫且不提那些別有用心地談論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些資產階級政治流派；我們的目的是要作出真正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分析。

我們托洛茨基主义者由于下列理由认为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

(1) 因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生产資料和基本交換手段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已从帝国主义和民族資本家那里沒收过来无偿地轉入国家之手，这是客观上符合于工农的历史利益的一个步驟。

(2) 因为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务現在已經实现（驅逐了帝国主

义，实行了土地改革)，同时与社会主义任务平行的工作也已全面开始(集体耕种土地，没收工厂，垄断国内和对外贸易，建立了单一的国家银行)。

(3) 因为现在古巴已经开始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规划经济。

(4) 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一切上层建筑已破摧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为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军队和警察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法院已被清算而代之以人民法院；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消失；教育制度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改变，教会的有害的宣传已不再向青年人灌输。总之，一切事情表明，革命已经在古巴以其旺盛的气势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工人国家具有哪些特点？我们认为古巴这个工人国家现在还没有像列宁领导的 1917 年革命之后的俄国这样一个模范的工人国家的那些特点。在古巴，现在还缺乏这个模范的工人国家的一些决定性的要素：苏维埃或控制和管理全国一切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表现的工人委员会。另一方面，古巴也不是一个像俄国后来在斯大林的官僚政治支配下变成的那样的变了质的工人国家。所谓“变了质的”就意味着它曾经一度是好出身的。

古巴在巴蒂斯塔被推翻后并没有成立一个以苏维埃为基础的(像 1917 年的俄国那样的)工人政府，而发生了一个不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被清算了，但没有建立起工人的权力机关或工人委员会来管理全国的经济。甚至在 1961 年初成立的技术顾问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也不是从下面产生出来、而是从上面指派的，且还不曾起到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作用。

由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古巴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一个

国家之所以生来就是畸形的，主要是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我們衷心地希望这些将通过英雄的古巴人民群众的努力和創造精神而消失。但我們决不能让我們的希望把我們的眼睛蒙蔽起来使它看不到现实，甚至由于害怕把事情搞乱而像某些投降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使我們去奉行尾巴主义。援助古巴革命的最好的方法并不是閉起眼睛不去看它的缺点，而是勇敢地指出这些缺点，以便阻止反动派的进展，并找出克服这些缺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要作类比的話——这总是危险的——我們可以說，今天的古巴在性质上很像中国革命一开始取得的那种畸形的工人国家。它的性质和南斯拉夫革命更为接近。不同之处是，在古巴还没有形成重要的社会等級或官僚阶层。我們进行比较的是一些生来就带着某些畸形的工人国家。

正像我們承认某些缺点那样，我們也坚信古巴政府的性质是一个工农政府。我們认为国家和政府是有区别的。国家是整个民族，而政府則是这个国的政治领导。根据托洛茨基对这种政府所下的定义，我們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府是一个工农政府。到古巴能够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經濟的时候，我們才可以說它已成为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工农政府。

古巴是要在我們拉丁美洲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人国家和第一个工农政府。这是拉丁美洲革命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我們可以說，古巴革命正在拉丁美洲促成一种极像中国革命在五十年代里在亚洲造成的局面。

我們托洛茨基主义者毫不迟疑地贊成无条件支持古巴工人国家的胜利。正像我們主张保卫俄国、中国、南斯拉夫以及北朝鮮和越南等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一样，我們也主张保卫古巴。

我們支持古巴政府，但是批判地予以支持。我們支持它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支持它的抵禦帝国主义入侵、保卫祖国的行动。但是只要它沒有把工人委员会建立起来，只要它沒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外交政策，我們的支持是带批判性的支持。

我們认为，在国内方面，对古巴革命的最好的保証是迅速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将管理国家的整个經濟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还将通过真正起到工人議会的作用的常設工会全体委员会由群众选举和罢免来自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工人部长們和来自全国土改委员会的农民部长們。我們认为任何一个领导人的报酬都不应多于一个熟练工人，同时省、市政府应掌握在古巴工人联合会所属的工人委员会和古巴全国土改委员会所属的农民委员会的手里。

古巴革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共产党所得到的越来越大的控制权。它的从属于斯大林的“和平共处”的路綫和它的在一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观念可以使古巴革命脱离其余的拉丁美洲人民而孤立起来，并开始进入一个官僚主义化的危险过程。这方面的迹象明显地表现在大批外国专家的来到古巴和古巴共产党领导人所明白宣布的下列观点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能仿效古巴而必須走和平的議会道路。因此，我們必須支持一切企图組織馬克思主义革命党或按社会主义方向改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或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努力，以避免古巴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古巴革命提出了丰富革命理論的一些重要的新問題。在古巴，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一个沒有工人政党参与的社会革命。不但沒有馬克思主义革命党参与，甚至也沒有一个共产党参与。在中国、南斯拉夫等国的革命中，共产党为特殊环境所迫参与了革命，虽然使革命变成了畸形。但在古巴，甚至这样的情形也沒有发

生。革命是在没有一个工人政党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领导革命的是一个非馬克思主义的小資产階級政党——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这也許“吓坏了”不止一个认为古巴革命否定了革命理論的拙劣的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如果承认古巴革命在沒有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清算了資本主义，那末它就会面临可以危及它的威信的問題。在我們托洛茨基主义者看来，古巴革命并没有使不断革命的理論归于无效；恰恰相反，它証实了并丰富了这个理論。第一，因为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就必然得实现社会革命。第二，因为现实已經証明，在古巴那样的特殊环境下，可以在非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摧毁資本主义。这是例外，不是規律。但是，沒有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取得政权、清算資本主义，是一回事；沒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而保持政权、建設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另一回事。我們认为后者是不可能的，至少不无陷入各种畸形的危險。更加重要的是，古巴的現政府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时，发觉它自己不得不乞援于馬克思主义的整个武器庫，因为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时，沒有一个别的理論是有用的。总之，如果沒有一个革命的党，就沒有达到共产主义的保証。

城市改革的經驗乃是古巴革命对革命綱領的一項重要貢獻。这一政策在人民中間造成的影响使我們不得不把这一口号載入我們过渡时期的綱領。

古巴革命同样已經着重地指出农民在拉丁美洲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玻利維亞和危地馬拉的革命中靠着千百万农民的参加而发动起来的这个潮流，在古巴革命中获得了更加明确的意义。我們在这里更加明白地看到了革命可以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同时，这种现象可以在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中重演。这絲毫不是意味着否认无产階級在决定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处于举足輕重的地位。最

后，古巴革命在革命的軍事战略方面作出了一个巨大贡献——在拉丁美洲可以发挥游击战的作用。

古巴革命无疑地已经在阶级斗争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意味着打破了被帝国主义所强加的美洲内部系统，并且对美国本身也已发生影响，影响着在那边从事劳动的黑人和墨西哥工人。在拉丁美洲，它已引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且已加速了在资产阶级指导下的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的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群众支持的这些思潮(庇隆主义、瓦尔格主义、民主行动党、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等)明白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古巴革命充分证明了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实现。有人提出建议说，应该先争取民族解放，而在实现之后才开始进行社会革命，这样的建议是错误。主张采取像梯子那样的一系列步骤，无疑地就是背叛革命而开始和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古巴革命证实了第一次应用于拉丁美洲土地上的不断革命的理論。

对于像我们这样希望建立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结论是：古巴革命并没有加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却分散了这种运动，因为它使各种新兴力量、阶级和革命力量得到了自由。它使各种中立的政治组织开始分化。它已使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发生分裂并组成了左派革命运动，使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分裂、组成了叛逆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使巴西北部出现了一个农民协会的强有力的运动，使各社会主义政党中、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中、厄瓜多尔的使貝拉斯科·伊巴拉上台执政的运动(现在由阿劳育领导)中的左派壮大起来，促使墨西哥工农力图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使各国共产党频繁地发生变动，等等。

总之，我们相信，工人、农民和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先锋队现在

正在通过阶级斗争鼓动各种潮流（实质上是各种有力的革命倾向），并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作为能够有效地通过社会革命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的唯一阶层而出现。这些发展着的战斗潮流将形成摆脱各种陈腐的中立组织的窠臼、而归根到底会促成要一劳永逸地贯彻“古巴式”的革命潮流的运动。今天谁认为先锋队将再度经历像庇隆主义、瓦尔格主义等那种资产阶级运动的经验，谁就注定要成为拉丁美洲革命事件的一个单纯的旁观者。更坏的是，那些想为陈旧的民族解放理论的战略辩护的人实际上已转变成成为拉丁美洲革命的明目张胆的叛徒。

那些由于受到古巴革命的影响而得到解放的新的力量，为重新组合各种革命团体、独立的战斗党派、左翼倾向铺平了道路，虽然上述中立主义组织中发生了分裂。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是鼓励和发展所有这些战斗的和主观上的革命潮流，同时支持一切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拉丁美洲的现在和未来的阶级斗争的情势为一个有利于通过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这一不断使这个口号具体化的道路使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广大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机会。

智利革命工人党号召大家为保卫古巴革命而在智利展开有力的斗争。应立即在赞成不干涉主义、赞成各民族自决的各党派之间建立起一条统一战线来。拥护和保卫古巴革命委员会应采取主动并要求它所联系的社会团体组成士兵委员会和连队来保卫他们的古巴兄弟。智利工人统一工会应即拟订支持古巴的总罢工计划，以便在帝国主义对古巴发动另一次袭击的时候及时决定措施。迫切需要在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早日召开一个拉丁美洲工会会议。智利革命工人党同时建议，作为一个具体措施，组织一个所有支持古巴革命的政治派别的拉丁美洲会议，以便制定一个全拉丁

美洲的广泛的反帝政治統一战綫，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速各国的革命，这是真正保卫光荣的古巴革命的唯一方法。

《国际社会主义評論》編輯部按語

古巴革命已成为全世界激进运动所最为关心的問題。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这个小小的島国对待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可怕的强国企图残酷地从經濟上、外交上和軍事上来粉碎新政府并根本摧毁其成就的努力所采取的英勇、壮烈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态度，但也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人們都觉得这个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鮮明和自然，說明了新的一代和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历史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即将出现。的确，如果我們稍稍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人类命定要遇到的最大的社会变革之一——拉丁美洲全洲规模的革命——已經开始。古巴革命就是它的序幕。

保卫古巴革命就是保卫拉丁美洲革命的开端。这同时意味着：保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扩大已經在古巴开始了的事业；也就是保証这一經濟的、社会的新秩序的正常发展，使它的直接利益及其所开辟的伟大前途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因而也是整个西半球人民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从这一点看，古巴似乎是一个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和研究的榜样。当然，对彻底的革命者說来，分析仅仅是在原則上决定对一切关键性問題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因此，保卫古巴革命这一巨大的实际工作显然是理論工作，因为从古巴的經驗中得出的教訓，只有当它們和革命理論的主要部分、即和无数战士与人类中头脑最清醒的人多年来所积聚并加以总结的丰富經驗相結合起来之后才有价值，才为人所賞識并在政治上加以运用。

古巴革命虽然它的行动显然十分单纯朴质，但它提出了一些异常难以解决的理論問題。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各色各样的解决办法和許多不同的意見。当然，其中有些反映了理論家的不够成熟。可是，除此之外，古巴革命的确作出了难以評价的真正的新发展。

古巴领导人本身对于他們革命的理論还没有作出过重大的貢獻。他們坚决地說，他們基本上是实际行动者，还得多多学习理論。十分明显，其中最杰出者，虽然已經像今天世界上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熟悉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都在重新学习像列宁那样的人物的著作，并把从革命本身中得到的丰富經驗帶到他們的学习中去。我們終于可望从他們那里得到重要的貢獻，这种貢獻正是对古巴革命的成熟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判断的集体努力的一部分。古巴革命使全世界各种托洛茨基主义派別感到万分高兴，主要因为它启示了帝国主义的衰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潜力，同时因为它鮮明地确认了不断革命論的真实性。古巴革命的主要道路是托洛茨基早在 1905 年时就已制定了的！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別有理由对古巴革命感到高兴。上面刊載的智利革命工人党的決議說明了他們的反应。我們知道，他們是作为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榜样的古巴的无条件的支持者。

他們对古巴革命的研究使他們強調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軍的农民的重要性、組織游击队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把土地改革的口号和城市改革的口号相互結合起来的重要性。特別重要的是他們就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影响的評价，以及对重新組織有革命思想的战士的令人鼓舞的前途的估計。

我們同意這一決議的主要結論，即古巴已成為一個工人國家，於1960年8月至10月間在經濟的各主要部門中推翻了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關係。可是我們對於各種提法和論點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我們認為是十分重要而必須詳細加以說明的。

例如，我們認為用“畸形的”來說明這個工人國家的種類是不妥當的。這一形容詞首先用於蘇維埃所有制關係的擴展到東歐的問題上，然後應用於南斯拉夫和中國。這一稱呼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特別對發生了強有力的獨立的革命的南斯拉夫和中國是如此，但它確實有助於說明它們的領導是在斯大林主義中教育出來的，同時它一開始就促成了一個有特權的官僚階級的成長，更不必說它的對官僚政治的偏愛了。

在古巴，革命乖離了斯大林主義而使一個有多得多的革命思想的領導執掌了政權，這個領導雖有一些錯誤，但它在革命過程中已經證明它能夠按照革命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這個領導的傾向顯然是民主的，不是反民主的。把古巴叫做“畸形的”工人國家就是詆毀它是一個與在斯大林分子領導下沒有什麼不同的系統化了的官僚機構。但是這種情況迄未發生，它究竟會不會發生還有待於我們去了解。最後結果將決定於不在古巴領導人控制下的各種世界力量。在防止古巴革命的官僚主義化的鬥爭中，我們覺得卡斯特羅的領導是站在無產階級民主方面的。如果用社會主義工人黨所用的下列生動的話來說，看來要更為正確一些：“還缺乏無產階級民主統治形式的”一個工人國家。我們認為，這句話的內容接近於革命工人黨賦予“畸形的”這個詞的意義。它有表明問題尚未解決的優點。

我們覺得，認為古巴人民社會黨（共產黨）有可能把革命的領導權奪過來、從而使革命官僚主義化的估計是過高的估計。我們

承认，有些旧时代的共产党领袖的确代表某种危险，因为按他们的派别来说，他们喜欢滥用职权，并利用它来谋取派别的私利而毫不躊躇地来贯彻最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古巴现在完全依靠着来自苏维埃各国的物质援助，这种援助使这样的人物据有不适当的重要地位。甚至很可能整个卡斯特罗领导集团，出于对苏联的感激或他们所说的政治上的必要，在这方面作出不正当的让步。

可是，古巴革命中主要的事实仍然是有作用的——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时，革命乖离了斯大林主义。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都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是致力于最高解放目标的革命者。他们是古巴人民所尊敬的人，而且确实值得尊敬。斯大林主义的潮流依靠本身的力量改变不了这个情况，即使它蛮勇得试图这样做。

此外，共产党容易受到革命的压力。不管它的某些领袖是多么厚颜无耻，普通党员对古巴革命所采取的道路，对革命的主要领袖所提出的指导，当然是共鸣的。由于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进行揭发那样的事件而已经开始行动起来的那种想打破斯大林传统的企图，已经由于古巴发生的一切事情而大大地得到加强。

至于来自苏维埃各国的专家，他们当然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他们的才能，整个说来乃是物质援助的一个必要部分。必须注意，这并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过程。派到苏维埃各国去的一些古巴代表团都被灌满了革命热情。这些代表团所受到的盛大的接待是衡量他们被苏联群众所欢迎的程度的标尺和说明古巴革命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得到完全同情的反响的标志。

当然有历史上的正当理由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使革命工人党主张加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作为对共产党的抵消力量。在我们看来，更大的问题似乎在于组织一个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来加强从政治上保卫革命的工作。但这就要求党派的分歧处于从属地位。

在古巴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将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一种倾向都应包括在内，且都赋有参与党内生活的充分权利。如果各种倾向的权利都应受到尊重，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把现在的共产党排斥在外呢？

至于古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认为他们当然会为这样一个发展而欢呼，并且作为党的完全忠诚的缔造者而参与这一工作。

卡斯特罗等领导者当然会被选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证明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并且适宜于担任这一工作，因而我们认为每一个古巴的革命者都会对他们投信任票。他们率先创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有能力领导古巴革命的明证。

从上面所说的话可以明白地看出，我们对卡斯特罗政府的要求要比对革命工人党的要求宽得多。我们认为上层领导人做得非常好，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那种方式。这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后可以利用的一个历史榜样。在古巴已经得到证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即使有最真诚、恳切的意向也是不够的——如果你真正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命运的话，那就必须越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走向社会主义！

的确，工人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同意革命工人党的看法，即工人委员会的出现将使古巴革命极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俄国革命。显然，这将大大地便于保卫古巴革命，因此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它的出现。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

法可能和革命工人党不同——古巴正在向这个方向进展。

我們不想詳細說明我們心目中无产階級民主應該在古巴采取的形式。首先,这是一个要由古巴人民来决定的問題。第二,他們已經把无产階級民主巧妙地發揮到这种程度,他們可以很好地走上新的形式。我們抱着热切的兴趣等待着他們制定出卡斯特罗曾在公开的演說中提到过的社会主义宪法。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第一次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中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出現的工人委員會,在当时也是沒有預見到的新东西。它是革命本身的产物。已經給了我們这样多的新东西的古巴革命,可能也会在这里給予我們某种新的东西。

我們願意用表示我們和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團結一致來結束这篇文章。古巴革命已經為他們打开了宏伟的新的前景。作为議事日程上的第一項,我們在竭尽全力来保卫古巴革命这一伟大的拉丁美洲革命的宏伟的开端方面,是和他們完全一致的。

十七、給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

——巴布洛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亲爱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同志们：

我现在在我的牢房给你们写信，我已经在这儿被囚了十三个月，一直在等待法院的判决，而法院现在才审理桑坦同志和我的案件，我们俩被控告干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罪恶”活动。

最近，我在这儿接连读了两本很好的书，非常满意，一本是赖特·米尔斯著的《听着，美国佬》^①，一本是胡伯曼和斯维济合著的《古巴，一个革命的剖视》^②。

重要的是，迄今论述古巴革命的最出色的书都是美国人写的。

关于古巴革命的历史性意义，美国自由派的一些知识分子或社会主义左派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我认为，它的历史性意义的另一证明是：古巴革命不仅是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从历史角度来讲，也是北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言以蔽之，是伟大的泛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这一情况已经说明古巴革命的重要性和动力是多么大了。

第四国际是最早一批认识到英勇的7月26日运动与巴蒂斯塔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动力的，也是最早一批随时注意、了解并

① C. Wright Mills: Listen Yankee.

② L. Huberman and P. M. Sweezy: Cuba,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欢迎古巴永久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胜利阶段的。

在全世界劳苦群众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工人中間宣传并保卫古巴革命，过去是，今后仍然是第四国际的一项基本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們的战士们已經付出了他們全部的旺盛的革命精力。

这就是我坦率給你們写信的原因，我是下面这样一个組織的成員，这个組織在历史上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經驗准备毫不躊躇地和全面地了解古巴革命，并且将全力地和无条件地手持武器保卫古巴革命，反击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

根据我被捕前对你本人和7月26日运动的了解、对你如何領導人民与血腥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进行英勇斗争的了解、对革命第一批胜利的了解，以及根据我被捕后对革命进程所了解的一切，我深深相信，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具有高度智慧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領袖。就你目前已經完成的和你正在进行的工作来看，你的确是伟大的革命者之一，像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并且在某些方面来讲还有革命的南斯拉夫人和中国人那样，知道如何以创造性的和高度革命的方式来发现、吸收、解释并发展馬克思主义。

因为，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根据經典作品干燥而死板地规定一些教条和条文，以机会主义的或愚蠢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人一旦掌权就把馬克思主义制度化，以便使国家的全部实施和他們所代表的官僚主义阶层的利益合法化，像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情况就是这样。

馬克思主义是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的社会知識和革命行动的灵活而公开的方式，它不排斥在任何地方所获得的真理，并經常得到永世新穎的和无双的革命实践的创造性經驗

来丰富自己。

我个人非常羡慕和欣赏革命的和反教条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具有一种很独特的体系，你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就曾使用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重要的基本问题。那就是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与巴蒂斯塔进行武装斗争时，你曾依靠贫农，依靠你对建立游击队、使游击队与革命农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打成一片的深刻认识，这种方式对全拉丁美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道路一定能克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仍然存在的死板的和宗派的偏见，那些人实际上低估了以革命农民为基础、为达到下列目的而组织游击队的巨大重要性：发动武装斗争反抗亲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步步加强这一斗争、鼓励和推动城市无产阶级并使他们更加接近革命的农民。

整个拉丁美洲要向古巴革命吸取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你在这方面依靠革命农民的支持和力量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这一范例可能指导拉丁美洲的各个革命力量，其中有些至少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已经堕入了无尽无休的机会主义策略，寻求一种据说是有“革命”性的臆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指望联合它，甚而依靠它来领导。他们应该放弃这种想法，从农民或无土地的农民那里寻找巨大的革命力量，依靠他们并坚决抛开资产阶级的犹疑性，用巨大勇气热情地投入真正的组织工作和包括游击队在内的革命行动。

古巴革命从马埃斯特腊山到哈瓦那的胜利进军，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至于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进军，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已经完全改变了。革命正从包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区

域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的中心,和最后,向美国的帝国主义堡垒挺进。这样,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就能在一个整个时期主要依靠农民的形势下开始并前进,因为这些农民可以推动和支持无产阶级在城市的斗争,在那些城市里具有敌人的主要的和装备齐全的力量。

当然,每个国家的特点都会影响革命的发展,并且给它加上一种独特的性质,跟其他一些因素一起影响着联合城乡、共同斗争的方式。

但是,进程的特点只有依靠古巴革命的总背景才能了解,至少对所有被帝国主义控制并具有同类阶级结构和地理特点的国家是如此。

我个人也同样羡慕你在初期不可避免的三个阶段解决国家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问题时所采取的办法。

我所指的是,你在发展经济所规定的方向和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

赖特·米尔斯等人曾肯定说,你根本不想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古巴经济,从而片面地长期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且几乎是绝对发展重工业,而是想建立一个主要供应世界市场需求的经济并且依靠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保持均等的和和谐的比例;如果赖特·米尔斯等人所肯定的是真实的话,那末毫无疑问,你所采取的道路就是正确无误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革命的政治演进来说,尤其重要。

这样一个方向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能够立即给古巴农民和工人群众带来好处,的确能够适度地但是经常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牺牲目前积极一代的利益,使将来的一代去享受。

这样的方向还意味着,可以建立一种和谐的经济,可以避免苏

联目前还存在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严重失调现象。

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比例的平衡不仅意味着可以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从而显示出国家在政治上的健康发展；而且还意味着可以避免在将来某一阶段在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发生“瓶颈”现象以及“瓶颈”现象带来的许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从而可以显示出国家在经济上的健康发展。

你好像已经完全认清了古巴发展那样一种经济的重要性，这对革命所产生的政权的演进是非常重要的。

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关于创立和推行合作社的办法，也同样是重要的。

合作社的农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合作社的一员，他们都卓有成效地参与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并且能够分享企业的部分盈余；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而且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全国各处，工人和直接生产者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加组织并管理国家国有化的和计划化的经济，并且不再把自己看成只是为一个抽象的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效劳的工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权的将来演进，是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还认真地注意到，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中对你肯定的另外几个问题：即你对于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结构和执行、对于文化的自由和发展、对于消灭文盲的斗争、对于儿童教育等等所表示的关切和思想。

所有这些极其鲜明地使人感到形势十分美好，而且符合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明思想的最高传统。

从刚才作为思想和第一批成就所提出的来看，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古巴革命将很快地找出家庭和私生活必需品与积极的社

会集体生活中必要的化一之間的正确差距，使妇女从笨重的家庭負担中解放出来、提倡节制生育、甚而推广越来越被自願接受的明智的优生学从而提高人类物质的质量，使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从一切官僚主义的干涉和一切偏见中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措施在各个阶段执行时，都将发生躊躇、甚而錯誤，发生迂迴和退却等现象(因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方法，任何一本书都沒有规定过)，这要决定于群众已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以及国家是否被官僚主义所削弱。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強調一下。使国家具有真正的民主結構并防止官僚主义浸蝕变质(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国革命在取得政权并在本国原来的社会和經濟結構上进行基本的社会改革以后的关键問題。

古巴革命仍然由取得政权的革命軍队的领导人所指导。

直到目前为止，这是历史上唯一无二的情形，因为在这里夺取政权以及发起一个实质上是无产階級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在沒有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和苏維埃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的。

从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时代中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股新动力，即世界建立的新均势的結果。

党的角色已經由革命軍队的角色所代替，苏維埃的角色已由斗争和斗争中的事件所形成的不同机构的角色所代替。

不过，目前的問題是，在某种意义上來說，制定革命的國家的新机器的結構。

一个政党当然是必要的；以苏維埃为基础的，也就是說以由掌握了真正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群众所选举的机构为基础的国家結構也是必要的。

这些机构的形式将由每个革命的特殊經驗和每一形势的特殊

性质来决定。

看来，你好像已经从事创造一个单一的党，它的组织自然是以7月26日的历史性运动和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军队为基础。

这的确是巩固和行使革命政权中的一大步。

这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它将扮演何种角色呢？我认为它将坚决扮演成一个伟大的、高度民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像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

如果这个党具备了那种条件并允许党内自由对待意识形态的倾向，就像列宁时代那样，那末，这个党将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无限信任，并且能够事实上在实践中成为唯一生存的党，即单一党。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倾向可能发生的冲突将清楚地成为劳苦群众不同阶层的利益和希望的反映。

如果这种实际的政治垄断的可行，事实上不是完全决定于群众对这个党的信任，而是决定于官僚主义对国家的统治，那末，就有必要立即宣布，每一个处于本国社会主义宪法范围内并坚持革命的經濟、社会和政治成果的党都有权存在。

其他政党拥有如此解释的这种存在权利，乃是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关键。

因为这种权利不仅证明人民对于单一党的自发的信任是真实的，而且还证明群众选出的构成新的国家机器结构的各个机构具有真正的民主性也是真实的。

如果不仅在地方上允许自由行使不同的政治倾向，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允许自由行使不同政治倾向并且具有进行组织的权利，那末在苏维埃，国民议会等等机构里，就只能有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一个自由的政治生活，就既不能有政党，也不能有国家政

治机构。

自由的政治生活意味着，自由对待不同的政治倾向。

革命在取得政权后所潜伏的最大危险，首先在物质和文化水平低下的国家里，是革命党和国家迅速的官僚主义化。

当革命受到敌人四面夹攻而处于极端危险的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掌握政权后所建成的还不巩固的革命政权，可能被迫在一个极短的时期里中止正常地行使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在实践中形成党对群众的专政，甚而党对党、对群众的专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实际就会葬送革命。

就在这种意义下，可以理解苏联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干涉时期所发生的一切。

就在这种意义下，列宁和托洛茨基说明了，他们一直认为特殊的、反常的和暂时的一些措施是正当的。

因为这个原故，我不同意，伊萨克·多依彻（Isaac Deutscher）在其著作中对托洛茨基所下的一些结论；从其他方面来讲，他那本书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因此我曾以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读完了它。

列宁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把政权被迫采用的（在极特殊情况下采用的）那些反民主的措施概括为一般准则，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作品中阐述的民主思想以及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民主思想。

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以归纳方式对国家的某些实践作理论阐述，却公开说过，那是一个临时的、特殊的措施的问题，甚至是退却的问题，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也并不是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

我们不应当忘记，第一个指出官僚主义化极端危险性的以及

早期对这种危险展开斗争并对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代表这种危险的人展开斗争的，也是列宁。

毫无疑问，只有实际提高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才是最最终克服歪风、甚而是克服革命成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堕落的有效药方。

因此，从一开始就制定一项旨在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合理的经济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这样可以防止农民顽强反对政权。苏联三十年来不平衡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及粗暴地和强制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就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一个以低价满足农民需要的市场。欧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南斯拉夫除外——的情况也同样是这样，他们的轻工业发展情况过于落后，他们采取了注定失败的实验道路，没有充足的技术和经济基地而强行农业集体化。

当然，国内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解体、帝国主义的经済封锁以及军事负担，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并且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军事装备给工人和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但是，不应当发生的是，由于错误和官僚主义的惊人浪费增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不利条件，这种官僚主义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加上群众没有对越来越脱离群众的国家机器进行有效的控制，势必有所发展。

必须从一开始就大力抵制这种危险，防止革命建立的政权由于单一党、甚而党的领导对党和群众的专政堕落成官僚主义对群众采取波拿巴式的专政。

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是不可能的，那就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是持相反态度的。

那末，目前必须考虑并参与所有那些能够保持革命军队民主性和革命建立的国家的民主性的措施。

官僚主义的偏差在整个过渡时期，即群众物质缺乏和文化水

平低落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有可能有成效地控制这些偏差,有可能利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防止他们进攻国家和控制国家。

我个人长期以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在掌握政权以后的决定性时期,革命政党与群众选出的机构密切合作来直接掌权是几乎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必须严肃认真地争取这样一个局面:政权一经巩固,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在另一方面,一经变得明显和严重,党就能够毅然使自己与国家机器、与政府脱开。

党首先应当关心使群众和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保持忠诚,党应当坚持自己的最后目标,走应当走的路,在原则方面不妥协,永远把全部真相告诉群众。

这样,党就不会与官僚主义浸蚀的国家混为一体,虽然,国家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即革命的产品,保卫着革命的经济社会基础。

这种国家的政策,就其性质而言,只能是实验的,迁就当前的一些问题,充满妥协和退却,与其他国家来往采取俗套用语,采取一种基本上常常是机会主义的政策。

党不应当依附这种政策,也不应当无保留地或无批评地全力支持它。党特别不应当在理论上把这种政策描绘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和社会主义的实际的真正范例。采取那种道路,就像苏联的斯大林那样,党就将被国家所左右,马克思主义就要庸俗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群众就会大为受骗。看到下边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党同工人的国家建立关系,尤如同工会建立关系一样,办法是同群众及其用民主方式建立的、国家赖以为基础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在群众的协助下把国家管得更加有条不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形成党的最高精神支柱的党内重要领

领导人分开,与全国主要领导人分开,就可以大大鼓励群众学习控制和管理工人的国家。

至于新的国家机器所依靠的群众机构,那是不能随便规定的。这些机构要根据每个革命和每个国家的特点来建立。但是,在实质上,它们只能采取民主方式来选举,作为一种苏维埃或代表大会或两者合一的形式,使全体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可能时轮流行使政权,这样,絕大多数的公民就可以学习控制和管理国家。

我个人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①的影响,这本书是我在獄中閱讀的,书中有許多高度民主的特点,說明了公元前四世紀的雅典民主制。

当然,这种民主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限于一些自由民享受。但重要的是,如何使这部分人行使民主,虽然我們时代是可以机器代替奴隶的时代。在这种安排中特别突出的是:推行人民大会制度,参加城市参政会和法院的人有許多是市民以及采取抽签办法使市民担負大部分行政职务。

社会主义民主不必抄袭这些古代制度,因为雅典民主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是絕无仅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只能在下列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它不跟一种抽象的官僚主义国家混为一体,脱离生产者和公民,而是跟大多数公民組織融合在一起。

古巴革命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革命領袖的气质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种与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化斗争的非常可靠的乐观主义。

古巴革命的全国組織是一个还不甚发达的小国的組織。

但是,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特别是对于拉丁美洲,甚而北美

① Aristotle: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

洲的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

古巴革命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它的成功没有经受到（至少比较起来说）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革命所遭受的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掠夺。

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以及所有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集团的存在和力量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帝国主义的經濟封锁无法施展往日的威力了。

这些国家所给的經濟援助，包括苏联和中国的軍事援助在内的帮助，已经证明，对于古巴革命的巩固和生存是极为重要的。

在另一方面，古巴革命还从近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得到了好处，这些国家是提高古巴群众整个文明的重要因素。

由此看来，在古巴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物质潜力和文化设施已经有了高度的和有希望的水平。

为了古巴群众和世界群众的利益，这次革命的領導肩负着巧于利用这些机会的重大历史任务。

你是充分了解这一点的（这可以从不止一件事上看到）：你的言論、你的政策和你的行动都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你在这方面是正确的。

你在解决下列这些问题时的作法和政策，不仅被古巴群众热情地注视着，而且被美洲各大陆和全世界千百万人热情地注视着，这些问题是：經濟方向的规定、土地问题的解决、新的国家制度的制定、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使、享受文化自由的方式、房屋和城市的建造、俘虏的待遇以及许多较小的事情。

你在历史面前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也就在这里。

古巴革命，不管在哪一领域，每走一步，都响遍全球。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曾说过，从历史角度来讲，我认为，古巴革命不仅意味着拉丁美洲革命的开端，而且意味着北美洲革命的开端。

我深深相信，古巴革命的胜利、存在和巩固所引起的革命影响已经深远而且将日益增长，特别是对于美国黑人少数民族群众、在美国的波多黎各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移民、美国工资低微的工人和大批青年与知识分子的影响。

古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形成美国的外围领土，但是它能变成美国的阿溪里的脚跟^①。

古巴革命在美国黑人少数民族当中已经家喻户晓，而这些黑人是美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最激进的力量。

当然，美国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古巴革命的主要危险，去年五月策划未遂的政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美帝国主义根据保全自己的高度本能已经认识到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即这个帝国主义目前力量的第一号储备所的巨大革命影响，归根到底，它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在另一方面，它已经了解，在它的近邻，比方说，在“虎口”建立了该半球第一个工人国家又是美国傲慢霸权无法忍受的一种侮辱，并且鲜明地形成了世界舞台上建立的新均势。因此，它决心要使用一切力量制止古巴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进展，并且如果可能还要把它扼杀掉。

古巴革命的巩固和生存将是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力量新均势面前注定衰落和公开无力的最有力的信号。由于这个原因，必须预

^① 阿溪里(Achilles)是古希腊作家荷马作品《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传说阿溪里全身刀枪不入，勇猛超群，唯一的弱点是脚跟；在一次战斗中敌人巴里斯(Paris)用箭射中了阿溪里的脚跟，立即致死。——译者

料到它将不停地阴谋削弱古巴革命并将采用一切手段扑灭古巴革命。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现在领导人提出的诺言，即一旦古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将给予军事援助的诺言是多么真切了。

过去，即斯大林时代，克里姆林宫从不迟疑地鼓动一些革命，利用这些革命为苏联外交、为苏联掌权的官僚主义阶层谋取金钱实惠，并且无情地背叛他们。

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上次大战时期和战后的希腊革命、南斯拉夫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特别表现了这种情况。

你知道，南斯拉夫和中国所以成功，实际上只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幸运地没有理睬斯大林的建议和指示。

一个时期以来，克里姆林宫对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对殖民地民族和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采取了一种更加肯定的态度。

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如果这种倾向能以巩固，那末就应当举起双手表示欢迎。

不管这是苏联日益增长的力量地反映，世界力量新均势的反映，还是克里姆林宫与北京对抗的反映和中国革命对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地反映，抑或，最后，是所有这些因素地总合地反映，事实总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一新动向目前在世界舞台上形成了一个极进步和极革命的因素。

由此看来，古巴革命在苏联强大力量的支持下，不管怎样，还在中国强大力量的支持下，是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能够继续发展的。

但是，国际群众，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群众，甚而北美洲的人民

力量的支持,对于古巴革命的前途,也同样是重要的。

归根到底,古巴革命的前途将决定于革命扩大到拉丁美洲,决定于革命浪潮在美国的发展。

因此,再一次提出,古巴革命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重要性,因为它是推动这些地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力量。

凡是有助于提高古巴群众生活水平、有助于古巴工业化、有助于消除失业现象、有助于消灭文盲、有助于发展一种自由文化、有助于促进革命群众参加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生活的,都必然对美洲各大陆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

你们是伟大的泛美革命的先鋒。

要充分了解这项巨大的历史性使命的深远意义。全世界无数工人将准备根据你们的言行,为保卫古巴革命而斗争、而牺牲。

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特别首先是第四国际的革命者——在北美洲、南美洲以及全世界,将宣扬古巴革命的成就和重要性,准备保卫古巴革命,反击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并通过革命把它扩大到本国去。

古巴革命万岁,伟大的拉丁美洲和泛美洲革命的先鋒万岁。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薩尔·桑坦和我从监狱向你们,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亲爱的7月26日历史性运动的同志们,致以最亲切的兄弟祝贺。

前进吧,要小心谨慎,以便你们可以继续,就像你们卓越完成的那样,为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和不朽的事业服务。

1961年7月6日于阿姆斯特丹监狱。

十八、一九六二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经济展望

——列維奧·麥丹

誰都知道——我們所领导的运动^①在它的世界會議的決議案中對這一點也已經強調提出——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進展，一般說來比亞非國家更為重要。其中特別有些國家——它們大都已經有一個社會結構比較先進的基礎——在這方面已經有顯著的進展，這種進展，配合着民族資產階級的加強，一直提出並且現在仍然提出了具有它們自己的特點的問題：根據這種情況，它們現在仍然是半殖民地國家呢，還是已經達到了一般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階段？不管怎樣，這種經濟發展並沒有消除，或者甚至並沒有減弱，社會結構方面的根本矛盾，這種矛盾可以綜合地分列如下：

(1) 經濟發展的速率，如果存在的話，一直是部分或者全部地被相當可觀的人口增加的速率抵消了；

(2) 工業化的過程仍然只限制在某些地區，而且一般限制在某些社會階層的手中，所以這些國家中的大部分地區的經濟結構仍然是落后的農業經濟；

(3) 失業和半失業的情況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創傷，它把足足一千二百多萬的人民逐出了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外；

^① 即第四國際的活動。——譯者

(4) 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种戏剧性的选择：究竟是在情况还一直在日益恶化的农村苟延残喘地活下去，还是眼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城市里去，住在可怕的窝棚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拉丁美洲的大都市中，大部分地区都籠罩着这种悲惨的乌云；

(5) 国内的社会结构和帝国主义的铁掌是阻挠更广泛的、比較平衡的經濟发展的天字第一号的障碍，因为很显然，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經濟就只能有一种符合于外国投資者和本国最得势的階級中某一部分人的需要和利益的不平衡、不統一的发展，而所謂的商业“自由化”，对外汇沒有控制权等等情况，都只会有利于国外的竞争，国家资源的浪费和它将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我們很容易料想到的……；

(6)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真正的致命的弱点仍然是它們的生产结构和对外貿易。流入外国資本家手中去的剩余价值，一方面由于原料产品价格的变化，一方面又由于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已空前地增高，这种价格的变化，从朝鮮战争結束后的繁荣时期开始，一直就不停地产生一种对經濟最落后的国家极为不利的情况。甚至根据官方的文件所透露的消息，原料产品的价格的下降，在性质上已足以抵消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基础上所提供的一切經濟“援助”可能产生的效果。

所有这些本身已具有爆炸性的困难和矛盾，在拉丁美洲无法逃避一种国际威胁的时候，甚至以一种更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国际威胁把拉丁美洲的經濟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跟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經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問題置于一个显著的对比的地位。

丢开这些假想的方面不談，不管这些方面是多么令人不安，在

某些国家中(阿根廷的經濟癱瘓、智利和巴西的財政困难和通貨貶值、玻利維亞的經濟解体,在那里民族工业差不多已經是被置于毁灭的境地),最近或不远将来的經濟前景看来甚至更为暗淡可悲。根据所有的迹象来看,既然沒有重大的革命运动发生,就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使这种社会結構中的矛盾,不用說完全消除,甚至也不可能略为減輕,拉丁美洲在国际商业中的地位必然只会每况愈下,特別从欧洲共同市場的前进的发展和它跟許多非洲国家的联系来看,更是如此。

說明拉丁美洲貿易在世界貿易中日益沒落的材料是尽人皆知,而且是不容爭辯的。共同市場的发展是同时也牵涉到农业生产的一一加上这一組織对組織內的各种产品給以直接和間接的保护,已迫使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不得不降低某些产品的价格,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减少了挽回的貨物的数量,这就不但在欧洲市場上給它們造成了困难,同时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也給它們造成了困难,欧洲国家一直就試图,现在也正努力着甚至要拿它們的农产品打入第三世界。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也很可能会看到,和法国有密切联系的非洲国家以同样的产品在共同市場中将会享有的有利的条件,对它們却是一种严重的打击。

在这种阴暗的前景中,参加欧洲共同市場的那些国家已經宣称准备提供的財政和技术援助也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补偿,許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感到从外来的威胁已經触及到它們目前的經濟神經中心了^①。更为一般地来讲,正像我們已經強調过的,世界市場

^① 受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濟委员会書記处邀請,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参加一次重要會議的某些专家最近发表了一个很有趣的报告——甚至在这个报告中,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出在 1937—1938 年間拉丁美洲出口貿易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 10%,1961 年拉

愈来愈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貿易的情况——再加上如果新的困难愈来愈严重——将会抵消美帝国主义，为保卫自己的一个重要障地，在拉丁美洲可能作出的一切努力。

各統治階級的政治危机

社会結構中的矛盾的拖延和恶化在許多国家中将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难关，这种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表现为领导权方面的危机，使那些领导力量几乎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改变政府的事件，而且大多出之于尖銳的政变的形式，都出现了领导退出政治舞台和自动辞职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在这里我們还有必要向大家讲一讲阿根廷政权中长期存在的危机、夸德罗斯的离去和巴西不同階級之間的剧烈斗争、厄瓜多尔和圣多明各的起义运动、貝坦科尔特政权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以及秘魯的軍事政变嗎？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从根本上說，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正日益迅速地遭到削弱，这情况在某一特定阶段，已使大部分甚至所有的群众运动处于瘫痪状态。这一过程在秘魯已达到极其严重的阶段，秘魯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已失去原来的影响，它所领导的工会也日益面临全部破坏的危险。在委內瑞拉，愈来愈残暴的迫害和某些在农村中进行的惑乱人心的改良主义——它的欺騙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已再不能掩盖貝坦科尔特的民主行动党的破产，这个党早已招致了多次的分裂和許多人的叛离。在玻利

丁美洲出口的貨物按价值算降低到 6.5%；在 1934—1938 年間欧洲共同市場所购买的拉丁美洲貨物的数量，占欧洲总入口量的 11%，而在 1960 年却只占 6%……。

維亞，只是由于在短期內看不出有任何其他的出路，因而才使人产生一种虛假的印象认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相当稳定，而其实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它已經大大失去了从前的威信，这一点，除开其他許多証明以外，从1962年6月的选举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分子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这次胜利^①。从根本上讲，事实上是由于这些运动彼此进行了合作，才迫使它們作出了他們原来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并推动它們慢慢走上了和美帝国主义公开妥协的道路，从此以后美帝国主义——从它自己的观点来看当然是正确的——就认为阿亚·多萊、貝坦科尔特、埃斯登索罗(更加上它的“左翼的下属萊欽)是它在拉丁美洲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在所有这些民族运动中(它們除了自己的特点外都有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根源)，只有庇隆主义还能使自己免于衰亡。它一直还能控制着人民群众，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为了了解庇隆主义所以能够免于衰亡，并能够大有希望地等待时机以便再次登上舞台，实际就是由于它——带着某种殉道者的色彩——退出了掌权的地位，那我們只要回想一下在庇隆倒台之前的那几年，在庇隆和他的參謀本部都认为自己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权力的那几年所面临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就完全够了。

在智利方面，目前以阿萊山德里为中心的領導集团是以各种力量的联合組織作为基础的，这情况使人想起的倒是某些欧洲国家的經驗，而不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經驗(这自然也是这个国家的經濟結構和特殊社会組成的反映)。可是这个领导力量也慢慢被削弱了，很难說在即将来临的两年中，在各种困难的考驗的前

^① 实际上弃权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根据官方的偏低的估計已經达到60%以上。在較大的矿区中心，只有几百个选民投了票。

面，它是否能够照常存在下去。这个国家事实上是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过渡阶段，在那里所有的力量都积极准备着，等待1964年的来临，如果把1964年单纯只看作是一个选举年，那不过只是一种表面的看法，在这未来的前景中，智利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维持住目前的这个不稳定的局面，它们甚至在选举的问题上也愈来愈失去了自己的阵地^①。

在已经达到高潮的拉丁美洲的风暴中，像墨西哥这样的大国，竟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外。可是非常显然，这种稳定局面的根源，恰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墨西哥在三十年中所经历过的革命运动的浪潮。在这种浪潮的压力下，同时出于自我保存的必需，墨西哥的资产阶级相当深入地推进了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次革命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差不多都还完全没有动起来的时候进行的，其发展的结果甚至形成了一种反对美帝国主义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的斗争。三十年间的革命危机，加上人民群众的动员，自然在客观上包含了出现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可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这种可能竟未能实现。资产阶级，由于能够使自己确保对人民运动，特别是城市中人民运动的极大的控制权，由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经济基础，由于取得了对于具有保守传统的拉丁美洲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它们整年胆战心惊地生活在帝国主义的魔影之下，只要能够得到从帝国主义的筵席上撒下来的一点面包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所不能想像的政治上的明确性和灵活性，从中取得了很大的利益。不用说，墨西哥的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并不是十分稳定的，特别是在农村，甚至在现阶段也经常

^① 可以参看1962年9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部分选举的结果，在那次选举中，政府的候选人已经落后，而人民行动阵线，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

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力量，可是我們如果忽略了或者低估了墨西哥的局势中所存在的某些非常特殊的特点，更重要的，如果我們不考虑到它們的存在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这一国家中群众运动的新的高涨和成熟的过程，那将是完全錯誤的。

在它們的这种领导权的危机中，包含着对本国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威胁。这种危机的另一方面也正导向一些新的，相对說来，具有独创性的經驗。这些經驗包括军队中的某种力量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很值得在这里提一提，那种力量将会打破拉丁美洲的反动的和一成不变的保守主义的传统。

比方說，1962年7月秘魯的軍事政变，实质上，不能算是一次反动的政变，因而也就不应该，比方說，拿它和3月的选举以后的阿根廷軍事政变相提并論。佩雷茲·戈多伊的执政委员会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寡头政治和买办资产阶级阶层的，而且至少在一开始，对公开支持阿亚·多萊的美帝国主义，怀着明显的仇恨。更有意义的是，执政委员会当时还受到了作为候选人的貝朗德的支持，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更为“先进的”分子們极力支持的人，他所感兴趣的是某种工业的发展和一般生活水平的改善^①。

同时，戈多伊的政府乃是某些革新的倾向得到加强的結果，这种倾向首先产生在军队中，主要是在军队随着軍事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某种现代化的过程的刺激下形成的。它首先表明的是国家普遍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不单纯是为了爭取使軍用武器發揮最小(原文如此——譯者)的效率。有很多軍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年輕人都十分注意那些阻止任何改革的障碍，决心要和那些跟帝国主义关系最密切的反动分子們进行斗争，因为他們使一切进步

^① 編輯《工农》杂志的革命工人党(托派)的同志們，在7月18号发表的一个声明中，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都变成了不可能的事。由于这个事实，在军队中就存在着某些改革的愿望和公开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里面也多少包含一些畏首畏尾的反帝思想。他们中有某些人毫不犹豫地希望进行国有化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从他们的主观愿望来看，越来越多的军官都极不愿意被迫处于以屠杀为事的地位，不愿意压制由保守分子的软弱性和愚昧无知所促成的革命浪潮。

换句话说，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我们看到一种纳赛尔式的军政主义倾向已开始显露出来。这种倾向最近在阿根廷也有所表现，胡安·弗朗西斯科·格瓦拉上校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这一倾向的最积极的代言人。在巴西，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更要早得多，而且已经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那里有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南里约格兰德的军队，已经彻底抛弃了民族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公开反对彻底亲帝国主义的势力^①。

关于每一具体情况的前景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总的说来，所有这些企图规模都是很有限的，运动涉及的范围在客观上，甚至在主观上都非常有限。这个大陆上的根据地的经济前景我们已经根据这里的具体情况（那就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发挥更大的影响，各种领导力量，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全都各自为政而且日益削弱）作过一番简略的概括，很显然，旧的公式既然已经失败了，“新的”公式肯定也没有成功的希望，特别是由于这些新的公式始终梦想着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军事政权，在这种政权下群众只能担任一种消极的角色，同时如果他们拒绝担任这种角色，那他们最后或者就会变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① 根据最近在巴西出版的一部书中的某些段落，似乎像儒利奥这种领导人也对军人给以相当的重视，他看出在巴西的军队中，某些将军都表现出了“民族的”和“接近人民的”倾向。

問題的症結却是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經濟情況甚至會每況愈下。在社會結構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可能取得平衡。可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是否一定可能很快得到一種有效的革命領導力量，這種力量將能夠在全國的範圍中把他們重新聚集起來、組織起來，領導他們進行一種具有決定意義的革命鬥爭呢？或者另一方面，這種真正的領導力量的缺乏以及舊的組織形式的長期停滯和癱瘓狀態，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將是革命的主要障礙呢？

首先，在拉丁美洲建成其他工人國家的前景，甚至在不久的將來，看來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可是如果目前這種有關領導力量的情況還會繼續下去，那末在某些國家中可能產生的結果就會是總的情況愈來愈壞，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情況就會真正地日益解体。這種現象在玻利維亞早已出現，而且現在還正繼續着，在那裡，經濟情況已經比十年前更壞；在那裡，社會危機仍然絲毫沒有減緩；在那裡，人民群眾隨時都準備着戰鬥，而且也正在進行着有效的戰鬥；在那裡，歸總一句話，數年來一直存在着兩種相持不下的力量。可是儘管有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那裡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到現在仍然安然無恙，敵對的力量始終也沒有能夠推翻他們，把政權爭奪過去。這一帶有戲劇性的例子不過是許多類似情況中的一個，我們決不能把它看作是例外的少有的現象。

農民階級、城市里的窮苦人民 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當統治階級由於它本身的危機已開始動搖的時候，群眾運動在兩個方面進一步取得了進展，一方面是動員的規模日益擴大，另一方面是群眾運動的許多先鋒隊的組織在政治上已經迅速地成熟

起来。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进展是一种直綫式的运动，那当然是錯誤的，甚至是未免过于天真了；这种运动可以在某些地区有效地发展着，但是也总随时受到許多挫折，走过許多弯路，表现了許多沒有取得任何具体結果的缺乏統一意志的热情，或者进行了某些过早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活动，其結果不但沒有达到主观的願望，甚至还招来了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削弱的危險。可是，总的說来，比如像在过去的两年中，运动是始終向前发展着的，它所取得的新的成就，甚至对未来的一段时期都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推动这种进展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古巴革命。除某些具体情况不同之外，它和俄国革命代表着欧洲的工人运动一样，一直代表着，现在也仍然代表着，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在卡斯特罗取得胜利，古巴走上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之后，这一大陆的社会和政治的分界綫，不仅在先鋒队的眼中，同时在广大群众的眼中，也已經变得非常明显，非常确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緒就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无法調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已經認識到，只要能打倒这个泥足巨人，反帝斗争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就可以彻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前景已不再只是一种为期尚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它已經通过具体的事例使自己呈现在人們的眼前，表明自己不久就可以实现；它甚至完全清除了那些所謂的先鋒队的混乱思想，以及他們在考虑到拉丁美洲革命的“必要”阶段，和现阶段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工人和农民爭夺政权的斗争具有“不现实”的性质等問題时所表现的畏首畏尾、犹豫不决的态度。

古巴革命的影响首先推动了农民群众，使他們在自己原有的客观的基础上日益达到政治上的成熟。正像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过的，城市地区已經出现了某种工业上的发展和某种现代化的过

程，可是在广大的农村，除了很有限的一些地区之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难堪的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在在皆是。如果再追随那个在许多都已古老的道路，使农村的发展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附于资本主义向农村的渗透（这种渗透的过程即使是非常缓慢而且是极不平衡的。再加上，更具体地说，随着传统的个体农民经济的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加深——这种危机说到最后，反正总不能逃避现阶段世界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甚至随着人口的增长），任何旧日的“平衡”已经不再可能了。饥饿的情况不但没有减轻，对于日益增多的人民群众倒反变成了更直接的威胁，他们一方面为时势所迫需要在某种形式下进行战斗，另一方面又都离开农村拥挤到满是窝棚的小市镇上去。

由于住在市镇上的人和留在农村的父母和亲友还经常有联系，由于许多学生在放假期间还会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拉丁美洲的农民，甚至那些最落后地区的农民，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听到关于古巴的消息，了解到古巴的革命和那里所进行的重大的农业改革等等。这样他们的传统的反抗精神，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地，甚至常常是绝对地，日益恶化，现在就被强有力地鼓动起来，并且在思想意识上也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概念：**有必要和古巴一样干**。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广大的各个阶层逐渐明确地认识到了为完成“古巴式的”斗争所必须的方法：武装的革命斗争，游击战。必须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的信念，已经在农人中随时表现出来，特别是在那些已具备革命条件或革命运动正迅速发展的国家中。

必须进一步指出，物质上的极端贫困和饥饿并不是在农民中培养反抗精神的唯一因素，归根结底，运动渐趋成熟的情况在这样的事实中也已经反映出来，那就是，甚至在那些土地问题或恶劣的

生活条件并没有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地区，农民，在古巴的范例的刺激之下也已经动员起来，因为他们也希望彻底改善他们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希望能够逃避愚昧无知的处境，自己受到教育，不能让自己被排除于日益进步的现代生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使自己具备足够的彼此交流思想的工具。毫无疑问，在拉丁美洲，城市对农村的诱惑之一，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就是脱出农村生活的孤立状态，参与市镇中的集体生活，因为在市镇中，即使住在窝棚里的那些可怜的人，也有可能接触到人类生活上的进步（即使他们得到的只是一点面包屑，只是这种进步的发臭的副产品）。

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和学生中，古巴的影响也同样是非常显著的。这些人长时期以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他们对一个不能使他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的社会表示不满，对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活动表示痛恨，在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发生联系时又经常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因而在没有一个能够指出明确方向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情况下，始终徬徨歧途。古巴革命对于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变成了“卡斯特罗主义者”，他们在本国中极力想把那些愿意追随菲德尔和他的战友们所走的道路的那些阶层组织起来。尽管他们有许多错误，也可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个问题我们回头还要谈到——目前正是在这些组织中在热情地讨论着，在不同的拉丁美洲国家中进行革命的具体道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任何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忽略了这些问题那就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阶层在为革命运动提供干部方面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特别不能忘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学和大学中，成千的年轻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在城市里念书，而一年中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消磨在农

村里，或者至少和农村的人保持联系，所以他们是和农民运动取得联系，以及使革命观念和革命的方向深入农村、深入各居民点等等的主要的通道。

最后，在拉丁美洲革命局势紧张化的情况下，至少在某些国家中，那些严格说来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那些失去自己的阶级，或者一般说来非常贫穷，聚集在大城市里悲惨的贫民区里的那些人也可以发生某种特殊的作用。无家无业，在利馬的市区、在里約热內卢的贫民区，或者甚至在圣地亚哥的某些地区过着非人生活的十数万人，并没有和拉丁美洲的群众的革命潮流完全断絕联系，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发出了令人不能忽视的威胁性的怒吼声。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表一种爆炸性的力量。他们中的年轻人首先可以变成宣传鼓动家，进一步推动在群众中驟然爆发的憤怒和反抗情緒。使得长期存在的大量失业的灾禍无法減緩的不发达状态，以及由于新的因素的出现反而更加恶化的悲惨的生活情况等等，都使我们可以假想这种爆炸性的潜力将会越来越聚集更大的力量。即使只从这一部分人的数量上来讲，如果对他們完全忽视，按照传统的看法认为他們不过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较为活跃的社会中的社会副产物，或者低估他們的潜力，不相信他們能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尽管根据一切証据，他們都不可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也将是完全錯誤的。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就可以帮助我們在现阶段更好地完成我們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特殊的組織工作。

面临死胡同的旧的领导和新的革命热潮

以我們已經进行分析的这些基本特点为基础来展望一下最近或者不远将来的前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

因素，那就是得到工人階級和农民階級支持的各种組織的情況和路綫，也就是先鋒隊內部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說一方面現在已經存在着一种帶有積極傾向和表現的巨大的革命熱情，那末，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一些對於人民群众的偉大鬥爭迅速取得勝利不十分有利的因素。

在世界其他地區具有重大影響的傳統的工人階級政黨，在這裡，除了某些眾所周知的例外情況之外，只能指揮極有限的一部分力量，這些力量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之下也常常是无足重輕，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不管怎樣，如果它們從拉丁美洲情況的激烈化和從古巴革命的反響中可以得到一些相對的好處，可是它們所處的地位，使它們並沒有能夠從其中取得主要的教訓，而且在現階段，群眾運動的絕大部分的力量並不是團結在它們的周圍。

另一方面，這種運動和組織本身，在絕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中都發現自己處於極端危急的情況之中，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根本上講，這些組織，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革命形式中，代表着一種革命的民族主義潮流，這一潮流以農村和城市的人民群众為基礎，同時受着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它們的行動在客觀上只是表現為，為了一部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進行着有限的反帝鬥爭。面臨着近幾年來的具有重大意義的發展，特別是在加勒比海一個工人國家的出現，所有這些組織都感到自己應該適應目前的情況作出某種選擇。在某些國家中，我們看到它們差不多是公開地選擇了反動的道路，因而付出了在群眾中的影響日益下降的代價，在另一些國家中，不同的客觀條件過去容許它們，現在也仍然容許它們進行活動、並仍然擁有對群眾的控制權。最顯著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主義，庇隆所領導的力量，因為並沒有當權，可以不必立即作出任何具體的選擇，相反的，卻可以暫時使自

已处于一种十分自由的地位，空口唱一些迷惑人的高調。巴西的劳工党，虽然在程度上差得很远，情况也大致相同，在过去十五个月的重变化中，它始終保持着具有重大影响的位置。

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比如像这两个最大的国家的人民群众，发现他们自己的传统的組織大部分都变成了自己的障碍，或者領他們走了許多弯路。在巴西，讓我們再說一遍，如果这些組織的影响是极有限的，由于没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运动，在本国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影响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力量或組織的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絕大多数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人和农民。但另一方面，誰都不能不想到，这个政治組織的水平极低的领导如何很容易就使这一組織在阿根廷最近期間經歷的一次危机中，担任了(基本上是)消极的角色。

最为消极的情况是，某些民族主义的組織的危机并没有能够产生新的运动，产生通过在现阶段担任具有决定性的角色而能够完成别人未能完成的各种任务的新的领导。这里我們只就几种不同的情况举出几个例子：在秘魯，容許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組成叛逆的人民革命同盟(即现在的左派革命运动)的那一部分力量，目前仍然非常薄弱，路綫不明，在群众中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在玻利維亞，任何能够取得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极端厌恶的某些組織的信任的新的旗帜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在委內瑞拉，左派革命运动尽管忽然发展起来，可是这个党，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和策略，同时由于接受了共产党的保护，内部已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因而也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爭夺政权，尽管貝坦科爾特的政府已經越来越众叛亲离了。

最后还有一点，在許許多多国家中，都有大量的集团和組織，它們聚集了一批值得重視的、主观上革命的成員，可是它們始終只

作为一些先鋒队在那里活动，既缺乏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没有可能配合当前的政治现实作出有效的行动。同时我们还必須說明，在它們之間經常存在着力量分散和极端有害的各自为政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基本政治观念有所分歧而产生的。至少在某些国家中，重新整頓組織的工作应该看作是在这准备阶段中的首要的工作。

可是这些組織的这种分散的缺点尽管存在，我們决不能因此忘了，分析到最后，这种缺点实际是古巴革命影响的反映，这种影响在先鋒队的組織中触发了具有无限前途的政治热情和思想意識上的热情。目前的种种論辯和討論肯定并不是学院式的，这些討論常常提出了现阶段或即将来临的新阶段中的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真正的問題，这一点实在是非常可貴的。

遵循着古巴革命的道路，所有这些組織都已經得到一个結論，肯定傳統的領導，不論是跟国际方面的活动有关的，还是只限于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的傳統的領導，都已經失敗了，因而有必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甚至极有限的几个組織，如果它們了解一个革命路綫的綱要并能使用有效的斗争方法，那也就是具体地說，拒絕接受“和平”过渡或“民主”演化的概念，了解使用革命暴力的必需性，在組織农民游击队和城市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发动真正的革命武装斗争，那它們就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些一般是由很年輕的人組成的（但有时也包括一些曾經和并且现在仍然和傳統的政党有过联系的一些具有斗争經驗的人）組織中，对这一問題，更有較為細致的分析和討論，它們考慮到在某一个国家的特殊的政治现实中，武装的农民的作用究竟應該完全居于主导地位，或者相反的，它只能作为具有决定性的群众斗争的一种輔助力量。我們必須認識到，甚至在一个由于它的特殊

的社会结构使得第一种情况成为不可能的国家中，农村中的某些武装斗争活动，对于城市中的运动也可以构成一种必要的刺激，这些城市中的运动，我们有时可以把它看作是和传统的领导一贯遵循的路线完全一致的。在某些客观条件更为成熟的国家中，甚至这种讨论也显得有些过时了，因为总的解决方案在那里已经被接受了。在那些国家中，对问题进行分析的重点首先是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特殊的具体的形式，以便有效地发动游击战，而不是要求从国外弄来一批武装力量，而且这种游击战必须是和一般的农民斗争具有密切联系的。

具有这种成分和这种性质的组织，当然很可能有发展成为冒险主义或单纯行动主义的组织危险。我们从来也没有强调眼下必须立即准备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某些国家中，因为这包含着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必要的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可是我们必须批判所有那些跟真正的运动脱节的虚假的和空想的观念，而且要更强烈地反对一切时机尚未成熟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只会招致采取行动的人本身的失败和牺牲，也反对任何一种玩票式的或甚至滑稽可笑的冒险行为。

具有更成熟的斗争经验的人们似乎也已经感觉到这种危险，他们也开始在批判某些甚至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行动，比方像委内瑞拉起义的插曲。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能很细致地来研究这些已经形成或者才刚刚萌芽的革命组织和古巴人的关系中的一些细微和复杂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菲德尔的领导集团对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发展越来越更感兴趣，而这些运动的比较激进的、方向更为正确的领导人并无意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更不用说把自己放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相反的，他们对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路线不遗

余力地进行批評，甚至当着到古巴进行訪問的代表团的面对他們大肆攻击。追随着哈瓦那宣言的根本方向，他們坚持武装革命斗争的必需，坚持农民阶级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而拒絕“和平”的斗争方式以及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但这并不說明现在古巴人已同这一或那一团体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們給人的印象是，由于他們在传统的組織中大力推动左的傾向，所以他們仍然是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活动。

在这些組織本身之中，尽管許多领导都极力想把古巴事件說成只不过是一般的彼此支援或借以进行宣传的問題，卡斯特罗的影响却仍然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阿根廷，庇隆主义內部的分化更为加强了；在巴西，儒利奥的运动更被向前推动了一步；在智利，在社会党和工会內部引起了真正的巨大的反响，至于像委内瑞拉一类的其他的一些国家那就更不用說了。

特别是在共产党內，古巴的經驗刺激了某些組織和左派的力量，它們有的已經从有地位的党派中分裂出来了^①。很显然，官僚主义的领导集团已看到自己面临一个主要的矛盾：一方面它們只能贊揚古巴的革命、古巴革命的领导以及諸如《第二次哈瓦那宣言》等等重要的文献，另一方面，它們又始終希望采取一个甚至是否定菲德尔主义的方向，否定《哈瓦那宣言》的根本方向的政治路綫。我們絲毫也不怀疑各共产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机会主义分子們搬弄花招的技巧；可是由于他們坚持自己的这种态度，他們就不可能防止自己陷于孤立，并使他們的組織日益削弱（这些組織至多只能像古巴一样，到了最后关头才又坚强起来），或者甚至会看到自己受到某种严重的危机的打击，在这种危机中左的傾向很可

^① 我們想到，比方像巴西的共产党就已从普列斯特斯的党派中分裂出来，此外还有秘魯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也已經分裂了。

能就会抬头。如果在像智利这样的一个国家中，这一性质的发展显然对于革命运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們承认智利共产党具有一定的力量)，那末即使在那些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小的国家中，干部的获得和忠誠的、客观上革命的、基本方向正确的战斗人員的組織也将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特殊的现实和对未来的展望

我們从目前的局势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的共同的特点，决不能使我們低估了某些特殊的条件。事实上，在这非常普遍的共同的发展中，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彼此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差异对于我們理解现阶段的具体现实，和对于最近以及稍远的未来的展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可以使我們知道，在群众运动的某些部分日趋成熟的过程中，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样最有效的策略方針。我們只要很粗略地分析一下多少是根据过去的經驗挑选出来的一些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在秘魯，統治階級的危机終于使得我們前面已經談到过的佩雷茲·戈多伊的解决办法得以实现。可是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个显然只是暫时的解决办法，在不久的将来有关領導力量的重大問題仍然会被提出来的(比如說在选举之前，如果进行选举的話)。

可是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城市和乡村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已經出現了一段时期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內部的危机，由于选举上的失敗，更重要的由于工会中心組織为了支持阿亚·多萊发动的总罢工的可悲的失敗，而更为恶化。因为这样，只在本国的北部还有一些影响，但不能得到全国大多数人支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工会的範圍內也失去了居于多数的地位，事实上，某一些重要的工会已經脫离了秘魯工人联合会，准备单独組織和它平

行的工会的中心机构。建立新的工会中心的斗争，以及逐渐使所有的工会从属于这一中心以求避免工会内部的分裂的工作，乃是现阶段秘鲁群众运动的中心任务。这个中心机构很可能将由受着共产党影响的人来领导，或者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与之下由一般的“社会主义者”来领导^①。这将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最重要的是，这样工会运动将可以从一切资产阶级集团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最后获得阶级自治权。

在农村中，革命的形势正在迅速形成。在不同的农民阶层中，首先是在各农村社会集体中，必须追随古巴的方向、为武装斗争进行准备的思想正在到处传播。占领土地已不是什么很少见的事，而且在某些地区，政府当局认为暂时不予干涉看来是比较聪明的作法。在另外一些地区，相反的，又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这里我们只要讲一讲弗朗西斯科·法莱霍斯的例子，他是国民警卫团里的一个年轻的士兵，可是他却把许多大学生组织起来，并且有一天带着这些大学生解除了当地的警察的武装，准备跑到山区里去。可是在他们走脱以前救援的军队赶到了，于是发生了一场极端激烈的战斗，结果法莱霍斯和一个农民领袖全都牺牲了^②。我们还必须指出，在起义山谷中，雨果·布朗科有一个时期曾经组织过游击队，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这个游击队对于农民占领土地的活动是大力支持的^③。

毫无疑问，**山区和海滨**的运动的发展对于秘鲁的革命将有决

① 铁业工人工会是由革命工人党(托派)的著名的战士领导的，革命工人党(托派)在建筑工人工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的工会中都有很好的影响。

② 和他们一同牺牲的还有梅塔，她临死时大声喊叫着：“革命万岁！”她的名字是一切革命者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③ 雨果·布朗科在有一次和记者谈话的时候，毫不隐讳地表示赞成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第四国际所采取的路线。

定性的作用；毫無疑問，依靠一些**游擊支隊**的力量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農民革命運動組織的條件已經存在了。非常可能，正像秘魯的先鋒隊似乎已經理解到的，在和農民占領土地的运动取得直接联系以后，武装斗争，特別是最初的一个阶段，一定可以逐漸发展。农民出身的大学生阶层和知識分子对于在农村組成自觉的先鋒隊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将最終保証城市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間的联系。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不遺余力地把这些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的人爭取到自己的队伍里來。

在智利，这种冲突並沒有表现为如此尖銳的形式，从 1960 年的形势来看，运动甚至有逐漸減緩的趋势。可是正像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保守陣綫仍然滿足于它已經享有的有限的稳定，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仍只是单枪匹馬地进行活动。事实上，統治階級在制定自己的策略的时候，首先考慮到的正是这个政党。他們是不是應該尋求一个新的包括基督教民主党在內的組織方案呢，或者他們甚至，在候選人的問題上，到 1964 年还准备进行分散的斗争嗎？难道不是有人为了防止人民行动陣綫获得胜利正主张采取大胆的嘗試，要提出一个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行动陣綫的联合候選入嗎？不管怎样，在我們看来，最后的这两种作法实在是一个未免过于大胆的游戏。

另一方面，直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說具有真正的政治力量的某些农民阶层所进行的活动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因素。这些活动也帮助在智利引起了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的討論，以及在智利是否可能进行游擊斗争的討論。可是，一般說來，在一个像智利这样的社会結構的国家中，我們不可能事先看到农民將起着主要的作用；战斗將主要是在城市里进行。另一方面，甚至即使我們願意接受这样一个概念，认为农民將只起着推动的作用，只是燃起一个巨

大的运动的一星火花(古巴人自己对这个概念的应用似乎未免过于广泛一些),非常明显,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在1964年以前——一切想普遍地直接进入游击战或武装斗争的企图都是不可避免地注定要遭到悲惨的失败的。

归总一句话,我们决不能忘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传统的组织对群众运动仍有巨大的控制力,这种控制是不可能因为某些考虑不周的行动就会完全消除的。更具体地说,总有那么一个阶段是工人和农民群众都非常注意的。事实上,在智利,一般都认为,1964年的选举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于这一点差不多是一致同意的,其中包括那些已经考虑到,传统的组织在群众中看来已经变得软弱无力的人,以及那些公开宣称要单独采取行动的人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依目前群众的精神状态来看,1964年的选举肯定将是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阿兰德取得胜利,而这个胜利要想取得,又必须使它,仿佛作为最后清账一样,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本文作者根据直接得来的资料,了解到,至少在一个地区,农人已经在纸上作下了分地的计划,准备在阿兰德获得胜利的第二天付诸实施。

所以非常明显,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仍然还须要和传统的组织打交道。如果左派更明显地得到群众的支持,那就很可能会出现分裂。1964年的事件可能会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使得各个力量之间须要进行一次新的安排。人民行动阵线在选举上可能获得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在国内引起非常激烈的斗争,而且甚至人民群众也许不会甘于失败的^①。

^① 现在在那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情绪,大家认为,只有在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破坏的情况下,阿兰德才有遭到失败的可能,而如果结果真是这样,人民群众肯定将有所反应……。

在玻利維亞，革命十周年所提出的一个平衡表对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是并不十分光彩的。經濟情况非常严重，因为錫的生产已經大大降低，出口的貨物在总的数量和价值方面差不多都减少了一半，各个矿場差不多全都停工了。技术革新看来完全沒有希望，因而我們也无法想像情况在短期內会有改善的可能^①。其他一些工业部門也感觉到所謂的解放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将近60%的工厂去年都倒閉了）。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日益削弱的过程仍然在繼續着，它的领导机构一天比一天更为官僚主义化；最近一次选举的未来結果已經被过分地強調，玻利維亞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完全变成了萊欽那一帮人的事情，其中还参加了不少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尽管表现出某种消极的情緒，可仍然在进行斗争，甚至公开在街头进行活动，而农人們却总能够用他們的剧烈的示威运动把政府当局轰走。双重力量并存的迹象仍然明显地存在。

正像我們已經說过的，不幸的是，群众在对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感到失望以后，再看不见任何其他的可以經常吸引着他們的注意力的旗帜。玻利維亞总工会本身看来十分缺乏內容，游击队只在某些地区存在，而且也缺乏全国性的配合。总结起来說，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們應該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革命的形势将有某种的发展，可是革命組織和革命领导的严重缺乏却严重地否定着我們的这种看法。

关于巴西，那里的情况我們只有一般性的了解，不可能用簡單的几句话作出更細致的分析，这里我們將只着重談两个方面。

^① 由于对过去的所有主付給极高的贖买金，工商企业的现代化过程遭到了严重阻撓。

群众运动仍然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組織起来的，这种組織形式各个地区都完全不同，全国統一化的企图沒有一次不是以失敗告終。更糟糕的是，这个运动始終还完全沒有脫出民族資產階級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这里且只說几个更重要的例子，在某些地区，控制这个运动的是巴西工党(PTB)和它的工会組織；再像圣保罗这样一个重要的市鎮中，大多数的工人都追随着夸德罗斯主义(夸德罗斯领导的运动)的路綫，在东北地区，組織农民的是左翼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儒利奥，他被看作是巴西的第一号卡斯特罗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考虑到那些多少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組織，这种組織一共有好几个，可是其中沒有一个具有重要的群众影响。巴西的共产党(普列斯特斯)已經大大丧失了原来的力量，在将来即使它希望(它实际并不如此)采取真正的独立自主的行动，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巴西共产党最多只不过能算作是一个力量有限的先鋒队的組織。巴西的社会党始終依賴着这方面或那方面，甚至工会的有限的支持，可是它本身完全是混乱一团，它看来更像是由許多完全不同的团体組織起来的一个联合机构，而不像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活动的統一的政党^①。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可以了解，为什么群众和他們的組織，尽管在这种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中，尽管其中一大部分都有一定的战斗性，却仍然常常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各不同阶层和不同派系所进行的重大活动中，仅仅居于观望的地位。在过去的十五个月中，这种情况曾經两次出现，一次是古拉特取代夸德罗斯的地位的时候，

^① 社会党内一方面有許多机会主义者，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政府的部长里馬；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接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富于战斗性的左派人士，同时也有弗朗西斯科·儒里奥这样的人。

一次是在去年9月的那一次危机中。结果是，在群众的帮助之下，古拉特取得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同样是依靠群众的支持，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可是到最后，他却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右派取得谅解，并且和肯尼迪携起手来，对肯尼迪来说，他是他在拉丁美洲的最值得重视的同盟者。这情况向我们表明，巴西的资产阶级手里仍然拿着我们不一定能够忽视的王牌，即使现在他们完全失去了经济或社会的稳定性。

所有这些都表明，总而言之，巴西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极端困难和极端复杂的，只有通过毫无成见的、随时注意到最新情况的细致的分析，他们才有可能认清群众运动的更深刻的发展过程，才能使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能够担当起促进的作用^①。

阿根廷近年来，由于几个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不同倾向的力量形成，已经经历了一个无比严重的危机。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比如像弗朗迪西主义的结束，“游击派”和军人中的“现代派”之间的冲突，纳赛尔主义的倾向的发展以及阿耳索加赖和阿兰布鲁这样一些人所进行的活动。在阿根廷的政治生活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庇隆主义所造成的现实，庇隆主义一方面阻挠着任何政治上的稳定（这种稳定即使不会使庇隆完全倒台，至少对他是不利的），而另一方面，它对于群众运动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怀疑，阿根廷的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是否可以再拿出庇隆主义的那张牌来，对马德里的流亡分子敞开大门。可是真正的困难在于，在1962年的拉丁美洲，谁也不能说，

^① 在巴西，进行游击战的问题是早晚会具体地提出来的。不管怎样，我们决不能忘了在像巴西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幅员广大的国家中，在落后地区进行的游击战可以很长时间进行下去，而并不能带来中央政权的迅速的衰落和灭亡。

像庇隆重新取得政权这一类的事是否可能只是一个序幕。在人民群众的眼中，庇隆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反帝斗争的旗手，是反寡头政治并求得他们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旗手。他们会把他的重新得势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会更增加他们的战斗性和斗争积极性，而整个运动也可能迅速向前发展，突破庇隆和他的参谋总长所拟定的目标。在革命的根据地，只有庇隆将军自己对这些情况是完全理解的，除开那些空洞的声明，他的各种具体的行动完全可以表明，在最近的将来，他根本无意进行有效的争夺政权的斗争。这一问题很可能会长时间拖延下去，摇摆于两种倾向（完全排除庇隆势力，或者必须依赖这种势力）之间的资产阶级，最后只能或者参与目前的群众运动，或者，由于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扶植庇隆的势力，让他重新登台^①。

在同样的情况下，庇隆主义的运动本身决不能防止内部的动乱，而且肯定将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内部的分歧将会越来越严重，等到国内的情况更为复杂的时候，除开其他许多必然的结果之外，古巴革命的影响肯定会更为显著。^② 当以弗拉米尼为主要代表的左翼的工会组织自动地开始向左转（这一点庇隆自己也认为是有必要的^③），而弗拉米尼自己又站在古巴一边（比如像他接见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所说^④）的时候，右派的马蒂拉却向军队中的“温和派”和游击队提出建议，拒绝“向左转”，而为争取进步联盟喝

① 在9月中旬的危机之后，前一种倾向看来更为显著了。

② 除开一般的影响之外，古巴革命的主要效果是刺激了先锋队中的各个阶层的人对问题进行思考，对许多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而过去他们是沒有这种习惯的。

③ 参看庇隆关于必须使他的理论配合当前现实的某些宣言。弗拉米尼所提出的十点中包括：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主要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禁止资本外流、无偿地没收地主的财产、由工人控制生产、消灭商业中的黑市活动等等……。

④ 参看1962年8月18日的《团结报》(L'Unita)。

干部和积极分子。拉丁美洲的现实，甚至在某些国家内部——我們只要想一想像巴西这样的大国就行了——是非常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各种变化、各种意想不到的动乱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可以說必然会发生。一切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像对待瘟疫一样拒絕一切不正当的計謀，緊緊地抓住拉丁美洲的现实，用辯証的观点来解释这些现实，及时地抓住其中最具有前途的倾向。那些只能空喊口号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中也永远只会空喊口号，他們不了解新的革命組織和领导自然会从群众运动本身的发展中产生出来，不了解把某些微小的組織視为神明是完全荒唐的，这些組織，不管它的成員的精神如何^①，最后必然毫无成就，而只能把別人取得的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狂妄地把自己放在高級顧問的地位。因此，我們必須有最广大的胸怀，認識到革命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这表明，我們永远不能够滿足于实质上只不过是一条条原則的概括性的結論，而必須注意每一现象的具体的发展，并依靠以对事实的深刻認識为基础的具体的分析。正确的調查研究的态度，在具体的行动方面，必須包含最大的灵活性，最高的敏感，一方面在政治上作出决定，一方面又明确地反对組織崇拜。在客观条件許可的情况下，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随时准备發揮大胆的主动性，正确地参加那些最大的运动（尽管那些运动的发展方向和他們的行动并非完全适应），并通过在运动中担任自觉的先鋒队的角色，来刺激这些运动。如果必要的話，他們必須有勇气让人民考虑当前的现实，讓他們了解群众运动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對我們來說，大多是决不能凭簡單的意志活动加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① 如果，像現在某些不正确的自称为属于第四国际的組織一样，这种組織的政治路綫一般还是原始的，組織机构又完全是官僚主义的，那当然就更糟了。

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同樣享受着一個巨大的便利，那就是，他們也是一個國際共產組織的革命歷史潮流中的一部分，這個組織擁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遺產和政治遺產，這就是它的非其他任何東西所能代替的認識的工具和鬥爭的工具。可是他們又不應該完全以這種遺產為滿足，因為如果這種遺產不隨時更新，並以新的經驗加以充實，最後就可能會變成一種障礙。古巴革命，除開其他許多事情之外，更表明，由於一個革命已經達到高度的自覺，整個的革命現實已發生了新的變化。對於願意在我們生活的這個特殊的時代發揮最大的作用的人們，這裡還整整有一個大陸可以供他們進行分析、進行活動。

1962年10月20日

附注：甚至秘魯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中的某些積極分子所組織的對信貸銀行的攻擊的插曲也極有意義地表明了這個國家的氣候，特別是，我們看到，工人和學生對於被監禁的人提出了巨大的熱情的支援。

十九、印度决定性的十年

——列維奧·麥丹

近几年来，印度的实际情况常常受到歪曲。在麦卡錫式的极端分子看来，印度是一个染上中立主义病毒的国家，因此必須把印度看成是个有“共产党人”进行最阴險的活动的場所。在“开明的”資產階級看来，情况恰巧相反，印度是个进行先进的“民主的”試驗的地方，这个試驗的結果是要証明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則是錯誤的，不需要以“中国方式”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的迫切問題。在工人运动內部，流行的傾向是为之百般辯解：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間，印度的榜样被用來說明实现社会主义要遵循的道路的特殊性质，尼赫魯甚至以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半社会主义者的身分而被授以文凭。^①即使在最近，关于今日印度的性质和它的統治階級所追逐的目标，还可以看到至少可以說是令人奇怪的言論。^②

① 陶里亚蒂在 1955 年 3 月向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认为应该重視下面的事实：“印度国大党是个政府党，但是它宣布打算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国家的經濟，”而在另外一个显然是提到印度和喀拉拉邦試驗的地方，他說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經暴力而接近取得政权的不发达国家的榜样。”（參看《再生》月刊，1957 年 5 月 5 日，第 248 頁。）

② 我們特別指 1959 年 10 月 29 日（《前进报》）米兰版《社会主义世界》栏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顾最基本的材料，硬說“印度，总的來說，虽然它的統治者並沒有每隔二十四小时就声称一次它在意識形态上所作的具體选择，却証明它已經吸收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說，我們认为，我們这么說是不錯的；印度采取了它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应该使人们对于这种辩护词性质的言论，提高一些警惕。7月底，尼赫鲁通过一个不论其形式和内容都是不民主的法案，宣布解散印度联邦中他的党并不占支配地位的唯一邦政府。一个月以后，加尔各答的饥民示威受到血腥的镇压。在同一时期，还利用边境事件进行了巧妙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在人民群众中加剧反华情绪。这三件事情各无联系，但是正因为如此，却说明了印度的实际情况及其统治阶级的目前倾向。对此所以不能汲取什么教训，那是因为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宣传和辩护的动机——必须证实已经决定的总路线或所谓“新”公式——仍旧占上风，而不愿意对现实情况和构成现实情况的一切因素进行直接的分析。

五年计划中的现实情况和虚妄幻想

印度独立后最具有特点的试验，无疑是五年计划的试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在几年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尚在起草阶段。大家都知道，正是由于这些计划——以及与这些计划同时提出的声明^①——人们就很容易把当代的印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者“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还要加以论述，不过目前先从实际成就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不用说，由于出发点的水平很低，根本谈不上在五年或甚至十年内达到很高的绝对水平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要在百分比上取得很大成绩，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甚至这第二点也没有做到。

^① 当时有“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的官方提法。

在决定这个计划的政策的时候，特别提出的是长期目标。当时谈到要在十五年之内把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在二十年或二十多年之内把按人口计的收入增加一倍。^①而根据其他方面的估计，消费量到 1977 年才增加到 77% 少一点点。

马上就可以发现，姑且假定达到了这种目标(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对于印度和它的人民的迫切问题，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内是不会有什麼解决的。只要想一想按人头计的收入加了一倍之后价值也没有多少这一点就够了，因为在 1944—1955 年这种收入只有大约二百七十卢比(一卢比等于十分之二美元或一先令五辨士)，比落后的锡兰这样国家居民的收入少一半以上。^②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要肯定所规定的起码指标。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投资保持在国民收入的 5% 与 6% 之间(去年提高到 7%)，这就是说还不及英国统治时期的每年平均数。投资中最大的一部分用在水利和农业上，而在总计划中工业只分配到全部投资的 5%。^③

最后结果是，国民收入增加了 18.4%——每年大约 3.6%——而按人头计收入的增加量甚至更加有限(只有 10.8%)。^④农业生产的指数增加了大约 20%，要是考虑到同时期的人口的增加，这个数目就不算多了。尤其是，一般认为，即使这一点也是靠了气候

① 根据比较悲观的计算，在 1977 年才可能把按人口计的收入增加一倍。(参看《印度年鉴 1959》[《India: A Reference Annual 1959》]，第 200 页。)

② 在同一时期中，美国的按人头计收入是九千四百十卢比，英国是四千三百五十一卢比，日本是九百七十八卢比(参看达斯和查特吉合著：《印度经济的发展和问题》，1957 年，第 1 页)。在后来的几年中，印度个人收入增加极微(1955—1956 年之间是二百七十三卢比，1956—1957 年是二百八十四卢比[暂估]。)

③ 运输投资得到同样的待遇。

④ 按人头计的消费量增加的还要少，只有 8% 左右。

特別有利才達到的（而用來作比較的一年的氣候却很不利）。^①

工業方面的增加却比較顯著，大約 40%，即每年 8%。但是應該指出，這是在私營工業方面，而不是計劃範圍內的公營工業方面取得的。此外，雖然在某些方面（即電器工業）增加的百分比較大，但是在其他重要部門中，情況却不是如此：它們基本上停留在戰時的水平上，有時甚至還達不到這個水平。^②

第二個五年計劃所根據的投資分配標準顯然是不同的，指標也高得多（投資率提高到 10—12%）。重點放在工業發展的需要上，投資額占總數 19%，農業投資額則要減少 5%。國民收入的增加要比前一計劃高一些，達到每年 5%。^③計劃要增加得特別多的是煉鋼工業。^④至於農業產量，增加在 18% 左右（糧食增加 15%），這就是說，一開始就決定比前一計劃所取得的成績要低。

第二個五年計劃定於 1961 年結束，因此要得出全面的結論為時略嫌過早，尤其是因為必需的統計數字總是要經過一定時期的耽擱以後才會公布。但是這個計劃不可能完全實現這一點是越來越明顯了，因為有關當局在經過了兩年的實踐以後不得不重新估計一下實際的可能性。在實踐中，有些指標已經降低，有些指標已經列為據說只能在有條件情況下實現的一類。更糟糕的是，根據一定跡象來看，計劃經過這樣修改以後是否能夠實現還是有些疑問的。

① 參看上引達斯和查特吉一書第 534—535 頁。並參看不僅在這個問題上——杰爾曼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印度經濟》一文，刊《第四國際》1955 年 10 月號。

②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鋼產量大約一百零七萬噸，1940 年初達到一百二十五萬噸。關於制成鋼，1941 年到 1956 年約增加 20%，而 1956 年鋼材所達到的水平卻低於 1939 年（參看《印度年鑑 1959》，第 323 頁）。必須記住當時的總的經濟情況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由於朝鮮戰爭後所造成的景氣，通貨膨脹趨勢的消失等等）。

③ 參看上引達斯和查特吉一書第 399 頁以下。

④ 從一百三十萬噸增加到四百三十萬噸；參看上引書第 546 頁。

在宣布作此修改的官方文件中，虽然指出原因在于通货膨胀的趋向和外汇方面的困难，但是也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阶段，国民收入每年增加不到4%，而农业产量同1953—1954年所达到的水平相比却开始下跌了。^①

至于新计划的头几年，制成钢在1957年比1956年略有增加之后，在1958年却开始下跌（甚至同1956年相比也是如此）。钢铁和水泥生产也有同样的下降。黄麻和棉花的制品产量在1957年就已有下降，制糖工业也是如此，而前者在印度经济中据有颇为重要的地位。^②

农业中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不仅自从1953—1954年以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指数反而下降了。1956—1957年度同1957—1958年度之间的下降特别显著。^③

这不仅意味着计划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大概也不会达到，同时也意味着现在已经很严重的农业问题有变得甚至更加严重的倾向。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时期里，绝对量的增加也刚刚够应付人口的增长，而且还是在低得可怜的满足人民需要的水平上做到这一点的。一旦产量若有降低，那末除了增加进口以外，就没有其他出路，增加进口对全面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很容易想像的（我们绝不要忘记，外汇困难在这三年中已经造成了什么后果）。但是，要是真的如所说的那样，按目前情况那样发展下去，粮食供应和人民需要之间的差距，到1965年将达到25%，而只有每年粮食生产

① 参看官方出版物《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估价和前景》第3页。关于实现计划可能性的比较悲观的看法，参看上书第19页和《印度时报》1959年9月1日所刊《计划》一文。

②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20—323页。

③ 1952—1953年度至1957—1958年度之间的五年中，总指数如下（以1949—1950年度为100）：102.0, 114.3, 117.9, 123.8, 113.4。同期粮食指数如下：101.4, 120.1, 114.5, 114.9, 119.9, 108.3。

增加8%以上才能保證維持最低限度生活的需要，那末这个解决办法，如果不作重大修改的話，即使作为治标应急的办法，也是很充分的。^①根据战后发展的全面情况来看（包括五年計划时期），是完全有理由采取絕對悲观的看法的。如果不发生新的情况，农业生产基本不足这一点，对于印度整个社会結構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会发生不可估計的影响。打破局面的第一个迹象可能就是在这一方面出現的。

由于采取了計划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具有“社会主义”意图，可能有人认为，在印度工业經濟的总范围内，由国家管理或直接控制的公营經濟的作用是很大的。事实上，情况并不是如此。

我們姑且承认，在开始的时候，用心是良好的，而且在一独立以后，就馬上宣传了国有化的思想，甚至由官方出面来宣传。但是事实上后来却又决定不进行国有化，国家只限于管理和控制新成立的工业企业。^②在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工业投资方面，公营經濟就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个五年計划也只想确立一个平衡的比例，这意味着，私营工业的比重仍占举足輕重的地位。^③因此，甚至

① 福特基金会所提出的关于印度粮食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些論点，它还具体地说：“想像不出有一个进口和配給計划能够应付这样大规模的危机。”（从1959年7月11日法国〔《世界报》〕重譯过来）。却尔斯·贝特尔海姆則說，“在1966年，收获不足将达三千万吨粮食。”（参看1959年8月1日的《瞬息》周刊。）

② 关于官方在这个問題上的思想发展以及公营和私营經濟要发展的不同类别的企业，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237—242頁。

③ 工业新投资情况的材料如下：

	公 营 部 分		私 营 部 分	
	預 計	实际結果	預 計	实际結果
第一个計划	94	60	233	233
第二个計划	524	—	535	—

（单位为千万卢比）

此外，从总数來說，公营部分与私营部分投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計划中是50对50，在第二个五年計划中應該是61对39。

在过去一味捧場的某些人士也看到,在实际上,印度的公营經濟比西欧某些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公营部分还要少。^①

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条件

在过去十年中,工人的报酬情况又如何呢?

在这一方面,官方統計数字是不完全的,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但是即使如此,也有足够的迹象可以得出一个全面的情况。

特别是关于工資和利潤总数同工业純产值的比較情况,可以收集到下列的数字:^②

(单位为千万卢比)

	1950	1954	1955
純产值	528.6 (100)	732.6 (136)	775.5 (145)
工資	236.4 (100)	292.3 (123)	319.5 (135)
利潤	292.2 (100)	440.3 (150)	456.0 (156)
工資占产值的比例	47.7%	39.9%	41.1%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工資收入的百分比已經下降。在其他方面,即使在这个时期,似乎也出现了相对的增长。

关于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資的比較数字,沒有 1954 年以后的官方材料,但是同起始点(1939 年为 100)来作一番比較却是很有意思的。工資指数在 1940 年上升到 108.6, 1943 年跌到 67.0,

① 參看意大利《团结报》, 1959 年 12 月 12 日。

② 參看全印工会大会(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联合会)总书记 S. A. 丹吉的《在厄尔納庫兰姆的总报告》。

1946年是73.2。然后又有了上升，其間只有一次短暫的間断，一直到1952年上升到101.8，1953年又跌到99.9，1954年回升到102.7。因此，1954年的指数低于1940年和1941年。甚至生产率的增长似乎也是很輕微的，不过比起工資来要显著得多：1940年104.2；1943年84.5；1946年74.7；1953年105.8，1954年113。^①

关于工資增长的材料从其本身来看不是很完全的，不仅是因为材料来源的关系，而且也因为它們有时仅仅是限于名义工資。不过总的来說，在第一个計划期間所增长的数日，就是不算它們像在1956年和1958年之間那种实际上的下降，也是很有限的。^②

不过，工人报酬的显然冻结，或者說細微的增长（更何況有时还要下降），表面看来是并不十分严重的，除非考虑到绝对水平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极其低下的。1956年所发的工資全国平均数事实上是1,212.7卢比（最高估計为1,525.9卢比，最低为786.4卢比）。在那一年，紡織工人的平均工資是1,244.5卢比，金属工人1,487.9卢比，石油工人1,686.2卢比。^③

1959年9月，作者有机会会见孟买和馬德拉斯的紡織业工会

①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89頁。

② 同1947年（最低限度工資法通过以前）比較，1954年的指数是131，1955年145，1956年138（实际工資）。（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391頁。）名义工資統計（1951年为100）到1954年为止是107，1955年113，1956年115.9。（参看《1956年工厂工人的收入》，刊《印度劳动公报》1958年3月号第22頁。）但是如果考虑到物价的变化（1949年为100，1954年101，1955年96，1956年105——参看《印度年鉴》第302頁），1956年与1955年相比就有了下降。关于1958年的情况，参看S. A. 丹吉：《危机和工人》，1959年版第68頁。丹吉并在上引报告中着重指出，在1954年，工資水平大体上停留在1939年的水平上（第24頁）。

③ 参看上引《工厂工人的收入》，第13—15頁。

領袖和工人。孟買紡織工人集中，共有好幾十萬人；馬德拉斯則僅僅白金漢·蘇那的克工廠就雇有一萬五千名工人。根據作者在那裡收集的材料，一個工人的月薪，在孟買大約是一百二十盧比，在馬德拉斯還要低一些，很少達到一百盧比（在白金漢工廠，高度熟練工人占全體工人10%，他們的工資才能達到二百到二百五十盧比）。

一盧比大約只等於美金二角，英幣一先令五辨士。因此，雖然我們知道，五個盧比在印度可以買到的東西比一元美金在美國可以買到的東西為多，任何人都可以從這個匯價看出這種工資是多麼可憐。根據作者個人的觀察，在孟買，最簡陋的房屋每月租金在十五到二十盧比之間，一條工作褲或一件工作服要十五到十八盧比，一雙便鞋要四到五盧比，一磅大米約半盧比，一磅麵包也要這個數目。^① 在工廠里，工人花0.37盧比可以吃上一頓粗飯，在下等館子裡則要半個盧比。

但是統計數字和材料只能提供一個關於印度人民群眾悲慘處境的粗略概況。僅僅知道一個孟買紡織工人在低得可憐的工資中得拿出15%到20%來付房租，這件事本身是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的；要了解它的充分意義，我們必須知道他得到的是什麼樣的房子，什麼樣的環境。

在孟買，工人一般都住在貧民窟里，或者郊区小村庄里。其中有一個村庄叫沃利的，住的都是工人和漁民。矮小的屋子擠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些髒得要命的小巷。沒有衛生設備，結果可想而知。赤身裸體的孩童們同牲畜一起在垃圾堆中找食吃，他們營養不良，百病叢生。房子都是東倒西歪，一到雨季屋頂沒有不漏雨的。

① 這些顯然是約略的估計，特別是考慮到度量衡極不一致。

作者被邀到一个职员房子里去，一共只有一间小小的厨房和一间六英尺见方的房间。一家六口，两个大人四个小孩都挤在一间。他们在这邻近还算是幸运儿，因为付得起二十卢比的房租。另一个幸运儿是孟买市政府职员，付得起七十二卢比一月。他住在一所五层大营房里，里面还有一个内院。其中的“公寓”都是一个小厨房和一间房间（小的是六英尺宽，九英尺长，大的是九英尺宽，十二英尺长），这个幸运儿的一家十二口人就住在这样的一套公寓里。

在贫民窟里，情况还要可怜。房子都很大，像学校和兵营。中间有一个长长的过道，十分黑暗和骯髒。一下雨，水深没踝。所谓“公寓”就是过道两边的单间房间，实际上和窝一样，每一间住上四五家人家。因此就不难了解，一到晚上，你就很可能踩在躺在过道上的人的身上。^①

孟买还是最先进的城市，大家一致公认，加尔各答的住房情况最糟，且不谈印度农村所特有的那种真正半开化的草屋。^②处在这个人间地狱的最低层的，是群众中间最困苦的人——失业者，他们身无分文，有不少人夜间只能在大城市的人行便道上露宿。

① 公共住房建筑是极其不足的。而且，工人和职员常常没有能力缴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房租，虽然这种房租实际上并不太高（例如，在孟买，在沃利区，有供中产阶级居住的房子，一间房，一间厨房，一个阳台，附有卫生设备，租金在五十到七十卢比之间）。

② 从孟买到苏联人建筑的钢铁厂所在地加尔各答比莱的路上，有一个现代生活的绿洲，最先进的技术成就是那里的特点。但是四周却是一大堆旧草屋，甚至帐篷，使人看到了一个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的互相矛盾的图景。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钢铁工人的居住条件据最近一个社会党的“调查”报告说是令人作呕的。二万名工人住在草屋里，没有水源和卫生设备。去年由于霍乱就死了一千人。（参看《领导者报》，1959年9月7日。）

农业的印度

不論工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是多么严重，不論城市群众所面临的问题是多么困难，我們在农村中才是接触到了这个次大陆上最迫切的问题。这个次大陆在今天来说，肯定还是农民占多数。^① 尽管有五年计划，生产停滞最显著的是在农业方面。使大多数感到过去历史所造成的瘫痪影响的，也是在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里，社会隔离现象最为顽固，貧困的根子最深，也是在农村地区里，有千百万人失业或半失业，他們成了印度的无数疮疤之中最碰不得的一个。^②

印度农业的一些最基本的特点是很容易概括的。土地仍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利用，全部耕地只占其中 19%，而全部耕地中又只有 15% 得到灌溉之利。^③ 生产主要仍是为了一家人的消费，生产率非常之低，按人口计的产量也是如此。^④ 土地分割的现象很普遍，有时甚至很悲惨。^⑤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是不难了解的。我們不用詳述农村地区的一般生活情况：有很清楚的迹象表明这种

① 据 1951 年人口调查，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 82.7%（参看《印度年鉴 1959》，第 45 页）。在 1956—1957 年间，国民收入约有 50% 仍来自农业（同上书，第 189 页）。

② 当时曾任美国驻新德里大使的却斯脱·鲍尔斯谈到大约有五千万全失业或半失业者，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估计在七千万人。据贝特尔海姆说：“……印度农村人口约有 40% 不参加生产，或者只参加极为有限的工作。”至于城市失业，有些地方十分严重（加尔各答约有三十五万人），参看《印度年鉴 1959》，第 192—193 页（其中数字可能大大低于实际情况）。

③ 耕地占地理面积 38%，占可用面积 61%（参看《印度年鉴 1959》，第 195 和 251 页，并参看《印度经济》，第 76 页）。

④ 参看达斯和查特吉著《印度经济》，第 57—59 页。估计 1950—1951 年按人头计产值，农业方面是五百卢比，工业是一千七百卢比，运输是一千六百卢比，小企业是八百卢比（参看《印度年鉴 1959》，第 19 页）。

⑤ 参看上引达斯和查特吉一书第 65 页中举出的两个有意义的例子和《印度年鉴 1959》第 196 页上的统计数字。

情况要比城市里糟糕得多。^①我們只来简单地談一談农业工人的处境。

这类工人在印度經過了长期的发展后目前已达到五千万人的可观数字,占整个农业人口 20%。^②他們的悲剧——这样說一点也不錯——是得不到充分就业机会。約有 85% 的农业工人只有部分時間的工作。一年之中,平均工作日只有二百天多些,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农业的活。而另外 15% 这类工人是长年失业的。^③即使他們运气好找到了一天的活,所挣的工資最多也不过一个半卢比,妇女和儿童还不到半卢比。因此,在全国按人口計平均收入在二百六十四卢比的那一年,这些不幸的人們中間最不幸的人們只得一百零四卢比。^④

印度农业和印度农民的这幅图景是极其阴曆悲惨的,因此人人都从社会經济結構中去寻找禍害的根源。統治階級也不得不提出土地改革問題。因此,我們就来談談独立后印度历史上这重要的一章。

印度农村的結構,其特点是存在着一个不事劳动的地主階級,他們收取大量的地租。^⑤而且,正如前資本主义时期的重要残余仍

① 按 1951 年 8 月到 11 月进行的一次調查,每个人的平均每月开支在农村需 24.22 卢比,城市需 31.55 卢比(四个大城市需 54.82 卢比)。(參看《印度年鑑 1959》,第 197 頁)。

② 在 1882 年,农业工人有七百五十万,1931 年增加到三千三百万,1951 年增加到四千九百万(參看《印度經济》,第 110 頁,《印度年鑑 1959》,第 265 頁)。在有些邦中,达 45%(參看《土地問題的某些方面》,1953 年版,第 8 頁)。

③ 參看《印度年鑑 1959》,第 265—266 頁;《印度經济》,第 111 頁。

④ 分別參看上引书第 215 頁和第 111 頁。

⑤ 根据專門研究这一問題的兰格尼迦,以各种形式出現的地租高低不等,从全部收获的 40—50%,到 60%,最高达 80%(參看《贫穷与印度的資本发展》,牛津 1958 年版,第 55—59 頁)。

旧存在的落后国家中一样，劳动农民的负担由于中间人、高利贷者和各种各样寄生虫的盘剥，而更加加重了。^①种姓偏见也是一个障碍，这种偏见虽然在表面上受到反对，但是实际上却根深柢固。不难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不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靠地租收入获利的人——他们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是一点也不想改进耕作的，因为他们反正可以收到高额地租。中间人也是如此。至于农民，他们耕种的土地并不属于他们，处境朝不保夕，也没有兴趣作什么改进，而且即使有心想改进也没有条件这么做。此外，由于地租高，就有不少资金投在购置土地上，使得工业投资受到了影响。^②我们在这里只举一些简单的统计数字和分类材料。

首先，关于土地分配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多少可靠性毋需我们提醒读者——表明，约有20%的农户没有土地。其次，是拥有五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户，据估计，这一类农户占四分之三，一共占有六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另一方面，拥有二十五英亩以上的土地的农户只有5%，一共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面积。再具体分析一下，把只占有二十五英亩多一些的人同占有一百多英亩甚至二百五十英亩的人分开来看，那么就可以看到一些更有意义的情况。^③

印度有三种土地关系，历史由来已久，还是英国统治的第一阶段就开始的。

(一) 所谓利育特瓦里 (ryotwari) 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土地属于耕种这块地的农民，他必须向国家直接缴税，而不经地主或其

① 参看《印度经济》，第124—125页，桑纳 (Daniel Thorner)；《印度农业展望》，1956年，第10页。

② 参看上引桑纳书第11—13页，《印度经济》，第125—127页。

③ 参看《印度年鉴1959》，第195—196页。

他中間人之手。实行这一制度的土地面积据估計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36%。^①

(二) 所謂柴明达里(zemindari)制度, 根据这一制度, 土地属于地主, 地主負責向政府繳稅(有两种柴明达里制度, 一种是固定的柴明达里制度, 一种是临时的柴明达里制度, 区别是前者稅額固定, 后者可作修改)。地主本人并不直接耕种, 而租給佃戶耕种。实行固定的柴明达里制度的耕地据估計占 35%。^②

(三) 所謂馬哈尔瓦里(mahalwari)制度, 土地属于村社, 由村社負責直接向国家繳稅。

受到批評的显然是柴明达里制度, 尤其是因为地主远在外地, 往往有各种不同的中間人介在地主与农民之間, 使得情况更加恶化, 这种中間人有的采取轉佃的形式。从經濟观点来看, 所以有可能产生这种层层剝削的现象, 是由于土地价值越来越高, 地主向国家繳納的賦稅本来已有稳定趋向, 而由于地价越来越高, 却又对这一趋向起了对銷的作用。^③

但是, 正如桑納(Thornor)在上引的著作中所正确地着重指出的那样, 轉佃土地最后成了一种基本上合法的事情。在不少的情况下, 甚至在实行利育特瓦里制度的地方, 占有土地的人也不直接从事劳动, 而把土地出租給人。因此,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种人往往与柴明达里制度下的地主是一样的。此外, 我們也不要忘記, 高利貸者常常很活跃, 正如桑納所指出的, 一个高利貸者“本人虽不是地主, 結果却同地主一起, 不必从事任何农业劳动而坐享一份

① 參看《印度革命工人党綱領》, 第 15 頁。

② 不幸, 在引証的材料来源中, 实行临时柴明达里制度的面积是算在第三种制度(馬哈尔瓦里制度)的耕地面积之內的(全部百分比为 39%)。

③ 參看上引桑納书第 8 頁。

农业收入。”^①最后分析起来，一个比較普遍存在，而且其成員在起因和法律地位方面显然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他們的共同之点是：它在农业中不直接从事生产却享有利潤和特权——的存在，就是印度农业“問題”的一个基本特点。

我們可以这样来作一种比較具体的分类：上层是由馬立克(maliks)即地主所組成的，他們在农业方面的收入直接来自土地所有权。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把土地出租，而自己坐享其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們也雇用长工或短工来从事耕作。也有地主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留下来的由自己經營。

第二个阶层是所謂基森(Kisans)，这种人根据目前流行的說法可以称之为直接耕作者。他們是小土地所有者，或者是伙种农，他們从直接农业劳动中取得一份足够的收入(这完全是一种假定)来养家活口。他們常常不得不从事額外的劳动——不論是农业的劳动还是非农业的劳动——才能使一家人免于饥餓。基森也有雇短工的，然而这只是少数例外的情况，而且只是在极短的时期以內。

最后一个阶层是馬茲杜尔(mazdur)，即农业雇工和短工，他們在別人的土地上劳动，即使自己有一块薄田，也主要不能靠它来得到收入。

土地改革的限度

印度农村的矛盾现在和过去一样仍旧是那么严重，寄生的負担仍旧是那么沉重，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仍旧是那么恶劣，因此印度一独立以后就必须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当时几乎各方面都

^① 參看上引桑納书第10頁，从法文轉譯。

一致承认，必須按照下述总方針采取行动：消灭中間剝削，保証劳动农民得到安定，限制土地所有量，把土地分配給无地农民。正是按着这个方向，当时曾經尝试采取行动，在联邦的各邦里^①进行了或者計劃了各种改革，并且通过像山姆巴蒂丹(Sampattidan)运动和布丹(Bhoodan)运动那样的典型印度式的运动。

一开始就普遍规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废除柴明达里制度。印度所有各邦都早已通过了这样的法律。^②

但是受到直接威胁的寄生阶级却并不因此而胆怯气馁了。他們玩弄各种各样法律上的和程序上的詭計，始則企图推迟对这种打击他們的法律进行表决，继則企图推迟这种法律的实施。虽然他們要想阻挠改革运动的企图并没有完全得逞，但是他們几乎都达到了目的，使得制訂出来的法律有空子可钻，或者可以在經濟和社会角度方面維持现状，如果不是在法律角度方面維持现状的話。

桑納在上述文章中对各邦的土地改革作了一番具体的分析。有一个例子特別有意思，那就是印度人口最多而土地改革也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北方邦(据桑納說，在其他大多数邦里，效果是很微小的)。

在北方邦，废除柴明达里制度的法律是在 1946 年就决定要通过的，但是直到 1951 年才由議會进行了最后表决(在比哈尔邦，全部程序历时不下八年之久)。寄生阶级就巧妙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来施展各种詭計。不过法律本身也为柴明达里地主們留下了保全自己的余地。事实上，他們有一部分土地——列为未出租的西尔(Sir)和庫特哈什特(Khudhasht)一类，这种土地的佃戶的地位极

① 根据印度宪法，土地改革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与联邦无干。

② 甚至国大党也贊成改革，尤其是因为柴明达里制度是英国統治的最有力支柱之一。

不穩定——可以免于改革。^① 不錯，免于改革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們必須自己是劳动农民才可以保有这些土地，但是所謂“劳动农民”(working farmer)的定义非常之广，因此地主很容易做到这一点。^② 結果很多柴明达里地主能够享受到这种豁免权利，而成了一种新的特权阶层，即所謂布米达尔(Bhumidar)。換湯不換药，原来的地主仍旧繼續占有土地，而且常常是占有出息最厚的土地。而对絕大多数农民来說，並沒有实际的变化：情况一切如旧——包括地租在內，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是向国家交稅，而不是給以前的柴明达里交租子了。^③ 最后必須补充一句，土地只要不是被沒收的，总是有充分賠償的。

至于实行利育特瓦里制度的地区（例如在孟买邦），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保証佃戶地位的安定，实行“公平的地租”。結果，实行的改革比这个要求还要低，因为，即使从形式上来看，古老的教士階級仍旧存在，因此他們用了种种办法来迴避。在这一方面，孟买的例子是很有意义的。其后果之一恰好正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事情的反面：在比較有利的安定条件下保留給佃农的土地逐漸减少，甚至往往連佃农都給消灭了。^④

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措施甚至处在更加落后的阶段：只有在一部分邦里通过了这方面的法律。凡是在宣布了这一法律的地方，这一法律所涉及的往往是将来的产业而不問现在的情况。如

① 在实行改革法之前，北方邦的未出租的西尔和庫特哈什特共有六百万英亩，而其他种类的土地則只有一百万英亩多一些（參看上引桑納书第 20 頁）。

② 四項基本标准不仅涉及实际的体力劳动，也涉及到工資，劳动的使用，农业經營的指導和管理以及遭受損失的風險。另一方面，有些法律规定禁止出租土地，但是却沒有禁止把土地交給伙种农使用。（參看上引桑納书第 20 頁和第 22 頁。）

③ 參看上引桑納书第 20 頁和第 25 頁。

④ 在孟买，减少的数量达到 50%，在海德拉巴邦甚至更多。在安得拉邦，大多数佃农好像都被逐走（參看《土地問題的某些方面》，1958 年，第 67—68 頁）。

果法律也限制现在的所有权，特权阶级总能设法找到空子，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南布德里巴德政府在被解散前不久在喀拉拉邦所通过的法律也包含了显然有利于地主的条款。^①

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也采取了另外一种对印度来说是相当特别的形式。甘地的一个弟子維諾巴·巴維在 1951 年发起了一个运动，其目的是使大地主把一部分土地赠送给无地农民。据这个改良者的估计，如果每个地主平均献出土地六分之一的話，所有无地农民平均就能有一英亩土地。当局决定支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根本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传统思想。

一个依靠占有阶级的“慷慨”而不是依靠无产者的斗争意志的人道主义性质的运动显然是有限量的，喋喋不休来谈论这个运动有些什么样的限制，实在毫无必要。^② 我们只要谈谈一件事情就够了，在 1958 年 6 月，“捐献”的土地不到四百五十万英亩，而其中有一半是在一个邦里（也是維諾巴亲自进行活动的地方）。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事先布置好的善举”：慈善家们乘机把石头太多的或者实际上不能耕种的土地处理掉。此外，在分配这些土地时，还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以致在 1958 年 6 月只分配掉七十八万二千英亩。^③

1952 年官方开始实行的所谓乡村发展计划（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gramme）甚至没有以改变农村结构为目标，而是

① 参看 1959 年土地关系法案。所有权限制在十五到二十五英亩之间，视具体情况而定。

② 在沙（O.G. Shah）著的小册子《山姆巴蒂丹运动和布丹运动》（《Sampattidan and The Bhoodan Movement》）（1955 年）中，可以找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批判。这个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有点机械。

③ 参看《印度年鉴 1959》第 278 页和《印度农业展望》第 74—75 页。格拉姆丹是同布丹运动相仿的一个运动，内容为捐献整个乡村。而山姆巴蒂丹则是捐献金钱或其他东西。

要創立一些上层結構，使得农村有比較过得去的生活条件。由于計劃完全不够充分，甚至在这方面的結果也很微小。在一个农民社会里，最反动的分子今天仍然能起控制的作用，在遭到这样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抵抗的时候，連有些政府人員也不再热心了。

因此，古老的，甚至是远古的势力繼續阻撓印度农村的革新。根本結構最多是稍为有了一些动搖，但是在最主要的方面都是碰也沒有碰一下。不錯，前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肯定受到了打击，在外大地主的地位也肯定遭到了削弱。但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並沒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仍旧处在不稳定的和从属于人的地位，仍旧不能实现基本改革，而沒有这种改革，要使产量有显著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在实际上，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是要創立一个資本主义类型或者資本主义倾向的經營农业的地主阶层和富农。这是像印度社会那样的一个社会要实现資本主义发展——不論如何迟緩——的必要条件。这在过去和现在仍然是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一个必要条件，只要这种阶层的形成能够起相对稳定的作用，而又能够避免由于**历史上已經过时的**而且无法确保群众生活条件有絲毫改善的社会形式的长期存在而带来的危險。^①但是由于寄生的地主在印度社会中繼續发生影响而且由于他們和資本主义成分有着联系，这一目标沒有全部达到。这种情况对于生产水平的影响，上文已經指出。因此，这又一次以实际例子証明了这个可以供其他国家和大陆参考的教訓：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在我們身历其境的历史

^① 关于这一估計，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虽然在其他問題上有基本分歧，在这个問題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印度共产党和非常接近第四国际的印度革命工人党（参看上述《农民問題的某些方面》和《印度革命工人党綱領》），像桑納这样的专家的估計（见上引文）也是相同的。

阶段，资产阶级是没有能力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虽然在理论上来说，土地改革并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俄国，中国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都已经说明，由于资产阶级长期不能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会产生怎么样的一触即发的局势。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规律对印度也同样有效的。

尼赫鲁的“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

本文一直把印度统治阶级作为一个不可争辩的资产阶级来谈的。的确，我们认为这一点是不用证明的，因为在几十年来的印度全部历史中就已经表明了。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时所谈到的一些虚幻的看法等闲视之。但是我们要坦率地说，空谈印度正在进入“社会主义世界”或者正在在目前领导集团的指引下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我们看来是极其荒唐的，因此倒是要这样说的人来提出他们的证据。我们甘愿冒被称为“机械主义者”的危险，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人不论如何善于玩弄骗术，都无法证明印度的领导集团不再是个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也无法证明在这样一个领导集团的领导下印度能够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尼赫鲁的印度采取这样一条特殊的方针，实行五年计划，规划土地改革，采取中立政策，谈论“社会主义式样”。只要稍许考虑一下印度的情况，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印度是靠可以说（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和平的道路”实现政治独立的，特别是因为英国当时相信，它的经济利益可以得到保障，而且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当地的资产阶级，其力量足以防止在独立后马上发生社会革命。英国的估计证明并没有错，不过印度资产阶级得千方百计用一切办法来保持一遇风吹雨打就岌岌可

危的平衡。

上文已經提到，这个統治階級，在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來說，是比較強大的。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我們可以說世界上還沒有这种国家的其他例子。甘地运动和国大党能够創立一个完整的領導階層，它同資本主义国家比較起来虽然还十分軟弱，可是在它的具体条件下却是很有力量的。不用說，根本条件是相对的工业发展所創造的。同欧洲文化的接触，英国所起的統一全国的作用等等也創造了其他的条件。印度的報紙水平甚至比西欧有些国家还高，提到这一点无疑也是有益的，即使这是一个細节問題。一个統治階級是否成熟，也可以从它知道如何建立它的喉舌，它为了教育和启迪它的干部采取什么方式这一点来判断。

在印度实现独立的时候，統治階級的政治工具国大党享有群众的非常广泛的支持。对于这些群众來說，独立不仅意味着政治形式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經濟和社会的变化。不論尼赫魯或者他的合作者都无法忽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在英国放弃印度的时候，中国正发生了伟大的革命，对所有亚洲的人民群众都要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尼赫魯的印度的道路就不可能是蔣介石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須是謹慎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即使它更多地表现在計劃上而不是表现在实际成就上。鉴于反帝斗争記憶犹新，鉴于印度所处的地理位置，鉴于它的經濟利益，^①中立的外交政策就必然比大西洋政策可取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地位——苏联領導人也对这种地位也不是沒有出力支持——尼赫魯的党，尤其是尼赫魯本人才繼續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① 中立政策使印度能够同时得到資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經濟援助。在这一方面，印度所处地位就比中国的地位有利得多。

这就是印度的“道路”的实质。关于“社会主义式样”的言論为这种道路作了宣传上的伴奏，而我們完全可以假定，这种伴奏是很合群众的胃口的。关于这一点，也許有些人对之抱有幻想，但是也有些人却感到担心。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为，正如一个印度高級领导人在显要的資本家們的一个集会上所說的：“这是一个道义上的願望的問題，这种願望迄今为止还没有具体的內容。”^① 它在将来也不会有更多的內容。

很难否认：最迫切的經濟和社会問題还没有得到解决，印度和比較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距离只有越来越大了。此外，同中国的对比现在已明显到十分普遍的程度。可能有人对于中国人玩弄統計数字抱有怀疑，但是沒有人怀疑这个事实：中国已經在质量上占了优势。

如果說要把印度的政治結構，即它的議會民主制度列为它在政治上的优点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說，不錯，在印度联邦里仍旧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統治階級特別——如果不是說只有他們——贊賞这一点。比如說在印度可以組織政党和工会，举行群众集会，出版报章杂志，議員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但是由于国内的具体情况——这是历史发展所决定而在独立时期所具体化的——議會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民主保證都不可避免地有利于統治阶层，而这个阶层却是最反动的阶层。印度問題最著名的专家中，有一个人最近写道：

由于大多数議員都是大地主、高利貸者或者他們的代表，議會制度必然是不利于土地改革的障礙物。^②

关于尼赫魯的民主的真正階級本质，沒有比这更一針见血的

① 参看 1959 年 10 月 18 日的美文《日本时报》(《远东經濟問題》栏)。

② 这是孟德(Tibor Meudo)的話，从法文轉譯。

概括了。因此印度农民认为中国的公社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民主形式，尽管它遭到种种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摧残而致变形，我們也不应该认为他們的评价是錯誤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常常很容易过高估計印度政治条件的一个方面。虽然上述相对的保証是存在的，但是一当出现群众运动的时候，即使是工会性质的群众运动，鎮压也是迅速而无情的。这不仅是指普遍进行逮捕，而且是指經常使用武力造成惨重的伤亡。在去年9月加尔各答粮食示威中，死亡者数以百計，伤者数以千計，被捕者也数以万計。整个城市仿佛一个被敌軍占領的地区。^①

但是，無論如何，最严重的問題仍是发展的前景問題。印度是否有可能长期保持目前的結構，繼續是一个議會民主的国家，而且我們是否会看到，即使是通过必要的演变，經由“民主的”和“和平的”道路轉向社会主义？

最近的一些迹象——我們指的不仅是某些极为粗暴的鎮压措施和在喀拉拉邦所采取的专橫行动，而且也指統治階級內部危机的一些表现——可能是一条新路綫的出现的預兆，虽然这可能仍旧是很遙远的事。一切須視今后几年中局势的发展而定，首先是經濟局势，自然也視群众运动的开展而定。如果經濟繼續保持停滯的状态，如果群众的一些基本要求得不到滿足，那么尼赫魯和国大党所占的优势可能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資產階級就不能再維持議會民主了。在这个問題上，喀拉拉邦的事件已經表明，当民主力量有可能趋向——即使是一部分——不利于資產階級时，資產階級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它。

关于第三个五年計劃，已經有人在預測它應該是什么样子，而

① 作者是这次事件的目击者。

且这种计划的目标似乎是野心极大。^①毫无疑问，印度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目前这个计划的最后几年中和在以后的五年中能够取得什么成就。根据过去的经验，预测只能是悲观的。不过也不能排斥会出现一个比较有利的，或者说没那么不利的情况的可能性，这种情况至少可能继续推迟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如果美国在长期和缓的气氛中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助的话。^②很可能，尼赫鲁会朝这个方向想办法，无论如何，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看到了他的政策在向比较“亲西方”的方向转了。

向着决定性的时刻发展

这里不可能讨论印度群众运动和它最近的发展问题，虽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障碍，妨碍着它发挥潜力，这种障碍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印度的广大幅员，多种的语言、宗教以及其他的分歧，即使在较近时期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等等，都使得群众运动极难以全国规模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即使是最重要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它们的力量分布也是不平衡的，而各地又有地方的政党和组织，它们在某一个地方或邦内力量很强大而在其他地方却简直是没人知道。归根结底分析起来，这种情况造成了群众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弱点：农民缺乏组织。而且更奇怪的是，正是在农业雇工中间，这个缺陷特别显著。^③

① 杜德在印共月刊《新世纪》1959年8月号上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② 杜德在上述文章中說，“美国不仅可能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资助整个计划”，这个计划总数为一千亿卢比，即二百亿美金，或七亿一千四百二十八万五千英镑。要是考虑到美国在1959年的支付差额借方的总数达七十五亿美元，这个说法肯定是夸张了。

③ 土地改革也受到限制，因为农村没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安得拉邦，由于农民组织比较强大，改革就比其他地方彻底和有效得多。

除了国大党仍旧发生很大的影响以外（尼赫魯的个人威望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工人組織能够对群众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們看到了一个使印度不同于——举个例來說——印度尼西亚的根本因素。

在独立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里，我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論点：由于种种因素，群众运动可能引导到社会党方面去。但是这个論点沒有証实，社会党歷經几次分裂，现在又遭到其他一些类似政党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有些地方有时是很剧烈的，因此它的影响比較有限，主要是在小資产階級中間，而不是在工人或者农民中間。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采取了保守的政策，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竟从右的方面来攻击尼赫魯。

共产党无疑要强大一些，虽然它的二十七個議員中有半数以上是从两个邦里选出来的，^① 这清楚地說明它的发展很不平衡。今年由于喀拉拉邦事件和加尔各答事件引起广泛的議論，打开了它加强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加尔各答，人們都认为粮食运动是它发动的，虽然这个运动在实际上的领导要广泛得多，而且有許多自发的特征。^② 喀拉拉邦是全国最小的邦之一，共产党在那里占优势。有些人认为，长远的來說，镇压他們会加强他們的力量，而左派中間也有些人认为，南布迪里巴德执行的政策十分軟弱和沒有履行有些諾言，已对群众基础发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客观上帮助了反动派的动員。^③ 关于这一点，现在还很难得出一定的看法。不过虽

① 社会党有二十名議員，国大党三百六十六名。

② 这次鼓动工作是由一个委员会领导的，組成委员会的有十个左翼政党，其中許多政党都自称是馬克思主义者。不过沒有疑問，共产党在委员会中最有力量；尽管如此，它还是不可能独力决定形势的。

③ 有人特別着重指出过，南布迪里巴德政府尽管作了正式的諾言，却动員警察来镇压工人。1958年7月在基隆还有工人被杀。

然几乎没有人认为共产党在短期内不会有强有力的发展，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它的势力正在抬头。根本的一点显然要看它的领导采取什么立场而定，特别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①

无论如何，群众运动内部情况还丝毫没有澄清，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分化和新的结合。只有在那个时候，印度革命才能说它已找到了自己的领导。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在发挥作用的和一定会加剧的因素，事实上也就可以从最具体的意义上来说印度革命是存在的了。在这个有四亿居民的次大陆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模巨大的爆炸性因素。新资本主义的道路、渐进改良的道路、减轻贫富不均的程度的道路是永远走不通了。在目前情况下，印度群众的在短期内的前途仍旧是贫困和被压迫的前途。

但是，种种矛盾虽然能够维持一个时候，却是朝着在一定时期后爆炸的方向发展。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停滞所形成的严重问题——我们看到，这是在不久以前出现的——，如果考虑到统治阶级力量所依靠的群众的恐惧和偏见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渐消失，如果考虑到印度群众是不断沸腾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而且特别是中国的榜样对他们越来越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考虑到国家（从广义上来说）和“文明社会”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印度的根子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子要浅，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不会太远了。将会出现的社会改革——它可能在1960年在印度出现——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世纪的历史上留

^① 印度共产党在战后的时期中政策迭有变化，不过现在是趋向于有批判地支持尼赫鲁的政策。所以支持尼赫鲁，显然是由于向民族主义浪潮让步，甚至在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问题上也向民族主义浪潮让步。印度共产党也强调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通过民主和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论点。

下一个可以同俄国和中国的两个革命所留下的痕迹相比的痕迹，但是要是认为这种社会改革能够不打破现有结构而在某种“民主的”和“合乎宪法的”方式下发展，那就太荒谬了。

1960年1月1—3日

